

沈慕羽研究论文集

何启良编著

# 历史慕羽



林连玉基金出版

历史慕羽

何启良编著

# 历史慕羽：沈慕羽研究论文集

## Sim Mow Yu in Malaysian History

---

编者：何启良 Ho Khai Leong

校对：黎翠雯、伍雪仪

出版：林连玉基金

LLG Cultural Development Centre

321-D, Lorong T. A. R. Kanan (1),

Off Jalan Tuanku Abdul Rahman,

50300 Kuala Lumpur

电话：03-26971971/2

传真：03-26971970

电邮：info@llgcultural.com

网页：<http://www.llgcultural.com>

定价：RM30.00

出版日期：2011年11月

印刷：永联印务有限公司

Vinlin Oress Sdn. Bhd. (25680-X)

No.2, Jalan Meranti Permai 1, Meranti Permai Industrial Park,

Batu 15, Jalan Puchong, 47100 Puchong,

Selangor, Malaysia .

国际书号：978-983-41441-6-6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

Cataloguing-in-Publication Data

[Li shi Mu Yu]

历史慕羽 / 编者：何启良

ISBN 978-983-41441-6-6

1. Sim, Mok Yu, 1913-2009. 2. Educators--Malaysia--Biography.

I. Ho, Khai Leong, 1954-

923.7595

---

# 序：沈慕羽研究的意义

---

■ 何启良

---

沈慕羽（1913-2009）是马来西亚的优秀子民、华文教育奋斗者、文化推动者、持续的写作人、时代的大好人。他的一生跨越百年，也见证了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发展、进步、挫折与动荡。

沈慕羽在马来西亚文化史、教育史、政治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对他的研究在学术界、文化界已经开始受到重视，这几年来教总出版了许多有关他的书籍。这一本《历史慕羽：沈慕羽研究论文集》收集了2009年12月举办的《历史慕羽》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大部分论文。我希望它是研究沈慕羽另一个重要阶段的开始。

论文集十篇论文的重点不同，环绕着沈慕羽一生的不同阶段、他的政治和教育贡献、文化思想与活动等，论述里不缺批判意识，进一步指出沈慕羽在他的时代的大小局限。论文内容精彩，读者可以研读，我不必多作注解。这里我只想谈谈有关马华历史与沈慕羽研究的几点观察。

首先，是一个较大的议题，即马华历史研究人员的栽培。马华学术界历来甚少有深刻的历史人物研究，有几个原因。第一、学术群体意识薄弱，所谓“马华学术界”，虽然大学学府设有研究院数十年，在国外获取高等学位者亦不少，但是基本上仍然没有成型。第二、学术界对研究议题共识并不深，彼此的交流有限，集体的大型计划，尤其是编写人物方面，更是困难。几项的大型学术工程，如《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篇》和《马来西亚历史与人物》不过都是十年前的成绩。现在马华研究人员有增加的趋势，无论是数量或素质，现在已经有所改善，的确一批新起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术人

员，在各领域都形成了一批生力军。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马华百年，到了现阶段，应该是可以做一个阶段总结以及累计资料、整理资料的时候了。这就是我们这一代学术人员的时代任务。无论我们是从战后算起，还是独立1957年算起，马华历史面貌发生了诸多的变化，但是有许多的延续性。如今马华历史的广度、宽度和深度，都足以让我们做深刻的研究。也就是说，确立马华历史论述，这是时代要求。

其次是马华人物的研究必须继续进行和加强。历史是由人创造出来的，因此历史人物研究便自然成为历史研究的主题之一。在百年来的马华史研究成果中，最能够成为学术亮点和突破性的，当数历史人物研究。马华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教育史、政治史、文学史、艺术史、社团史，都有人在辛苦耕耘，都有点成绩。这些研究议题相当专门，也因此变得相当冷门。历史人物研究可为的地方在于，它是多学科、跨学科的，因此可以凝聚个方面的学术人才，慎思撰写人物的各方面成就与局限。

撰写历史人物研究的困境有许多，其中一项是资料问题。马华历史人物所遗留下来的文字不多，一位像林连玉先生那样健笔，所收集到的资料，也让研究者感到途穷的时候。李孝式先生的生平书信和资料被后人捐送到新加坡珍藏，使本地同仁失之交臂。其他的政治人物或华团领袖的资料之少，就更不用说了。所幸沈慕羽所留下来的文字（演讲、书法、书信、日记等），非常之多，廖文辉博士和李亚邀先生历年来整理了不少这方面的资料，但是还有让研究者继续发掘的余地。尚未刊印的《沈慕羽日记》，一千万字，就是一个研究者的宝藏。他所书写的领域也非常之广，包括家族事迹、人物评价、教育与政治风云等等，都有涉及。深入研究沈慕羽，我们现在是有基本条件的。

这里牵涉到一个“盖棺定论”的议题。“盖棺论定”常被时人挂在嘴边，但是这个思维基本上不利于人物研究的深化与发展。“是非功过，任由后人评说。”是一种较高明的态度。任何人的功和过，都不认“金口玉言”，都要接受后人的评头论足。而后人复后人，无穷尽也。任何一代人如果下了“定论”，就等于剥夺了更

多后人评说的权利。实际上这也是做不到的。后人可以肯定，也可以颠覆。

人物研究的另一个困境，是社会上普遍还拥有一些禁区。有许多关于马华历史人物的研究，多年来都有一些顾忌，对于过去的人物，“为死者违”，对于在世人物，顾虑更深。但我们必须认识到，独立精神与批评意识是必须提升的。学术界没有独立精神和批评意识，就沦为政治和附庸。实事求是，全面评价人物才对得起历史，才对得起后人。

第三是涉及沈慕羽研究的方向。这一本论文集的研究课题是多方面的，沈慕羽在教育、政治、文化方面的成就得到了较深入的探讨。有哪一方面可以继续和开发呢？《沈慕羽日记》、《沈慕羽书信集》的编辑和研究，以及《沈慕羽评传》的撰写，都是以后的学术工程。现阶段的沈慕羽研究目前还缺乏高水平的综合研究。所谓综合研究，是指沈慕羽多方面贡献的总评论，以及沈慕羽思想和活动与他处的时代紧密结合起来。换言之，我们可以用沈慕羽这个人物更深刻地说明那个时代；反过来，也可以用那个时代更深刻地说明沈慕羽这个人物。这显然是有待各方面研究的深入才可能做得更好。

第四是沈慕羽资料的保存和出版。董总、教总、林连玉基金等有资源的机构，以及民间设立的沈慕羽纪念馆，都做了大量的工作。我这里只提沈慕羽日记。沈慕羽从1957年（45岁）开始写日记，直到2009年2月（97岁）逝世为止，长达52年，约1000余万字，其年代时间跨度之大，内容涵盖面之广，堪称马来西亚华人文化一绝。他的日记不止亲笔记录了马来（西）亚政治、文化、教育的历史变迁，也记录了个人的真性情和内心独白，揭示了他真实思想及其复杂性。如此大气磅礴之日记，大马华社罕有，中文世界罕见，世界亦罕有。《沈慕羽日记》折射出马华社会的命运历程，是教育学者、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眼里不可多得的原生态史料。因此无论是质或量，其价值并非一般人物日记可以比拟。

《沈慕羽日记》是各方评说其个人以及华文教育、社会和政治的最新依据。《沈慕羽日记》是一件丰富的文化遗产，具有填补一甚至

足以改写一马来西亚华人史的价值。我由衷的希望林连玉基金、或教总、或其它有资源的文化机构，能够考虑到《沈慕羽日记》的重要性，全面出版。

最后，感谢主办研讨会当局林连玉基金，联办单位南洋商报、孝恩文化基金会、施恩爱基金会，以及所有协助出版这一本论文集的工作人员。

2011年7月

---

# 目录

---

<b>序：沈慕羽研究的意义 / 何启良</b>	iv
<b>第一部分 生前身后名：沈慕羽生平研究</b>	
沈慕羽的“壮游”： 1957年稿本《沈慕羽日记》 / 何启良	1
沈慕羽最后的15年： 活动、贡献与局限（1994-2009） / 廖文辉	55
沈慕羽纪念馆的特质与功能研究 / 黄建淳	81
<b>第二部分 大时代、大信念：沈慕羽与华教、政治</b>	
不同面貌的华教斗士： 林连玉与沈慕羽 / 曹淑瑶	97
沈慕羽的领导风格及对华教运动的影响 / 张荣强	127
独立建国后的华教问题及其本质： 沈慕羽与语文运动案例 / 庄华兴	157
孤忠与反叛：政党政治中的沈慕羽 / 黄进发	173
<b>第三部分 立大本、知化育：沈慕羽与文化</b>	
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 中华文化视野中的沈慕羽 / 吴前进	191
寻找文化通人：沈慕羽与马华文化发展 / 叶汉伦	217
沈慕羽的楷书形体：正体规范与书艺别构的兼容 / 李乾耀	249
<b>作者简介</b>	274
<b>主编简介</b>	278



## 第一部分

**生前身后名：**

**沈慕羽生平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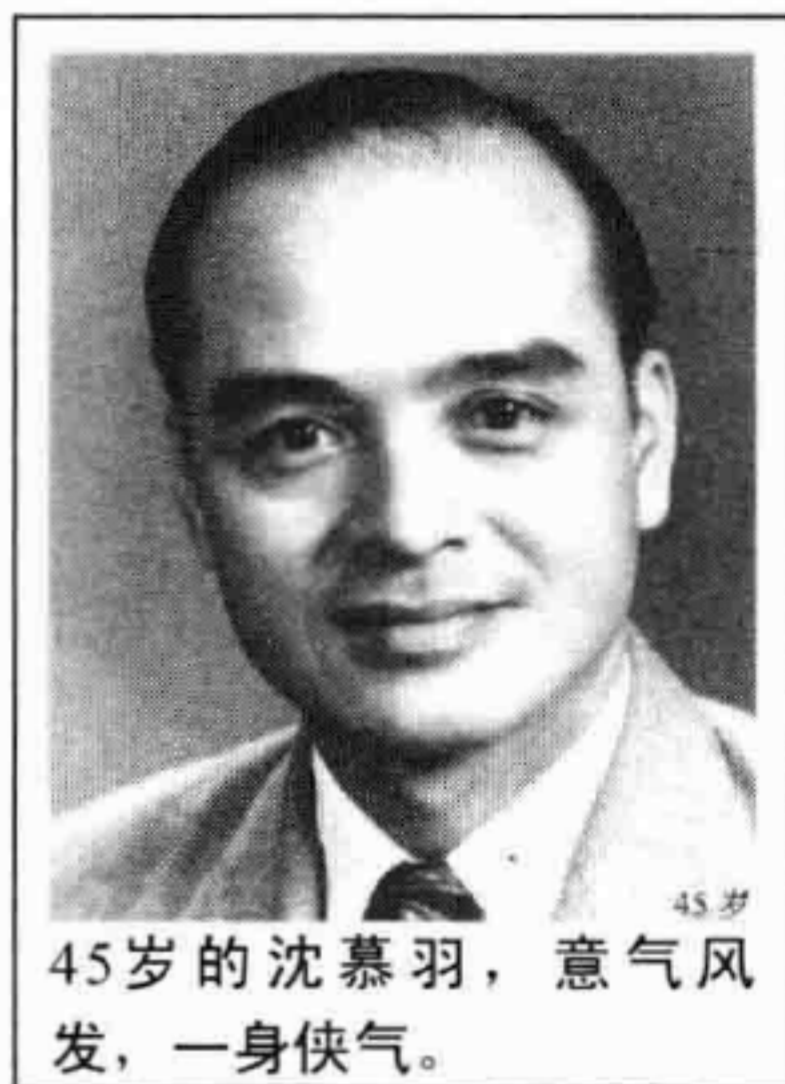
# 沈慕羽的“壮游”

1957年稿本《沈慕羽日记》

■ 何启良

## 一、前言

沈慕羽生前常提起他壮年时的一次游历，即1957年他45岁时环游22国的旅行。<sup>1</sup>他说这是他“这一生最光荣与骄傲”的事。<sup>2</sup>这是沈慕羽一生少有的长途旅行，余谓之为沈慕羽的“壮游”。此年沈慕羽身心健康，意气风发，一身侠气。此行是真正的“行万里路”，对他以后的视野和事业有极为深刻的影响；当时他在政界与教育界声誉已经相当卓著，此行之后他的社会地位更大大提高，而其政治与文化参与度更加深入，其视野胆识更具恢宏。诚然，游览世界，观察周围，参悟人生，蒙生斗志，定会给予一个人的思维和价值观相应的转变，从而影响到其文化人格。歌德说：“人只有认识世界才能认识自我，世界使人意识到自我，自我使人意识到世界。”寻找成就沈慕羽日后的原



45岁的沈慕羽，意气风发，一身侠气。

<sup>1</sup> 如2008年出版的《沈慕羽图片集》的序言里，沈慕羽自述：“1957年3月，我承钟敏璋讲师的推荐，欣获美国国务院颁发的青年领袖奖学金，到美国考察教育及观光。出发前惠蒙好友杨朝长借用一架名贵的照相机。我从东半球出发绕西半球回来，游历了22个国家，其中包括英、法、比、意、希腊、中东诸国、巴基斯坦、缅甸、泰国等。我在异国踏上脚印外，还把令我回味无穷的画面及景点都拍摄下来。”《沈慕羽图片集》，吉隆坡：教总，2008，页5。

<sup>2</sup> 《中国报》，2009年2月7日。

因，此段经历可以提供一条线索。因此沈慕羽的壮年之行之意义不可低估。

然而，沈慕羽对此行虽然多次提及，但是其许多细节信息仍然不太清澈，其时代背景、缘由目的、线路安排、考察对象，以及沈慕羽的所思所感，鲜为人知。日前笔者阅读到尘封了52年、尚未刊印的稿本《沈慕羽日记》<sup>3</sup>，发觉1957年的日记对此旅行的风土人情与地域文化，以至思考，都记录得非常详尽，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和信息。此行路程3月余，然而却是此年全年日记记录的全部。日记从1957年3月1日开始写起，到7月1日结束，字数总共约10万字。<sup>4</sup>每日闻思，如历历在目。沈文精神饱满，神采飞扬，行文如流水，顺畅成滔滔之势，其词采朴实，描绘精微，节奏明快，端是一部精彩写实报道和文学作品无疑。这也是沈慕羽一生书写日记的第一本，其个人生命史意义非凡。

余细读此年日记，发觉它的意义实际上已经超越了沈慕羽个人范畴。若把它定位为个人史的重要资料，那只是仅仅把它作为沈慕羽生命史的一场思想解放的记录、一次在“远方思考”的书写，然而若把它定位在马来（西）亚华族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范畴的话，它却使我们重新思考华族知识分子的思想本质与价值面向，而进一步认清那个时代的世界局势与国家权力交替时期马华文化思想的取向和局限。换言之，此游记日记的重见天日，逼使让我们反思马来亚独立前后华族知识分子“走向世界”的议题。沈慕羽当年虽然不是像康有为所说的“不得已而远行者”，然而他背负着文化重任与教育使命，或者意识到自己任重道远，却是可以肯定的。因此日记的思维事实上折射出马来亚独立前后一位入世华族知识分子的游历观察，其珍贵的史料价值对马华“异域形象学”的研究也不可小觑。与其他差不多同时的“游记”、“见闻”、“散记”著作相比，沈

<sup>3</sup> 我一开始是在加影教总处阅读《沈慕羽日记》，因日记不外借，故只能到临阅读室。后在沈慕羽纪念馆阅《沈慕羽日记》影印本，仅此致谢。我也在该馆阅看过《沈慕羽日记》原本。此文摘录日记，皆出自影印本。为了行文方便，本文皆以《沈慕羽日记》标志，并志于阿拉伯数字日期。

<sup>4</sup> 1957年日记于7月1日结束。到了1958年1月1日，沈慕羽才重新提笔作日记。日记里半年的空白，如何解析？实在耐人寻味。

慕羽的日记式游记是一枝独秀的。

本文是沈慕羽1957年日记的初步研究成果，除了导读之外，希望能够进一步探索此日记在沈慕羽生命史和华族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的意义。对于沈慕羽这次的游历具体情况，根据日记的记录，我将给予一个梳理。同时，也就日记作为游记文本以及历史文献，点出其特色。

## 二、“壮游”的时代背景、缘起

沈慕羽整个旅程的费用，是由美国国务院赞助的。这项荣誉相当特殊，无论是50年代还是现在，美国奖学金颁发给处于“非主流”的华文教育人士，非同寻常。现在探讨这个时代背景。

1957年是美国和苏联冷战年代的高潮。那年苏联率先发射了洲际导弹和人造卫星，美国人由此惊呼，国际关系出现了所谓“导弹差距”的论述。美国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就大量运用公共外交作为对抗共产主义和赢取世界民意的策略。公共外交主要工具，即教育与文化交流、私人与官方间的政策建议与信息交流。1953年，美国政府于在致力赞助国际文化交流之时，创建了美国新闻署（USIA）和艺术顾问委员会。1954年，艾森豪威尔总统有行政命令，成立了国务院负责的文化展出，特别倚重“公共外交”，重视“软实力”与“巧实力”。同时，美国主流舆论也要求美国的工商、慈善、宗教、传媒、教育、文化、非政府组织乃至普通公民都肩负起外交使命。对美国政策拟定者而言，非官方组织比官方组织更容易赢得国际民众的信任，推行“善行外交”（diplomacy of deeds），与核心人物交朋友，树立良好的口碑。<sup>5</sup>

在这个大时代背景之下，1957年美国国务院颁发了两份青年领袖奖学金予马来亚华校教师到美国各地考察。在很大程度上，沈慕羽此行实是冷战大环境下的产物。从沈慕羽日记的记录看，主

<sup>5</sup> John Gibson, "The International Visitor Program.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nd the National Councils for International Visitors", October 1977. [http://www.nciv.org/archives/reports/Gibson\\_Report\\_1997.pdf](http://www.nciv.org/archives/reports/Gibson_Report_1997.pdf)

持此项计划的是美国教育学院（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而具体运作的是“领袖与专家委员会”（Committee on Leaders and Specialists），负责人是Robert Abbey。美国政府方面对人选的要求，可能有相当的针对性；以一般常理推测，若是邀请函落在政府马来官员手中，华文教育不可能分享到此项奖誉。从独立后的美国所颁发的奖学金的得主来看，差不多清一色是马来精英分子。<sup>6</sup>

1957年也是马来亚争取到独立的一年。1946年4月，在英国“分而治之”的政策之下，新加坡从马来亚划分出来，成为单独的“直辖殖民地”。1955年，英国宣布马来亚实行“部分自治”。然而，战后英国政府成立的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的计划，遭受到以巫统为首的马来族群的强烈抗议。彼等要求土著优先的国家制度。马华公会的陈祯禄与巫统的东姑阿都拉曼密切合作，成立联盟政府（后来马来西亚印度人国大党也加入）。联盟在1952年和1955年的大选中在马来人和华人地区均获胜。马来亚共产党进入地下，成为非法组织，继续进行武装斗争。1954年，马来亚时紧急状态已经结束。1955年和1956年里，联盟和英国一起起草了一部独立的马来亚的宪法基础。巫统承认所有民族享受平等的公民权，马华公会则同意马来西亚国家元首由马来亚苏丹轮流担任，马来语为官方语言，促进和资助马来教育和经济发展。实际上这个协议标志着马来亚由马来人统治，管理机构、警察和军队主要由马来人控制，而华人和印度人则在内阁和议会中获得适当的代表，在他们占多数的州中管理，他们的经济地位受到保护。谁来控制教育系统以及各族母语教育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这个问题一直拖延到独立后才解决。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联合邦宣布独立。

无论从国际局势或国内政经变化来看，1957年是一个风云变幻、充满变革的一年。处于这样的一个年代，充满理想的马来亚华裔知识分子如何自处？

1957年的马来亚联合邦教育部，决策权力仍然是在英国官员手中，而当年担任华校视学官的那位有管理责任的公务员，就是钟敏璋。

<sup>6</sup> 我查了一下历年来美国在马来西亚颁发的艾森豪威尔奖学金（Eisenhower Fellowship），无一为华人。

钟敏璋，原籍福建福州，菲律宾华侨中学高中毕业，上海国立暨南大学法学士。移居马来亚后担任彭亨关丹甘孟华小校长，从1949年至1970年，她担任马来亚联合邦华校视学官。<sup>7</sup>她与华文教育者来往甚密，对华文教育的推动和影响，有一定的贡献。她在1984年写过一篇题为“华教奋斗史一幕”的文章，有谈到她和华教人士的交往以及她所扮演的角色：

当时我服务于联合邦教育部的华文组，有机会和教育界先进吴毓腾先生及「华人之友」的英籍教育联络官侯士先生共同负责改善本邦华文教育制度，使华校逐渐演变成为本邦教育系统中的一环。因此，我有许多机会和华文教育界领袖们接触，充当政府和华校间的桥梁。对我来说，这是一件非常艰苦但却有意义的工作，尤其是初阶段的工作，因为数十年来因隔膜而积成的猜疑及偏见，不是一朝一夕之间可以消减及解决的。我费尽心血不断地向两方面解释，疏通、排解，令大家逐步地了解对方的立场和处境，互相容纳，互相退让，才达到妥协。<sup>8</sup>

这里道尽了她的“费尽心血”的努力。在同一篇文章里，她也提及1969年世界教总在印尼首都椰加达召开世界教育会议时，她担任过沈慕羽的英文翻译。“沈先生还被邀在大会上以华语演说（有史以来第一个用华语演讲者），由本人充当翻译，沈先生曾向世界各地代表大声疾呼，请求支持公道，为母语教育而请命，并鼓励民间办大学。”<sup>9</sup>从她也曾经翻译过一本有关教育的英文著作来看，她的

<sup>7</sup> 这些资料，采用自廖文辉：《华校教总及其人物》，吉隆坡：教总，2008，页251-252。

<sup>8</sup> 钟敏璋：“华教奋斗史一幕”（《南洋商报》，1984年1月14日）。见《教总33年》，吉隆坡：教总，1987，页666。

<sup>9</sup> 同上。沈慕羽日记有一段记录，证实了此事。《沈慕羽日记》1969.4.25：“余于前晚已将稿拟就，由钟敏璋翻译。昨日由来惠卿及希巴兰夫人转达余将发言，主席一开会，便请我登台演讲。我用华语讲出，这是有史以来以华语在国际大会上讲出之首次，由钟敏璋译出。”林连玉曾称赞钟敏璋，说“她写出与她职务有关的华文教育史实，自然是百分之百的正确，不容置疑的。”（林连玉：“马来西亚到今日还有华校继续存在，不要忘记华校教总的功劳”，《教总33年》，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总会，1987年，页664）。钟敏璋的论述是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确”，余不敢肯定，但是就此事而言，确是事实。

外文（英文）是极好的。<sup>10</sup>至于她的人品，林连玉说她“为人和蔼可亲，处事精明，口才辩给，确是华族中杰出的女性。”<sup>11</sup>看来她的确是一位女中翘楚。从照片上看，年青时的她，面容清秀古典、气质端庄高雅，在公众场合相当显眼。她退休以后还有与华教人士来往，而且颇受尊重。<sup>12</sup>研究华教教总人物的廖文辉对她有以下一段评论：“虽然钟敏璋不曾担任教总任何职位，但他以公务员身份作为教育部与华教之间的桥梁，数度解救华教于困厄之中，多次协调双方的误解，于双造皆立功不少，此功此劳，有必要一记。”<sup>13</sup>而钟敏璋其中“有必要一记”的功劳之一，即是当美国国务院颁发两份青年领袖奖学金予马来亚华校教师时，她独具慧眼推荐了两个人：卢振樵和沈慕羽。

卢振樵，1911年出生于福建连江，与沈慕羽同籍贯，大他两岁。他的生平，在黄仰英“我所认识的主内弟兄卢振樵”一文有这样的记载：

卢君弟妹共六位，曾在县立鳌江小学肄业，一面追随鸿儒游幌溪先生学习国学。游君亦为古代书法名家。因此卢君于小学毕业后即写得一手好字。后近连江初中求学，不但各科成绩

<sup>10</sup> Hubert Bryne著、钟敏璋译：《教师和学生》，新加坡：联营出版有限公司，无出版日期。我看到的那本有图书馆打印的采购日期（1972年2月3日）。该书的出版不会迟过这个日期。更早时候她也曾写编写过教科书（钟敏璋编著：《马来亚历史》，吉隆坡：东南亚，1959年）。书里有林连玉和黄润岳的序文。

<sup>11</sup> 《教总33年》，页664。这句话黄润岳和廖文辉都引用了。我再引一次，因为这的确是不多见的评语。黄润岳也说：“和她私人交往，更是潇洒不拘，妙语如珠。”见黄润岳：“我的朋友林连玉”，收入李亚邀：《族魂林连玉续编》，吉隆坡：林连玉基金，2005年，页177；廖文辉：《华校教总及其人物》，吉隆坡：教总，2007，页252。

<sup>12</sup> 钟敏璋后来仍然有参与华教活动和与沈慕羽保持联系，在沈慕羽日记里还可以找到一些痕迹。《沈慕羽日记》（1986.12.18）记载，钟敏璋在林连玉先生座谈会上“报告林连玉为华教奋斗事迹。”《沈慕羽日记》（1988.8.30）又记载：“钟讲师来访。下午二点钟敏璋讲师和杜先生、何老师在天木弟夫妇带领下来访。他们是高龄协会的会员，随团赴星游览归来，途经马六甲，特请假一小时来看我。他们对我的关怀可谓无微不至。大家畅所欲言，对于政治，多有异议，认为当道如不悬崖勒马，恐终有一日陷深渊。”那时候沈慕羽经历了“茅草行动”浩劫，刚从监狱出来几个月，特别高兴有人来访。除了欣慰见到老友，字里行间对“钟讲师”仍然是非常尊重的。

<sup>13</sup> 廖文辉：《华校教总及其人物》，页251-252。



优异，且成篮球健将。毕业后进福州福建学院学习法律。

学院毕业后，1935年南渡，任教于实吊远育智中学，后任森美兰庇勝中华中小学教务主任，日本占领期间在实吊远务农及经商。

和平后，入安顺三民学校教务主任两年，转任森州庇勝中华中小学校校长，计16年。1959年教育部选派赴欧美考察教育，后以学校发展迅速，中小学各设校长，专任小学校长十年，服务马华教育统计35年。<sup>14</sup>

卢振樵于1972在马大医院逝世，享年61岁。他葬在新加坡。这段记载，说卢振樵1959年教育部选派赴欧美考察教育的年份有错误。当年他被推荐时是47岁，职位是森美兰中华中学校长，与45岁的沈慕羽年龄相当。他擅长书法，又专国画，和沈慕羽的文化兴趣相差不多。他的政治意识倾向也是认同国民党的，这又与沈慕羽志同道合了。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看来是位纯粹的文化人和华文教育工作者，沈慕羽说他“擅交际，颇健谈，但为人实际”。<sup>15</sup>他这个背景和资历，应该是被钟敏璋赏识和推荐的原因。

沈慕羽之所以被推荐，原因不难想象。那时他的社会成就已经获得认可，同时也拥有两重身份。在教育领域里，他当时担任马来亚联合邦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副主席，在政治领域里，他是马六甲马华青年团的团长。之前（1951年12月25日），他担任教总研究组主任，负责起草教总成立章程。1952年，他是马六甲华校教

<sup>14</sup> 黄仰英：“我所认识的主内弟兄卢振樵”，*CSCA The Anglican News*《星马教声》，1972年4月，第126期，页5。

<sup>15</sup> 《沈慕羽日记》（1972.1.15）记载，小标题是“卢振樵死矣”：“曾与我于1957年游历世界一周的卢振樵逝于前日，病逝于首都马大医院。从李玉泰处悉他患病已数月，初则肠部生癌，结着又发现其肝部硬化，终告不治。卢君为连江人，当年旅台时，他曾愤言说整个中华民国只剩下三块土地，即连江县的马祖列岛，金门和台湾。当时他邀我到他弟弟的家——卢振纲，与他们一家人团圆，大喝大吃。那是他母亲已七十余岁，颇健康。卢君能书画，长庇勝中华中小学二三十年，擅交际，颇健谈，但为人实际，对于教师会绝不出席，对于维护华教工作袖手旁观。一九七零年我人发动主办华文五年级检考，他竟不报名参加。”余搜索有关卢振樵生平资料，所获甚少。沈慕羽此项日记异常重要。它披露卢振樵死因之外，又道出卢的性情和思想倾向，以及彼对华教的态度。

师职工会的创始人及首任主席。1955年1月12日，他也参与在马六甲陈祯禄私邸与巫统领袖之历史性会谈。他在政界的表现也同样出色。1949年加入马华公会后，他积极参与政务，连任马华公会甲州分会义务秘书要职六、七年，他又发起组织马华青年团。后来他荣膺马六甲华人参事局议员。1956年被英女皇封赐太平局绅。

换言之，45岁的沈慕羽已经是一位领袖群伦人物。沈慕羽获得这项荣誉出国考察，马华公会诸君亦认真看待。他们或设宴、或送礼、或到机场送行，场面热烈隆重，如马六甲马华公会青年团设宴欢送，现存有一张照片，有“甲马青欢送沈团长赴美考察教育大会”的大布条横褂在宴会大厅间，场面搞得很大，气势做得很足。<sup>16</sup>马来亚华文报章对沈慕羽的行踪也有跟踪，不时有报道。沈慕羽回国时受各界欢迎的场面更大，“如龙的队伍环绕市区一周”。他晚年自述：

7月1日，我抵新加坡，结束3个月的旅程。7月2日，我凯旋马六甲，同机者有巫统要员赛那雪和嘉化峇峇。抵达峇株安南机场时，我受到10余团体，计500余人热烈欢迎，陈修信、郑文胜、吴仲坦及陈清水等人与我握手祝福。之后，如龙的队伍环绕市区一周……

除了在登机前一刻，与沈慕羽同行的卢振樵和众欢送者有合照之外，在这些大小欢送或欢迎的场合里，卢振樵基本上没有出现。这当然归因于两人背景的不同。晚年沈慕羽对此行的回忆里，卢振樵也基本缺席。他们两人全程还有翻译员张树德陪伴在侧，显然那是路途中的事。所以严格的说，此行应该是三人。

综看沈慕羽和卢振樵的这次出国考察，钟敏璋的推荐是关键，然而在选拔过程里是否有竞争而两人脱颖而出却不得而知。两人在遥远路途里彼此照料，相处融洽，配合度很高，在日记里沈慕羽都一贯以“卢先生”或“老卢”称之，相当尊敬和客气。他们在美国各地被接待时，我们看不出对方对那一位另眼相看，但是一旦被邀请演讲或公开讲话时，沈慕羽显然是站在前面的。如在美国内布拉

<sup>16</sup> 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总会，1997年，页76。

斯加州（Nebraska）那一次访问，被邀在州议会的演讲的，是沈慕羽。他在日记里对此次的演说也非常满意（1957.5.3日记：“余谓时声调洪亮口齿清晰，全场肃静无声，议员凝神屏息……讲毕下台，一阵热烈的掌声，议员纷纷与我招呼握手。”）。两人旅程费用虽然全由美国政府当局全部支付，然而两人却省吃俭用，能省则省，有时连衣服也舍不得给洗衣店洗，自己动手，为的就是省几分钱。<sup>17</sup>美国奖学金不可能短缺，他们两人生活上的节省，实为天性使然。

### 三、“像浮萍及飞鸟似的”——“壮游”旅程

这是沈慕羽一生最重要的旅行，可比唐代文士如杜甫的年轻壮游，但是杜甫是“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漫游，沈慕羽却是胸怀壮志的游历。说此行是沈慕羽的壮游，因为它有三个特点：旅游时间长、行程挑战性高、与人文社会互动深。行程时历三月半，游览22个国家，遇访之人亦相当之多。沈慕羽形容这次旅行“像浮萍及飞鸟似的，行踪飘忽，也像蒙古人的游牧生活一样。”（1957.5.5）看来漂浮的感觉相当之深。也正因为如此，日记所显露出的思维实在和书写投入更显得不简单了。此行几乎每个夜晚他都有作日记。他在旅途中写信通过报社给亲友，说“每晚…书写日记至深夜一、二小时始枕。”<sup>18</sup>他是很重视这次考察的。

沈慕羽全程如下：1957年3月8日出发，7月1日回国。此行从东半球出发，西半球回归，路经22个国家。日记的最后两页，尤其是“由欧回马”的行程——地点、机号、日期、时间、票价——有非常详细的记录。

<sup>17</sup> 《沈慕羽日记》（1957.5.11）：“上午后有参观的节目，我就利用这时间洗背心内裤及衬衣。边洗边叹气，自来美后，对于这工作未能假手于人，因之给洗衣作，则每件起码二角，快洗则三四角不等，以叻币折算；洗两次我可买新衣一件了。可恨的衣服越洗越黄，因此想到月霭在家洗衣的功夫的确好，一天要洗那么多，真够辛劳了。”

<sup>18</sup> 录自1957年5月17日：“甲沈慕羽来鸿。报告欧游行踪”，见《沈慕羽事迹系年》，页79。但是书中并没有说明是那家报纸。

下表列出此行的细节以及日记之重点摘要。

表一：沈慕羽1957年旅途：日期、国家、探访地点与遇约人物

日期	国家	地点	探访地点	遇约人物	日记重点摘录
1957年3月8日	新加坡				无日记
3月9日至29日。	菲律宾、香港、台湾、日本				无日记
4月1日至4日	美国				无日记
4月5日		华盛顿	华盛顿市麦坚利高级中学		“学生八十巴仙为黑人，完全免费且供给书籍，寓生活于教育，使学生不致毕业即失业。参观历四小时始毕。”
4月6日			林肯纪念馆、华盛顿纪念碑、无名英雄墓，五角大楼华盛顿故居、杰弗逊纪念馆		“下午二时前往杰弗逊纪念馆前菜价樱花节，游艺大会堂前石阶坐满万人。游艺全属轻松歌喝。堂前面临大湖，环湖皆樱花，红白相间，游客如鲫，盛极一时。如此佳节胜景，平生殊罕躬逢。”
4月7日			国立博物院、国立艺术展览馆		“我人浏览二小时仅及其半。”
4月8日			PAA办事处	董颖光（中国驻美大使）、曾恩波（中央社副主笔）、朱抚松公使、彭启平秘书、赖家球秘书、参事凌崇熙、顾毓瑞、骆传华、刘和主事	“董大使与余谈叙星马情形，均一一为道。”
4月9日			处理各国入境签证		“余之至李朋餐馆用膳，最大的目的在向彼索阅华文报——美洲日报，俾知世界动态。”

日期	国家	地点	探访地点	遇约人物	日记重点摘录
4月10日			法国使馆、希腊使馆、泰国使馆、德国使馆、缅甸使馆、黎巴嫩使馆		“余意联合国应有国际通行证，以沟通各国旅客，增进民族间之瞭解，多来往，感情增加，猜忌减少，国际纠纷可以逐渐消之无形。天下一家之理想，庶几可以实现。”
4月11日			国立古物陈列所、美国国会、国会图书馆		“馆正中有木箱及桌各一，陈列杰佛逊起草之美国独立宣言初稿真迹。”
4月12日			美国教师总会、地理学会	小学组组长Mrs Mary Dawson, Dr. Elicker中学组执行秘书、访Abbey取行程表	“此来主要目的早考察美国的教育。”
4月13日		纽约	纽约图书馆、Radio City	PAA办事处。火车 开行赴纽约、经Maryland、Delaware、New Jersey	“一早收拾行李，如浮萍的我们，方才肖安定，又再飘逸了。” “傍晚到世界第二大的纽约图书馆逛一圈。藏书数百万册，各国书本莫不收罗。伏案阅读者数百人。”
4月14日		纽约	到PAA拿票	访曾宗麟不在。 黄兴宗、梁卢泰、杨裕兰、关镜池。	“晚阅纽约华文报。中国城华人连全纽约华人不过三万人，而报馆竟四家，可谓难得矣。”
4月15日		纽约	访国务院办事处、中央公园、Hudson River、哥伦比亚大学、联合国	访曾宗麟不晤。缪经田、杨裕兰。	“在Hudson River之滨。当年胡适陈衡哲谈恋爱之所。胡适曾因此而歌颂Hudson River之景物。一瞬数十年，此两位思想家，好事未成，终各奔前程，如今衡哲已做老祖母，胡适也达知命之年。回首往事，不知作何感触。”
4月16日		纽约	摩天楼、Wall Street、中华公所、Waldrof旅店、四十七街、世界商业展览会	杨文伯、陈华瑞、关崇焕，赵百川、李志贤，杨裕兰、伍锡璋、谭正文	“今日世界最好的东西最新奇的东西，莫如美国，而美国最新奇的东西，莫如纽约。”

日期	国家	地点	探访地点	遇约人物	日记重点摘录
4月17日		纽约	High School of Commerce, Manhattan市立第九小学、纽约古物陈列馆。出发到达波士顿	High School of Commerce校长, Manhattan市立第九小学校长Israel Kaiser。	“若以其学生之太过自由及轻狂态度观之, 是否合于教育, 则吾以为有研究之价值。”
4月18日		波士顿	Milton Academy	校长Arthur Bliss Perry, 张先生, Solich Pudjotaruno	“学校之设备完美, 学生之秩序良好, 教师有循循善诱之态度。学生与教师打成一片, 决无厉责之事。”
4月19日		波士顿	哈佛大学		“外国学校之办理有长期计划, 在安定中不断求扩展, 这是值得我们效仿的。”
4月20日		波士顿	州立图书馆, 游波士顿名胜, 科学馆、中国城		“余观斯校后, 不禁叹曰, 有斯财, 始有斯校, 有斯校, 国始有才。”
4月21日		波士顿	中央公园、基督精神教会母会、艺术陈列馆	相机留在的士上, 后失物复得。 加藤教授。	“此种设备, 为余平生所仅见。”
4月22日		波士顿Maine	乘火车到Maine, Augusta	William教授,	“我们这次旅行, 无论到任何角落, 尚迷了路, 问路人没有一个不告诉我们, 不时有人看见我们在彷徨总先发问What can I do for you, 不惮详尽告诉我们。这种友爱助人的美德, 给我的印象太深了。”
4月23日		Augusta, Maine	Copbey College	Drubbs教授, Agha Shahi (巴基斯坦驻美大使馆参事)	“火车不用蒸汽机改用柴油式样如电车, 行时无冲冲之声, 宛如坐在汽车中。”
4月24日					“昨晚做了一个梦, 看见慈母龙钟的形态, 爱妻灯下缝衣, 诸儿剪烛读书, 家庭之乐园一一泛现。睡醒不禁两目潸然。”
4月25日					无日记
					无日记

日期	国家	地点	探访地点	遇约人物	日记重点摘录
4月26日		利特莱(Detroit)	福特汽车工厂、福特博物馆		“每天此厂能出汽车4760辆，全美Ford厂能出一万辆完好汽车供给世界各国之用。全年出365万辆汽车，以利人类之交通。伟乎哉福特！”
4月27日		利特莱(Detroit)，抵达芝加哥	下榻廿四摩天旅馆(Allerton Hotel)、芝加哥市区	梁锦源	“这旅社规模堪称规模宏大，其房金也特别贵。单人房最便宜的每天五元五角，双人房也要九元。”
4月28日		芝加哥	艺术馆、科学及工业馆、自然历史馆、水族馆、东方馆、历史学会、林肯动物园、Brookfield动物园、芝加哥大学	周曾琰、庄泽宣	“余在中国城遇一华侨青年，问其那一家餐馆较好，他听了莫名其妙，反用英语回答我“I don't know what you say.”如此下去十年二十年后必数典忘祖而无疑。”
4月29日		芝加哥	R.R. Donnelly & Sons Company (世界最大之印刷公司)	梁锦源(中华会馆主席)、陈昆楼、周宇凡、袁奕沛、伍伦、梅友煦、梅拔群、李美舍、李妙玲、潘贤模	“统观该厂之设备，可谓极印刷术之大观。当年印刷术之发明，与今相距何？天壤。噫，伟乎哉科学！”
4月30日		芝加哥	芝加哥市区、Prudential大厦，海军队库、Michigan湖滨公园、大战纪念馆、Marshall Field、青年会		“余询以美国之政党有无青年团之组织。据称有，但平日无活动，只于竞选时出面耳。美青年平日多注意其切身问题如兵役、教育、婚姻等。彼等认为美国政治已上轨道，无需彼等操心云。”

日期	国家	地点	探访地点	遇约人物	日记重点摘录
5月1日		林肯市, Nebraska州			“林肯市的路旁遍植树木, 现都萌出嫩青的叶子, 充满春意。地上绿草如茵, 尤其那Antelope Park及Lincoln Park有浅绿的杨树, 深绿的松柏、桃红的花树、雪白的花树环绕公园, 园中的曲溪, 鹅鸭已知春暖, 浮沉其间, 悠游自在, 充满宁静悠闲的空气。人一到此, 万念俱消, 似乎到了桃源仙境。我爱Nebraska的宁静辽阔, 我爱Nebraska的和平气息。”
5月2日		林肯市, Nebraska州	州政府大厦、 议会、Community School, Milford Trade School, 养鸡场	Allen R. Lichtenberger (州政府教育厅研究主任)	“Lichtenberger先生及张树德先生略致介绍后, 便请我演说; 这是第一个马来亚人也是第一个中国人在这州议会被认为贵宾而被邀请讲话的。我用国语致词……”; “余谓时声调洪亮口齿清晰, 全场肃静无哗议员危坐屏息……讲毕下台, 一阵热烈的掌声, 议员纷纷与我招呼握手, 使我这黄种人自尊心增加十倍。”
5月3日		林肯市, Nebraska州	Milland Leffler Junior High School, Southeast High School, 国际学生会		“当在Southeast参观高中学生会开会时, 学生发问争先恐后, 有如连珠, 我们均一一给予满意只答复。最后我被邀请讲马来亚问题, 卢先生被邀请写中国字及画中国画。” “这天校中到处可见到男女同学扮装乞丐或穷人之模样, 余见而异之。查询之后, 始知该校写到, 每年毕业班学生在离校前有此写俗, 指在劝导同学莫轻视穷人及乞丐云, 此为余平生所未见之新奇运动。”



日期	国家	地点	探访地点	遇约人物	日记重点摘录
5月4日		林肯市, Nebraska州	教育厅、 Gold's百货商店	Mr Stanley, Ralph Tylor Jr	“美国的一切总是好和大。他们精益求精，自强不息，对于事业不苟且，勇于进取，好奇使他们多发现，进取使他们样样都有得世界冠军宝座。我看了这小小城市Lincoln的感觉如此。”
5月5日		林肯市, Nebraska州		庄叔永	“今天要离开林肯城了，初始鄙视他厌弃他；现在却爱他恋他敬他，人们矛盾的心理往往是出于不了解。”
5月6日		Denver, Colorado	少年罪犯寄留 所, Red Rock Theatre, 中学联 音乐会		“由十二里至十五里之间，岩石夹道，峭嶙险峻，为状不一。穿过一石洞后即达红石露天戏台。台在半山两大岩石间，岩高百余尺，中为斜坡，度约百尺。当局施人工改造，沿斜坡作石级凡二百三十，下有平台，即以此为戏台。”
5月7日		Denver, Colorado	Longmont小 学, Rotary Club, Great Western Sugar Company, 制糖 厂, Longmont Time Call报馆	Rohwaldt校长, H.E.Brewbaker	“未去之前，我们埋怨国际教育会为何未征求同意给我们安排到一个小地方去。回来之后，我们深深体会到国际教育会的安排是不错的。我们不敢说满载而归，最低限度是不虚此行，对于美国精神更进一步的了解。” “到了车站市立中心学校校长Rohwaldt已在等候，握手自我介绍My name is Sim Mow Yu.”
5月8日		Denver, Colorado	Central City, Rocky Mountain National Park		“远处积雪的山岭越来越近。车子环山而上，满山遍野一片雪白与松柏的翠绿相映成趣。这时山势越益险峻，雪花横飞，烟雾迷蒙，远山近木不辨面目。幸车路可寻。终于达到高峰。Mt Evans的最高峰，飞鸟绝迹，海拔一万四千二百六十尺。”

日期	国家	地点	探访地点	遇约人物	日记重点摘录
5月9日		New Orleans	住St Charles Hotel, 法国区		<p>“来Denver转瞬四天了，勤劳刻苦是我们对Colorado的印象。”</p> <p>“New Orleans之最著名区而为游客所向往者为法国区。不到过法国区，则不算到过New Orleans。因此我们在用餐后决定到那里去，看看这地方有什么神秘，尤其是我这准备做游记的人。”</p> <p>“在此区白天冷静如死，华灯初上，顿行热闹。汽车相接，每使交通受阻。别地看不到的马车，当地政府为保存该区色彩，特准川走，尤为别开生面。”</p>
5月10日		New Orleans	理发, Canal Street		<p>“下午二时许租Taxi一辆，周游全市名胜，每小时付银二元，司机为大学毕业。美国的大学之多极了，他们以自食其力为荣，劳动工作待遇辄比劳心为高，工读之风气甚浓。职业平等，无贵贱之分。”</p>
5月11日		New Orleans	港务局, 游密西西比河		<p>“上午后有参观的节目，我就利用这段时间洗背心内裤及衬衣。边洗边叹气，自来美后，对于这工作未能假手于人，因之给洗衣作，则每件起码二角，快洗则三四角不等，以叻帮折算，洗两次我可买新衣一件了。可恨的衣服越洗越黄，因此想到月露在家洗衣的功夫的确好，一天要洗那么多，真够辛劳了。”</p>

日期	国家	地点	探访地点	遇约人物	日记重点摘录
5月12日		乔治亚州亚特兰大(Atlanta), 罗马(Rome)	亚特兰大城,		“Atlanta到Rome约六十哩, 车费每人二元。中途在Carterville车站稍息发现食堂分为White & Color两种。始悉美国政府虽极力设法消除对黑人的轻视。在北方已有相当收敛, 在南方仍未尽除。故坐车时白人与黑人不约而分界, 不会混合。”
5月13日		乔治亚州	Berry大学, 自来水厂, Wiseman's Bakery制饼厂	Dr Bertrand, Inez Henry, Marvin Hicks, 警察局长	“Miss Martha Berry...提倡生活教育, 认为生活就是教育, 教育不能脱离生活; 有了灵敏的头脑, 还要有劳动的身手, 头脑必须并用。他国情穷苦人家, 所以这学校不收富家子弟, 他要使理论与实践合一, 不是要造就一些士大夫阶级的人物, 他要的是知行合一, 文武合一役于人而非役人的教育。”“我们致敬后, 凭吊良久, 不禁爱她的伟大精神而感动到流泪。”
5月14日		乔治亚州	Pepperell纺织厂, Rome报馆		“今天一出面, 行人都看着我们, 不少跟我们大招呼。警察且向我们说“Good morning”。美国人的好客与易于结交可于此看出。” “朱子治家格言说: 一丝一缕当思来处不易, 看了纺织厂之后, 我益信。”
5月15日-21日					无日记
5月21日离美赴英	英国	伦敦			无日记

日期	国家	地点	探访地点	遇约人物	日记重点摘录
5月22日		伦敦	英文化协会，	李玉佑, A.Perumal	“大鹏振翅四万一千余尺，直凌云霄之上。过了二时半，他渐低掠了，如棋盘似的田地碰触显在眼帘，我们知道已入伦敦境界了。这时伦敦的时间是下午贰时半，离纽约时间迟了五点钟。哦！这是另一个洲啊！我们一夜里驾雾腾云共五千五百四十里，较西游记的孙悟空的翻筋斗还快哩。”
5月23日		伦敦	伦敦市	候士	“看过美国再看英国，觉得她的一切都苍老，但在老气中犹有雄道和壮严的气派，盖国虽精力衰退，仍竭力挣扎，图谋换作。这古老的帝国的黄金时代——如日晷遇午，日薄西山——殖民地——逐渐随时的变迁而独立。”
5月24日		伦敦	伦敦大学	余养樾, Brian Hook	“昨晚写日记至深夜二时半始就寝，神疲力竭，一夜好睡，不知四时许已天明，阳光照在屁股上犹不觉，忽令令一阵一阵的响，讨厌的很；是谁一清早就打电来，把我吵醒了，忙提电话来听，哈啰哈啰几声，仍无回音，是谁开的玩笑？就把听筒放下，原来是电话局每朝例常的催工电话，他怕一般人睡得太甜，不知醒觉，故在每日上午八时半必会合作响唤醒好睡的人。用意良善。”
5月25日		伦敦	伦敦中国城	郭则钦	“伦敦的西餐菜色不如美国之多，名称也有多少差别。”
5月26日至29日		伦敦			无日记
5月30日	荷兰	Amsterdam			“荷兰国土地小，雄心甚大。十七世纪时其海军曾称霸一时。殖民地拓展至非洲、南洋一带，离祖国数万里，土地较本土大六十倍。”

日期	国家	地点	探访地点	遇约人物	日记重点摘录
6月1日					无日记
6月2日	比利时	不鲁塞(Brussel)	城市, Cecil Hotel, 游览全市, Waterloo古战场		“不鲁塞的路牌都写着法文及Flemish文, 比利时的官方语文也就是这两种, 称为Bilingue (Flemish是一种荷兰语)使国中的两大民族都能了解。这种民主的措施可增加行政效率, 可使民众了解政府, 更为消除民族间语言不通的隔膜, 马来亚华人几占全民的半数, 要求列华文为官方语文, 并非先例, 执政者应具远大眼光, 方能使各民族和谐共处。”
6月3日		不鲁塞(Brussel)			无日记
6月4日	法国	巴黎			无日记
6月5日		巴黎		胡良珍	“今日上午蒙胡良珍博士拨冗出去。直到夜始返旅寓。我对巴黎的印象好坏参半。”
6月6日		巴黎			无日记
6月7日		巴黎	巴黎中的小巴黎	胡良珍	“我们终于到了这巴黎的发源地SACRE COEVR在圣心教堂至前停下来。圣心教堂之建筑崇高宏伟, 圆顶之尖, 直空际。时十二岁之童男女百余人, 正在接受洗礼, 穿着白色长衣, 装束如天主教之传教士, 敬然道貌。”
6月8日		巴黎			无日记
6月9日	德国	法兰克福 (Frankfurt)	Hotel Baseler Hof, 歌德故居, Schauhauser植物园		“瞻仰大文豪歌德故居。歌德于1828年生于此。其生前风流韵事, 史不绝载。少年维特之烦恼, 盖其生平缩写。其在文学上之成就举世敬仰。其在德国之地位, 犹如莎士比亚之在英国, 永垂不朽。浮士德与魔鬼之名剧, 排演不辍。”“高山仰止。我人对此一代文豪致敬后, 瞻仰故物, 良久始去。”

日期	国家	地点	探访地点	遇约人物	日记重点摘录
6月10日		法兰克福 (Frankfurt)	河滨公园		“我们徘徊在河边，给美丽的景色迷住了。正在猎取镜头时，突来一位徐娘半老的妇女，招手画脚，用德语谆谆讲述。我们一如哑子听雷，一子也不懂。察其意，似乎在指示我们游玩的途径。她门牙已掉落几根，眼角结了不少皱纹，戴着老花眼，却涂脂抹粉，打扮入时。当卢先生为我拍照时，顺便邀她在一起，她竟一手揽住我的腰。”
6月11日					无日记
6月12日	瑞士	日内瓦	城市		“日内瓦城位于日内瓦湖之南端，沿湖而上可至朱力、吕森、洛桑诸地。日内瓦城建于湖之两边，市区面积不甚大，人口二十一万。市内之交通便利，街道除若干干道较为宽坦外，多属小街狭巷，整齐清洁，屋宇无摩天之楼，然平均多为五层以上建筑。”
6月13日		日内瓦			无日记
6月14日	意大利	罗马		Amedeo	“晚餐后逛到游览办事处，询问观光事宜。其职员Amedeo君会讲巫语及英语，喜逢知音，久不讲的马来话又搬了出来。”
6月15日		罗马	游览胜迹		“罗马城为历史故都，历代之遗物极多。意大利视为国宝，均一一保存。今日意大利能吸引如此多之游客，不知赚取几许外汇，盖即如许？废墟之功用。我们以四千四百里拉（和叻币二十二元）决参加两天不同节目的环境游览。”

日期	国家	地点	探访地点	遇约人物	日记重点摘录
6月16日		Naples	村镇Colleferro, Frosinone, Ripi, Poli, Arce, Rassino, Riardo, Capua, Aversa, Naples		“清早五时便醒，盥洗毕，喝一杯咖啡，写日记，七时登游览车。” “Naples的海滨像香港，市街略似香港，但比香港伟大。Naples城中间是盘地，三面是山，一面是海。”
6月19日	希腊	雅典			无日记
6月20日		雅典	访中国大使馆	濮德介、温源宁	“蒙温大使接见，话匣就打开了。他身体健硕，精神饱满，戴着博士眼镜留着八字须，态度殷切，他侃侃而谈，历一点多钟。他关心南洋大学的前途。他说林语堂在赴任之前曾来看他。又说熊式一是他任北平师大教授时的学生。”
6月21日	黎巴嫩、巴基斯坦				无日记
6月22日	黎巴嫩、巴基斯坦				无日记
6月23日	印度	新德里			无日记
6月24日		加尔哥答	城市		“昨晚十一时乘BOAC航空运客车到机场，在候机室中，偶遇陈修信由日内瓦飞回，喜极而寒暄。问为何提早回去，据称国际劳工会议缺乏兴趣，又问何不在印度逗留数天，据称印度地方肮脏气候又热，我受不了，我在太平洋战争期内避居印度够受了，我死也不再在印度居住。修信先生对于印度的印象如何不言可知。因他要登机了，未能多谈，实为憾事。”
6月25日		加尔哥答	城市、中国街		“加城有中国街数条，路短屋小，湫隘不堪，卫生及秩序与下级印人相差无几，远不及星马。彼等业皮靴做鞋，洗衣、饭店、酒家、木匠、药店等。市面萧条，生活情况不佳。”

日记重点摘录					
日期	国家	地点	探访地点	遇约人物	日记重点摘录
6月26日		加尔哥答	梅光中学、国民党 驻印统一支部	刘志良、童纪唐	“我们在印度只到过首都新德里及大商港加尔各答两地，就看到这种惨状——无街无难民，无巷无乞丐，通衢大道旁、树下、走廊中都有蓬头垢面的人卧着，或兜售食品或紧追乞钱，老而无依，弱而孤零，最为可怜。我曾施舍不少给他们，但尾随而来的越来越多，我就没法应付了；我恨我手下无来，我恨我无钱，没法救出这般无辜的苍生，我更不明白上帝既创造人类，却因何有的享受富贵淫乐，有的却衣不蔽体，食无谷粒；我更恨那些朱门让酒肉臭却没想到途有饿死骨而普救众生。”
6月27日	缅甸	仰光	城市	林文炳、王辉、王大琅、 陈文宣、白鸿川	“旅客多付旅费乘坐飞机原拟节省时光早达目的地。欧美各家航空公司莫不深体会旅客心意，力求手续快捷，服务无微不至。一入亚洲境后，乘坐亚洲人的航空公司的飞机，便感觉的亚洲人做的事不如欧美人士多多。”
6月28日	泰国	曼谷	城市	萧介珊	“到泰国，犹如到星马，华侨众多，据说三四百万人，七时若连中暹混种人而计之，何止此数。泰国市场几操在华侨手中，金字的中文招牌字迹遒劲，不乏好书，但必加上暹文或英文。”
7月1日	新加坡、 马来西亚	新加坡、马六甲			“为免亲友们在新加坡久候，我于是决定改搭本日下午四时十分起飞的国泰机，并电告在星亲友施家佐君及襟兄梁树漠君。至于甲马青同志则不知他们在星下榻何处，无从电告，心中深感不安。”



上面的表所列只游访处与所遇人物只限于日记所载，事实上应该比次数目更多。而在此摘要的日记实为洋洋洒洒文字的一丁。下面我进一步分析日记的行文与内容。

#### 四、1957年日记节选、品评

如今沈慕羽日记尚未刊印，故此为了让读者能进一步了解1957年日记的状况，我从中大量摘引，一方面帮助读者评析沈慕羽文采文气，原汁原味的语言和风格，另一方面也有助我行文分析的方便。以下我从不同的面向——就风景描绘、考察教育、社会观察等——选了沈慕羽在美国首府华盛顿、纽约、芝加哥、比利时和印度日记数项。

美国首府华盛顿日记四条：

46年4月5日（星期五）<sup>19</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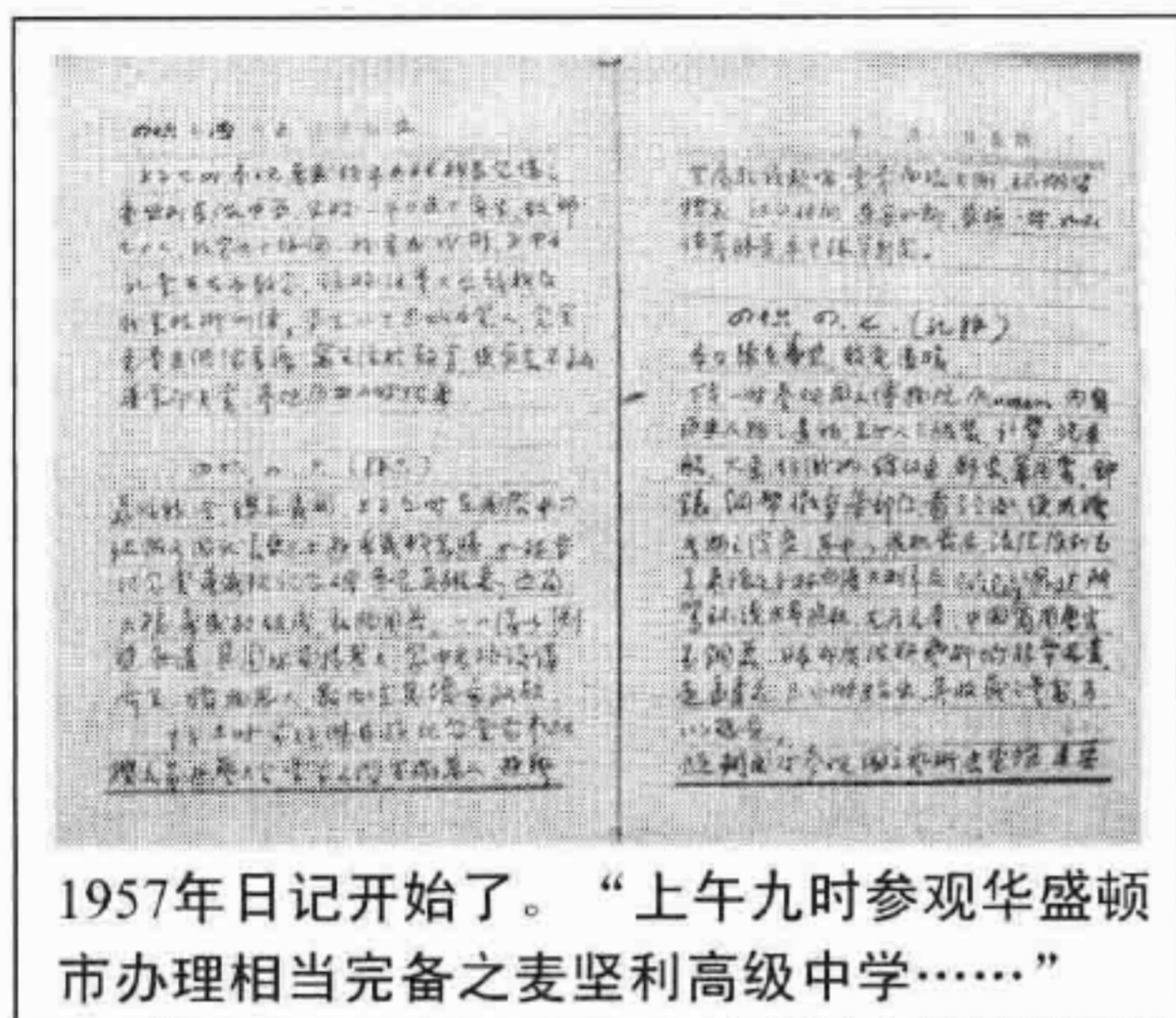
上午九时参观华盛顿市办理相当完备之麦坚利高级中学，全校一千零五十学生，教师九十人，教室九十余间。校舍成W型，正中为礼堂，左右为教室。该校注重大学预科及职业技术训练。学生八十巴仙为黑人，完全免费且供给书籍，寓生活于教育，使学生不致毕业即失业。参观历四小时始毕。

这一条是整本日记的第一则，是参观了华盛顿市麦坚利高级中学后所记。学校人数、族群分配、建筑状况、教学重点，简要述之。

46年4月6日（星期六）

气候较冷，樱花盛开，上午九时在国际中心站与各国代表乘巴士游华盛顿名胜，如林肯纪念堂、华盛顿纪念碑、无名英雄墓、五角大楼、华盛顿故居，衣物用具，一一得以浏览无遗。其园林面积甚大，家中各项设备齐全，睹物思人，最后在其坟前致敬。

<sup>19</sup> 民国46年，即1957年。1957年《沈慕羽日记》书写习惯上是用民国纪年。到了1959年2月9日的日记，始用公元纪年。



1957年日记开始了。“上午九时参观华盛顿市办理相当完备之麦坚利高级中学……”

46年4月7日（星期日）

本日阳光普照，极觉温暖。下午一时参观国立博物院 Museum，内有历史人物之遗物，名女人之服装，引擎、汽车、船、火车、纺织机、缝纫车、邮票、军用票、钟表、铜币、徽章等部门，看了之后，便明瞭各物之演变。其中以飞机最速，该院陈列当年莱德兄弟林白渡大西洋及Wiley Post所驾环绕世界飞机，尤为名贵。中国商周唐宋玉铜器，日本印度波斯艺术均非常名贵。走马看花三小时始出，其收藏之丰富，可以想见。

旋到面对参观国立艺术展览馆，建筑完全用大理石，庄严雄伟，非千万美金不办，内陈列古典油画包括英、法、西班牙、美国之名画家作品，均镶以名贵之金框。又有近代象征粗线条作品，每室陈列数幅，全馆约百余陈列室，室内之光线及空气均特别调配，以免损坏画品。画之题材，人物风景、民间生活、宗教均有。其规模之宏大，允称世界第一，我人浏览二小时仅及其半，因疲倦不堪，肚子又饿，购画片几张而归。

华盛顿市名胜极多，日记所记皆旅游重点。天气人气，皆有记述。虽然他说“走马看花”，但是观察入微，所记录亦简炼。文字文白并用，如“堂前面临大湖，环湖皆樱花，红白相间，游客如鲫，盛极一时。如此佳节胜景，平生殊罕躬逢。”文字流畅典雅。

下午二时前往杰弗逊纪念堂前菜价樱花节，游艺大会堂前石阶坐满万人。游艺全属轻松歌唱。堂前面临大湖，环湖皆樱花，红白相间，游客如鲫，盛极一时。如此佳节胜景，平生殊罕躬逢。

46年4月12日（星期五）

我们来华盛顿时，树木凋零，曾几何时，樱花开了，今天到美国教育总会去，一路只见树都发芽长出嫩叶来，青草可爱，原来我们住在这幽静的首都瞬息已两星期了。

此来主要的目的是考察美国的教育，除实地参观外，还得探访主持教育的机关，俾得交换意见。

今日上午到美国教师总会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与小学组组长Mrs Mary Dawson探取美国小学办理情形约一小时。

下午访Dr. Elicker中学组执行秘书，谈了半小时。

旋遇到一位能讲国语及广东话的美国教育家，话甚投机，他是国际教育会议的副总秘书。据称去年在马尼刺开会时，有五十余国参加，今年八月将在柏林举行，希望马来亚也能参加。他说，共产国家也有一个这样的组织，但我们不谈政治，不干与他国的内政。

下午路经地理学会，规模宏伟，内部陈列各国景物及民族生活画片，书籍甚丰，有自动更换彩色大幻灯，把华盛顿及各大城市的风貌放映出来，接二连三，绵连不绝。因时间关系，无法多逗留便回旅店。

稍息后与张先生访Abbey取行程表。我们在美只剩四十天，而美国却有四十八州，各州均有其独特点，欲在四十天内看三百万方哩的地方的东西，挂一漏万早在意料中，于是只得放弃探访朋友而世界影城好莱坞及洛杉矶也无缘观览了。

这一条日记透露出一个重要讯息，即沈慕羽的目的“是考察美国的教育。”而邀请单位的名字也出现了。

在首府华盛顿停留了十余天，他来到纽约了。选日记一条。

46年4月15日（星期六）

一早就收拾行李，如浮萍的我们，方才稍安定，又再飘逸了。好在这种如游牧式的生活我们都过惯了。

今晨用过早餐，张先生随后到，因九时一刻火车即将开行赴纽约，所以八时二十五分赶到PAA办事处，但办事处仍深扃。张先生说这又是美国人的缺点，里面没有一个人，正万分焦急，而外边等着的taxi，又催促再三，我们正在怪办事人太没精神，应该早些到办公室，突电光一亮，玻璃大门自开，我们不速即冲入内。Hello Hello了几声，仍无动静，一忽儿，马格烈小姐启门出来，我们如见救星，急向彼取回机票，以便赶到纽约PAA订新票。老张对马格烈小姐大加赞许，连声we appreciate your help very much，还拉她的手吻了又吻，马小姐也喜形于色，我们跟着也thank you very much, goodbye而别。

汽车开着马力赶到车站，Porter在车站外点好行李，一手交行李，一手交行李卡片，进入车站凭票上所指示的门号进入月台，因车辆太多，一再查问，才登上到纽约市的coach车，有票而不识路，仍是没办法的，过了不久，Porter将行李送来了。

火车开行半小时进入Maryland州，十时到Baltimore城，为该州最大市镇，著名的John Hopkins医科大学研究院即设于此。其后经过乡村累累，村屋建筑精致，一似马来亚公务员之小洋楼，村屋之前后林木葱翠，茅屋几未发见。

经Delaware州有DuPont化学制造厂，资本十万万元，分公司遍设美国各地。又经过革命时首都费城，费城在美国历史占极重要地位，人口达三百万为美第三大城，行程未列入，实深可惜。

二时抵Jersey搭乘巴士车过Hudson河渡头，纽约攀天的高楼在望，我们连摄数片，过去书上看到读到世界第一大城，今天脚已踏到了，心里的欣慰无以言宣。

下榻于127, W 43rd St., Hotel Woodstock, 此旅店虽高十二层，然与其他建筑物比较，犹如小巫之见大巫。

到自动餐室用经济餐，该店特制菜柜陈列各种菜色，外据价钱，我们选定菜色后，将银币投入洞内，用手一按，铁门自

开，取菜而出，茶点处也如此。

用餐后，赶赴航空公司联合办事处，这建筑内天体，蓝的天，挂着星状的灯，旁配以飞机，顾客都乘流动梯而登Sky Ribbon。各家办事处都很忙碌，可见乘机的人一天多似一天。我们连访PAA三四个职员后，才把这连环的游历飞机票的日期，机号，何机订下来，相当费事，幸航空公司有大表册，能预标机费、数十天后的机期、机号，航空事业的进步，堪称一日千里。

傍晚到世界第二大的纽约图书馆兜一圈，藏书数百万册，各图书本莫不收罗。伏案阅读者数百人，座位则有二千，每位一枱一灯。美国学术之发达，图书馆之功用也。纽约街道，由东到西随序而进，四十二街第七路为全市最繁华地。车辆如鲫，行人摩肩，霓虹广告灯闪闪烁烁，颇为奇观，Time之旋转条题，Camel标烟自人口喷烟，等均极特色，戏院之广告则不甚悦目，反不如港星。

纽约隧道甚多，在马路上可看见铁盖出烟，或看铁栅下为空沟，实即底下城也。内有火车及电车来往不息，商店如市尘。如Queen市则过河底隧道，或过上面天桥，天桥有公路及铁路直通Queen市，Queen市属于Long Island开启较迟，故市政之建设特注重交通之方便。上有天桥，下有道路，左右两旁还是道路，每条道路同时数车可行，如是以计，上下左右车道可同时平行十余辆车，真奇观。纽约市人口八百万，市郊则为住家，也有四百万人，合计一千余万。街道两旁总是停满车辆，找停车处事不易的。现有许多停车楼，车由上螺旋开到十余层楼上，亦一奇事。据统计纽约每三人有一部车，则全纽约将有四百万辆汽车，普通我们在市区往往发见行人比车辆少，纽约简单是汽车的世界。

我们又到煤油大王Rockeller（启良按：应该是Rockefeller）投资的娱乐城Radio City，此区本为哥伦比亚大学之校地，往日为下流区域。煤油大王特投资一万万元，全部改观，厅堂美奂美仑，底下为酒吧及休息处也有三层，楼顶为

天体圆穹式，舞台广阔百呎，座位有按铃，座位三千，大幕是提吊式的，可大可小，可随意变化，交响乐一二百人，制服齐整，大风琴在台旁，一人按，全场闻声，票价箱位十元，五元，普通票一元八角，列队购票者长达二百呎，每排三四人。奏乐毕，先放映时事片，继为宗教舞剧，大歌舞剧、电影。规模之宏大也鲜有其匹。

沈慕羽在纽约总共四天，对这个大都市非常喜欢（“今日世界最好的东西最新奇的东西，莫如美国，而美国新奇的东西莫如纽约。”1957.4.16）。他参观了中央公园（“此园在夏天时游人如云，红男绿女，树下湖滨情语缠绵，韵事风流，诚乐园也。”），到了Hudson河边（“当年胡适陈衡哲谈恋爱之所。胡适曾因此而歌颂Hudson River之景物。一瞬数十年，此两位思想家，好事未成，终各奔前程，如今衡哲已做老祖母，胡适也达知命之年。回首往事，不知作何感触。”），访哥伦比亚大学、联合国（“大会场规模宏大壮丽，壁画为Josevela Zanette西人所绘，象征人民为和平而奋斗。”）帝国大厦（“电梯上升时，耳鼓会鸣，如飞机升当空？。举目俯？，众楼皆在眼下，俱告失色。”）。参观了纽约一间中学High School of Commerce。

从纽约，到了波士顿，停留五天。后到达了东北部的Maine州，后到密士根州的首府Detroit，然后才到了美国第二大城市芝加哥。对各处大学的大型图书馆，沈慕羽也作了不少的记载，雅慕之情溢于言表，我这里不一一抄录。此外，在游历的过程中，他最为关心的就是当地华人的生存状态。这种关心同时也是对于自己国家国民的再认识与考察。这在芝加哥的考察中留下了比较完整的记录与思考。

46年4月28日（星期日） 芝加哥一瞥

芝加哥这美国内陆最大商埠，亦係仅次于纽约的大商埠，现有人口五百八十万人。由于其地位处于农业产品及煤产区域，故为美国最大之铁路中心，兼有大湖及密西西比河水路交通之便，于是又成为美国中西部工商业之首邑。它有五个大学，几个著名的博物馆及交响乐队，在廿八哩的湖边，景色尤

佳。芝加哥住民复杂，黑人占人口六分之一，波多里加人也日在增加中，世界各国都有人在此城市。

芝加哥于一八七一年遭受空前大火，牺牲数百性命，财富损失达二万万元，经过此大破坏后，始有今日宏伟的大建设。

交通：芝加哥可谓世界最大的铁路中心，计有卅六条铁路线，通至各地。由于汽车的数目日增，公路上不够供驰驱，好几段路分上下层，即地下也开公路，地面上也是公路，地下公路且有商店，宛如城市，至于高架铁路虽有，恐行人在下经过不卫生则不多，地下铁路则四通八达。因城市的面积太大，非有交通工具实甚不便，虽然如此，汽车在地面上受交通灯的限制，仍无法横冲直撞，每逢十字路的红灯一现，便暂时停止，让行人走过。在市区里往往一二哩的路，非十分钟不能达到，尤其在中午及下午放工的时候。

商业：芝加哥的Board of Trade是世界最大的穀市。Merchandise Mart是最大的市场。Marshall field为最大的百货公司，货真价实，万物齐备，其他多种大商店，不胜枚举。

工业：芝加哥有多种工厂，Ford的汽车配装厂，Inland钢铁厂，International Harvester规模都非常伟大。

肉类食品工业也是芝加哥顶出名的，以前屠牛场每天共屠杀十五头牛，完全靠电力及机器，今则迁到Omaha去。

文化教育：除中小学校、职业学校外，当有五个医科学学校，大学为芝加哥大学，西北大学，福斯福大学，Loyola教会大学，伊利诺大学及许多学院。

报纸：Chicago Tribune, Chicago Daily News, Chicago American, Chicago Defender, (黑人) Ebony。最伟大而设备最新式的印刷厂为R.R. Donnelley(The Lakeside Press) (此厂的详情容后介绍) 广播电台甚多，就中心National Broadcasting Company设在Merchandise Mart用彩色传真最受欢迎。芝加哥教育传真，其他方言广播，不能尽录。

## 社会文物展示

艺术馆在Adams St.，科学及工业馆，自然历史馆，水族馆，东方馆，历史学会，林肯动物园，Brookfield动物园等，藏物丰富，走马看花，终日难完。

上午十一时半芝加哥大学生物化学系教授周曾燏先生来访，他是新加坡世界书局主人周星耀先生之哲嗣，在星中正中学毕业后入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得博士学位，前年曾在中正及南大先修班任教。年纪虽轻，造就甚大，现在芝加哥大学任教之余，孜孜矻矻于光合作用之研究。他正在想法怎样把太阳能成为化学能。为了专心于科学的发明，冀有所贡献于人类，他对于终身大事竟置于脑后。虽则有女学生追求他，他不以为意。他的一弟一妹在英留学，将来元季并芳，可以预祝。

周教授带我们参加芝加哥大学，边说边走，是我们知道该大学的概况。芝加哥大学虽是私立的，煤油大王捐款最多，故中建一教堂纪念他。据云美国大学最富有为哈佛，次为耶鲁，芝加哥大学列为第三。该校有研究生三千人，大学生二千人，华人子弟有二十余人，学业成绩常列前茅，马来亚学生约有七八人，内有一二马来学生及印度学生。大学里对于原子的研究有极大贡献，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子弹该校与有功焉。该校的Green House全部玻璃建筑，内植热带的椰、橡及棕榈树。该校附设医院床位八百个，医科学生最后阶段便是在此实习，王x（启良按：此字难认。待查。）相先生之公子修齐现在内实习。该校对于cancer之研究，甚为积极，冀能对于cancer之病理治疗有新的发现，而消灭此人类之恶魔。

环绕芝加哥大学后，即赶车前访名教育家庄泽宣博士于University Hotel，久别重逢，畅叙甚欢。庄博士已届花甲之年，健康尚好，询以当练太极拳否，彼谓每日下午五时在旅社走廊走几步，藉资运动，询以仍常写作否，彼谓每用脑过度则血压高，医生劝以少写为宜，故鲜新作发表。

庄博士现任华美协进社驻芝加哥专员。该社成立已有三十年之历史，经费由庚子赔偿基金委员会拨下：主要工作在促进



中美学术，指导留学生，联络侨情。他说在芝加哥的中国留学生，包括在校学生，教授及在各机关服务者约有六百人。两月有以聚餐会，每年有三次会员大会。下月将举行选举大会，星期六及星期日为同学交游联谊之日。

关于美华侨之团结及下代教育问题，庄博士认为相当严重。

一、美老华侨在美国各埠均自成一区，所谓China Town是也，彼等之职业以饭馆洗衣作古董为主要，为维护各人之利益，昔有安良工商会之组织，遍及全美，此会之规定，围在百呎内同侨不能有同业以侵犯利权。同侨如被他侨或政府之不会理彼过，则由该会维护，该会之重要可见一般，昔日几乎人人参加，以资庇护，今则华侨通晓英文者多，有干法律之事彼等自知聘请律师走门路，故安良工商会之威望稍差。

至于留学生则散居于校中或赁房于公寓Apartment，论人数及资力则集中于中国城，论人才则留学生中不少在学术上有巨大成就，如陈省身先生在芝加哥大学教授Topology数学，为当今世界权威。其在外国厂商中任工程技师者不少，就以Ford汽车厂而言也有十余位，其他在化学工业厂中服务居高职领高薪者大有其人，受彼邦人士敬重。由于兴趣职业语言生活习惯种种的不同，彼等鲜与华侨区父老来往，至如秦越之不相关，本来是一家人，今竟如陌路，岂不令人痛心。

又者华侨过去在美所赖以谋生为餐馆及洗衣馆。素来受彼邦人士之欢迎，詎料我华侨多墨守成法，且乏资本，于是美籍犹太人纷纷开设中国餐馆，楼宇堂皇，设备美化，重金聘用中国厨师，味既可口，环境又舒适，就把一般阔客抢去。至于洗衣业则美国人完全用现代机器洗染，工作快速，洗濯清洁，熨烫光滑，交货时与新购之货无异，且年来洗衣机器普遍，普通人家把全家污衣送到洗衣机厂，只要掷廿五分于机件中，就能打开机门，把污衣放入加上肥皂粉，机门扣上，便能旋转搅拌，一刻后，又洗净之衣转入绞干机内，就可取出，何等方便。我华侨之洗衣业及餐馆受外资及科学机件之威胁，日甚一

日。在美国华文报常可看到出顶餐馆及洗衣业之广告，足证此事之严重性。缘此若非急图补救，华侨之事业将因此根摇树倒。华侨若能与留学生取得联络及合作，资力与才力配合，图谋改进，加上中国人的勤劳美德，相信是能站得住的，其他行业也可创办起来。

二、华侨子弟及留学生子女的教育问题。留美华侨区人口，最多为纽约及旧金山各有三万余人，次为芝加哥五千人，波士顿Detroit华盛顿各有二三千人不等。旧金山有华侨、中山、中华三校，纽约有华侨及教会两校，芝加哥有中华学校一所，各校均属补习性质，即华侨子弟上午全到美校求学，下午始到华校补习二小时中文。课程不完备，教学方法当不如理想，且全用粤语教授（台山话），华校之本质就此走样。学生程度如何可想而知。华侨人数少，能不忘祖国文化，酿资维持学校，精神之伟大令人倾服。留学生及智识份子华人子弟，因散居各处，由于环境关系，全美校肄业，在校在家满口标准而流利之英语，母语已不谙。余在中国城遇一华侨青年用粤语询其那一家餐馆较好，他听了莫名其妙，反用英语回我，“I don't know what you say”。如此下去十年二十年后，必数典忘祖而无疑。庄博士之意拟创办假期中文补习学校，专给此等留学生及华人智识份子之子弟读国语讲国语，并创议在家不讲英语。此议果能实现，则中华文化在美国当有存在之一线希望。

庄博士还想刊印一种华文季刊，介绍时代智识，提高华侨文化水准，惟内容将迎合华侨智识水准，使彼等能接受。

我们谈了又谈，越谈话越长，不觉已下午一时许，周教授建议到中国城筷子园吃点心。据说包饺等点心，每星期日始有，平日不卖，故每逢安息日中国餐馆之门限为此辈留学生走穿。被邀作陪者有王修齐、黄沃泉（新加坡华侨）等居席间谈风盎然，获悉星马留美同学有一同学会之组织，去年全体大会在芝加哥举行云。

二时半席散，宾主互道珍重而别。

（启良按：此处从略。当日日记还有约900字。）

沈慕羽在芝加哥只停留四天，但记述甚详。这里选的是1957年日记里其中最长、最详尽的一项。

从美国的大都会，沈慕羽到了广阔腹地的内陆。当局很巧妙的安排两人到了几处较偏僻的乡下小镇。开始时他埋怨当局为何安排他们到乡下农舍去，后来才恍然大悟。一开始时他的确对他认为是“穷乡”没有什么好感，但是最后造访后却道此地广人稀之州及其田园生活方式是他最爱之地，大有东坡“不辞长作岭南人”之感概。他说：“我爱Nebraska的宁静辽阔，我爱Nebraska的和平气息。”“今天要离开林肯城了，初始鄙视他厌弃他；现在却爱他恋他敬他，人们矛盾的心理往往是出于不了解。”这里选日记三则。

四十六年五月一日 星期三

林肯市的路旁遍植树木，现都萌出嫩青的叶子，充满春意。地上绿草如茵，尤其那Antelope Park及Lincoln Park有浅绿的杨树，深绿的松柏、桃红的花树、雪白的花树环绕公园，园中的曲溪，鹅鸭已知春暖，浮沉其间，悠游自在，充满宁静悠闲的空气。人一到此，万念俱消，似乎到了桃源仙境。我爱Nebraska的宁静辽阔，我爱Nebraska的和平气息。

四十六年五月三日 星期五

这天是Nebraska州议会舍年会举行的第一天。

州议长听说我们来观察都来迎接。在讨论议案告一段落时，致词欢迎我们，并请我们登台演讲，而时掌声雷鸣。全场数百人的视线都集中到这三个黄色人种的身上了。

Lichtenberger先生及张树德先生略致介绍后，便请我演说；这是第一个马来亚人也是第一个中国人在这州议会被认为贵宾而被邀讲话的。我用国语致词，开头说几句客套话‘我此次被国务院邀请来贵国考察教育，觉得非常荣幸，而今天能到贵议会来观察与各位识见卓远、公而忘私的议员见面，尤感快慰。’（鼓掌）马来亚的立法会在民选政府未成立前，其议员多数是官委议员及官吏议员。1954年大选。民选议员始佔全部

议员98席之83席。在民选之前的议员仰政府鼻息而增高声价，故多数yesmen之流，故教仗义执言为民喉舌若殆不多见。这是殖民统治的自然现象。

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自决浪潮汹涌，亚非多国纷纷摆脱殖民统治而宣告独立。马来亚岂甘落后，经华巫印联盟的力争，英女皇已批准马来亚在本年八月卅一日独立了。

马来亚这未来孩子的长大，有赖于先天，而要有后天的维护与扶持。美国是民主国家的先驱，希望他对这未来的孩子能予政治经济技术各方面的援助，使它能兴多国并驾齐驱同主在万国之间共享自由平等之福。

余谓时声调洪亮口齿清晰，全场肃静无哗议员危坐屏息。我的异国语言达了磁性作用，而我的词锋也是他们所喜吃的甜糖适合他们的口味。

讲毕下台，一阵热烈的掌声，议员纷纷与我招呼握手，使我这黄种人自尊心增加十倍。

### 参观Community School

自议会出来后，Mr. Lichtenberger亲自驾车带我们到附近乡校参观，一路只见平原千里、阡陌交通、麦浪随风起伏，田舍零落异而问曰为何此州田舍如此稀疏，何不聚居。据云，Nebraska州地广人稀，沃野千里，山地甚少，易于耕耘。全州几无废地，每家均有耕地三百亩，为便于治理家园，故皆就其土地内造屋僦居，职此每隔地区三百亩，始有屋一椽焉。

此校共有学生二十名年龄自七岁至十七岁不等，合在一教室上课，教师为一卅余岁女性，她告诉我们此教室中共有七班不同学生，她每天均须充分准备教材而不致浪费上课时间，随即把每天教案教学准备书。

此校虽小，设备甚齐全，是为马来亚乡校之借镜。教室中四周配日光灯黑板在前，黑板之上为大小英文字母字示范字图、左壁为成绩板、右壁为长柜；上面为图书室、下面为自来水厕所，学生放衣橱，梳洗室兼有收音机留声机之设备。所谓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也。

### 州议员频频招呼

我们住的Lincoln旅馆中，不少的住客是出席州议会的各区议员，身价地位高而隆。由于今天我在州议会发表演说，他们在餐室或电梯中或走廊上一遇到我，便自动招呼握手，频频赞扬。由此足见美国人的天真，他们不记仇不念恶，即以发动太平洋战争突袭珍珠港触发世界大战的日本而言；当时是美国的大敌，势不两立，日本一俯首称臣，美国便把一切深仇大恨一笔勾销了，又让日本复国了，且对日本援助不遗余力，特别看得上日本。美国这国家是容易做朋友的。看你怎样争取上，尤其是当这东西两大集团不相容的时候。

四十六年五月五日 星期日

离家不觉两个月了，像浮萍及飞鸟似的，行踪飘忽，也像蒙古人的游牧生活一样，每地方住不到几天就迁徙了，蒙古人以水草所在为目的地；我们以文物教育建设为目的，水草吃完了就搬家，我们则参观完毕就移地。初出门时，总觉得是件不平凡的事，看得相当严重。第一二晚睡不着，经不起一迁二迁三迁；搬家为家常便饭，心情也就正常。紧张的生活，使身心疲乏，一侧床便天不知地不觉地呼呼入睡，直到天亮才爬起来。

当离开芝加哥到Nebraska州时，我们埋怨Alley为何把我们这批贵宾送到地广人稀不见经传的僻壤来，岂不是跟我们开玩笑吗？迨在林肯住了几天后，始觉他有相当道理，原来美国的东部（当年殖民时代的地方）已成老区，现在一切新的好的建设，渐由东而向西移。真正的美国该是在这些地广人稀的内陆，而不是那繁华烦嚣的城市，要了解要认识美国到内陆来观光是不会错的。

内陆的美国人情淳厚，居民刻苦耐劳，乡村及市区的住家区，瓦屋板屋参半可见得并不是个个富有。它们住宅的四周总有广地种花卉树林、家中布置雅致、蚊蝇绝迹；喝的是自来

水、饪烹都用气炉，一切现代化，收音机、传真机、钢琴几乎家家有。住在这种美丽的环境里，叙天伦之乐事，多有趣啊！

我们在这儿，越觉美国人的友谊可贵，上自议员政府长官，下自贩夫走卒，都对我们好感。路旁的小孩跟我们招收招呼，皆由出于内心真情的表露。

今天要离开林肯城了，初始鄙视他厌弃他；现在却爱他恋他敬他，人们矛盾的心理往往是出于不了解。

在美国历史上，种族歧视（主要是对黑人的歧视）一直是个严重而尖锐的社会问题。南北战争中虽然颁布了解放黑奴的宣言，战后黑人的处境也多少有了改善，但黑人所受的种族压迫仍是相当明显的。1957年的情况如何？沈慕羽在美国南部的城市，考察了黑人遭受种族歧视的状况。

四十六年五月十二日星期日

Atlanta到Rome约六十哩，车费每人二元。中途在Carterville车站稍息发现食堂分为White & Color两种。始悉美国政府虽极力设法消除对黑人的轻视。在北方已有相当收敛，在南方仍未尽除。故坐车时白人与黑人不约而分界，不会混合。据说白人隔离黑人有以下原因：

- 一、黑人知识较差，不甚注意整洁。
- 二、黑人天赋性欲极强，白人恐其子女受污。
- 三、身份观念由来已久，一时不易消除。

第二次大战前黑白之分尤显，战后由于美人高唱民主，且受外族之批评及黑人之不合作抵抗，白人已让步多多，一切渐趋平等。美人若能充分体会林肯总统解放黑奴之真谛，则黑白一家定可早日达到也。

沈慕羽5月21日离开了美国，到了欧洲，第一站是英国伦敦，再经荷兰、比利时、法国、德国、瑞士、意大利、希腊。本文篇幅有限，不能一一摘录日记。我最后摘录日记中在比利时和印度的观察。

四十六年六月二日 星期日

### 游览全市

下午三时乘巴士车巡游全市及观览名胜，六时回。每客125法昂，回来时报告员索银10法昂；给报告员小账这在美国各州都没有，欧洲才有这种现象，什么都要钱，我这南洋伯看了非常不惯。

不鲁塞的路牌都写着法文及Flemish文，比利时的官方语文也就是这两种，称为Bilingue (Flemish是一种荷兰语)使国中的两大民族都能了解。这种民主的措施可增加行政效率，可使民众了解政府，更为消除民族间语言不通的隔膜，马来亚华人几占全民的半数，要求列华文为官方语文，并非先例，执政者应具远大眼光，方能使各民族和谐共处。

四十六年六月廿六日 星期三

### 独立后的印度

我们在印度只到过首都新德里及大商港加尔各答两地，就看到这种惨状——无街无难民，无巷无乞丐，通衢大道旁、树底下、走廊中都有蓬头垢面的人卧着，或兜售食品或紧追乞钱，老而无依，弱而孤零，最为可怜。我曾施舍不少给他们，但尾随而来的越来越多，我就没法应付了；我恨我手下无来，我恨我无钱，没法救出这般无辜的苍生，我更不明白上帝既创造人类，却因何有的享受富贵淫乐，有的却衣不蔽体，食无谷粒；我更恨那些朱门让酒肉臭却没想到途有饿死骨而普救众生。

在回程中，沈慕羽有一则日记是记载了在印度新德里机场偶遇“修信先生”。这段日记记述了陈修信曾经逗留过的印度的看法，其描述极为传神。日记摘要见上段。

沈慕羽日记每则都相当详尽，日常虽然疲于奔波，但是每晚的书写仍然精神饱满，思路敏捷，下笔千言，他壮年精力之旺盛，可见一斑。他除了善于观察外界现象以外，还更进一步的去觉察社

会现象真实的内在，包括自己与别人的情绪及精神状态。他在衣食住行，待人接物，都有描述。详细、宏大、饱满，是沈慕羽日记行文的一般风格。当然，他也有疲倦的时候，毕竟这是非常耗力的路程。

## 五、“日记”或“游记”：1957年日记的定位与特色

沈慕羽除了把每日反思当作日记书写之外，他也把它定位为“游记”。他有一则日记就透露出这样的思维：“New Orleans之最著名区而为游客所向往者为法国区，不到过法国区，则不算到过New Orleans。因此我们在晚餐后决定到那里去，看看这地方有什么神秘，尤其是我这准备做游记的人。”（1957.5.9）有了如此的书写计划，那么旅途中的衣、食、住、行就样样必记了，而记录之后也必须有所感所思。

游记是一种以记述参观访问、旅途见闻为主要内容的文体。一般以描写为主要手段，又常与抒情议论相结合来表达作者独特的感受。而游记亦有许多类别。其中包括再现型游记和日记体游记。

我把沈慕羽这些文字定位为“日记游记”而不是“旅游日记”，他是以日记为体，书写他旅游之经历。日后他也是用这个形式来书写他日常生活和思考。也就是说，他不是为了写游记才写日记的，而是在长达52年的日记书写里，这一年恰好是有关游历的。陆游的《入蜀记》和康有为的《欧洲十一国游记》都是为了写游记而写日记的例子。毋宁说沈慕羽是“旅游中写日记”，不如说他是“以日记文体来写旅游”。日记是媒介，旅游是内容。弄清楚这个分别之后，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讨论探讨这本“日记游记”在沈慕羽生命史上的意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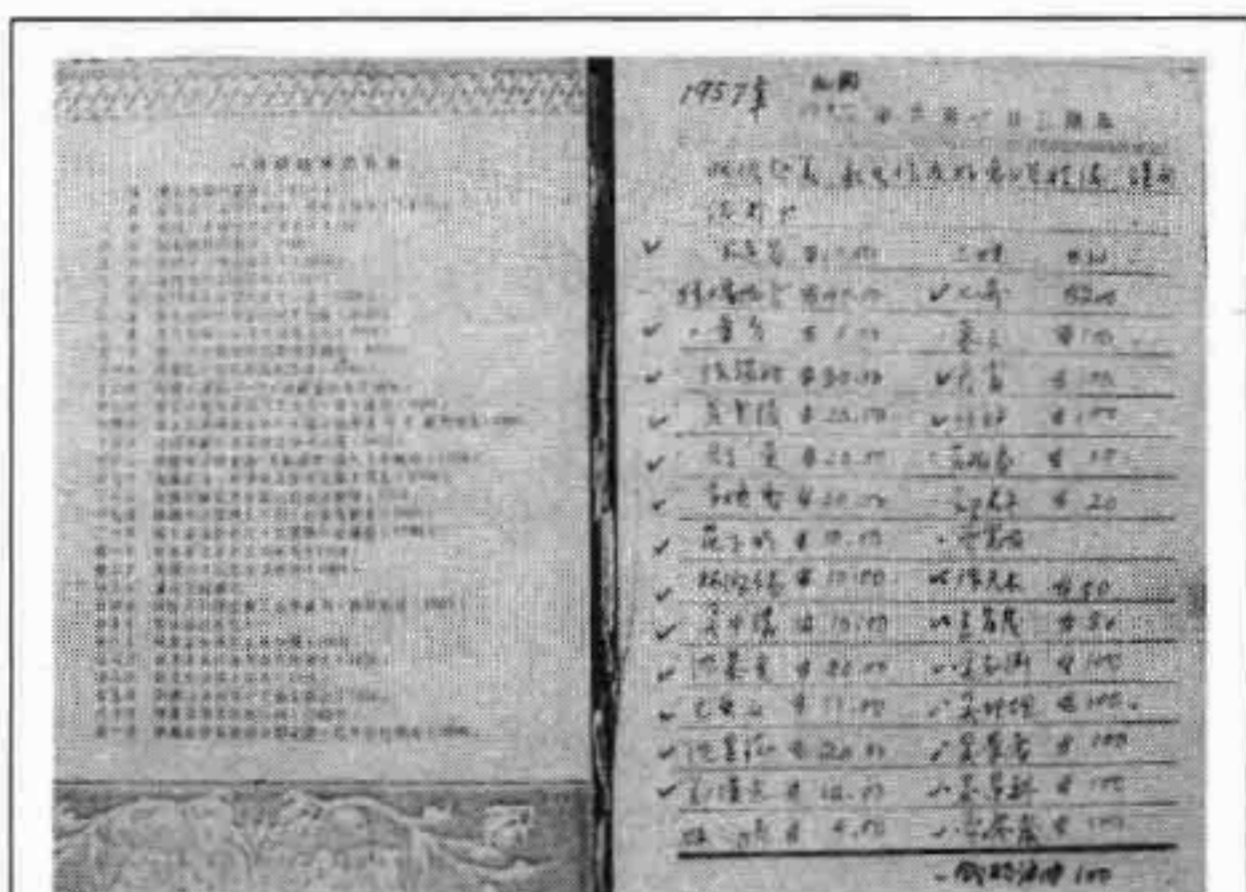
还有一点必须指出，“游后游记”与“旅游日记”有别，游后游记可以事后追述，游历归来在文字的修饰可以加工，斟酌字，而旅游日记则是原汁原味，原形毕露了，考验着当时书写人的精神与文采。前者有梁启超《新大陆游记》、郁达夫《屐痕处处》、郑振铎《西行书简》、余秋雨《文化苦旅》为代表，马华作



家赖瑞和的《坐火车游盛唐》也是这一类；后者有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艾青《旅游日记》等。一般来说，旅游日记是随心所欲的、只言片语的，缺少通常的文字表达时所注重的修辞、延续性和逻辑关系，甚少能够写得像第一类的游记那样典雅、完整。薛、康、艾游记之能够传世，并不是偶然的。

其实日记游记之所以难写，主要是考验着书写人的精力和精神，当然还有他观察能力。每日必须有事可记，又不能流水帐式的记录，不然就索然无味了。我们且看看沈慕羽日记游记的几个特色。

沈慕羽细致观察入微，大者固然不能逃过他的目光，小者更加注意。大者如城市之外貌与内涵，旅途的重要人物和事件，都一一在案。琐碎之事，他更加不厌其烦的记录下来。如出游前亲友送给他的程仪，以及旅途费用，他都会很详细的记下。1957年日记的第一页和第二页，就非常详细的记录了亲友送他的“程仪”。至于银钱收付方面，沈慕羽付出的钱会入帐，而收入及别人归还的钱，却很少漏记。日记里，地名、人名、景名都记。上段的图表的整理，是依据日记记载。他写景状物，极为精细，如“本日阳光普照，极觉温暖。下午一时参观国立博物院Museum，内有历史人物之遗物，名女人之服装，引擎、汽车、船、火车、纺织机、缝纫车、邮票、军用票、钟表、铜币、徽章等部门，看了之后，便明各物之演变。”对博物馆陈列之物，如数家珍。



沈慕羽1957年日记的第一页。“此次赴美，承多位友好惠赠程仪，仅开志于下。”

“Marshall Field百货公司位置Washington, Clark Randolph state四路的中心，占地之席可想而知。屋凡十层，每层上下楼均用活动扶梯以省脚力。入内概不许抽烟，顾客川流不息，女

士约占80%。每楼均标明部门名称。女人之化妆品衣服帽鞋布匹、瓷、毯、首饰、钟表、玩具、花朵、食品、电器、家具千千万万种举凡生活用品应有尽有。每部设邮寄部可代客邮寄货品。第十层设还款机登帐部，如此规模之商店在余平生当属创见。”

沈慕羽日记也有浓厚的生活实感，其表达细腻深刻；如“上午后有参观的节目，我就利用这时间洗背心内裤及衬衣。边洗边叹气，自来美后，对于这工作未能假手于人，因之给洗衣作，则每件起码二角，快洗则三四角不等，以叻帮折算，洗两次我可买新衣一件了。可恨的衣服越洗越黄，因此想到月霭在家洗衣的功夫的确好，一天要洗那么多，真够辛劳了。”

“昨晚写日记至深夜二时半始就寝，神疲力竭，一夜好睡，不知四时许已天明，阳光照在屁股上犹不觉，忽令令令一阵一阵的响，讨厌的很；是谁一清早就打电来，把我吵醒了，忙提电话来听，哈啰哈啰几声，仍无回音，是谁开的玩笑？就把听筒放下，原来是电话局每朝例常的催工电话，他怕一般人睡得太甜，不知醒觉，故在每日上午八时半必会合作响唤醒好睡的人。用意良善。”

在艺术成就方面，沈慕羽日记词汇丰富，敏于创制；写景多用短语，状物绘景，叙程述感，富于节奏感。文字赏心悦目，除全方位多角度叙写风景之外，遣词准确，生动传神；如“远处积雪的山岭越来越近。车子环山而上，满山遍野一片雪白与松柏的翠绿相映成趣。这时山势越益险峻，雪花横飞，烟雾迷蒙，远山近木不辨面目。幸车路可寻。终于达到高峰。Mt Evans的最高峰，飞鸟绝迹，海拔一万四千二百六十尺。”

沈慕羽写景时也有时注重抒情，寓情于景；如以下描述：“离此教堂为Grant总统之纪念堂，在Hudson River之滨。当年胡适陈衡哲谈恋爱之所。胡适曾因此而歌颂Hudson River之景物。一瞬数十年，此两位思想家，好事未成，终各奔前程，如今衡哲已做老祖母，胡适也达知命之年。回首往事，不知作何感触。”（1957.4.15）

沈慕羽看到美国的进步与现代化（“我最敬佩的就是美国无论

大城小镇都有相当好的现代设施，文化水平不因穷乡僻壤就差，而人情味却较大城市更浓厚。”（1957.5.7））往往会想到马来亚、华社应该如何学习、借鉴等感概。他实践考察活动，通过考察活动的交流，阐述自己的感受和观点。此类文字非常之多；如：“余意联合国应有国际通行证，以沟通各国旅客，增进民族间之了解，多来往，感情增加，猜忌减少，国际纠纷可以逐渐消之无形。天下一家之理想，庶几可以实现。”（1957.4.10）。

沈慕羽虽在国外，但不忘国内时事，特别是关注国内华社时事的动向。日记有一则这样的记载：（1957.4.9）“余之至李朋餐馆用膳，最大的目的在向彼索阅华文报——美洲日报，俾知世界动态。其内容远不及星马报纸，较檀香山知华文报则胜过，与旧金山之少年中国报相伯仲。偶翻阅，得悉钟灵中学又以罢考闻，韩江及中华学生亦起而相应。檳华女中等均由当局会其停课。详情则未悉。余信汪永年如不去职，钟灵将无宁日也。不禁扼腕再叹。”沈慕羽对于钟灵罢课的历史提出了至今仍有意义的诠释，他对于华文改制中学的哀叹，及对汪永年的去留的强硬态度，构成了某种真预言。这些描述给了我们很强的历史现场感。

日记里也时常透露了他出国时对家人深切的惦念，偶尔独处时甚至不禁惆怅。四月十七日的日记写道：“主任把天木弟和义儿写来的信递交给我，忙拆开来看，以慰四十天的渴望。家书一字值千金，这话一点也不错。”（1957.4.17）接着有更细致的描述：“翻阅阅读，不忍释手，人虽在此，心实在马来亚。美国虽好，终不如马来亚。福建人所谓‘猪穴不值狗穴好’，意谓自己家虽穷却比人家的家好。我在美国每晚临睡前总是从皮篋中检出全家福及青年团等相片看看，像是必温的功课……”（1957.4.21）有一则日记这样写道：“在车站的凳上我一口气写了四封信，仍无法普遍地为每个亲友候安，心头感觉不宁。”（1957.5.12）

此外，在记游的同时，日记还常常兼及当时美国和各地的居民生活、风俗人情、民族分布、历史社会等等事情。沈慕羽对美国社会发表的诸多观感，至今读来还能受到不少启迪。当然，他对美国社会的观察，因为是日记文体之故，仅仅能够停留在表面现象上，

还没有进一步深入其内部的。无可讳言，他对美国社会的了解还是比较肤浅的，其中有很大的片面性。

## 六、1957年日记在沈慕羽生命史的意义

沈慕羽写日记写了52年，毕生致力，勤而有恒，而绝大部分是在晚上写的。写日记，是一种享受孤独的时刻，也是热闹的沉淀。“孤独是一种沉淀，而孤独沉淀后的思维是清明。”（蒋勋语）他享受孤独，是要把热闹的情绪化享受，沉淀为情感化享受。日记，也可以成为个人的情绪发泄；当有了什么心事，又不便对他人提起，或者有什么委屈和愤恨，都可以用笔记下来。沈慕羽日记无疑是独白，但是，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个情绪的发泄渠道。他是一位自控能力极强的人，日常自持而自重，此行径特征反映在日记的内容与书写上。他的日记没有诅咒、谩骂、激愤之言，极少项是埋怨，有许多感叹，绝大部分是记述、观察，多是思考的产物。他极少在日记上随手涂鸦或草草几句，其日记构思完整、用词恰当，极能反应出沈慕羽潜意识中的心理状况。

正是由于沈慕羽行文叙事有序，其日记就呈现出真实的生活内容。作为个人生活道路的史录，沈慕羽日记和他的生活一样，并不装腔作势，也不矫揉造作。其实他的生活说不上丰富多彩，在平实中度过。他晚年有写过自传之类的文章，但是，余认为他的日记比自传更能表现他的个性和多方面的生活内容，堪称最大意义上的个性化写作。

沈慕羽1957年开始写日记，而此年的日记是以游记文体出现，其特殊意义实在耐人寻味。他为何选择这个作起点，而他出游或下笔之前，是否有任何长期准备或未来策划？我们不得而知。他曾说他出游之前参考过游记之类的书籍。<sup>20</sup>的确，日记游记作为一种文

<sup>20</sup> 李亚遨在编辑《沈慕羽日记》时，曾经询问过他。他答曰：“我於1957年得到美国国务院青年领袖奖学金，受邀赴该国访问两个多月，足迹遍全国各大城市及乡村。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殊有记载之价值，而事前曾读多本旅游日记，因此引起写日记的动机。”可惜他没有说明“曾读多本旅游日记”是那些著作。见李亚遨：“《沈慕羽日记》答编者问”，未发表稿件。

体，当时已经有著作出版，他借鉴这些著作是极为自然的。此年日记书写之顺畅，也可能让他意识到日记文体之可以继续经营。事实上，在此之前，沈慕羽也留下一些笔记和不系统的日记段落。<sup>21</sup>现在我们知道，写日记，实在是沈慕羽心灵的需要，一个积习。

这部日记也不是为了出版而写。它显然在一种“非公共写作”的心态支配下完成的，而是写过自己看的，其私密性很强，所以体现出的沈慕羽的思想、情趣、性情、气质都相当真实，读日记就如同近距离阅读其人了。正如周作人所说的：“日记与尺牍是文学中特别有趣的东西，因此比别的东西更鲜明的表出作者的个性。诗文小说戏曲是做给第三者看的，所以艺术虽然更加精炼，也就多有一点做作的痕迹。信札只是写给第二个人，日记则给自己看的（写了日记预备将来印书出版的，算作例外），自然更真实更天然的了。”沈慕羽后来到了80年代才有出版日记的计划，了解这一点后，读者会更惊叹他1957年写日记自我用心之深，自我课责之严，简直就是锻炼自己的意志。<sup>22</sup>

1957年的沈慕羽日记与以后和其他年份日记最大不同的地方，是其独立成一本游记日记。它是日记，也是行纪、更是游记。也就是说，就1957年日记而言，我们可以就沈慕羽日记读沈慕羽日记，不需太多的旁白或诠释，读他的文笔与见识，而其味无穷。就如我们读连士升的《印度洋舟中》或黄润岳的《英伦见闻》一样，把著作当作一个文本来欣赏，获得自然的阅读体验和真实的审美直觉。至于其他年份日记，读者可能无法如此阅读了。

沈慕羽对此行如此自豪，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乃它实质上意味着一种敢于冒险、思想开放、开拓见识的精神。此次行万里路，是沈慕羽自由人生的一个选择，也是一种生命态度。不论是胡适留美、鲁迅留日；还是康有为游历欧美，梁启超流亡海外考察，都是有成就之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迎开放自由之人生的范例。沈

<sup>21</sup> 金马士沈慕羽纪念馆内有摆饰这些文件。

<sup>22</sup> 在远离家国的途中书写，是需要一点激励和“心理基础”的。黄润岳《英伦见闻》的“后记”有这样一段话：“铁忱兄的回信，更给我戴了一顶高帽子。接着学校里的同事也来信说大家争看校长的文章。这样一来，便奠定了我写伦敦通讯的心理基础。”（黄润岳：《英伦见闻》，香港：人生出版社，1959年，页143。）

慕羽知识和阅历随之增加，提高了自身的修养，对于以后的事业发展，很难说没有激发的作用。他的这一次壮游，在他以后漫长而丰富的岁月里，已经升华为一种开放和奋斗的人生哲学。之后他不断书写日记的动力，难道不会是来自于这次壮游的潜移默化？三个余月的壮游，正是象征他97岁生命的壮游。

强调积极入世、奋发进取、自强不息，是儒家思想最基本、最重要的价值取向。论者常说沈慕羽一生实践的是儒家思想。郑良树就开宗明义说他是“儒家文化的实践者。”<sup>23</sup>这一点在沈慕羽1957年日记里可以找到佐证。从此年的日记里，读者可以感觉到作者内心充满对现世的理想，以及充满淑世和入世的情怀。日记处处充溢着积极入世、刚健有为和以天下为己任的人道情怀。我们几乎看不到沈慕羽当年有任何愤世嫉俗或激进色彩。与其说他缺乏忧患感，不如说他洋溢着人文精神的淑世主义。显然，这些气质绝非汲汲追求眼前名利者可以比擬的。

较之与80年代和90年代他进入了暮年期的日记，1957年日记（以及60年代日记）所表现出的，是其充沛的生命力和竞争力。1957年是沈慕羽生命史上其中最重要的一章。他一生的奋斗里有几个关键年份。1965和1966年间，他在马华公会里争取华文为官方语文运动，直到被陈修信开除为止，为他一生政治事业的高峰时期。此两年的日记可谓“争取华文为官方语文日记”。1970年他接受陈修信之邀请，参加全国华人团结大会，发表演说，内政部根据录音控告他涉嫌触犯“煽动法令”，直到1972年10月撤消案件为止，此两年日记可谓“大团结运动日记”。1987年的茅草行动当局采用了《内安法令》大逮捕异议人士，他被捕入狱六个月，有极为详细的日记记载，此两年日记可谓“狱中日记”。这几个阶段，都是沈慕羽生命史之叙述中佔有重要的位置。换言之，1957年的“美欧日记”是记录了沈慕羽一生生存轨迹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具有沈慕羽生命里程碑式的意义，其文献的独特价值不言可喻。

<sup>23</sup> 郑良树：“总序——儒家文化的实践者”，《沈慕羽事迹系年》，页4—11。

## 七、沈慕羽1957年日记与马来（西）亚华族思想史

当前马来西亚华人研究最薄弱的一环，是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而思想史和文化史研究最薄弱的一环，莫过于马华知识分子走向世界“异域形象学”的论述。至今我们不乏世纪交替是南来或南渡或南游的文化人对新马或南洋的描述，但是那些身份认同上是南洋、新马华人的知识分子对星马以外——即异域——的看法究竟如何，尚未看到研究成果。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命题。

所谓“形象学”（imageology），或者“异域形象学”，是从区域本位思考异域的研究，一种“自我”与“他者”的对照。一个在特定的语言文化氛围中长大的人，他来到另一种不同的或异质文化环境并与后者发生实际的（如旅游）或想象的（如阅读）接触时，他的思考会发生什么样的激荡呢？这是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无论是“西方的中国观”，还是“中国人的西方观”，都是一项非常有意思的思想史片段。<sup>24</sup>八十年代钟叔河就曾经编过一套湖南出版《走向世界丛书》，企图寻找晚清知识分子看世界的不同感受，其用意在于借旧人之笔说今日之况，将昏庸与明智展示给世人，这套丛书影响极大。钟叔河在文中说：“一种文化决不能靠排斥其他文化而得到真正的发展。有没有容纳外来成分的气魄，能不能吸收和消化新的分子而并不机械搬运、盲目崇洋，正是衡量一种文化有没有生命力的标准。”

马来西亚华族知识分子有没有容纳外来成分的气魄？他们有没有生命力？他们对于中华文化和华人教育的执着，我们知道很多。但是他们是如何持着中华母体的旧、新文化传统，在马来（西）亚在地化、去殖民化的同时，观察外面的世界？他们是抗拒还是容纳？是反思还是自省？在“自我”与“他者”的对照之下，到底发生过什么冲击？

对于马来（西）亚华族“异域形象”的建构，我们需要大量的

<sup>24</sup> 有关“形象学”的讨论，读者可以参考张国刚、吴莉苇：《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一个历史的巡礼与反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也可以参考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材料和对异域（包括中国、欧洲、美国）历史与文化的深刻理解以及精到的分析，才能把握住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之“异域观”的来龙去脉。努力去获得一种从马来亚的观点看世界的知识力，对于新一代的马华知识分子而言，再重要不过了。

以我初步观察，50年代与六十年代初的马来（西）亚华族“异域形象学”的一些资讯，主要还是在马来亚文化人、学人的游记散文找到。我们不妨看看连士升、黄润岳和许云樵这方面的著作。

连士升，福建省福宁府福安县人，1948年移居新加坡。他有多本游记，是少数离开大陆后继续游览世界各国的南洋文化人之一。游记著作有《祖国记行》（1948）、《塞纳河两岸》（1950）、《地中海之滨》（1950）、《大西洋一角》（1950）、《印度洋舟中》（1950）。他的《祖国记行》显然是从中国本位对南洋华人诉求的论述，而后来1950年出版的四本游记，可以归纳为“通讯文学”，其中中国人的身份隐约可见，而其南洋人身份认同感则完全感觉不到。《印度洋舟中》一书是以日记文体写游记，更多的是写欧洲各国的历史与文化，参插着每日的游程和见闻。连士升的欧洲旅游日记是一种旅途读书的记录，在文体上较接近刘海粟的《欧游随笔》。

黄润岳的足迹也到达过世界各个角落。他的《英伦见闻》（1957）、《万里归程》（1958）、与《美游杂记》（1958），都是他旅游随笔。王宓文在《英伦见闻》的序里说：“本书作者，所常在念的，是民族语文教育问题。现在我们马来亚华人甚为注意民族文化。中华文化的发扬，在今日的马来亚也是重要课题之一。作者既关心于此……”<sup>25</sup>他是看到黄润岳游记的比较好的出发点是马来亚和华文教育；这恐怕是王宓文一厢情愿的看法。黄润岳写道：“我从马来亚来，我是华校教师，我来英国考察教育”<sup>26</sup>，但是行文与描述显然是自在和悠闲的。他的游记随笔，自然朴实，出世意味浓厚。黄润岳代表的，是另一种类型的马华知识分子。就其身份认同而言，却较连士升更具本地化色彩了。

<sup>25</sup> 王宓文：“序”，黄润岳：《英伦见闻》，香港：人生出版社，1957年。

<sup>26</sup> 黄润岳：《英伦见闻》，香港：人生出版社，1957年，页41。



许云樵的《欧非胜览》描述他1962年环游欧非各国的经历与观察。<sup>27</sup>他于1905年出生在江苏省吴县。1931年，他下南洋谋生，当过编辑。先是在马来西亚柔佛新山市宽柔学校当教务主任，后任职与南洋大学。他的著作主要是学术的，《欧非胜览》是他少数的一本散文游记。内容有许多考据和历史观察。学理与见闻并列，加之微妙的感受杂糅其间，拼成了马来亚少见的文化散文游记。许云樵是参加会议而顺道环游欧非，其目的可以说是为游览而旅游，并没有肩负着太重的时代使命感。

这几位都是博才饱学的作家，说他们是新（星）马第一代的徐霞客，应无异议。50和60年代的游记散文，他们作为代表是当之无愧的。当时的旅游事业还不发达，他们能够远行，的确不是一般的事。当时随笔（通讯、报道）倒是相当流行的文体。这些作品记述山水景物、风土人情和介绍域外风物，结合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游踪履迹，以散文体、日记体的游记发表了。我们第一次看到马华知识分子将思维延伸到东方之外的地方，文章的气象特别新鲜。

但是我更关心的是，这一代华族知识分子走了出去，他们的“外观内省”究竟如何？己身的拷问和对历史的反思？外观异域，有何心得？内省身份，有何思量？他们有没有身份认同的矛盾？在思想的挣扎上，是否有留下痕迹？从这些作品中，我们是否可以得知马华知识分子几时摆脱“地方性知识”的身份？

从这些游记作品理，我们似乎感觉到星（新）马华族知识分子企图以远游来诠释整体世界的开始。这是一种国外的时事观察，也是星（新）马文学对世界的解释了的显现。新马华知识分子并不缺乏在“自我”与“他者”之间跨越的本事，从这些游记中即可看出。连士升、黄润岳和许云樵的游记都凸显出50、60年代马华知识分子，除了侧重在新中国的发展之外，也远眺美欧。他们对美欧景物和风土的描写，是了解、研究独立前后马华文化人“自我形象”的最重要的信息来源。这些著作虽存在思想上的局限性——他们既没有救亡图存之心，也没有启蒙改革之意——，但是却的确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是新马华人自觉进行文化交流的珍贵记录。他们在

<sup>27</sup> 许云樵：《欧非胜览》，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1964年。

跌宕起伏里寻找本我，而域外宁静里的思考书写，留下来的是本原的闪光。他们对当时异域的想象与论述，即其“异域观”之宏构，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举证。世界各国形象学的研究，以后不能遗漏他们这些马华知识分子的“外观书写”。

在这文化史、思想史的大脉络里，沈慕羽的游记日记有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作为一位马来亚独立前后的华族知识分子，沈慕羽1957年的游记的意义，在于提供了一个观看世界的侧面。说这些文化人（沈慕羽在内）是50、60年代足迹最远的马华知识分子，应该不是夸张之词。沈慕羽1957年日记，和连、黄、许的游记一样，记录了当时新马华知识分子的思想脉络与观念信息，也实在地提供了许多记述历史的可贵细节。它们把马来亚历史和世界历史结合起来，凝固起来。

沈慕羽1957年日记的特殊性在于它的隐密性、日记文体以及思想内容。游记不是为出版而写，是显而易见的。日记游记文体也是与上述著作有不同之处。连士升的游记虽然是以日记形式记录下来，但是据他自己说是“回家之后……在两三个月内把全部稿子整理出版”的。<sup>28</sup>就其“原始性”来说，沈慕羽日记的特点是更向内心倾斜，也因此使它成为了研究个人心态史和族群思想史的珍贵资料了，它也是研究马华“异域形象学”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文献。

上述的几本游记的一个特色，是作者寄情于山水之间，多倾注于自然美景的描绘，自是洗尘脱俗、清新流利，其文学色彩也特别浓郁。沈慕羽1957年的游记日记虽不乏艺术成就，但是它不应该被视为文学创作。更适合把他定位为一位先进的马华公共知识分子借助了一个机缘，走向西方，走向世界，续而受到西方现代文化的吸引与启蒙，以寻求富强属于他的新独立国家与民族教育的历程。与连士升、黄润岳和许云樵不同的地方是，沈慕羽不是一位纯粹的文人或学人，他是一位社会行动人，一位公共领域的知识人。他的时代使命感比前者沉重的太多了。他的文字更能代表当时的马来亚华人文化思潮与实际的政治矛盾。

<sup>28</sup> 连士升：《印度洋舟中》，星加坡：南洋报社，1950，页156。

的确，沈慕羽1957年日记还保留着50年代独立前后国家、民族认同矛盾的一些记录。当时华族精英分子在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上的矛盾与张力，是非常显著的。日记日期皆志“民国”，是其一。走访志人多属中华民国官员，是其二。走笔之间说到“我国”，是指中国而非马来亚；说“国人”，也是指“中国人”，而非马华人。有一则日记有这样的记述，是沈慕羽对波士顿的马拉松竞赛的观察：

有出发点至重点廿六哩，参加者二百余人。突闻欢声掌声交织中，冲出一位身材中等年纪廿岁的美国青年，脚不停蹄的向前奔驰，速度正常，气力尚充沛。他就是荣获第一名的Kelly，次名也是美国青年，三四名均是高丽人，日本人居第五。他们个子小，看来气色似不继，然仍咬紧牙根忍着气，企图名列前茅而不遗别族笑。这种气概是每个黄帝子孙所应该学习的。试观每次世运会我们派出大群人马出发前预测如何有获分希望，到临阵则退缩而败下阵来，归来是带来满筐满箩的大鸭蛋。国人如不猛醒，卧薪尝胆，忍辱负重，国仍无可为也。  
(1957.4.20)

这里认同的“黄帝子孙”和“国人”，显然是沈慕羽想象的中国和中国人。这些思绪、论述，折射出当时马华知识分子政治理想与政治实践之间的矛盾。这是历史现实、时代的局限，我们不能因此说沈慕羽不忠诚于马来亚。当他介绍给地主或演说时，都是表明来自马来亚的。其实当时还没有公民权的问题。我们只能说，这种身份认同的矛盾以及国籍身份的纠缠不清，的确是这个年代普遍的现象。这种身份认同上的左摇右摆，心理和认知上的无棱两可，恰好反映当时马华人所经历的历史阶段，以及后来在去殖民后的国度里适应下来的特徵。

当然，沈慕羽的时代、以至个人，都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他1957年的游记日记，并不是梁启超变法失败后念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沉甸甸压在他心头写成的《新大陆游记》；他1957年旅美历程，也不是康有为亡命天涯时“七年以来，汗漫四海”而“哀中国之病

而思以药寿之”<sup>29</sup>的那种历程。他明言：他考察的目的，是考察美国教育。如此简单而已。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不难发觉，在他的潜意识里，或他认为自己更大的时代任务，他是要从美国教育体制里寻找到马来亚独立后华文教育应当发展的理想，以至吸收、借鉴、引进他国的经验。他表面上是在写游记，写外国的一切，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借题发挥，讨论自身处境和的教育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沈慕羽的游历虽然没有“西学东渐”的深刻透悟，但也颇拥有几分郭嵩焘“那容一枕独安眠”的色彩。<sup>30</sup>

## 八、结语

约一千万字的《沈慕羽日记》从1957年的日记始，到2009年2月终，它可以被视为沈慕羽个人编年体的史书。<sup>31</sup>这些文字藏掖着沈慕羽的精神光辉，也凝聚了他毕生心血，其年代时间跨度之大，内容涵盖面之广，确属不可多得。我们知道“公共领域”的沈慕羽毕生服务华文教育、推动文化活动、苦练书法，在日记还没有公诸于世之前，殊不知他私下亦毕生经营日记文字。他磨墨，墨磨他；他写日记，日记也在写他呀！到了晚年，他干脆把日记当作一种独特的脑力锻炼方式。有时失眠，他还会漏夜题书追忆往事呢（2006.10.24）<sup>32</sup>。余以为，沈慕羽的天天写日记行为，不只是他的生存日志，实际上已经是一种去蕪存菁的淨化修行，是他内心对话的釐清与照见，是他不断调整脚步，虚己化物的表现。

自从2005年3月8日沈慕羽向媒体公开他的日记后，华社惊叹，李亚遨和廖文辉也曾经做了一些重要的编辑工作。<sup>33</sup>一般人认为，

<sup>29</sup> 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7年，页10—11。

<sup>30</sup> 全诗为“挈舟出海浪翻天，满载痴顽共一船。无计收帆风更急。那容一枕独安眠”。郭嵩焘是其中一位先到西方国家寻求先进知识的中国知识分子。

<sup>31</sup> 一千万字，是沈慕羽自己在2005年公开日记的估计。

<sup>32</sup> 《沈慕羽日记》（2006.10.24）：“入夜因情绪兴奋，致整夜睡不觉，起来写这篇日记。”这则日记是写“二次战争的故事”，记述他在日居时期的经历，共六百余字，极具历史价值。

<sup>33</sup> 李亚遨负责2001年教总原拟出版《沈慕羽日记》早期的数册。此出版工作后来因种种原因而搁置。廖文辉在编写《沈慕羽事迹系年》时亦有参阅沈慕羽日记。

日记乃草根琐事之记录，不必太过重视。殊不知如此大气磅礴之日记，大马华社罕有，中文世界罕见，世界亦罕有！<sup>34</sup>更重要的是，沈慕羽日记折射出马华社会的命运历程，是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眼里不可多得的原生态史料。阅读之余，更可观瞻。《沈慕羽日记》实为马华文化之绝唱、五十年之史诗。事实上，沈慕羽日记影印抄本每页是“蝇头行书”，不易阅读，不易辨识，只能变成铅字后才真真能够方便研究。余读沈慕羽日记，未尝不废书而叹也。

1957年的《沈慕羽日记》记录了沈慕羽一生仅此一次的全球旅行；它是那次旅行的完整记录。之后他把毕生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和文化发展上，偶尔会出国旅行，更多的是公干或考察，但是无论是跨越度或深度，都无法与此年的游历相比。感谢他用心的日记书写，我们如今仍然可以窥看到45岁壮年沈慕羽亮丽的人生，他心灵深处的真实告白以及他对触及西方后消化的思考成果。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这部日记填补了沈慕羽壮年文化景观的空白，让我们找到了一份了解成就日后沈慕羽的重要思想线索。它也让读者从那个年代的政治诡异和华团斗争的包围中感受到一份来自一位有志于公共服务的知识分子的清新与亲切。

日记是一种个人的生存状态，而若出自于一位公共人物之手，它也是一个族群生存的集体历史画卷了。1957年《沈慕羽日记》的书写方式与思想内容，其意义不仅是个人的，实际上，它折射出一位在马来亚独立前后的入世华族知识分子的思维与对世界的观察，因此也透露出一个民族文化命运始末的讯息。这本日记的价值已经渐渐超越了个人心态史、人生史和生活史的范围，而进入到一个族群的思想史及的文化史范畴了。作为一份没有出版的历史文本，它在我们心底烙下抹不去的岁月。时间越长，日记的历史价值就越大。从日记里，我们深深感觉到壮年沈慕羽的高昂而豪迈、旺盛而坚定的精神。这些都象征着有深邃文化并有坚定政治信仰的民族精

<sup>34</sup> 份量略与《沈慕羽日记》相埒者，只能够在近代中国学人里找到。如《胡适日记全集》四百万字；《顾颉刚日记》起于1913年，终于1980年，其间经历六十余年，字数达六百万余言；而被喻为“史上最长之日记”的《吴宓日记》，约三百万字，及《吴宓日记（续编）》，约四百万字。

神，也是一个超前意识的民族的思想写照。现在重新翻阅，这本日记隐约间也似乎赋予了当代马华文化及政治式微某种悲剧色彩。

（作者谨此感谢沈慕羽纪念馆以及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给予阅读《沈慕羽日记》的方便，以及黄亚花女士、苏启慧先生、余裕忠先生和李亚遨先生的帮助。）

2009年9月—10月

---

# 沈慕羽最后的15年

活动、贡献与局限（1994-2009）

■ 廖文辉

---

## 一、前言

2009年2月5日，9点15分晚，备受华人社会敬重的华教元老、社会活动家沈慕羽在马六甲住家与世长辞，享寿97。噩耗传来，同声一恸。沈慕羽原籍福建晋江，1913年7月20日诞生于马六甲。抗战时领导抗日，为民先锋。沦陷后，被系于狱，历尽苦刑。沈氏战后活跃于政坛，为马华公会青年团（马青）创始人，任副总团长职。曾于1956年，荣膺甲华人参事局议员，嗣又受英女皇封赐JP（Justice of Peace太平局绅）勋衔；1959年，荣膺最高元首封赐JMN荣衔，为教育界膺此衔之第一人；1966年，因争取母语为官方语文，遭马华公会开除党籍，1971年。为鼓吹华人大团结，涉嫌触犯煽动法令，诉讼两年始平反，1987年，为反对不谙华文教师担任华校高职，失去自由两年。他致力于母语教育之争取，数十年如一日，未尝稍懈。沈氏是全国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全国华校教师职工会、马六甲华校教师会等多个重要华教团体的创组人及主席，并任教总主席28年，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共甘苦、共存亡、共进退。

沈氏精彩的一生，其服务奋斗的精神，对民族国家的贡献，以及在政治社会和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影响，因此无论其生平和精神、隐含的意义、留下的文化遗产等，无不成为学术研究很好的题材，产生不少值得探讨的议题。在沈慕羽生前，有关他的资料，主要以《沈慕羽资料汇编》系列丛书的名义陆续整理出版。此外，除了不在少数的短篇文字，相关的学术研究论著也逐渐涌现。最早的两篇是何启良的〈大马华人历史上的沈慕羽〉和廖文辉的〈千磨万击

犹坚劲——谈沈慕羽的事业》。两篇文章都刊载在《沈慕羽事迹系年》内，前者是序文，后者是导读。何文从政治、教育和文化三个层面论述沈慕羽的事迹，并总结其历史意义，提出了“以道德人格的典范来防止文化人格的失范”的观点。<sup>1</sup>廖文则替沈慕羽的生平事业分成四个领域，即政治、教育、文化和社会进行总整理。<sup>2</sup>另有三篇本科学位论文：一为赖淑娟的*Sim Mow Yu: Biografi Seorang Tokoh Pejuang Pendidikan Cina Malaysia*（〈沈慕羽：一位大马华文教育斗士的传记〉），亦从政治、教育和社会文化三个层面论述沈慕羽的事迹<sup>3</sup>；一为陈丽娟的〈沈慕羽——华教运动中的导师〉，探讨沈慕羽在华教史上的地位以及他对教育事业始终如一的坚持与努力的价值和意义<sup>4</sup>；另一为谢升漙的〈探讨民间创办纪念馆的精神：以金马士沈慕羽纪念馆为中心〉，从纪念馆设立的角度谈沈慕羽纪念馆的资料收集、管理和困难。<sup>5</sup>台湾学者朱宏源也撰有〈沈慕羽——华教领导人与打造马来西亚〉一文，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来探讨沈慕羽如何同时兼顾发扬中华文化和打造马来西亚。他指出：“沈慕羽一生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个‘华侨’如何变成‘华人’……如果和林连玉相比，沈慕羽最大的不同点是从不以加入政党为讳，而他和其他马华要员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从来也不曾忘记自己文化传承的任务。”<sup>6</sup>上述五篇论文主要集中论述沈氏卸任教总主席职（1994年）以前的事迹，其卸任至离世之间15年有关沈氏的研究迄今还未进行，因此本文

<sup>1</sup> 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1997年，页19-55。此文也在1997年1月5日的“东南亚文化冲突与整合国际学术会议”上以〈政治孤航和文化典范：沈慕羽论〉为题发表。

<sup>2</sup> 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页56-88。

<sup>3</sup> Lai Sook Kin（赖淑娟），“*Sim Mow Yu: Biografi Seorang Tokoh Pejuang Pendidikan Cina Malaysia*”，Jabatan Sejarah, Fakulti Sains Kemasyarakatan dan Kemanusiaan,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1996/1997。作者在进行撰写之前，曾向笔者请教，此文基本采用〈千磨万击犹坚劲——谈沈慕羽的事业〉论述架构。

<sup>4</sup> 陈丽娟：《沈慕羽——华教运动中的导师》，加影：新纪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学位论文，2002年。

<sup>5</sup> Chia Seng Hui（谢升漙），“*Semangat Pembinaan Memorial Komuniti di Kalangan Masyarakat Cina: Kajian Kes Memorial Sim Mow Yu di Gemas, Negeri Sembilan*”，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现代语文暨传播学院外文系中文组，2008年。

<sup>6</sup> 朱宏源：〈沈慕羽——华教领导人与打造马来西亚〉，收入何国忠主编《承袭与抉择——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与人物》，台北：中央研究院东南亚区域研究计划，2001年，页95-130。



尝试以这15年作为研究的时限，探讨沈氏这15年的社会活动、贡献和影响。至于他晚年的思想，则不在本文论述范围，容后另文撰述。

沈氏称得上“仁者寿”，年寿极长，本文不采一般以60或70为人生晚年的刻板定义，而且以此定位沈氏晚年，反而难以划分沈氏一生的活动，有分期方面的困难。以1994年作为沈氏晚年的起始，主要是之前他仍然是全国性教育组织的领导，继续前此的奋斗，辞卸主席职后，才算正式引退，开始他人生另外一段不同的旅程。

本文将沈氏最后15年的活动为主轴，尝试整理其活动脉络，从而探讨其对华人社会的意义和影响。

## 二、沈慕羽晚年的教育活动

母语教育权益和体系的捍卫与争取是沈氏整个奋斗事业的重点所在，以期能在马来西亚这块土地上开出母语教育之公平与合理的果实，沈氏在这方面所耗的时间和精神也最久最大。他的华文教育事业可分两个方面：一为作育英才；一为捍卫华教。在作育英才方面，他强调教育是终身事业，以教育天下英才为己任。他廿一岁执教鞭、办晨钟夜学；战后任3校校长，把平民小学办得有声有色；退休后仍担任晨钟夜学校长。捍卫华教方面，他是马六甲教师公会和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以下简称教总）的发起人之一，并连续担任28年的教总主席，期间曾因为争取华文教育的权益而身陷牢狱。<sup>7</sup>

1994年，沈氏以82高龄卸下仔肩，退居幕后，采用与前此有别的方式，仍然持续关心华教事务。为了肯定他对华教的贡献，同时也为询问沈氏的宝贵意见，董教总在他卸任后，议决委任沈氏担任永久会务顾问。初期他还会以教总永久会务顾问的身份，尽可能出席会议，继续关心华教与教总。后来由于年岁渐大，不胜长途往返的劳累，加上行动不便，需人搀扶，故此不再出席会议，但碰上重大议题或事件，他总不免透过电话或字条传达他的意见和建言。

1995年适逢全国大选，国阵政府又来每4、5年一度的花招，

<sup>7</sup> 廖文辉著：《华教历史与人物论集》，八打灵再也：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07年，页176-190。

大派糖果给长期受偏差对待的华校，企图临门一脚，收买华裔选民的心。教总新领导一时迷惑于糖果政策，而想以组织的名义公开赞扬正副首相。沈氏知悉后，紧急传来一封致主席与列位常委的亲笔函，表达对即将要发表的文告，“感到惶忽，因在大选的最后关头，发出文告赞扬正副首相的所作所为，很容易被人误会教总已表态支持国阵，教总已受政党控制而变质了”、“大选期间，政府施用银弹政策，破例而自动地慷我们的慨，大发红包给华校，莫非博华人欢心，为何平日求之难如上青天。今日突然如此豪爽，作用何在，不言而喻。”他还说：“倘以个人身份发表任何言论，谁也不能反对，谁也不能阻止，公私必须分明。”最后，他表明：“事关教总之尊严及华教前途，爰不揣冒昧，略抒浅见，当希裁夺为幸！”<sup>8</sup>立场鲜明坚定，态度坦然得体。

2008年6月，新纪元学院风波爆发，为免风波继续延烧，沈慕羽和董教总顾问张雅山于9月19日联合发表文告，提出“维持现状，续聘柯嘉逊院长一年”的主张，但却不获叶新田等当权派的认同。虽然如此，沈慕羽仍然不厌其烦地在各种场合继续提出以和为贵的看法，并且在11月2日的董总特大上，委托马六甲州董联会主席杨应俊念出一份人在医院以病体之躯草拟的亲笔信函，信函要求：“以宏观透明中庸忍让谦虚融洽品格互相尊重，不宜刚愎自用，独断独行”，最后恳切道其胸臆：“我毕生奉献华教，以华教为生命，今目睹危机，震撼不已，愿大家以大局为重，冷静亲切化解症结，坦诚合作。”令人遗憾的是，不仅没有得到会场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认同，反而遭到难听话语的羞辱，最后特大票决以11比3的大比数通过不再续聘柯嘉逊一年。但他没有因此而放弃，反而在12月25日《图说沈慕羽》新书推介礼上，在分享个人生平事迹的时间，却使用其宝贵时间和精力再次劝导双方和解。这是他为华教所作的最后努力，可惜他的期盼在临终前都无缘见及。<sup>9</sup>

其次，沈氏经常出席华教团体常年的活动，如就职礼、监誓仪式和团拜，以及重要会议，并即席演说勉励的话语来鼓励同道，

<sup>8</sup> 详见志期1995年4月22日之沈慕羽亲笔信函，当时传真至教总，本拟会上讨论，后在会议前决定不讨论此课题，有关文告最后不了了之。

<sup>9</sup> 《东方日报》，全国新闻，2009年2月7日，A12版。

同时也不忘抨击政府政策的不公。由于常年活动不胜枚举，这里仅举数例为证。1995年8月6日，沈氏出席董总第廿届常委会就职仪式，并建议董教总成立经济筹划委员会，以负起三项任务来解决全国独中在目前及将来所面对的问题。<sup>10</sup>1996年6月25日，沈氏出席马六甲华校教师公会主持新职员就职监誓仪式，并指出，既然政府强调“我们是一家人”，就应该确保政党族群的利益，改变态度仿效泰国、缅甸及柬埔寨实行大开放态度，让其它语文教育自由地发展。<sup>11</sup>1999年8月1日，沈氏在第22届董总常务委员会就职典礼上致词，评击政府本末倒置，原是主人的人民反而成了公仆，并吁请朝野政党在大选来临之际，全力支持董教总提呈予首相拿督斯里马哈迪医生及教育部长拿督斯里纳吉的教育备忘录，只有在朝野政党相互配合下，华文教育才能突破。

除了上述形式性的活动外，一些大型聚会往往也会邀请沈氏出席，并演说以激励士气，如《1996年新教育法令》通过在即，董教总继续作最后的努力，于1995年12月17日在董教总加影教育中心举办了“全国华团争取华教权益大会”，沈氏致词认为华教前途与发展系于部长手中的豁免权是一种不肯定的因素，这与1961年第21条（2）部长有权把华小改为国小几乎同出一辙。<sup>12</sup>1996年3月24日，沈氏在“1996年华教工作研讨会”中，建议华教工作者应重新提出“列华文为我国官方语文”为目标，同道们仍需努力，千万别松懈，因为华教还有许多目标未达成。<sup>13</sup>2000年11月9日，沈氏在“宏愿学校汇报及交流会”上表示，华文教育是华族的根，我们炎黄子孙体内流着华族的血，绝对不能被同化的。华教的宏愿是要平等，而不是同化。因此，我们更应该坚持下去，保着我们的根。

其三，由于沈氏的名望和代表性，在一些重大的教育课题上，媒体皆会循例访问沈氏，征询其看法，因此沈氏也不时透过媒体发

<sup>10</sup> 《南洋商报》，1995年8月7日。沈氏在会上提出三点具体建议：一、向政府要求在经费上辅助华校，像殖民时代的政府一样给华校援助；二、争取教育捐款豁免缴交所得税；三、呼吁及以实际行动，以征求财团及厂家作为董教总教育活动的长年赞助人，同时领养独中。

<sup>11</sup> 《南洋商报》，1996年6月27日。

<sup>12</sup> 《中国报》，1995年2月18日。

<sup>13</sup> 《中国报》，1996年3月25日。

表意见。1995年8月6日，沈氏对报界回应有关拿督斯里马哈迪医生在5月8日公布的新教育法令。他表示，政府应该在新教育中，明文规定国民型学校可以自由以母语作为教学媒介语，以符合马来西亚宪法的精神。<sup>14</sup>1995年11月19日，沈氏针对教育部长口头保证华小地位不变之事表示，口头保证及文告保证不足信，唯有法令条文中，白纸黑字印上才可靠。<sup>15</sup>1996年4月24日，沈氏受访时表示，设立新纪元学院的事，教育部有必要再作出考虑与研究，以让本邦的华文体系更趋完整。<sup>16</sup>1997年2月28日，沈氏针对霹靂州一国民型中学接获教育局要解散董事会的函件一事对《南洋商报》回应说，政府要董事会重新注册，也应尊重董事会的既有地位与权利。<sup>17</sup>

其四，沈氏也常常针对教育课题提出看法，立场坚定，始终如一。1999年2月20日，沈氏针对教育部长拿督斯里纳吉考虑迁移华校及首相拿督斯里马哈迪医生曾答应考虑在华人稠密区增设华小一事作出回应说，任何未决定、未落实的事情，大家不应该太过乐观。1999年8月24日，马六甲华校董联会、马六甲华校教师公会及马六甲华校联合会吁请华人组织响应全国11个华团呈予政府的《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大选诉求》。沈氏在记者会上强调，政府或部长拨款发展教育，是天经地义之事，华社应该认清权利，不应大事感谢政府或有关部长。2000年9月3日，沈氏以顾问身份在马六甲晋江会馆欢迎吉兰丹晋江会馆访问团时，促请每位华人提高警惕，不要听信甜言蜜语，要有判断力。2000年10月28日，副首相拿督斯里阿都拉为2000年马来西亚全国校长职工总会第22届代表大会主持开幕时披露，他与陆庭谕曾在1983年同意教育部提出的综合学校计划概念。后来因他和林良实都调任其它部门，有关计划书也被迫搁置。沈氏强烈否认副首相阿都拉的言论，并表明当年讨论的只是学生交融计划。

除了上述所参与华教运动，难能可贵的是，沈氏虽然早于1973年从平民华小的校长职务上退休，却未曾放弃树人的教学工作。仍

<sup>14</sup> 《中国报》，1995年8月7日。

<sup>15</sup> 刊载报纸不详，1995年11月19日。

<sup>16</sup> 《南洋商报》，1996年4月25日。

<sup>17</sup> 《星洲日报》，1997年3月10日。

然担任晨钟夜学校长一职，继续坚持他作育英才的事业，直到2003年方始荣休，由其弟沈慕尧接任校长职位。<sup>18</sup>这期间，沈氏提出晨钟夜学振兴计划，以期增加学生人数<sup>19</sup>，其目的在于为乐龄人士补习，不论男女老少，只要有心学习华文、英文，皆可到该校报读。

### 三、沈慕羽晚年的文化活动

何启良曾谓：“严格地说，沈慕羽并不是一位政治家，更不是一位思想家。但是他在马华的政治史和思想史上所起到作为和影响，从一定意义上说，又超过了许多马华政治人物和文化人。如果不是因为时代形势和视野的限制，沈慕羽很可能是一位马华文化史上自成一家的大师。”<sup>20</sup>诚然此言非虚，尤其是晚年的沈慕羽放下了捍卫母语教育的包袱，可说是放开手脚全面推动文化活动。

#### 孔教活动

沈氏自小受良师教诲，这些老师或多或少皆受儒家思想影响，儒家思想不免印烙心中，并以教书为志业，以孔圣为学习楷模。他认为推广孔教与发扬华教及中华文化是二而一的。<sup>21</sup>1974年，在孔教会两位元老多方奔波游说感动下，毅然出来重组孔教会。把一间千疮百孔、摇摇欲坠的危楼焕然一新，同时也整理会务，扩充图书

<sup>18</sup> 《南洋商报》，2003年3月3日。

<sup>19</sup> 沈氏在晨钟夜学的休业式提出该校将采取四项步骤增加学生人数：一、向国小找学生。国小三年级始能选修母语，家长要孩子选修母语，必须有15名学生方能向教育局提出申请母语班，希望国小的学生家长能把孩子送到晨钟夜学读一、二年级；二、为华小学生实习英文。为适应时代变化，该校也设英文班。华小三年始教英文，且一星期只上课60分钟，实为不足，希望华小学生能进入该校一至三年级英文班。华小学生若华文程度低者，也可到该校实习华文，每星期3天6个小时，比正课时间还充足；三、欢迎专业人士报读。在亚太经济起飞之后，中文世界的政经地位提高，使用华语者越来越多，华校非华族学生日渐增加。这是形势使然。专业人士如懂得华文华语，对他们的事业发展更有利。（刊载报纸不详。）（1997年11月21日）

<sup>20</sup> 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页55。

<sup>21</sup> 黄文斌：〈沈慕羽与孔教：以马六甲孔教会为个案研究（1974—2009）〉，为林连玉基金、南洋商报、孝恩文化基金会和施恩爱基金会联办之“历史慕羽：沈慕羽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之论文，2009年12月12日—13日。

馆，开放公众人士浏览，宣扬中华文化，一改过去将孔子当神明参拜的作风。<sup>22</sup>沈氏卸下教育仔肩后，更能专注孔教会的会务，推展孔教活动。

沈氏晚年对孔教活动的推展，主要有如下几项。首先是通过孔教会进行文化活动。1995年7月6日，沈氏在接待来自中国山东省旅游局的团员及孔子的75代孙孔祥金时，即明确表示孔子是反对迷信的。因此，马六甲孔教会纯是进行学术性的研究及举办各种文化活动，如书法、猜灯谜比赛以及放映祭孔的影片。除了每年举办例行庆祝至圣先师孔子周年诞辰活动，同时不忘呼吁各学校供奉和敬拜孔子像<sup>23</sup>、提倡儒家思想<sup>24</sup>，以期唤醒社会的尊孔风气。

<sup>22</sup> 沈先生在孔教会就职之讲词（1981年7月31日）及巴人〈马六甲孔教会重修落成，增设中华图书馆〉。详见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页139-142。

<sup>23</sup> 如1998年9月27日，沈氏在马六甲孔教会庆祝至圣先师孔子2549周年诞辰，建议各有关学校供奉孔子像，以推行孔子所提倡的儒家思想，以及让老师与学生膜拜；2005年9月14日，沈氏呼吁家长在孩子入学前，将他们带到孔子像前致敬，以学习孔子精神并发扬并实践孔子的教义与精神；2006年9月28日，沈氏在祭孔仪式大会中，建议将孔子的诞辰——9月28日，列为世界教师日，他也建议学校应张挂孔像，恢复旧时学生入学前向孔子致敬的传统；2006年1月，培风379名新生在开学第一天在马六甲孔教会主席沈氏带领下，在孔教会大厦向孔子像致敬礼，见《中国报》，2006年1月4日；2007年9月26日，沈氏在至圣先师孔子2558周年诞辰的祭孔大典中，带领众人在孔像面前上香、献花、献茶、献果，见《中国报》，2007年9月27日；2008年9月26日，沈氏在孔教会庆祝至圣先师孔子2259周年诞辰时表示，所有独中应设法在校园竖立孔子塑像，让学生向孔像敬礼后才进教室，而小学也应设孔子画像让大家瞻仰，周会时向孔像敬礼，并读其格言，才对得起孔子。

<sup>24</sup> 1996年3月17日，沈氏为马六甲孔教会举办的挥春赛主持启封仪式上发表说，孔教会是集中孔子门徒的组织，所以会员们应该提倡孔子的六艺和学说；1996年9月29日，沈氏出席马六甲孔教会庆祝至圣先师孔子2547年诞辰纪念会上建议政府设立一间孔子大学，作为回儒学术交流重镇；2000年8月4日，沈氏在欢迎孔子第75代孙孔祥金的访问时，建议中国推动朗读四书五经运动，以提升社会道德；2000年9月28日，沈氏在庆祝至圣先师孔子2551周年诞辰会上指出，孔子是两千余年的历史人物，华人的伟大圣人，也是世界伟人，其思想放诸四海皆准；2001年9月18日，沈氏在马六甲孔教会、人生佛教中心与《南洋商报》联办庆祝至圣先师孔子2552周年诞辰暨筹募孔子大厦基金联欢素宴中指出，唯有贯彻孔子的儒家学说，世界才不会走向末日之途；2004年8月1日，沈氏在马六甲孔子大厦动土礼中呼吁政府把孔子伟大思想纳入教科书，挽救日渐败坏的社会风气；2004年9月27日，沈氏在马六甲孔教会庆祝至圣先师孔子2555周年诞辰的联欢晚宴上表示，首相拿督斯里阿都拉欲提升马来人的地位就应该把儒家思想编入教科书，让学生从小学接受儒家思想的素养，才能发奋图强。

其次，是马六甲孔子大厦的建立。早在2000年8月5日，沈氏即电传一则“孔子要找屋子”的新闻到报馆，呼吁华人社会有识之士能够拔刀相助，协助孔子搬家。2001年8月29日，沈氏正式发动“筹募孔子大厦基金”活动，吁请全国子弟给孔子一个像样的家，冀望兴建大厦计划实现后，将马六甲发展成为马来西亚的曲阜。在沈氏积极推动下，捐款纷至沓来，如2002年3月19日，天下肯尼国际研究机构捐献6千令吉，以充马六甲孔子大厦基金。<sup>25</sup>2005年7月23日，拿督斯里庄智雅捐100万令吉给马六甲孔教会作为基金。<sup>26</sup>2005年3月14日，获得州政府批准马六甲孔子大厦土地转换费获减半的优惠。<sup>27</sup>在孔子大厦落成仪式举办前一周，2005年9月14日，孔子铜像从中国山东曲阜运抵马六甲，竖立于将建竣的孔子大厦内。<sup>28</sup>25日，沈氏在马六甲孔教会以对至圣先师最高崇敬之意的口号“我爱孔子，我爱孔子，我永远敬爱孔子”，宣布“孔子大厦”在正式落成，并引领1500名嘉宾一同诵读孔子的《礼运大同篇》。<sup>29</sup>

沈氏在完成孔子大厦建筑的心愿后，本欲引退，但在马六甲孔教会复选时，被全体与会者坚持挽留，只好以94高龄再度蝉联主席。<sup>30</sup>

沈氏不只向社会大众推广儒家思想，同时身体力行，将之落实到个人生活、家庭乃至家族上。每年除夕晚团圆饭前，沈氏都会向团聚的家族成员讲述该年生肖的意义和特征、总结家庭动态、报告自己所为、晓示做人道理和勉励的话。每年年初一皆有家族大团拜，并接受子孙跪拜，前后维持了80余年。<sup>31</sup>另外还有清明扫墓的活动，也是沈家的大型慎终追远活动，从如下的一段话可以反映沈氏对清明祭祖的重视：“清明扫墓，乃华人先辈为祭拜祖先，崇功报德，不忘恩泽。凡有良知者必于清明节前后摒挡一切率领家人亲往扫墓，以尽人子之道，语云每逢佳节倍思亲。今人定清明为孝顺

<sup>25</sup> 《南洋商报》，2002年3月20日。

<sup>26</sup> 《中国报》，2005年7月24日。

<sup>27</sup> 《南洋商报》，2005年3月15日。

<sup>28</sup> 《南洋商报》，2005年9月15日。

<sup>29</sup> 《南洋商报》，2005年9月26日。

<sup>30</sup> 《南洋商报》，2006年6月11日。

<sup>31</sup> 沈墨义著：〈永远祝福伟大的父亲〉，《中国报》，2009年2月18日，A10版。

节可谓名符其实。数年来之清明前后都恰遇教总开常年代表大会及公祭林连玉；去年清明节我仍在扣留营，致未到祖坟祭扫，内疚之深，如针砭刺骨，痛苦之至。今日我虽风湿累脚，步行欠劲，但无论如何我必定要登山扫坟，以谢不孝之罪。”<sup>32</sup>

沈氏家族团结一心，沈氏曾经以“天下第一家”自况。据沈氏女儿的回忆：“沈家是大家庭，家族成员足有800人，唯家族中，没有谁不妥谁，也不曾吵过架”、“逢过年过节前夕，沈家的子孙都会聚在一起开家庭会议，讨论分配工作等细节，当天则会聚在祖家，与沈老一同庆祝。父亲总是很高兴地将印好的歌词分派给大家，然后由他弹琴，子孙们就与他一起合唱，大大小小都很快乐。父亲虽然不在了，但我们还是会继续在祖家办家庭聚会的传统；尽管父亲无法再为我们弹奏，但他的后辈有好几位都是弹琴好手，我们还是可以大大小小一起弹唱，就像父亲在生时一样，而我们也能感觉得到，父亲就在我们的身边。”<sup>33</sup>沈氏家族也经常举办大型的家庭聚会，最近一次是在2007年8月19日，沈志明家族举办一场已相隔23年的大型家族聚会，来自全国及海外的530名家族成员踊跃出席，六代同堂，共享天伦。2008年7月21日，沈氏96岁大寿，逾百名沈氏家族成员，齐聚一堂，轮流恭敬地向先生跪拜贺寿，<sup>34</sup>是他有生之年最后一次接受跪拜贺寿。

## 推广书艺

沈家乃甲州著名世家，以诗书传家，兄长们好读书，勤习字。自小其父已经教其如何执笔写字，这是沈氏的书法启蒙，毛笔也成为他的终身良伴。而沈氏书法享誉国内外，曾获代表参加中国的《神墨碑林》书画印作品展及韩国国际书法展览。其书法有“沈体”或“马六甲体”之雅称，与槟城已故名书法家孔翔泰，合称“南沈北孔”。<sup>35</sup>主持孔教会期间，大力提倡书艺活动，举办比

<sup>32</sup> 《沈慕羽日记》，1989年4月9日，未刊稿。

<sup>33</sup> 姚美芹：〈延续天下第一家传统精神，沈家继续保持家庭聚会〉，《中国报》，1909年2月12日。

<sup>34</sup> 《星洲日报》，2008年7月21日。

<sup>35</sup> 有关沈氏书法的研究，可以参见陈玉佩：〈南、北马书风的差异——“南沈北孔”现象分析〉，收入郑文泉、傅向红编《粘合与张力——当代马来西亚华人群内关系》，加影：新纪元学院马来西亚族群研究中心，2009年，页159-173。



赛，借此培育书艺人才。晚年的沈氏对书艺活动的推广是他念兹在兹、极为重视和推动的文化活动，除了在各场合大力疾呼<sup>36</sup>、参与各

<sup>36</sup> 有关言论计有：1995年10月15日，沈氏在大马书艺协会马六甲联委会新会所开幕仪式上，呼吁众人同心协力振兴毛笔书法，因为它所具有的艺术价值，非硬笔所能比拟；1996年1月28日，沈氏在大马晋联青全国书法赛，马六甲区赛颁奖仪式上说，书法是世界最特殊的文字，是天造地设的文字，懂得拿筷子的人，也应得拿毛笔，才不愧为华人；1996年2月11日，沈氏在马六甲平民校友会主办的“母校学生及校友鼠年挥春赛”中，鼓励老师学习书法，以便指导学生写毛笔字；1996年3月2日，沈氏在马六甲书艺协会主办的马新书法交流会及会员书画展开幕礼中表示，好书法须形神具备，外有形态内有实质，才会百看不厌；1996年11月10日，沈氏在主持尊孔独中举行的尊孔四机构书法作品观摩展开幕仪式上指出，毛笔有着发扬中华文化艺术的工具，能体现出中国人的民族特色，中华国粹炎黄子孙不可不学的文化艺术；1997年6月6日，沈氏在马来西亚书艺协会马六甲联委会庆祝成立5周年纪念及筹募活动基金主持仪式上，建议工商界人士与其利用商余时间打高尔夫球或在桌上玩方城游戏，不如通过写书法来调剂身心。他认为勤写书法也可长寿延年，如中国许多著名书法家，皆靠书法延寿；1998年8月16日，沈氏在吉隆坡画院及大将书行举办的“春晖堂名家书画藏品展”开幕仪式中表示，艺术是属全人类所有，并非只是读书人的专利品，工商界人士除了取得物质及钱财上的“富贵”之外，也应涉身艺术，以精神上的“富贵”充足自己；1998年10月3日，沈氏在晨钟励志社举办的“刘欣耕、陈行健书法展”开幕仪式中表示，目前是科技发达的时代，但是中文书法仍然有其存在和发扬光大的价值。他呼吁经商的华人利用余业时间来练习书法，将自己带入墨海里，把中文书法发扬光大；1999年9月29日，沈氏在马六甲书艺协会联委会新届理事宣誓就职礼中，提醒工商界人士，不应忽略精神文化，应协助书艺发展活动；2000年2月13日，沈氏受邀担任“龙迎千禧庚辰年拿督沈慕羽局绅杯挥春公开赛”评判员之一。他强调“龙的书法”是一门大学问，书法并无年龄资格、阶层或种族的限制，是有教无类的高等艺术；2001年4月29日，沈氏在马六甲椰子屋举行的“全甲中学生书法展”中，提醒年轻人学书法，要从端正的楷书开始，打好书法的基础：“就像学做人，先要做个正直的人，心正则笔正，才不会走到歪路上去。”；2001年12月17日，沈氏以马六甲书艺协会顾问的身份主持书法研习营闭幕仪式。他在会上以“翰墨无限，勤练有功”座右铭与在场营员们共勉；2002年2月2日，沈氏在北京易经学者刘纬黎书法展中，透露希望通过频密的书法比赛和展览，把书艺推广到各阶层及各角落，使到马六甲成为“书法城”；2002年2月24日，沈氏主持由马六甲书艺协会、孔教会及《南洋商报》在M广场联办的第4届拿督沈慕羽杯挥春赛剪彩仪式中告诫学习书法者要有“马不停蹄”不屈不饶苦学，不能中途停歇，才能写出好书法；2005年1月5日，沈氏在“张韬书法展及学术报告”中，吁请马六甲书法爱好者齐心协力加强推动书法艺术，俾将古城发展成一个墨香社会；2005年1月16日，沈氏马六甲孔教会主持“乙酉年挥春比赛”启封仪式时，勉励华裔青少年应秉持自强不息，终身学习的态度，不让华族落在他人的后头；2007年6月23日，沈氏在“丁亥年九五叟沈慕羽翰墨展”中与大家分享其一生的奋斗史，并鼓励大家购买他的墨宝，一旦他不在人世，这些墨宝将会变得值钱的宝物；2008年2月24日，沈氏在“春暖人间，家家贴春联”的活动上致词表示，中华文字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方块字，可以横行也可以直排。书法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是上天赐给炎黄子孙的文字，也是炎黄子孙的骄傲。

类书法活动<sup>37</sup>，并身体力行推广。每个星期天，他都在孔教会开班授课，教导书法。

但晚年沈氏对书艺文化最大的心愿乃是成立书艺馆，沈氏身体力行，不遗余力推动，为了落实文物馆的成立，沈氏用其生命最后几年的余晖挥毫书写了数百幅的墨宝，并在全国各地举办书画展，希望透过这些墨宝的义卖筹取经费，最终在2007年2月25日，附设于郑和纪念馆内的“沈慕羽书道馆”正式开幕。<sup>38</sup>

## 抗日纪念活动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蝗军入侵马来亚3年8个月的时间里，沈氏为抗日份子之一，其兄沈慕周则在抗日期间牺牲。战后，日本不道歉，不悔改，以及种种令亚太国家不安的举动，惨遭3年8个月暴虐对待的华人社会，在战后仍然持续各种抗日纪念活动。沈氏作为华社领袖之一，虽然已经卸下仔肩，但仍然出席、主持各类常年的抗日纪念活动、发表演说、提出看法。有关这方面的活动，现做一表列如下：

<sup>37</sup> 1998年7月1日，沈慕羽书法义展在雪华堂举办为期9天的巡迴义展。此义展共列出130件沈氏的书法作品。2000年5月18日，沈氏在新山宽柔中学图书楼展览厅举行的“沈慕羽书法义展”中，捐出70幅墨宝，当场卖出60幅。宽柔校友会518晚宴中，沈观铭将在沈慕羽书法义展筹获的4万元款项，移交予教总副主席陆庭谕，作为沈慕羽出版基金。先生也赠送一幅“仁者寿”墨宝予拿督郭鹤尧，并致赠一幅作品予宽柔校友会。2004年2月27日-29日，林连玉基金、教总和马来西亚创价学会联办“任雨农、沈慕羽、伯圆长老岁寒三友世纪联展”，为林连玉基金筹款。2005年1月22日，沈氏在“乙酉年春暖人间，家家贴春联”活动开幕仪式中，现场挥毫8尺榜书赠送于大马国际现代书画联盟会长符永刚博士。2006年1月14日，沈氏在鸡场街文化坊街头当众挥毫写榜书，吸引了男女老少驻足围观。2007年2月2日，为了配合“春暖人间，家家贴春联”活动，先生在文化街海南会馆举行的书法展中，挥写12尺对联，拍卖叫价7000令吉。2007年11月3日，沈氏在柔佛麻坡区“沈慕羽翰墨展”中，写下15尺的“笔歌墨舞，翰逸神飞”的8字榜书。此幅榜书将会被悬挂在日后落成的“沈慕羽书法文化馆”内，供民众观赏。2007年12月19日，麻坡永美书局画廊举行的“沈慕羽翰墨展”，共筹获18万令吉为筹募沈慕羽书法文物馆基金。

<sup>38</sup> 廖文辉著：〈沈慕羽八十话父兄〉，《孩子》双月刊，1995年3月，页26—28。

日期	活动	讲话内容
1995年 4月5日	马六甲华人抗日义士纪念碑管理委员会会员大会。	抗日义士纪念碑是华人效忠我国的见证，政府应该拨款维持，并把它列入旅游册子。
1995年 8月13日	“太平洋战争结束50周年纪念”专题讲座会。	以〈铁蹄下的梦魇〉为题，细诉日治时代令人悲愤的情景。他呼请日本政府坦诚地向日治时期的受害国道歉及赔偿损失，并且放弃日益强大的军备，以事实表示爱好和平的诚意。
1995年 8月25日	马六甲晨钟励志社主办的“太平洋战争结束50周年纪念”图片展讲座会。	华人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抗日的历史资料应该编入大马教科书内。日本当局应赔偿日战时期向民间刮取的奉纳金，以充作文化学术基金来栽培人才。
1996年 8月15日	于马六甲亚洲人寿保险大厦会议室接见吉池的“和平之旅组”和高岛的“悼念和牢记亚太地区战争牺牲者，并把他们铭刻于心会组”日本和平访问团。	中国和日本既然有着同文同种的关系，双反更应互相配合，以便为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
1998年 4月5日	马六甲华人抗日义士纪念碑管理委员会联合马六甲各注册社团在华人抗日义士纪念碑前举办公祭仪式，沈氏为主持献花圈仪式的其中一位代表。	
1999年 4月5日	马六甲三保山抗日烈士纪念碑前公祭日治时期壮烈牺牲的烈士忠魂。	
2003年 11月26日	为孝恩园“九一烈士纪念碑”主持上红仪式。	华人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保卫国土而牺牲，政府不应质疑华人对马来西亚的效忠及贡献，并应一视同仁对待华人。
2005年 4月17日	马六甲孔教会常年会员大会。	指责日本篡改历史、歪曲史实，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2005年 4月24日	马六甲华校教师公会会员大会及颁发会员子女奖励金仪式。	促请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针对二战日军滥杀无辜历史公开做出书面道歉。

日期	活动	讲话内容
2005年 4月5日	马六甲抗日纪念碑管理委员会在常年大会。	赞成发动签名盖章运动，反对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2006年 10月25日	培风中学礼堂出席“三年零八个月的梦魇”讲座。	战后至今60年，日皇还没向中国道歉，日本前首相只说对中国不安感到抱歉。抱歉是“sorry”，道歉则是“apology”，显示日本民族“小气”。
2008年 4月5日	以主祭者身份出席三保山麓“忠贞之式”抗战烈士纪念碑前举行的马六甲华人抗日义士公祭仪式活动。	

注：有关资料整理自《星洲日报》、《南洋商报》、《中国报》、《光华日报》。

## 捍卫三保山活动

自1983年，马六甲州政府意图铲平三保山发展为商业区开始，沈氏即已参与保卫三保山的活动，并常发表捍卫三保山的演说。在沈氏最后的15年，他在这方面的关注就更为积极了。1991年，马六甲华社从中国福建泉州订制的郑和像运抵马六甲，脸部朝下被迫弃放在神庙戏台下，后来又搬移到路旁一间汽水工厂内放置。<sup>39</sup>沈氏接受《中国报》访问时指出，三保山与郑和的关系是不能分开的，因此将郑和石像置放在三保山的顶峰，可睥睨四方，能够表现出郑和大统帅的威风。如果将郑和石像置放在山坡三保井旁的空间，是看不起这名伟人，如同是安置在一个不重要的地点，简直不配。<sup>40</sup>2001年，甲必丹蔡士章古墓被发展商毁坏，沈氏在马六甲中华大会堂会员大会中，针对此事发表言论说，蔡士章是甲必丹，对马六甲的贡献很大，对青云亭的贡献更大，他的古墓是国家古迹，应受到保护。<sup>41</sup>为了三保山，在2007年10月14日，沈氏以耄耋之龄，行动不便之躯，仍然坚持让“三山九九，重阳登高”活动工委特制的轿子登上三保山担任“慎终追远，民德归厚”主祭嘉宾。<sup>42</sup>

<sup>39</sup> 安焕然：〈从开拓先驱到友好使者——马来西亚华社的郑和叙述〉，载曾玲主编《东南亚的郑和记忆与文化诠释》，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页48-69。

<sup>40</sup> 《中国报》，2001年2月13日。

<sup>41</sup> 《星洲日报》，2001年5月13日。

<sup>42</sup> 《南洋商报》，2007年10月15日。

#### 四、宠荣有加

沈氏终其一生为民族权益奋斗，并谓所作所为是傻瓜事务，其言行不免与当政者相左，并因此惹上牢狱之灾。但在沈氏晚年除了华社对其事业的认可，同时也备受官方认同，其声誉甚且远播海外，得到国际社会的赞赏，这种情况在马新华文教育史上，可说绝无仅有。其原因固然是由于他能对民族权益长期坚持不懈，但更为重要的是他背后的政党色彩，从年轻时代随其父加入国民党，积极服务党团，到战后加入马华，创办马青。虽然他在马来亚独立后成为国家忠贞不二的子民，但与国民党仍然有紧密的联系，沈氏的表现无疑成为台湾海外侨务积极鼓吹的一个亮点。<sup>43</sup>沈氏虽然在1966年因为争取华文为官方语文事件，与马华中央的意愿大相径庭而遭开除党籍的处分，但却得到大多基层的肯定和认同，其中庸处事态度，有极大的政治价值，不免成为马华乃至掌权者拉拢华社选票的一颗有利的棋子。此外，沈氏虽曾从政，却无政客奉承唯诺、私德亏欠等毛病；沈氏儿孙满堂、家庭和乐，夫妻感情融洽，为一称职的丈夫和爸爸<sup>44</sup>；沈氏家族族风绵长、人丁旺盛，为德高望重的族长；沈氏服务杏坛60载，自许华教苦行僧。这些良好形象，无疑在取得这些荣誉上都有加分的作用。

沈氏最后15年获得的荣耀不计其数，以下尝试将之分类归纳论述。

首先是各式的表扬会和贺寿大会。1994年5月，沈氏辞卸担任28年之教师总会主席职后，教总、马六甲华校教师公会、马六甲中华大会堂及马六甲华校校友会联合会议决在是年8月于沈氏故乡，马六甲培风中学礼堂联合主办“沈慕羽表扬会”，会中筵开190席，场面盛大热烈，沈氏为投桃报李，买了一张联合马六甲种植股来捐献给4个发起团体。除此，主办团体也赠送一面表扬服务华教

<sup>43</sup> 1997年1月8日，台湾《宏观报》的“每周社论”以“海外华文教师应以沈慕羽为典范”为题，在文末有几位典型的评论：“沈慕羽老师历经数十年奋斗、奉献而不悔，84岁高龄仍意气风发，矢志要继续奋斗，嶙峋风骨，正是我们文化人的典范，在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所走过的脚印、所创造的功业，开的花、结的果，我们所有从事华侨文教工作者，都应该视为宗师，当作经典。”

<sup>44</sup> 1998年1月17日，沈氏家族曾为沈慕羽及其太太庆祝60周年结婚晚宴。

功绩的奖状给沈氏，并获得各界华社领袖给予极崇高的赞誉，尊为马六甲的“伟人”。<sup>45</sup>

1995年5月23日，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在吉隆坡天后宫礼堂举行18周年纪念庆典，同时表扬4位对文化艺术卓有贡献的4位华教耆宿：任雨农、沈慕羽、邱祥炽和庄金秀，颁发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奖。他们都是长久以来致力于发扬中华文化，对巩固华教地位有一定贡献。<sup>46</sup>沈氏在会中发表了著名的华教苦行僧的演说：“我是一个布衣，没有很高的学历，没有官禄，没有雄厚的资产。现在受到推崇，真是受宠若惊。对于成功的教育家这个赞誉，我愧不敢当，其实我是一个华人教育的苦行僧。”

1997年12月7日，马华公会在马六甲举办了一场“尊师重道表扬会”，全马六甲共有55名中小学退休和在职校长教师受到表扬，沈氏亦为其中一人，但他另外获赠一面由马华总会长拿督林良实亲自颁赠，刻有“杏坛名师”的金牌，以表扬他一生奉献教育的精神。<sup>47</sup>

2002年7月7日，马六甲25华团在马六甲培风中学礼堂联合主办“马六甲华团庆贺沈慕羽九十大寿千人宴”，筵开逾200席，政经文教及全国各地华教人士聚集一堂，盛况空前，沈氏在会上即席，将24万令吉贺仪悉数捐献给培风校友爱校基金，充作培风增建西楼校舍用途。此外，沈氏及其家族也以身作则，合捐1万8千元，沈氏认捐其中1万元充作宴会经费和培风中学建校基金各5千元，余数则为认购培中礼券款项。<sup>48</sup>

2007年7月28日，约400名来自新马两地的沈氏家族成员聚集于马六甲平民学校沈慕羽礼堂，齐向先生贺寿。翌日，全国182个华团在马六甲培风中学礼堂举办“沈慕羽95荣寿大会”，约两千名来自各界人士齐聚一堂庆贺沈氏95大寿，筵开186席，席间中国云南财经大学颁赠荣誉教授予沈氏。<sup>49</sup>

<sup>45</sup> 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页220。

<sup>46</sup> 《中国报》，1995年5月23日。

<sup>47</sup> 《南洋商报》，1997年12月9日。

<sup>48</sup> 《星洲日报》，2007年7月8日。

<sup>49</sup> 《星洲日报》，2007年7月30日。

其次，有各类封勋和奖项。沈氏晚年获奖无数，除了国内奖项和封衔，也荣获国际表扬。

在国际荣衔方面，主要有两个，皆由台湾颁发，其一为台湾行政院文化奖，其二为台湾教育文化奖章。1997年1月3日，沈氏从台湾副总统兼行政院院长连战手中接获台湾行政院文化奖，为第一位海外华人荣获此奖者。根据《行政院文化奖设置办法》第6条，文化奖每年举办一次，受奖人以一至五名之台湾人为原则，但如有受国际推崇之特殊成就者或对中华文化有特殊贡献之外籍人士，得专案予以表彰。沈氏这次受到专案表彰，显示了他发扬与维护中华文化的努力受到国际的推崇与肯定。

文化奖设置已15年，曾受表扬的知名人士包括陈立夫、张其昀、罗光、钱穆、牟宗三、吴经熊、蒋复璁、台静农、郎静山、毛子水、苏雪林、陈奇禄、李天禄、余英时、证严法师等等。他们皆是对国家有贡献的党国元老或在学术及文化上卓有成就的学者。沈氏获奖，可谓实至名归，除他与国民党良好的关系与深远的渊源外，更重要的是他维护与发扬华文教育、推动中华文化半世纪以来始终如一的贡献。台湾政府一向对海外华人的教育非常重视，所以有句话说：“有华教才有侨务，侨务的主要工作也就是在华教。”从这一角度观察，沈氏一生所为，不正是这句话的体现吗？他获专案表扬，正是恰如其分。

文化奖由台湾行政院发出，无庸质疑，自是国家级的奖项，以一外国平民百姓，能得他国政府的肯定，可说是国家无上荣耀。迄今，海外仅日本人宇野精一获此殊荣，而沈氏则是东南亚地区华裔获此殊荣的第一人，若誉之为东南亚华裔第一人，相信也不为过。

1997年9月6日，台湾教育部长吴京代表台湾教育部在第一届世界成大校友嘉年华会及“成大之夜”25周年晚宴上，颁发教育文化奖章给我国4位对华文教育和对中华文化遗产工作做出卓越贡献的人士，他们是前任教总主席沈慕羽（一等教育文化奖章）、马大副教授乌拜德拉（二等教育文化奖章）、文艺界前辈姚拓（二等教育文化奖章）和华总会长吴德芳（二等教育文化奖章）。<sup>50</sup>

<sup>50</sup> 《星洲日报》，1997年9月8日。

国内的奖项则有如下四项，首先是“模范父亲奖”。为了表扬伟大父母之爱，灌输正确道德及家庭价值观以维护及推广孝亲敬老的精神。1997年，华总妇女部、《南洋商报》和青团运联办第三届“春晖照人间”模范母亲和父亲选举。5月3日，沈氏入选为马六甲区“春晖照人间——模范父母亲”活动之模范父亲。5月11日，荣膺模范父亲奖。其次，是荣获1999年“林连玉精神奖”，该项奖项的设置主要是为了表扬华教界好人好事而设。他得奖理由如下：“教总立会元老，历任教总主席28年，是华教的掌门人，是华教的舵手，更是华教的中流砥柱；走过漫长的华教风雨路，是带领华教走向下一世纪的领导人物，誉满海内外。”其三是沈氏在杏坛服务长达70年，出任校长一职为时57年。因此，在2003年10月被“马来西亚记录大会”评选为全国服务最久的校长<sup>51</sup>。最后是“福建楷模奖”。这个奖项是于2008年4月27日，由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为配合该会创立50周年而颁发，共颁10名“楷模奖”和40名“杰出奖”给福建籍贯的杰出人士，旨在表扬各个领域杰出的乡贤。<sup>52</sup>这个奖项也是沈氏生前最后取得的一个奖项。这些奖项，除了“模范父亲奖”，其余皆是因为沈氏在华文教育上的付出和贡献而取得。

除了上述各种各类国内外奖项外，沈氏也获颁拿督勋衔和名誉博士，前者是在1999年10月16日，马六甲州元首敦赛阿末赛马木沙哈布丁七秩晋四华诞时受封赐DMSM拿督勋衔。<sup>53</sup>后者则同时获颁两个荣誉博士：其一是2007年11月15日，由大马佛教大学所颁发；其二是2007年12月9日，由美国高登大学所颁发。前者是马来西亚私立大学，成立于2005年，后者是美国私立大学，1978年成立于加利福尼亚，两所大学颁发荣誉博士的目的皆在表彰沈氏对华文教育的贡献。<sup>54</sup>华教人士受国家或州元首封衔不在少数，那是极平常事，但因为对华教的贡献接二连三获颁荣誉博士在马来西亚无疑可谓仅见。

其三是沈氏命名之建筑及纪念馆的成立。由于沈氏的德望，国内某些学校的建筑也开始以沈氏的名字来命名。在2004年，马六

<sup>51</sup> 《中国报》，2003年10月30日。

<sup>52</sup> 《中国报》，2008年4月28日。

<sup>53</sup> 《新明日报》，1999年10月16日。

<sup>54</sup> 《中国报》，2008年4月28日；《星洲日报》，2007年12月4日。



甲的平民学校新礼堂落成，以沈氏之名来命名，是为“沈慕羽礼堂”；同年，吉隆坡的育南学校盖建校舍大楼，也以沈氏之名来命名，是为“沈慕羽楼”。但是更为有意义的是沈慕羽纪念馆（以下简称纪念馆）和沈慕羽书道馆的成立。

两年后，即2006年1月，筹备多时，目的是为了表扬沈氏，由金马士的苏启慧夫妇凭一己之力创设的沈慕羽纪念馆正式开张。此馆在没有太多资源支助下，由零到渐具规模，目前已经是沈慕羽资料最完整、最丰富的馆藏所在。同时，纪念馆也扩大其收藏至其他重要的华教人物，如林连玉和陆庭谕，往后陆续还会有更多的华教人物在其典藏之列，纪念馆的收藏方向，主要是以人物为主轴。纪念馆可谓是目前国内第一间以华教为主题的纪念馆，设立的意义重大，其工作在于搜集和整理华教史料，并且在短短的几年内，迅速崛起继董总资讯局和教总教育研究中心外的第三大华教资料库。

纪念馆分成5个展览点：一是置放沈氏量身打造的铜像、剪报及《沈慕羽资料集》；另一处是沈氏生平事迹的陈列室，陈列了许多沈氏的照片，透过照片与文字的结合，呈现沈氏一生的奋斗事迹；其余3个展览点则分别展出沈氏文物，如文房四宝、《教学笔记》、书信、书籍、墨宝和纪念馆录制的光碟。此外，也设置一间视听室，通过光碟了解沈氏的晚年活动。

2007年2月，马六甲的沈慕羽书法文物馆也成立了，宗旨在推广和发扬沈氏书法，同时有收藏和管理沈氏留下的遗物之功能。文物馆最早的雏形是利用孔子大厦二楼的智雅堂部分空间辟为“沈慕羽文物纪念馆”，由于涉及庞大经费而事寝。<sup>55</sup>后来，议决成立“沈慕羽书道馆”，并附设于“郑和文化馆”，于2007年2月24日开幕。<sup>56</sup>

<sup>55</sup> 《南洋商报》，2005年5月29日，2006年9月25日。

<sup>56</sup> 《南洋商报》，2007年2月25日。2009年3月14日，“沈慕羽书法文物馆”署理主席梁德宗表示，此馆已筹获125万令吉作为文物馆购买建筑屋和装修基金，其中包括先生家属捐献的26万令吉沈老治丧帛金。梁德宗指出，沈慕羽文物馆已耗资79万令吉在三保井购买一间三层楼建筑作为沈慕羽书法文物馆馆址，目前正在进行设计和装修，费用约100万令吉。他表示，一旦沈慕羽书法文物馆落成后，将免费开放让公众参观。因此，此文物馆计划购买产业收租，充作文物馆的营运基金。见《星洲日报·古城》，2009年3月15日。

其四是沈慕羽资料整理和研究。1971年，沈慕羽在怡保华人团结大集会上发表演说，倡议三大种族互惠平等，坚决反对教育一元化，呼吁华人大团结，竟遭政府援引《煽动法令》提控，教总特为此事成立沈慕羽法律基金，向各区属会会员及同情者募捐，获各方热烈响应。后经两年审讯，此案获撤销，教总乃决定将该基金利息充作“沈慕羽大专奖励金”之用途。沈氏亦捐出5千元，使款额凑足4万元。1987年，警方在“茅草行动”中援引《内安法令》进行大逮捕，各政党、民间团体共百多人遭拘禁牢房。当时已75高龄的沈氏是其中之一。教总在沈氏近8个月扣留期间，每月拨出两百元作其生活津贴，同时也获一些属会捐助。后因沈氏婉拒而归入原有基金，使款额增至6万余元，并易名为“沈慕羽出版基金”。

为了表扬和肯定沈氏终身为华社服务奋斗的精神，教总在1995年4月11日于“沈慕羽出版基金”内部成立“沈慕羽资料汇编编委会”，负责编纂出版《沈慕羽资料汇编》。至今《沈慕羽资料汇编》已出版6册，它们是《沈慕羽翰墨集》（1995年）、《石在火不灭》（1996年）、《沈慕羽事迹系年》（1997年）、《沈慕羽言论集（上、下）》（1998年）、《沈慕羽翰墨集二》（2002年）、《沈慕羽翰墨集三》（2006年）和《晚节飘香续集》（2006年）。<sup>57</sup>

为了推介这些著述，曾经举办了5次的新书推介礼，即1995年5月6日，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举行的《沈慕羽翰墨集》推介礼，由教总主席王超群主持，名书法家任雨农、朱自存和黄金炳负责推介；1996年7月20日，在加影董教总教育中心行政大楼礼堂举行的84大寿友好欢庆集会暨《石在火不灭》新书推介礼；1998年7月4日，教总在吉隆坡尊孔独中讲堂为《沈慕羽言论集》及香港中文系教授郑良树博士撰述的《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举行推介礼，其主题为“认识华教史，认识华教人物”；2002年12月14日，为了配合华教节，林连玉基金主办，教总和《星洲日报》联办推介林连玉的著作《姜桂集》和《沈慕羽翰墨集二》，大会特邀书法界高僧伯圆为先生的翰墨集主持推介仪式，沈氏则为林连玉的著作主持推介仪式；2008年12月25日，在董教总教育中心举办的《图说沈慕

<sup>57</sup> 陆庭谕：〈关于沈慕羽出版基金〉，《南洋商报》，2000年4月24日。

羽》推介礼，这也是沈氏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及发表演说。

由于沈氏的地位和名望，自然就成为各华文报章争相报道的新闻焦点，甚至常以沈氏为主题制作专题，报道沈氏的奋斗事迹和故事，连英文报章和台湾的报道也不在少数，有关海内外连篇累牍的介绍文字，可整理成一表列如下：

篇名	报章	日期	作者
New Challenge for Chinese Educationists	Star	1995.07.09	
沈慕羽回首风雨来时路	星洲日报	1995.08.27	
古城第一世家系列	南洋商报	1998.11.07-12.01(共23期)	
翰林飘香无私藏，捐献墨宝结文集	中国报	2000.06.29	
当小贩街边摆摊， 沈慕羽拒当日寇教师	光明日报	2000.12.24	
A Guiding Force for Youth	The Sun	2001.08.02	
甲华团庆贺沈慕羽90大寿	南洋商报	2002.06.30-07.01-05	周树
教育苦行僧沈慕羽教育 一生一世不悔不休	福报	2003.11	
服务最长久校长——沈慕羽专栏	南洋商报	2003.12.15	陈淑婷等
如苍松屹立 ——大马华教先驱沈慕羽	台湾光华	2005.07	
沈慕羽华教风雷战士	东方日报	2005.09.30	
大马华文教育的斗士 ——沈慕羽的故事	侨协杂志	2006.01	钟远
沈慕羽——明心无愧华教		2006.03.12	
第一代通讯员沈慕羽真情60载	中国报	2006.03.24	
沈慕羽——华社边缘化须深思， 华基政党“有口难言”	东方日报	2006.09.24	李伟伦
沈慕羽醮墨养正气	南洋商报	2007.02.23	
沈慕羽担任总编辑， 《古城月报》停刊半世纪	南洋商报	2007.04.12	
老前辈活出精彩	中国版	2007.05.29-30	
拿督沈慕羽局绅九五鹤寿专辑	中国版	2007.07.29	
拿督沈慕羽局绅95荣寿特辑	南洋商报	2007.07.29	
1957-2007，大马50金风云人物	号外周报	2007	
沈慕羽——永远的民族斗士	东方日报	2007.09.01	
沈慕羽和我们在一起	号外周报	2007.12.10	
Spirited Sim	Star	2008.04.21	

另外，沈氏的日记也是马来西亚历史文化的瑰宝，从1957年开始书写，到沈氏去世时已经坚持51年，期间除了1987年茅草行动被扣留在牢狱长达60天，日记的书写在1987年10月27日至12月31日完全中断以外，不曾停止书写。沈氏日记的书写开始于1957年，当时他获得美国国务院颁发青年领袖奖学金，与瓜拉比勝中学校长卢振樵受邀到美国教育考察为期3个月，沈氏趁此机会环游22个国家，期间开始将每日所见闻笔录，从此养成习惯，从写游记一变而为写日记。沈氏的日记，主要记载了他一生为华教服务奋斗的浮沉，可谓是华教史实的记载。除此以外，他的日记也记录国际大事、国家时事、华团事务、时人评论，乃至家庭琐事也多有记录。他的日记最大的特点是每一篇都会自拟标题，以清眉目。<sup>58</sup>在他晚年，可能精力不及从前，某些日记往往附属剪报，文字记录反而寥寥数笔。自从《沈慕羽资料汇编》系列丛书陆续出版后，沈慕羽日记的出版似乎无可回避，由于日记涉及的内容庞杂，整理需时，颇非易事；加上部分内容涉及敏感课题，沈氏日记毫不掩饰，直抒胸臆，不少当事人仍然在世，某些评论实在不易发表。自《沈慕羽资料汇编》系列丛书启动，沈慕羽基金即着手整理，并影印备份收藏其日记。2005年3月8日，沈氏在住家二楼举行新闻发布会，首次公开他48年来所写的70本日记。

最后是沈慕羽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主办，此会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政治系副教授何启良主催，在沈氏逝世前已经将此构思告知在病榻上的沈氏，沈氏虽然极为高兴，但可惜的是他已经无法参与其盛。此次会议共邀请多名国内外学者共襄盛举，从沈氏的日记、晚年，以及政治、社会、文化和教育参与等层面给予全面的论述，也是马来西亚以某一特定华教人物为主题，在国际会议上进行讨论的第一次。

除了上述的荣誉，其它还有2000年3月13日，台湾宏观卫星电视前往马来西亚拍摄华文教育及华社人文历史，并拉队到孔教会拍摄书法班及访问先生关于华教奋斗史；2002年受台北市长马英九邀请赴台湾主持祭孔典礼；2007年4月受委为中国“和谐世界，爱心

<sup>58</sup> 《南洋商报》，2000年8月20日，马六甲地方版。

传递，奔向2008国际少儿艺术大展组委会”爱心大使。<sup>59</sup>

## 五、晚年的评价

晚年，沈氏的关怀与活动与其说是教育，毋宁是文化的。沈氏贵为董教总名誉会务顾问，但他可以发挥的余地极为有限，顶多是在仪式性的场合或重要大会上发表演说，讲讲鼓励话语，激励士气。华社普罗大众对他的尊敬，固然无可置疑，但华教领导对他的尊崇，当摆在斗争和利益的天秤上时，似乎黯然无光，其光环似乎起不了任何作用，反而在受到羞辱性的回应时，带来的是灾难性的难堪。1950年代初期，沈氏和林连玉首倡教师总会，华教运动风起云涌，确有洞见。但1970年《阿兹报告书》公布后，局势已经有所改变，但沈氏没有适时在组织上进行调整，结果他以个人的道德力量支撑教总的大旗。经时久远，贤人终有离去的一刻，而教总已不复当年有理想有热情的教师组织，杂糅了更多的利害和利益。这足以说明沈氏虽然举荐了同样对华教具有高度热情、准备牺牲的人选，但其个人的道德力量却难抵组织内部的利害和利益，最后虽不致全线溃败，但无疑时不我予，以道德人格的典范来约束组织道德的失范，看来并不能如愿，或许新纪元学院风波，沈氏遭受的待遇，可以作如斯解读。

华教领导虽然无视沈氏的存在，但华团关注书艺文化的领导，此时却看到了沈老的文化价值，在沈氏积极推动和领导下，鼓吹书艺活动，提倡崇儒运动，这可从报章上连篇累牍刊载有关的新闻可见一般。事实上，文化事业或许是其中一项沈氏长期念兹在兹要推动的，只是在辞卸教总主席职前，华文教育风雨飘摇，分身乏术。沈氏晚年以孔教会为基地，一面搞孔教，一面办书艺，两者可谓一而二，二而一，这在他晚年下半期更为明显。从广义的意义上来说，其实这是中华文化的推广。当然，沈氏不过是开了一个头，接班的领导是否能依循，甚至发扬光大，只能拭目以待。沈氏晚年文化上的贡献和光芒，实非教育领域望尘可及，尤其在他身后，沈氏

<sup>59</sup> 《南洋商报》，2007年3月4日。

被提名国家文化奖的传闻甚嚣尘上，可见端倪。<sup>60</sup>事实上，这也为后人留下了一道难题，沈氏以其文化人格的魅力在中华文化的推动上取得一个好开端，接下来如何持续不间断乃至发扬光大，无疑是我们必得详加思考的问题。

沈氏晚年尊崇有加，但沈氏接受拿督勋衔和自封“族英”，却引来了诸多议论。虽然华教人士受封大有人在，但如此高级别的华教领导受封还是头一遭，因为位居全国性的领导，从1920年代的庄希泉、钟乐臣到1960年代的林连玉、严元章等，只有被对付，甚至至今仍无法平反，何况是封赐。这或许与沈氏的领导方式属温和派有关，但贵在能和而不同，较少与政府产生激烈对抗，较为有关方面所接受。更令人非议的是沈氏接受的勋衔级别其实不高，以如此高级别的领导接受级别相对较低的封衔，似乎有被收买之嫌，虽然在受封后，沈氏不断声言“受封不等于封口”，而他往后的言行也证明其言行确实一致。如果沈老拒绝封赐，无疑让华教运动的斗争更为一贯，这或许是华社颇有微言的其中一个症结。受封所引发的另外一个争议是沈氏的“好名”，此事后来因为沈氏自封“族英”，更遭人窃窃私语。林连玉身后华社称誉为“族魂”，实至名归，但沈氏却在生前自冠“族英”，一般上荣誉和称号是由他人或后人公认和赐予，方可名实相符，鲜少自我加封。华社的非议，其关键在此。当然，林连玉和沈氏皆为华教运动史上了不起的领袖，沈氏恐其身后后人无法如实给予定位，故先行定位，让后人参照。但后人是否采行，已经非沈氏个人意愿所能主导，还得胥视后人的评价。报界老前辈张木钦的评论或许最能恰如其分说明情况：“沈老是儒家，不可能自外于名利。一个服务一生，战斗一世的人，希望身后留个芳名，不但正常，而且应该。当然，如果沈老亲口说：‘是的，我爱名。’那是有点奇怪，但是也不必再三撇清。他又不是浪得虚名，或者沽名钓誉。”<sup>61</sup>沈氏好名或有可议之处，但好的其所，缅怀其贡献，或许吾人可用较宽容之心看待此事！

<sup>60</sup> 《星洲日报》，2009年2月10日。不久后，团结、文化、艺术及文物部长拿督沙菲益阿达指出，不会把国家文化人物荣誉颁给已故者。因此，沈氏无法获得此殊荣。见《星洲日报》2009年2月15日。

<sup>61</sup> 张木钦：〈服务一生名垂百世〉，《光华日报》，2009年2月15日。

或许沈氏有“疾没世而名不称焉”的焦虑，但综观其晚年仍然言行一致，坚持立场，一如既往。马华公会曾分别于2000年和2005年重提恢复沈氏党籍，但都被回拒了。沈氏乃马华创党的最早会员，也曾担任高层领导，虽不为党领导所容，而遭开除，但以沈氏宽容忠厚的个性，从他对马华总会长黄家定的期许，可看出沈氏对马华仍然有所期待，但沈氏不因为如此而违背原则，仍然坚持立场。他受封拿督，但不断强调这不等于封口<sup>62</sup>，因此他晚年常抨击政治的不合理和不公平，皆可作如是观。<sup>63</sup>沈氏凡事皆望面面具圆，两全其美，但绝不为和而和，有其底线和立场，这无疑皆是典型的沈氏处事风格和哲学。

沈氏晚年的风光，在华教运动者的遭遇里，可谓是个异数。但与此同时，也揭示了投身于华教运动者的晚年不必然如林连玉般的含辛苦烂，也可以是皆大欢喜的收场。沈氏系出名门，在其晚年尽显世家气派。沈氏是镁光灯聚焦所在，在赞誉祝福下荣休，晚年宠荣有加，与林连玉的遭遇大异其趣；子孙后代约800人，身后有大量文化遗物，死后，马六甲市政府还以其名字为路名<sup>64</sup>，与林连玉身后了无一物，实不可道里计。其实，最后15年是沈氏之前奋斗成

<sup>62</sup> 1999年10月18日，沈氏对报界表示，他不因受封拿督为傲，仍以平常心来看待。华社应该会了解州元首封赐他拿督勋衔是因为他对国家有功绩，不是封住他的口。详见《中国报》，1999年10月19日。10月30日，沈氏在马六甲华校校友会联合会庆祝成立20周年纪念。会上指出，政府封赐勋衔给有功人士是因他们对国家与社会做出贡献，并非要“封”口。

<sup>63</sup> 2008年3月23日，沈氏出席林连玉墓园美化工程动土礼，并在致词时促请政府反省，因为如果还不放弃种族主义，继续一元化政治、固打制及特权，连马来族群都会变心，天下将会变色。他认为，大马政治局势一夜间变色，是人民忍无可忍最后的发泄，单元化已形成了政治激流，引发政治海啸。见《光明日报》，2008年3月24日。8月27日，沈氏接受《星洲日报》专访时，谓国阵一路来操纵在巫统手中，使大马的马来色彩太重，土著权益更是把他族边缘化。更批评马来西亚没有善用人才，如今已比不上原本比我们落后的国家。见《星洲日报·古城》，2008年8月27日。如此言论不在少数，在此仅举他生命最后一年的相关言论，其余可以概见。

<sup>64</sup> 3月20日，马六甲州行政议会一致通过将甘榜恩拔路易名为“拿督沈慕羽路”，让沈氏的英名，从此与古城华教堡垒的培风独立中学风雨同路。沈氏一生为华教，为甲州教育，特别是华教发展贡献良多，州政府能以他的名字为公路命名，足见珍惜他在马六甲州教育领域的奉献和牺牲。见《星洲日报·古城》，2009年3月20日。

果的验收，各种各样的奖项、勋衔、表扬万千宠爱在一身。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华教人物类型，如果以儒家圣人类型标准来区分，林连玉或许近似伯夷叔齐的圣之清，而沈氏有近似柳下惠的圣之和。<sup>65</sup>

## 六、结论

沈氏晚年虽然从教育领域退下，但其社会文化活动仍然丰富多彩，为其“服务一生，战斗一世”的人生划下亮丽的休止符。在教育领域，他退居幕后，但仍然持续关注华文教育。他担任董教总永久会务顾问，经常出席华教团体常年的活动以及重要会议，即席演说勉励的话语来鼓励同道；常透过媒体发表有关教育课题的看法，立场坚定，始终如一；教学上，他继续担任晨钟夜学校长，主持校务。在文化领域，他大展拳脚，推动孔教活动，推广书艺文化，筹设书艺馆。由于沈氏数十年在教育文化领域的努力和奋斗，为他晚年迎来无数荣耀，各式的表扬和贺寿大会、国内外的奖项和封赐、以沈氏命名的建筑和纪念馆的成立、沈氏资料文献的整理和研究等是。因此，沈氏的晚年与其说是教育，毋宁是文化的，更能符合事实。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沈氏并非完人，他受封并自封，无疑引来议论，但贵在能一如既往，坚持立场；沈氏宽厚能容，却和而不同，不为和而和。这些高贵的人格特质，没有因为功名利禄而变质，小德或有出入，大德却不逾闲。其一生言行举止，实为马来西亚华社乃至国家留下良好文化示范，楷模足式，或许这正是何启良提出：“以道德人格的典范来防止文化人格的失范”的意义。

本文初稿完成后，承蒙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政治系副教授何启良博士详细阅读，并提供意见，仅致谢忱。

<sup>65</sup> 柳下惠曾当小官，并3次见黜，但即使以三公的高爵引诱，亦不可失其操守。



# 沈慕羽纪念馆的特质与功能研究

■ 黄建淳\*

## 壹、前言

沈公慕羽局绅 (Sim Mow Yu, JMN, JP, 1913-2009) 在大马诡谲多变的时代里, 终生奉献民族教育,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一如沈氏语录所云: “华教存, 我人存; 华教亡, 我人亡”、“教育的最重要使命是发扬文化, 承先启后, 使一个种族的灵魂延续不灭”、“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维护是消极的办法, 发扬才是积极的途径”。<sup>1</sup>其为华教树立了坚忍不拔、奋斗不懈的典范, 沈公行谊, 马华文献斑斑可考, 马华社会家喻户晓, 故“沈慕羽纪念馆”是一个社会历史文化的缩影, 也是一个民族精神文明的象征。

以博物馆或纪念馆的角度而言, 在跨国多元文化备受重视的前提下, 当代世界各地博物馆的创设, 每年至少以10%的速度在增长。博物馆的文化概念, 随着人类生活及知识领域的扩充, 从而呈现出更丰硕的内涵与功能。<sup>2</sup>依据国际博物馆协会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 归纳各类型的博物馆及其功能指陈, 以发生历史之地所设置的现地博物馆 (site museum), 如名人纪念馆……等, 即属性于历史类型的博物馆之一。<sup>3</sup>爰是之故, 本文试以“空间特

\* 台湾淡江大学历史学系专任教授。

<sup>1</sup> 节录〈沈慕羽语录〉, 载“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网站, 2009年2月23日, <http://smy.jiaozong.org.my>

<sup>2</sup> 伊里斯博寇 (G. Ellis Burcaw) 著, 张誉誉等译:《博物馆这一行》, 台北: 五观艺术管理公司出版, 2000年, 页30-31。

<sup>3</sup> 肯尼斯何东 (Kenneth Hudon) 著, 徐纯译:《有影响力的博物馆》, 高雄: 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出版, 2003年, 页169-170。

质”及“社会功能”为命题，并借史学方法的相关角度，从求真、求善、求美的三个面向思考“沈慕羽纪念馆”（为行文便，下称“纪念馆”）所应呈现的意义与价值，并探索纪念馆营运的架构和影响。

## 贰、纪念馆传播历史文化的特质与性格

### 一、纪念馆存在的核心价值

当代纪念馆所呈现的型态日趋多元，已脱胎于早期属性偏重历史文物的收藏陈列，朝向新式博物馆学（New Museology）发展，讲究生态博物馆运动（ECO-museum Movement），重视展示的文物能通畅地将内涵传译给观众，并强调历史现象与现实生态的变迁和发展等理念。<sup>4</sup>因为任何文物（artifact）即来自于人为的知识系统或科学的演绎创造，易言之，文物系社会参与或创作过程中的产物，一向赋有强烈的历史性格，故透过生态学的设计，重新陈列展示于世人，将会导引过去与现在时空产生连结的效益，从而萌生出相关的历史价值或文化认同的确立。<sup>5</sup>

“沈慕羽纪念馆”的创立，当是发扬沈氏及其相关历史文化的时代记忆和传译。<sup>6</sup>名人纪念馆的收藏和展示，目的在彰显被纪念者重要的历史面向与文化活动的，其存在的价值不外是“保存记忆”和“发扬传译”，倘以历史研究的角度言之，名人纪念馆所具有的历史正当性与完整性，其实远高于真正以保存历史为号召的博物馆。<sup>7</sup>“沈慕羽纪念馆”的社会角色，即借大马华社薪传民族文化及

<sup>4</sup> 张誉眷：《博物馆大势观察》，台北：五观艺术管理公司出版，2003年，页38-41。

<sup>5</sup> 同上注，页41-43。

<sup>6</sup> 如〈金马士沈慕羽纪念馆〉简介所载：“沈慕羽纪念馆”的成立，是为了表扬一位披星戴月、不畏辛劳地肩负起发展中华民族母语教育，和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的著名华教斗士——拿督沈慕羽局绅。沈老一生为华教无私的奋斗精神，更是千千万万华裔子弟的学习典范。

<sup>7</sup> 例如屹立于台北市南海路的“国立历史博物馆”，馆内固有丰富的典藏，目的在于保存与传译中华历史演进和发展的过程。但若要从其中追寻孙中山在新马地区成立中国同盟会南洋各分会的史迹，甚或欲探索沈公先父沈鸿柏成立“救国十八友”的史实，恐将如缘木求鱼而不可得。

华教奋斗史的建置过程，从而唤醒华人民族意识和文化感情。以另一角度而言，纪念馆亦秉持客观态度，舍弃专断的意识型态，提供历史文化的展示场所，成为社会公众的论坛，展现多元文化、多元民族的观点，去除成见，引导不同民族文化及不同宗教信仰间的尊重与理解。亦如沈氏所云：“人是有自尊心的，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我们尊重别人的文化，别人也应该尊重我们的文化，相互扶持，互相尊重，才能共存共荣。”<sup>8</sup>

尽管如此，但仍无可避免的是，任何博物馆或纪念馆皆难以跳脱出意识型态的畛域，例如台湾的“国立故宫博物院”，即使在80年代，仍大力宣扬“国家法统”的观念，自诩为维护中华传统文化之尊，意即代表着国家法统的承传者。<sup>9</sup>类此系于国家法统的意识型态，自会左右了博物院文宣策略及其传译功能。因此，相对于“沈慕羽纪念馆”的创立，我们应该运用何等观点或角度来诠释应有的文化内涵与历史事实，才能发挥出纪念馆的核心价值？就一般历史文化类型博物馆的发展来看，历史名人的故居或纪念馆，较之传统博物馆仅止于泛泛的藏品展示等功能，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更胜一筹，因为名人纪念馆既为（前所指陈）现地博物馆的属性，本具有相当程度保存着区域文化资产，及其发挥广域历史情境的能力。基本上，这正吻合当前世界各国对区域文化资产的保护政策与态度，即侧重于文化资产的就地保存维护，进而发挥相关的社会教育与文化推广的实务功能。<sup>10</sup>一如近年来，结合考古学及人类学共所开发的遗址博物馆（archaeological site museum），像台湾的台东卑南遗址博物馆、台南左镇菜寮化石馆等，皆讲究原址保存在地文化，致力于历史情境的复原，亦即透过在地的历史文物，重建其历

<sup>8</sup> 节录〈沈慕羽语录〉。

<sup>9</sup> 1925年10月10日前清末代皇帝溥仪迁出皇宫后，遂成立“故宫博物院”，使原有的深宫禁地自此开放，亦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帝制时代的结束，从此与民更始，国家步上民主政治大道，所以“故宫博物院”的建立，即代表此一重大历史改变的主要象征。国民政府迁台后，借院藏展示三代鼎彝、书画名迹、珍宝罗列等，在绽放中华文化光芒万丈之际，亦在增进民族信心与国家认同的现实功能，此即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以“国家文化法统的传承者”自诩，所展现的意识型态。

<sup>10</sup> 吕理政著：《博物馆展示的传统与展望》，台北：南天书局，1999年，页107-108。

史的脉络，传译其文化的轨迹，因地与物结合的教育效益显著，往往顿使其它历史类的博物馆望其项背，<sup>11</sup>而名人纪念馆即隶属地与物相结合，并彰显出社会文化之教育功能的这一类型。

就一般纪念馆的展示型态而言，凡历史类展示（exhibiting history），有时呈现的是大众化的历史通则、有时则显现出特殊或个别领域的历史意义、也有时突显出族群的历史记忆及文化情感的意识型态。无论展示的型态为何，皆具有再现历史（representation history）的共同企图，不外乎冀期以文物展示来建立应有的历史记忆，<sup>12</sup>而名人纪念馆所呈现的既有价值，即再现被纪念者之地与物的历史脉络。因为，当我们在观察历史文物时，大都将会面临一个诠释学上的循环体系：凡参访者因领会出曾在自身发酵作用的历史事件，从而体察出相关的历史面向，亦即通过个人的生命去观察历史，同时也透过历史的情境看到自我的生命。所有的参访者和历史文物的关系之间，都将因“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的参与中，相辅相成而愈形丰富。爰是之故，在过程中所建构的历史意识，其可贵之处，并不在于文物所显示的历史人事物等知识性对象，而是在于自我参与的历史情境中，所获得的启迪和反省的能力。这正彰显出名人纪念馆所再生的历史脉络，及其呈现意识型态的价值所在。

## 二、纪念馆的特殊性格

固然名人纪念馆与一般博物院馆相同，具有最基本的典藏、保存、研究、展示、教育等多元化的功能，但细察下，不难发现两者间确存有许多不同的条件，而显示出各异的现象，如下表胪列即见一斑：

<sup>11</sup> 苏启明著：〈诠释、沟通、共享：博物馆展示原理与实践〉，《博物馆之营运与管理：以历史博物馆为例》，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2000年，页79-80。

<sup>12</sup> 吕理政著：《博物馆展示的传统与展望》，页67-68。

名人纪念馆与一般博物馆性质差异略表

类别	名人纪念馆	一般博物馆
展品性质	主题单一	多元繁复
展品来源	因专属特性的纪念文物来源有限，增添不易，更有历久毁损之虞。	来源不受主题性局限，可以规划性地不断增添充实。
展览关系	因所纪念之人、事、物皆具有一定程度的专属特性，故性质之限，不易与他馆联展，多倾向独立作业，规模较为狭隘。	可依兼容的展品性质，与他馆形成联合关系或互换互借的联办活动，使规模多元、效益扩大。
功能目标	仅以被纪念者的导向为依归，限制性多。	可规划成多元的社会导向，限制性少。

数据源：参考黄光男2002年5月6日于台北市南海路国立历史博物馆演讲“国际博物馆趋势”的相关内容节要而成。

大体上，名人纪念馆十分强调地理位置的重点取向，故设置地点多以被纪念的历史人物之出生地或相近的活动地址为主要考虑，以强化其在地精神的代表性。例如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的家乡，即设置了“莎士比亚中心”及“莎士比亚研究所”，以藏书闻名，并定期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sup>13</sup>在台湾如“钱穆先生纪念馆”或“林语堂先生纪念馆”等，皆以钱氏、林氏之最终居家处所或其活动地为设置馆址的最佳选择。此固为名人纪念馆的重点特色之一，然而也可能因纪念馆址座落于市郊，或位处幽静偏僻之地，往往使观众专程参访的意愿大受影响，例如笔者曾走访广东梅县黄遵宪故居“人境庐”及中共名人叶剑英的故园，<sup>14</sup>每因长途跋涉又交通不便而倍感劳顿。

又名人纪念馆典藏的品类，大多具主题性取向的纪念性文物，

<sup>13</sup> 许美云著：〈名人纪念馆的特质功能〉，《历史文物月刊》，第113期，2002年，页85。

<sup>14</sup> 笔者因“砂拉越华人社会组织史的调查与研究”（行政院国科会：36050F），曾为探索西婆罗洲（W. Borneo）兰芳公司创始人罗芳伯的史迹，于1995年7月28日-31日走访位于广东梅县石扇镇大岭下的罗氏故居，并兼程考察梅州郊区的黄遵宪故居“人境庐”，及叶剑英的故园。参阅黄建淳著：《砂拉越华人史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9年，页980。

其品种不但固定而且有限，主要可分为两大项目：一为纪念人物日常生活用品，如手稿、函札、纸墨笔砚、钟表眼镜、衣物杂项等纪念物；另则为事业成就的史料文物类，如书法字画、励志语录、演讲记录、官方文献、晋爵勋章等书状。由于每随时间氧化斑剥，或因潮湿虫蛀而腐蚀等不易维护的因素，常使藏品多有折损，加上添补之限，故馆藏文物的质与量遂而递减。类此不利因素将使展示的功能难以淋漓尽致的彰显。同时，也不利于馆务的拓展。

无可否认的，名人纪念馆展示之主题性固然强烈而明显，但也因主题性的局限，相对缺乏社会流行的性格。正因如此，凡纪念馆的观众参与，一般多具有社群区隔取向的特色。易言之，所以前来参访的观众，多具有一定程度的意识型态，即因个人主观的省察经验或感受，而呈现出明显的社群区隔。例如一位对海外华人寺庙不感兴趣的人，除非有偶然的机缘，否则将不至于刻意或主动地走访马六甲（Malacca）的青云寺或槟城（Penang）的广福宫。由此，不难窥悉，主题性强烈的特殊性格，既是名人纪念馆的基本精神，但也因此受到局限性格的约束，是其所必然的结果。

## 参、纪念馆场域互动的内涵与功能

### 一、纪念馆空间的基本内涵

博物馆学者欧里尔（O' nell, Mark）的研究指陈：“博物馆是人类能够徜徉其间，思考和感觉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之场所，也因博物馆的存在，恰足以让我们体认人性的独特定义。”<sup>15</sup>信哉斯言，名人纪念馆的展示空间，正是提供人们借由历史的途径，启迪而反省自我存在意义与价值的场所。

以纪念馆的角度而言，文物展示即一种历史诠释的过程；相对于参访的观众言之，对所展示的历史情境，将可视为一种有机的展

<sup>15</sup> Gaynor Kavanagh, *Dream Spaces: Memory and Museum* (London: Leicester University, 2000), pp.2-3. 另参阅注13, 页87。

演场所。<sup>16</sup>透过精心设计的展示活动，不仅是纪念馆与观众间沟通的桥梁，亦是观众与观众间互动的媒介。以另一角度观之，虽然参与纪念馆的活动也是一种心灵学习的活动，<sup>17</sup>但也与一般的社会活动一样，因为各阶层人民、各家庭或团体成员，往往将参访典藏展览视为休闲或社交的行为，彼此间在展示的场域可交换心得感想，甚或切磋讨论共所专注的对象，因而也建构了彼此间文化心理的互动关系。<sup>18</sup>

为维持纪念馆与参访者所形成的共鸣与互动，除了应具有最基本的典藏及展示的功能外，更应致力于纪念馆本具有的主题性之历史意义，有规划、有层次的研究与发展。<sup>19</sup>无论时代如何改变，历史的事实终究不能抹灭。因此，对相关历史情境的系统研究之成果，恰如其分地彰显于展示的空间，即为名人纪念馆不可或缺的重要内涵，更是纪念馆的终极目标。

名人纪念馆的系统研究，系一种以人物之事业成就及其精神典范为主体内容，并兼具其时代的特殊性之历史意义。就研究理论与实践的考虑上，笔者试以史学方法的相关角度，从求真、求善、求美的三个面向，思索纪念馆所应呈现的空间内涵。<sup>20</sup>1.求真，纪念馆的展示，应注意启发民众领略到相关历史的客观性，所展现给观众的文物史料，得以导引出正确的序列与脉络，从而学习并体认到自我理性的思考空间，进而领悟出感同身受的历史情境。2.求善，纪

<sup>16</sup> 卡诺·登肯 (Karol, Duncan) 著，王雅各布译：《文明化的仪式：公共美术馆之内》，台北：远流出版社，1998年，页6。另参阅注13，页86-87。

<sup>17</sup> 博物馆属性归类为社会教育机构的一环，以全民为对象，开拓终生学习的全面教育为宗旨。参阅周灿德：〈推动终生学习的社会教育：建构学习社会〉，《社会教育年刊》，台北：中国社会教育学会，2004年，页11。

<sup>18</sup> 苏启明著：〈诠释、沟通、共享：博物馆展示原理与实践〉，《博物馆之营运与管理：以历史博物馆为例》，页77。

<sup>19</sup> 汉宝德著：《博物馆管理》，台北：田园城市文化公司，2000年，页40-57。

<sup>20</sup> 博物馆独具的文化资产，透过规划的空间展示出应有的价值内涵，大致可分为（求真）1.社会价值 (social value)，2.历史价值 (historical value)；（求善）3.象征价值 (symbolic value)，4.完善价值 (authenticity value)；（求美）5.美学价值 (aesthetic value)，6.精神价值 (spiritual value) 等。参考戴维·斯罗思比 (David Throsby) 著，张维伦等译：《文化经济学》，台北：典藏艺术家，2003年，页105-107。

纪念馆的整体规划，应具宏观与客观的向度，呈现出历史中前因以至于后果的关系性。一所优质的传译空间，将因允当的排列组合之设计，启迪参观者省察出历史结构中条件性的缺憾，同时也得能思考谋求致善的方法或途径。3.求美，历史系人类生活与文化的借镜，纪念馆在主观上应具备寰宇性的历史态度，本诸于鉴往、知今与推来的观点，呈现出时代性客观的现实意义，从而涵盖了未来共荣共存的美好取向。

无论如何，为建构以上求真、求善、求美等三个面向的空间内涵，在在地说明纪念馆致力于系统研究之刻不容缓。

## 二、纪念馆空间的基本功能

纪念馆典藏的文物史料，透过系统的规划与设计，在展示的空间所散播的视野与知能，成为传译相关历史、文化和记忆的最佳媒介。依空间理论而言，纪念馆用以展览的空间，大致可分有三种功能性的象征，即认知空间（cognitive space）、实用空间（pragmatic space）及想象空间（dream space）。参访的观众穿梭在这3种传译的空间中，将与纪念馆共享知识功能、社会功能与启发功能等三大职能，也因此，职能建立了观众的历史、文化和记忆。<sup>21</sup>

第一，认知空间所传译的知识功能。一般纪念馆内空间的规划和操作，目的在于透过展览事务的筹备和展示内容的设计，俾以提供参访者自我学习和认知的便利性（cognitive facilitation）。类此功能如何水到渠成，完全得依赖纪念馆对其展示主题知识的掌握程度，以及观众对此主题性知识的需求多寡而定。认知空间的规划及其合理的设计，实质上将直接影响到纪念馆能否发挥完整的教育功能。<sup>22</sup>

第二，实用空间所传译的社会功能。纪念馆的造访者，不再是被动的知识接收者，而是位具有积极创造意义的参与者。因为展

<sup>21</sup> 许美云著：〈名人纪念馆的特质功能〉，页88。

<sup>22</sup> 展场空间的设计、使用与动线，以及展出的选择与布置，甚至包括导览内容序列的安排等，均直接影响到展览的教育功能。参考黄光男2002年5月6日于台北市南海路国立历史博物馆，演讲“国际博物馆趋势”所涉“空间使用与展品选择”的相关内容。



示空间既是一历史知识的场域，亦是参观者之间的相互激荡，从而形成意识脉络的交集、历史情境的互动，建立了社会团体或族群间的正向关系。<sup>23</sup>类此参观的经验，正可达到纪念馆实用空间所传译的社会功能；即使展示的主题并非一一地吻合于观众所认知的领域里，但往往因志同道合的共同参与，或情境上的交集，将使彼此所获得的历史、文化和记忆，更加的强烈和满足。

第三，想象空间所传译的启发功能。纪念馆透过任何历史对象的展览系统，基本上都具有回复历史脉络的企图，为此延揽专家研究以解析对象的历史意义，并依相关的因果关系编排设计，以充分呈现对象的文化内涵与历史情境。在类此的空间氛围下，参访者因触景生情，将使想象力和历史记忆受到激发鼓舞，内在的情感与热诚遂而汹涌澎湃，思想奔放，启迪良多。<sup>24</sup>这是优质的展示场域所形成的想象空间，其所传译的启发功能即见一斑。

以上三种功能性象征的空间经验，在参访的过程中，并非经由刻意选择而逐一发生，往往随着展示所呈现的情境油然而生，且三种经验多相互依偎也相辅相成，从而使参观的活动升华成主动活泼，也乐趣无穷的经验。当代稍具规模的历史博物馆或名人纪念馆，大多已利用了这三种空间经验来营运各类展览，借以有效地强化馆藏空间的基本功能。

## 肆、纪念馆教育推广的营运

至于名人纪念馆的实质营运，应跳脱传统的固定模式，不再仅止于追寻被纪念人物的原始面貌，及其歌功颂德的历史意义而已。虽然这些特质即名人纪念馆的基本主题，但更重要的是，应善加利用馆藏文物与史料，透过各类各式的展示或推广活动，考察被纪念者的思想及其精神典范，进而发扬类此取向之与环境、与社会、与历史、与文化之各种理念的因果关系，创造出时代性的新价值。

<sup>23</sup> 张誉誉著：《博物馆大势观察》，页170-176。

<sup>24</sup> 吕理政著：《博物馆展示的传统与展望》，页67-68。

## 一、纪念馆教育推广的理念

晚近以来，无论博物馆或纪念馆的营运，最值得肯定的就是教育功能的强化，凡馆内的各项活动，包括收藏、研究、展览、讲座或馆外交流合作等，只要涉及教育的意义和作用，皆纳入“教育推广”的活动范畴里。<sup>25</sup>事实上，教育推广活动既是纪念馆发挥教育功能的重要管道，也是营运纪念馆与观众间建立互动关系的最佳桥梁。特别是鲜活的推广活动，除可吸引民众的好奇与关注外，更可因而塑造一个生动活泼、参与性高的学习氛围，从而激发其思考、想象和共鸣的潜力，并透过有系统、有规划、有主题的排列组合。除了将纪念馆收藏、研究、展览等各类成果和资源与观众分享外，并可大大增强纪念馆的亲合力，导引大众借各种推广活动的参与，同时也充实了社会生活的内涵，并提升了人文领域的素养。<sup>26</sup>

为使所推广的教育活动能确实发挥其应有的效用与功能，首应明了所欲施教的对象类别，同时顾及纪念馆的立场与对象的关系，嗣依据对象的认知程度及其志趣取向作为规划教育推广活动的合理内容。依常态言，纪念馆的所有参访者与一般大众无异，但细察下可发现，这些一般大众均来自不同的环境，因背景与条件的差异，自然形成彼此并不相同的态度。因此，虽同属一般大众，然其相异性却远远地超过他们的同构型。<sup>27</sup>面对各类相异的教育对象，在设计任何类型的推广活动时，自应先做好教育对象的评估解析，包含馆外小区大众的结构分析，结合历来参访者的取向调查，从而考虑

<sup>25</sup> 博物馆教育学家茉莉·哈里逊（Molly Harrison）的研究指陈：“毫无例外的，博物馆做的每一件事，应含有一定的教育性质，……每个展览的设计水平、规划观念的质量、服务人员之友善与真诚的态度，包含馆内每项配备、器材的选择、出版品的内容及印刷技术等等，皆具有启发观众的影响力，并且亦属于教育功能的服务项目。”参考Hans L. Zetterber, *Museum and Adult Education* (New York: ICOM, 1969), pp. 17-18.

<sup>26</sup> 美国博物馆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编辑，徐纯译：《经营公民权的参与：博物馆的挑战》，台北：中华民国博物馆学会出版，2005年，页41-46。

<sup>27</sup> 由于环境条件、家庭背景、教育程度等因素的不同，其所塑造的生活态度及理念志趣等性向亦随而不同，故彼等所凝聚的社会记忆，系一多元复杂的综合体。参考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台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页417-418。

适时、适地、适人的周延性，才能规划出一项既（符合时需）广受青睐，又（意犹未尽）启迪良多的优质活动。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在有限的经费与人力下，借由对参访者的掌握与了解，从而设计出周延适当的特定展示，将使纪念馆的教育推广活动，发挥出恰如其分的教育功能。

## 二、纪念馆教育推广的实务

纪念馆为配合教育推广活动的策行，应具备基本活动的配备，俾以辅助教育推广目标的落实。大体上，不同的活动目标，当置有各需的设备，例如针对文物展示的活动之需，自应备有展览室、展示柜等设置；针对影视的教育目标，当设有视听媒体（录像带、光盘片、幻灯片）播映室及相关器材；针对见习或研究的教育目标，则置有研究室、工作室等空间，同时也应附设皮藏文献档案、手稿函札等参考数据的图书室。此外，为配当学人讲座或研讨会的筹办之需，当辟有演讲厅、会议室等必要的场所。

除以上硬件的配套设备外，各类的教育推广更需要丰富的典藏物品加以充实，尤以文献图书、纪录片、照片、光盘及文物的复制品等。<sup>28</sup>其它包括文物的次级品，如残余破片无法修补者或同类中品相较差者，这些次级品与其长期尘封于库藏，倒不如开放于架上，提供给历史研究者实物的凭据，这对教育推广的目标上，将可发挥出锦上添花的最佳功能。当然，为满足各类的教育推广，纪念馆尚需编制短、中、长程的征集目标，除主题性的需求外，旁及相关的时代性或历史性的文物史料，甚至包括区域性的会馆、宗祠、商会、学校、庙宇、建筑所存有的档案记录、民俗用品等，皆是纪念馆充实定性、定量之历史文物的来源之一，也是致力于教育推广的重要实务。其它相关营运上的管理，如文物的维护、作业空间的配置、各级配套的设施、馆员专长的培训、相关组室的联系、经费的来源与筹募等，皆是纪念馆营运教育推广所不可忽略的重要条件与基础。

<sup>28</sup> 提供教育推广活动所需的馆内典藏，甚至包括了私人寄存或馆外单位托管者。参阅任莉莉著：《博物馆藏品征集与登录管理之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页22-23。

至于纪念馆策行的教育推广活动，项目繁多，不胜枚举，其萃萃大者有以下若干型态：

（一）依年度各时节庆或纪念日，推广相应的各类巡回展览：

在展览期间，同时也可搭配出版相关的历史图录，或倡导海报，或摄制教学影带，办理专题讲座、导览特定的史料等。类此配合时宜的教育推广活动，多深受民众的欢迎赞赏，对提升参访者相关历史与文化的认同，具相当的教育效能。

（二）假日的推广活动：

多以家庭性的亲子活动为主，每月至少举办一场，随季节或月令的推移，每场设定不同的主题，如“春之飨宴：访亲拜友贺新禧”、“清明扫墓的远足乐趣”、“粽子飘香的联想”、“人圆月圆：比嫦娥更美的天伦乐”，其它如“桃园结义”、“孔融让梨”……等，借由影剧、民俗、彩绘、雕塑、童玩、创作等比赛项目加以推广，类此不拘泥又活泼的亲子活动，除益助于家庭天伦的乐趣外，亦能推广儒家的精神文化。

（三）教师研习营：

主要教育的对象即在职的教师，旨在协助或加强教师对馆藏文物与精神文化的认知，甚至运用馆藏史料编辑成研习营的教学教材，增进教师教学领域的提升。

（四）才艺研习营：

教育的对象为学童，透过规划的主题寓教于乐，如小学生的“彩绘我的最爱DIY”、“第一类接触：做个说故事的小老师”等，中学生的“笔墨光辉：书法艺术”、“华夏古今的儒家情怀”、“有情造物的雕塑之美”等。由于当今工商社会繁忙劳碌，每逢学子课余假日，家长多碍难拨冗与孩子共度一有意义的活动，徒令孩童虚度光阴、结交损友或沉迷不当场所等，是以才艺研习营或夏令营的教育推广，将能弥补当前社会机能的缺失。

### （五）专题研习营：

前文所指陈纪念馆典藏多具其专属的特性，也因而使活动的功能受到某程度的局限。为弥补类此不利的缺憾，应可扩大或提升纪念馆的专属特性。以“沈慕羽纪念馆”为例，如所周知，沈氏领导马六甲孔教会35年，<sup>29</sup>其“服务一生，战斗一世”的精神与儒家思想密不可分。<sup>30</sup>基于此，沈氏纪念馆当可衍其精神，推广相关儒学文化的活动，例如举办“孔教儒家对海外华人的影响”学术研讨会或与台湾学界单位联合举办“儒家文化历史文物特展”等，<sup>31</sup>亦不失为拓展纪念馆教育推广的优质活动。

### （六）视听飨宴：

为深化参访者对馆藏文物的认知，可利用馆内专辟的视听播映室，精选相关影片、记录片或专制的教育教材，配合主题展览，期间每日定时轮流播映，以增强教育推广的深度。

### （七）知性之旅：

为增进馆外动态的教育推广，可运用华社的相关资源，例如结合旅游业者，委办“生活乐章：心灵之旅”系列活动，包括“三保山青云亭史迹之旅”、“窥悉荷兰街华人的足迹”、“叶亚来与仙师四爷庙的回顾”、“陈氏书院讲古”等一日游的活动。类此馆外学习史迹之旅的推广活动，鲜活有趣，使参与者深获回响，发挥纪念馆更佳的教育功能。

<sup>29</sup> 1974年5月5日，孔教会推选沈氏为第八届主席。参阅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出版，1997年，页135。

<sup>30</sup> 一如马华郑良树教授撰述沈氏为“儒家文化的实践者”。参阅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总序。

<sup>31</sup> 例如2009年7月间，台湾淡江大学历史学系应砂拉越州（Sarawak）华总邀请，为庆祝大马“全国华人文化节”，与所属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Sarawak Chinese Cultural Association）联合举办“中华玉器文化特展”，渥蒙历史学系的支持与提供，越洋展览120组件中国历代珍贵玉器，并派师生5人协助现场导览及发表专题讲座。期间展示观者如堵，场面热烈，几可谓万人空巷，盛况空前。参阅东马《星洲日报》，2009年7月3日12版；《诗华日报》，2009年7月3日，A7、2009年7月6日，A6；《联合日报》，2009年7月3日，B3；《国际时报》，2009年7月12日，C7；《美里日报》2009年7月10日，A3等各报专版报导。

## 伍、结论

无论是博物馆或纪念馆的教育推广事业，随新世纪多元文化的发展，愈加显现其重要性。当今欧美博物馆界所盛行的名言：“如果藏品是博物馆的心脏，那么教育就是它的灵魂。”<sup>32</sup>这是一句相当贴切的比喻，如果纪念馆内没有典藏，就如同一个人没有心脏难以生存；然而一所纪念馆不借着教育推广，把文物知识与精神传播给社会大众，即如一位没有思想的人，其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便丧失了。

爰是之故，纪念馆设置的目的是在促发大众的学习，其发挥的教育功能，乃最为贴切大众的生活旨趣。近年以来，马华社会在经济、社会文化与华文教育的发展，皆有长足的成效，随着华人生活质量的提升和教育素质与理念的普及，对纪念馆所传播的历史领域与文化知识，需求性将日益殷切。我们应结合区域性的文化特色、应用国际资源，不断地借鉴各国的先进经验，在理想、策略与成长中，展现扎实的教育功能，使“沈慕羽纪念馆”不论在文化上、教育上、精神上拥有丰富的资源及内涵，正如同马华社会中一座孜孜不倦的灯塔，始终绽放出华族历史文化与精神文明的光辉。

---

<sup>32</sup> 引自周功鑫：〈博物馆的教育与导览工作〉，《故宫文物月刊》，第36期，1986年，页110。

## 第二部分

# 大时代、大信念：

---

## 沈慕羽与华教、政治





# 马来西亚不同面貌的华教斗士

林连玉与沈慕羽

■ 曹淑瑶

## 一、前言

马来西亚学者何国忠曾指出马来西亚华族社会的思想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型态：第一种是以董教总<sup>1</sup>领导人物为代表的文化维护者，他们坚持各族语文地位平等，对现行政策有许多不满，向来被主政的巫统视为是政策的挑战者；第二种是以马华公会<sup>2</sup>的领袖为代表，他们虽在政策的拟定过程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却倾向以协商的方式与巫统处理族群权益，被巫统视为较具中庸色彩的人物。<sup>3</sup>随着马来亚化的国家政策逐步确立，这两种不同的思想型态，围绕着华族民族文化能否存续的议题，在独立后的马来西亚国境内，激烈地碰撞。由于被排除于决策圈外的华教人士不断地呼喊、抗争，在坚持与妥协之间，相互较力之下，华族的母语教育终能持续生存。在这批领头捍卫华文教育的人士之中，林连玉与沈慕羽最为人所熟识，两人不但曾先后担任教总主席多年，更为争取华语文的平等地位牺牲奉献，对今日的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影响至巨。1984年，前英属马来亚殖民地政府的华校视学官钟敏璋女士在《南洋商报》上发文表示华文教育还能在马来西亚存续发展，要归功于林连玉和沈慕羽的

<sup>1</sup> 董教总是简称为“董总”的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与简称为“教总”的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的合称。

<sup>2</sup> 马华公会是马来(西)亚华人公会的简称，是马来(西)亚最大的华人政党。有关马来公会的成立与发展，见张晓威：《“马来西亚华人公会”与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之研究》，桃园中坜：国立中央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8年。

<sup>3</sup> 何国忠：〈林连玉与马华公会领袖〉，收入林忠强、陈庆地、庄国土、聂德宁主编《东南亚的福建人》，福建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页261-262。

努力。<sup>4</sup>钟敏璋的看法，对今日我们审视林连玉与沈慕羽两人的贡献时，下了一段有力的注脚。本文虽以“不同面貌的华教斗士”为题，却不是要比较林连玉与沈慕羽两人的作为，诚如何启良所言，将林连玉与沈慕羽两人相比，不论是在道义上或学术上，都是“一件相当吃力又不讨好的工作。”<sup>5</sup>事实上，何国忠与何启良两位学者已分别对林连玉与沈慕羽的历史定位做过相当深入且精辟的研究，他们都认为在今日马来西亚华族历史上，林连玉与沈慕羽以其超卓的人格，牺牲奉献的精神，立下了典范。<sup>6</sup>因此，本文的出发点，仅仅是想借由回溯这两位典范人物一生的历史脉络，呈现他们有别于过去我们所认识的其它面貌，期盼能对今日的马来西亚华族的母语教育发展有进一步的了解。

## 二、造就英雄的时代：一段历史情境

19世纪中叶以后，大批原本居住在中国东南沿海的贫困华人，响应英殖民地政府的招募而南移，在马来亚各地的矿场、园坵之间填补大规模开发所欠缺的劳动力。华族重视教育的传统，使得这些华族移民在生计稍获改善后，往往培养子弟接受教育。因此，讲授中国儒家经典的私塾、家塾、教馆、义学陆续被设立，华文教育就此在马来亚地区开始扎根萌芽，进入20世纪后，又随着原乡中国对于教育的改良，而出现新式教育。直到二次大战前，马来亚的华文教育是原乡中国教育的延伸，不论教材、师资都来自原乡中国。

马来亚地区的华文教育在发展之初期，并未受到英殖民地政府太大的关注，因为英殖民地政府视华人为他乡过客，认为华人只是追求经济利益的暂居者，<sup>7</sup>所以对于华文教育采取放任的态度，既不

<sup>4</sup> 《南洋商报》，1984年1月14日。

<sup>5</sup> 何启良著：〈大马华人历史上的沈慕羽——《沈慕羽事迹系年》序〉，收入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1997年，页54。

<sup>6</sup> 何国忠：〈林连玉——为族群招魂〉，收入何国忠主编《承袭与抉择：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与人物文化篇》，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东南亚区域研究计划，2001年，页39-76；何启良：〈大马华人历史上的沈慕羽——《沈慕羽事迹系年》序〉，收入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页19-55。

<sup>7</sup> 李长傅：《中国殖民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页209。

加以支持，也不制止。<sup>8</sup>但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自决”的观念逐渐激励亚洲各民族，海外华族民族主义以华文学校作为其活动的场域，鼓吹各种政治与思想活动，逐渐凝聚华族对原乡中国政治的关怀。此外，英殖民地境内的其它族群，如马来人的民族意识也开始萌发，<sup>9</sup>于是，英殖民地政府开始加强各项控制，以稳定其对马来亚的统治。为压抑海外华族民族主义的发展，英殖民地政府一方面鼓励华人以方言为教学媒介语，借以阻止华人社群产生一致的政治认同，<sup>10</sup>另一方面则从1920年开始颁布法令，对于华文教育的实施加予规范。<sup>11</sup>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再度恢复其对马来亚的殖民统治。由于此时马来亚共产党在全马各地进行恐怖武装暴动，而新兴的马来民族主义也持续发展，强烈地主张“马来亚为马来人的”。为适应战后的新局势，英国开始改革统治方针，于1948年2月成立“马来亚联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的政体。<sup>12</sup>1949年，英属马来亚联合邦政府邀请任教于牛津大学的学者巴恩（L. J. Barnes）组成一个委员会，研究马来文（巫文）教育之问题。这个委员会于1951年提出一份名为《巴恩报告书》（Barnes Report）的研究结果，主张联合邦政府建立一个国家教育体制，废止各族群的方言教育，提供以英

<sup>8</sup> Paul Chang Ming Phung,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in a Plural Society: A Malaysian Case Study* (Kuala Lumpur: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1973), pp.9-28.古鸿廷则进一步指出英殖民地政府对于殖民地的统治主要着眼于经济利益的剥削，一切政策皆以维护政局稳定与经济繁荣为目的，只要殖民地居民的各项活动不损及这两项目的，政府多半采取消极的放任政策。见古鸿廷：《教育与认同：马来西亚华文中学教育之研究（1945-2000）》，福建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页1。

<sup>9</sup> 有关马来民族主义的兴起，参阅W. R. Roff, *The Origins of Malay Nationalism*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7)。

<sup>10</sup> 古鸿廷：《东南亚华侨的认同问题：马来亚篇》，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4年，页135-136。

<sup>11</sup> 有关1920年代英殖民地政府立法监控华文教育的情形。参阅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二分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1999年，页19-124。

<sup>12</sup> 马来亚联合邦于1957年8月31日宣布独立，1963年9月16日与新加坡、沙巴、砂拉越共组“马来西亚联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sia），并不因1965年8月9日新加坡的脱离而再更改国名。

文与马来文为教学媒介的免费国民学校教育，以培养人民共同的马来亚国家意识。<sup>13</sup>《巴恩报告书》的内容使华社认为联合邦政府有意消灭华校，使华族传统文化及语言无法传承，于是在林连玉的领导下，全马华校教师在1951年12月25日成立“马来亚华校教师会总会”（简称教总），<sup>14</sup>抗议《巴恩报告书》的建议事项。

为了安抚华人的不满，联合邦政府委请教育学者方威廉(William Fenn)以及吴德耀对马来亚地区之华文教育进行调查，作成《方吴报告书》(Fenn-Wu Report)。《方吴报告书》主张政府应承认并协助华文教育在马来亚地区的发展，将其纳入马来亚国民教育的体制。<sup>15</sup>但联合邦中央教育咨询委员会检视两份报告书的意见后，却拟成一份内容倾向于《巴恩报告书》的报告书，建议设立一种采用英语或马来语授课的国民学校制度，并依据这份新的报告书制定《1952年教育法令》。<sup>16</sup>至此，一种透过教育来形塑马来亚国家认同的观念渐次成型，并且随着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摆脱大英帝国的支配，独立成为一个以马来人为主导的新兴国家，国家教育政策逐步趋向独尊巫语的单元化发展，使得华文教育在马来亚地区无可避免地承受更多的压制。为了反对《1952年教育法令》，教总与雪兰莪、霹雳、檳城、柔佛、马六甲等十州华校董事和教师代表，以及马华公会代表，分别于1952年11月及1953年4月举行两次全国华校董教代表联席大会，<sup>17</sup>“马来亚华校董事会联合会”（简称董

<sup>13</sup> 《巴恩报告书》(*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Malay Education, 1951*)之重要内容。译文见《教总33年》编辑室编：《教总33年》，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1987年，页85。

<sup>14</sup> “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是由全马各地的教师会及州教师联合会组成，目前共有41个属会，各属会的成员主要来自华文小学和华文独中的校长及教师。

<sup>15</sup> *Report of a Mission Invited by the Federation Government to Study the Problem of the Education of the Chinese in Malaya (Fenn-Wu Report)*, Council Paper No.35 (Kuala Lumpur: The Government Press, 1951)。

<sup>16</sup> Federation of Malaya, *The Education Ordinance, 1952,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Government Gazette*, Vol. 5, No. 30 (December 30, 1952), pp.594-595.

<sup>17</sup> 第一次全国华校董教代表联席大会召开经过。见林连玉：〈全国华校董教代表大会第一次大会〉，收入氏著《风雨十八年》上集，吉隆坡：林连玉基金委员会，1988年，页45-55；两次联席大会的决议内容，见《教总33年》编辑室编：《教总33年》，页318-319、328-335。

总)也在1954年8月正式成立。<sup>18</sup>

1956年5月16日,由教育部长阿都拉萨(Abdul Razak)为首所组成的15人教育检讨委员会,提出名为《拉萨教育报告书》(Razak Report)的调查结果,建议政府将华文小学纳为“标准型”小学(Standard-type Primary Schools);<sup>19</sup>中学以上教育必须统一以形塑全国人民对于新国家的认同,建议政府以津贴的手段,诱导数量最多的华文中学放弃华语,改采英语为教学媒介。<sup>20</sup>《拉萨报告书》公布后,联合邦政府并未等待新的教育法令制订通过,就即速于5月21日宣布在11月举行首届的初级教育文凭考试(The Lower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采用英文出题作答,华校生须为高中一年级才能报考。<sup>21</sup>8月2日,联合邦政府又宣布推动“火炬计划”,规定各校须登记所有适龄学童的人数,并在同年底宣布自1957年元月起驱逐超龄生,取消其学籍。<sup>22</sup>联合邦政府的措施引爆了华族社会对于政府意图消灭华文教育的争议,当全马知名的华文学校——槟城的钟灵中学,率先宣布愿意接受政府的特别津贴,遵守政府的规定改制为全津贴中学,<sup>23</sup>各地华校学生累积的不满情绪爆发,相继发起罢课抗争。为扭转逆境,由教总、董总及马华公会教育中央委员会所构成的“三大机构”,<sup>24</sup>一再发出联合声明,向教育部长陈情,<sup>25</sup>并在1959年国会大选前,召开“全国华文教育大会”,强调华族效忠联合邦,但对本族优秀之文化传统也“绝不放弃”,建议政府设立“华文教育咨询委员会”,给予华校百分之百的津贴。<sup>26</sup>

<sup>18</sup> 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出版组编:《董总卅年》下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1987年,页570。

<sup>19</sup> *Report of the Education Committee, 1956 (Razak Report)* (Kuala Lumpur: The Government Press, 1956), p.6.

<sup>20</sup> *Report of the Education Committee, 1956 (Razak Report)*, paragraph 72, p.12.

<sup>21</sup> 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三分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2001年,页358-360。

<sup>22</sup> 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三分册,页376、386。

<sup>23</sup> 有关钟灵中学改制。参见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三分册,页392-415。

<sup>24</sup> 有关三大机构的创立。见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出版组编:《董总卅年》下册,页572-583。

<sup>25</sup> 有关三大机构的联合声明。参阅《教总33年》编辑室编:《教总33年》,页410-412。

<sup>26</sup> 《教总33年》编辑室编:《教总33年》,页430。

1960年8月，联合邦政府新任教育部长拉曼达立（Abdul Rahman Talib）所召集的“教育政策检讨委员会”，公布所谓的《达立报告书》（Talib Report），建议以巫、英文两种官方语文为教学媒介，<sup>27</sup>除小学的母语教育可纳入国家教育体制的一环，中学教育仅能采取巫语及英语教学，并且在1977年逐步改以巫语单语教学，以母语为教学媒介语的中学，若不愿改制，将不再获得政府的津贴，成为自筹经费的私立学校，亦即“独立中学”。<sup>28</sup>联合邦国会于1961年，依据《达立报告书》的建议，制订新教育法令。为诱迫华文中学之改制，联合邦政府吊销教总主席林连玉的公民权和教师证，并动员马华公会领袖如陈修信、谢敦禄、梁宇皋及李孝式等人劝导华文中学改制为英语教学的国民型学校。<sup>29</sup>由于不少马华公会的党员是华校董事，因此马华公会的鼓吹，获得相当显著的成效。<sup>30</sup>

当1964年联合邦政府逐步废除小学毕业生升中学的会考后，经费须自筹的独立中学面临学生人数减少的处境，又因为设备欠佳，师资缺乏，学生程度不好，在社会人士与学生家长中的评价恶劣，许多独立中学因而停办，华文教育陷入能否生存的逆境。<sup>31</sup>1967年9月21日，联合邦教育部长佐哈励（Mohamed Khir Johari）宣布只准许拥有剑桥文凭或马来西亚教育文凭的学生出国留学，<sup>32</sup>对于只拥有华校毕业文凭，完全没有机会在国内升学的独中毕业生而言，更是沉重的打击。热心华教的人士虽然立即号召创办华文大学，但是1969年“513种族冲突事件”的爆发，却使得这所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寄予厚望的独大筹办运动就此延宕。面对华文中学日趋没落的局面，1970年代初期由霹雳州9所华校开始发起的华文独中复兴运动，竟引起全马各地华社的关怀，纷纷以义捐、义卖、义踏、义

<sup>27</sup> 《达立报告书》的华文译本见《马来亚联合邦(1960年)教育政策检讨委员会报告书(《达立报告书》)》，吉隆坡：1960年。

<sup>28</sup> 《达立报告书》，页16。

<sup>29</sup> 陈绿漪：〈大马半岛华文教育的发展〉，收入林水椽、骆静山编《马来西亚华人史》，（兰莪：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1984年，页299、323。

<sup>30</sup> 何国忠：〈林连玉——为族群招魂〉，收入何国忠主编《承袭与抉择：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与人物文化篇》，页62。

<sup>31</sup> 有关华文独立中学的出现以及其面临的困境。参阅古鸿廷：《教育与认同：马来西亚华文中学教育之研究(1945-2000)》，页90-122。

<sup>32</sup> 《星洲日报》，1967年10月12日。

捕、义剪、义唱、落发等等方式，为华文独中筹款，<sup>33</sup>董教总顺势于1973年12月16日召开“发展华文独中运动大会”，发表《华文独立中学联合建议书》，确立独立中学的六大办学方针，<sup>34</sup>并成立“全国华文独中工委”统筹全国华文独中的发展步调，推动各项发展。<sup>35</sup>自此，华文独中采取“华、巫、英三语并重”及鼓励学生同时参加独中统考和政府考试的“双轨教学制”政策，不但提升华文独中学生的竞争能力，而且普遍获得华族社会的支持，成为今日华文独立中学办学的一大特色。

经历了漫长时间的摸索，华文中学教育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应现实环境的生存之道，而华文小学教育虽然被纳入国家教育体制里，却得不到政府平等的照顾，又因为受制于教育部的政策，自1980年代起，屡屡面临“变质”的危机。1980年12月，教育部长慕沙希旦（Musa Hitam）宣布自1983年全面改革小学教育，推动“3M”计划，以增强各源流小学生的读、写、算能力。在这个计划下，华小课程除华文、数学维持以母语教学之外，其它教材皆以巫语编写。<sup>36</sup>董教总立即表达强烈抗议，不断发表文告，<sup>37</sup>呼吁华社反对3M制，终于迫使联合邦政府修订课纲。<sup>38</sup>但1984年，吉隆坡联邦直辖区教育局径自通令区内各小学集会时须以巫语发言，为抗议该项作法，教总副主席陆庭谕自11月5日起，在教育部静坐抗议，董教总则邀集政党、华团代表召开雪隆华小三机构的联席会议，表明声援陆庭谕的静坐抗议行动，并要求联邦直辖区教育局收回成命，矢言确保华小不变质。<sup>39</sup>1985年8月，教育部长阿都拉（Abdullah bin Badawi）宣布自翌年起，试办“综合学校计划”，将各种族学生汇集在同一校舍学习，并透过副教育部长林良实宣称综合学校计划仅

<sup>33</sup> 《教总33年》编辑室编：《教总33年》，页67。

<sup>34</sup> 《华文独立中学联合建议书》。见《教总33年》编辑室编：《教总33年》，页526-528。

<sup>35</sup> 古鸿廷：《教育与认同：马来西亚华文中学教育之研究(1945-2000)》，页108。

<sup>36</sup> 《星洲日报》，1981年12月31日。

<sup>37</sup> 相关文告收录于《教总33年》编辑室编：《教总33年》，页588-599。

<sup>38</sup> 《星洲日报》，1982年3月14日。

<sup>39</sup> 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出版组编：《董总卅年》下册，页705。有关雪隆华小三机构抗议集会用语联席会议的决议内容，见《教总33年》编辑室编：《教总33年》，页526-527。

限于课外活动项目，但董教总等热心华教的人士仍质疑联合邦政府的意图，认为这项计划只会加剧华巫两族“极化”。因此，联合各地华小董家教、华团陈情抗议，教育部遂将该计划改为“学生交融团结计划”。<sup>40</sup>1987年再度爆发所谓“华小高职事件”，教育部大规模调派不谙华语的教师担任华小高级行政职务，为抗议教育部的作法。董教总于1987年10月召开全国华团政党抗议大会，以罢课方式要求教育部解除这些人事任命，但10月28日，政府以迅雷不及以耳的速度执行“茅草行动”，长期主导抗议政府教育政策的教总主席沈慕羽、副主席庄迪君，以及董总主席林晃昇等华教人士，被指控挑动敏感课题，煽动种族情绪，遭到逮捕入狱。<sup>41</sup>

进入1990年代以后，联合邦政府仍持续推动不利华小母语教育的政策。1995年，教育部长纳吉（Najib bin Tun Haji Abdul Razak）提出“宏愿学校”计划，企图使“综合学校”计划卷土重来。<sup>42</sup>至2003年，联合邦政府又推动各源流小学实施英语教授数理课程的措施，直到2009年7月才宣布废除。<sup>43</sup>只要单元化的教育政策持续推动，各族群的母语教育不被平等对待，华文教育仍将遭遇各种形式的挑战。因此，要求政府废除单元化教育，确保华小不会变质，争取位于偏远地区招生不足的微型华小迁校，并维持华文独中的发展，俨然成为近年来董教总奋力推动的重要华教课题。<sup>44</sup>

<sup>40</sup> 有关董教总对于综合学校事件的响应。见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出版组编：《董总卅年》下册，页718-751。

<sup>41</sup> 《永远的林老总》编委会：《永远的林老总》，雪兰莪：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2003年，页63、65。

<sup>42</sup> 《董总50年特刊》编委会：《董总50年特刊》，雪兰莪：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2004年，页1118-1132。

<sup>43</sup> 《南洋商报》，2009年7月9日。

<sup>44</sup> 2009年4月召开的董总各州属会第78届联席会议大会，提出10项建议，要求政府废除单元化教育，制度化拨款给华小，解决华小师资问题，并支持华文独中发展。见《南洋商报》，2009年4月11日。



### 三、创造时代的英雄：林连玉与沈慕羽的生平

回顾过去一个世纪以来，马来亚地区华文教育的发展历程在国家教育政策渐趋单元化的发展下，华文教育的生存遭遇许多困难险境，几乎要丧失它的竞争力，但因为有着一群愿意牺牲奉献的人，为华文教育开辟出一片地土，得以继续开枝散叶。其中，林连玉与沈慕羽，是这段奋斗历程上不能被忘记的人。

#### （一）林连玉(1901-1985)

林连玉，原名采居，1901年出生于福建省永春县蓬壶西昌乡。林连玉的祖、父两辈皆入县学，祖父已是岁贡生，父亲则为禀生，出生在这样一个读书人的家庭，林连玉自幼在祖、父的教导下，接受传统中国式的教育，从三字经等蒙学的书籍，读到大学、中庸、论语、诗经、易经等儒家经典，也学过算数、代数。依据清朝的制度，科举取士必经学校，而学校出身者，可不经科举得官，<sup>45</sup>若因循这样的制度，林连玉的祖、父或许原有机会当官，晋升为绅仕阶级，只可惜他们处在清末这个剧烈变迁的时代下，因着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没能对中国的时局有一番作为。<sup>46</sup>由于以科举取士作为晋升绅仕阶级的途径不再，全家生计日加窘迫，使得林连玉的父亲体认到读书没有前途，希望子执辈能向商界发展，林连玉因而在16岁时到厦门投靠亲人，在姑丈与人合资经营的店铺当学徒。然而，林连玉并没有完成父亲的期待，经过三年的学徒生涯，他在1919年考入陈嘉庚所创办的集美师中学校师范部，选读文史地系，毕业后留校担任师范部国文科教员，就此步上为华文教育奉献一生的道路。<sup>47</sup>

<sup>45</sup> 有关清朝的科举考试制度。参阅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7年，页221-314。

<sup>46</sup> 在这样的处境下，林连玉的父亲林赓扬与祖父林以仁仅能对乡里发挥有限的影响力。林连玉在其自传中说林以仁有两项作为“对乡人的福利，有巨大的贡献”：一是与同乡父老共议取消铺张的祀神活动，免人破产；二是为重建三圈石拱桥而募款。林赓扬因会推算历法与日月蚀而成为由“第一流天文学家所组织，要有三个天文台长介绍，才可入会的”中国天文学会的会员，也曾参与永春县志的编纂工作，“有新的贡献”。详见林连玉：《林连玉小史》，收入氏著《风雨十八年》下集，吉隆坡：林连玉基金委员会，1990年，页190。

<sup>47</sup> 林连玉：《林连玉小史》，收入氏著《风雨十八年》下集，页190-194。

1924年，林连玉在集美学校初执教鞭，当时集美师中学校师范部的薪资相当优渥，令林连玉感到自己“真是太幸运了”。<sup>48</sup>但这个难得的幸运却在1926年底因国民党军队入闽，一些加入国民党的学生在校内鼓动罢课，导致集美学校停办而消失。顿时失业的林连玉决定南来马来亚谋生，在族兄林采仁的介绍下，林连玉先是在霹雳爱大华国民学校代课一个月，然后辗转到爪哇泗水任抹中华学校教书。由于林连玉屡屡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引起荷属东印度殖民地政府的猜忌，意图对他不利，于是他离开爪哇到马来亚，改名“连玉”，先在巴生共和学校任教半年，再至加影育华学校担任教员。1935年10月，林连玉到吉隆坡尊孔学校任教，除在1941年时曾加入“雪兰莪医药补助队”，在日本占领马来亚期间被雪州教育局调去士拉央侨民学校担任校长6个月，后来躲到雪兰莪州而榄镇（Jerem）的树胶园中养猪维生之外，<sup>49</sup>直至1961年8月被联合邦教育部吊销教师注册证，驱逐离校为止，林连玉一直在尊孔中学服务。<sup>50</sup>

当年迫于生活而来到南洋谋生，但在马来亚教书的薪资“非常菲薄”，<sup>51</sup>林连玉的日子依然过得困顿。由于妻儿留置家乡，因此林连玉在教学之余，还不断为报刊写稿赚取稿费，薪资收入在扣除生活费用后，全数都寄回唐山，当他的妻子在1935年过世后，3个未成年的儿子则寄养在兄弟家，未能接来马来亚。<sup>52</sup>在他的诗作

<sup>48</sup> 林连玉：〈林连玉小史〉，收入氏著《风雨十八年》下集，页194。

<sup>49</sup> 有关林连玉加入雪兰莪医药补助队及日据期间在而榄养猪的事迹。见林连玉：〈我劝告陈嘉庚先生出走避难〉，收入氏著《风雨十八年》下集，页170-171；黄文界：〈三年零八个月的林连玉行踪〉，《九五年华教节特辑——林连玉先生逝世十周年》，吉隆坡：林连玉基金委员会，1995年，页61-63；吴志超：〈医药辅助愁坐狮岛——林连玉老师畅谈时局〉，《九五年华教节特辑——林连玉先生逝世十周年》，页64-66。

<sup>50</sup> 林连玉：〈林连玉小史〉，收入氏著《风雨十八年》下集，页194-195。

<sup>51</sup> 林连玉：〈我组织教师公会〉，收入氏著《风雨十八年》下集，页175。

<sup>52</sup> 郑锦瑞：〈侨教功臣林连玉〉，收入教总秘书处编《族魂林连玉》，吉隆坡：林连玉基金委员会，1991年，页54。林连玉曾在1963年3月26日的家书上，嘱咐次子林多才说：“你伯母近来的生活怎样？当你的亲娘去世时，你们兄弟还年幼，照顾你们衣食，使你们长大的就是你伯母。你们应当把她当亲娘一样”。见林多才：〈为华文教育，托妻寄子，留丹心——林连玉部分家书整理〉，《九五年华教节特辑——林连玉先生逝世十周年》，页44。

里，一首“饥驱仰屋苦无粮，搜篋寻求急救方；检得金钗赴质库，且图剜肉以医疮”，生动地描述了这种穷乏的生活，迫使他将妻子的金钗送去典当的无奈。<sup>53</sup>林连玉不重视外表的修饰，曾在学校里被误认为工友，走在街上被误认为泥水匠，<sup>54</sup>一辆老旧得可以送进博物馆收藏的脚踏车，是他最重要的交通工具，<sup>55</sup>当1946年他和国民政府派来南洋视学的陈绍贤见面时，身上还穿着一条破了个洞的裤子，脚上的胶鞋则是战时养猪时穿的。<sup>56</sup>有时候他的口袋里少到只有五分钱，仅够他吃一碗面，再买包香烟。他曾在接受学生的接济时，哀伤地说：“‘吃教育饭’是死路，我老早就打算退出教育界了。可是，我始终没有这样做，这就是因为良心不许我这么做。”<sup>57</sup>由于他见识到华校董事会“贱视教师，刻薄寡恩”的行径，明白英殖民地政府压抑华校的意图，深深体悟华校教师的苦处只有自救一途，因此他自1946年起，号召筹组工会，终于在1949年时成立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实现了“以教师团结的力量，谋教师自身福利的理想”。<sup>58</sup>

当1951年初，《巴恩报告书》发表后，华人社群普遍认为殖民地当局有意消灭华校，使华文教育无法存续。在这种华族传统文化及语言将无法传承的危机感下，林连玉以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主席的身份，号召全马华文学校教师代表集会，通过决议于同年12月25

<sup>53</sup> 转引自郑良树：〈论林先生的人格和情怀——读《连玉诗存》后〉，《九五年华教节特辑——林连玉先生逝世十周年》，页48。

<sup>54</sup> 陆庭谕：《京华风雨、鹿鸣呦呦》辑一，吉隆坡：东方企业有限公司，2005年，页152-153。

<sup>55</sup> 黄润岳：〈我所认识的林连玉先生〉，收入《教总33年》编辑室编《教总33年》，页658。

<sup>56</sup> 当时陈绍贤以不屑的口吻问林连玉的资历，林连玉因对陈绍贤摆架子而反感，就不改冲撞的本性回说：“我是刚从养猪棚里出来的。”见林连玉〈冒牌的视学大员〉，收入氏著《风雨十八年》上集，页15。林连玉对于战后初期国民政府负责马来亚“侨教”的官员甚为不满，另见林连玉：〈华侨复校辅导委员会〉，收入氏著《风雨十八年》上集，页18-22。

<sup>57</sup> 黄东文：〈林师连玉印象记〉，《教总33年》编辑室编《教总33年》，页657。

<sup>58</sup> 林连玉：〈我组织教师公会〉，收入氏著《风雨十八年》下集，页175-179；何国忠：〈林连玉——为族群招魂〉，收入何国忠主编《承袭与抉择：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与人物文化篇》，页45。

日成立“马来亚华校教师会总会”，<sup>59</sup>誓言发扬中华文化与维护华文教育。<sup>60</sup>当马来亚联合邦政府罔顾华社的意见，拟定通过《1952年教育法令》时，林连玉召集教总、华校董事会及马华公会代表开会，反对《1952年教育法令》的实施，<sup>61</sup>林连玉起草了大会的宣言，提出这样的呼吁：“我们的文化，便是我们民族的灵魂，这崇高的，圣洁的灵魂，必须受极神圣的尊重，而我们文化的传递与发扬，必然寄托在华文教育的继续存在及发展上面，所以尊重我们的华文教育，即是尊重我们的文化。”<sup>62</sup>这次的会议也促成华教“三大机构”的形成，成为1953年至1959年间争取华文教育平等地位的领导机关。<sup>63</sup>

1953年12月，林连玉出任教总主席。此时，联合邦政府消灭华文教育意图越加积极，林连玉也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地挑起捍卫华教的重担，强力反对《1954年教育白皮书》的实施与1956年火炬运动的推行，并为维系华文教育的发展，与巫统领袖展开谈判，争取不把“最后目标”列入《1957年教育法令》，<sup>64</sup>当1960年《达立报告书》提出，华校面临改制与否的两难，他以孟子“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也”一语，沉痛地呼吁华人社群要“为着民族正义，为着子女的学业”，一起“共体时艰，暂时忍痛”，因为“我们认为传统相承已经数千年的文化，不但要加以保存，还要发扬光大，因此我们必须不惜任何代价，维护下来。这就是说，津贴金可以被剥夺，独立中学不能不办。”<sup>65</sup>

林连玉虽然强调“华人必须认识华文”，但并非意味着他否

<sup>59</sup> 林连玉：〈教总简史〉，收入《教总33年》编辑室编《教总33年》，页6；陆庭谕：〈教总33年〉，收入《教总33年》编辑室编《教总33年》，页7-8。

<sup>60</sup> 〈马来亚联合邦华校教师会总会成立宣言〉，收入《教总33年》编辑室编《教总33年》，页12-13。

<sup>61</sup> 林连玉：〈全国华校董教代表第一次大会〉，收入氏著《风雨十八年》上集，页45-55。

<sup>62</sup> 林连玉：〈马来亚联合邦华校董教及马华公会代表联席会议宣言〉，收入氏著《华文教育呼吁录》，吉隆坡：林连玉基金委员会，1988年，页11-12。

<sup>63</sup> 林连玉：〈马华教育中央委员会的真相〉，收入氏著《风雨十八年》上集，页62。

<sup>64</sup> 林连玉：〈有关最后目标问题〉，收入氏著《风雨十八年》下集，页146-147。

<sup>65</sup> 林连玉：〈津贴金可以被剥夺，独立中学不可不办〉，收入氏著《华文教育呼吁录》，页95-96。

定英语或巫语的学习。事实上，他始终对于自己不精通英文而感到遗憾，<sup>66</sup>因为语言的限制，他无法与他一生敬仰的华人领袖陈祯禄或者巫统的东姑阿都拉曼、教育部长佐哈励等人直接对谈，从而他强调语文是一种工具，须视学术或生活环境的需要，增加对其它语文的学习。<sup>67</sup>对他而言，他所追求的并非独尊华语，而是在马来亚这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社会里，作为一个开发有功的族群，他们的语文应该被尊重，应该被平等看待。<sup>68</sup>况且，“效忠的问题，与语文扯不上关系”，<sup>69</sup>因此他自出任教总主席起，即展开将华文增列为官方语言，争取母语教育平等的运动。林连玉始终将实现这个目标视为是个人的责任与义务，但他对民族语文的坚持，使他招致马华公会的“不肖份子”以及巫统领袖的仇视。为着《达立报告书》，林连玉与他口中的“民族败类”梁宇皋数度论战，被梁宇皋讥讽成是个为了“他的牛油与面包”而吹牛皮的走江湖者，<sup>70</sup>还意图推倒由联盟主导的联合邦政府。<sup>71</sup>1961年8月，马来亚联合邦政府以“你(A)故意歪曲与颠倒政府教育政策，有计划的激动对最高元首及联合政府的不满；(B)你的动机是一个含有极端种族性质以促成各民族间的恶感与仇视，可能造成骚乱”为理由，宣布褫夺林连玉早已在1951年取得的公民权，<sup>72</sup>首相东姑阿都拉曼甚至在出席一场纪念独立四周年的晚宴上公开表示：“当华校教总主席林连玉努力于华人沙文主义，称呼不向中国效忠的人为走狗时，政府乃剥夺他的公民权，因为他是非马来亚的，所以他不应拥有他所得到的公民权。”<sup>73</sup>

<sup>66</sup> 林连玉：〈教师之友——宋哲湘〉，收入氏著《风雨十八年》上集，页226。

<sup>67</sup> 林连玉：〈不学无术的语文院长〉，收入氏著《风雨十八年》上集，页172；林连玉：〈为马六甲会与联盟会谈书面谈话〉，收入氏著《华文教育呼吁录》，页48；《通报》，1968年2月25日。

<sup>68</sup> 1965年4月15日，林连玉在教总暨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合办的饯别会上之演讲。见《教总33年》编辑室编《教总33年》，页482。

<sup>69</sup> 教总秘书处：《林梁公案》，吉隆坡：林连玉基金委员会，1988年，页64。

<sup>70</sup> 《中国报》，1960年8月13日。

<sup>71</sup> 《虎报》，1960年11月8日。

<sup>72</sup> 〈教总为主席林连玉被政府褫夺公民权事声明〉，收入《教总33年》编辑室编《教总33年》，页459。

<sup>73</sup> 《教总33年》编辑室编《教总33年》，页461。

林连玉的公民权被褫夺后，其教师证也旋即被吊销，残酷的现实迫使他“不得不放下责任”，逼使他“做到不能再做为止”，他终于卸下捍卫华教的这份重责大任，把这个目标交给后人，只因为“母语教育平等尚未实现，全体华人必须继续努力，贯彻始终，以求实现。”<sup>74</sup>或许令他真正伤心的是当他离开后，他倾囊复办的尊孔中学再也抵挡不了改制的压力，变为国民型中学。<sup>75</sup>1963年，林连玉的回忆录在出版后，被联合邦政府列为禁书，<sup>76</sup>比起公民权被褫夺一事，林连玉为回忆录被禁更为愤怒，他为公民权与政府缠讼，只是“要为全民族争取平等的权利，表示到底不屈而已”，<sup>77</sup>况且“人家筹钱要我打官司，我必须打完这场官司，不可以把钱收下来作其它用途！”他内心并不期盼这个业已耗时三年多的官司能获得胜利的判决，<sup>78</sup>唯独为回忆录被禁一事，他冀望起诉成功，而且“便是十年八年的官司，我也打下去”，因为“我的决心，就是我的著作，重于我的生命。头可断，志不可辱，笔不可屈。”<sup>79</sup>

失去了教职后，林连玉的经济陷入极端困顿，当他的义女一家人搬离他后，他的晚年生活仅能依赖友人断断续续的接济，<sup>80</sup>即便如此，他仍安慰远在中国的家人不须为他忧虑，因为“我落难的时候，有几万人伸出同情的手，纷纷援助，使我不但生活无忧，还有巨款与压迫者做法律的周旋。”<sup>81</sup>当留在中国的妹妹子贞写信要他返回中国时，他仍坚决回信说：“你希望我回去，我……要获得光荣的还乡。所谓光荣还乡，就是要被当地政府驱逐出境。我领导华

<sup>74</sup> 林连玉：〈告别教总同仁〉，收入氏著《华文教育呼吁录》，页110。

<sup>75</sup> 陆庭谕：〈他不看尊孔大楼一眼——林连玉深恶痛绝的一件事〉，收入吴志超主编《百年尊孔人与事》，吉隆坡：尊孔独立中学，2007年，页252。有关尊孔中学改制的经过，见《教总33年》编辑室编《教总33年》，页462-464。

<sup>76</sup> 林连玉：〈回忆录被禁止〉，收入氏著《风雨十八年》下集，页91。

<sup>77</sup> 林连玉：〈调查庭记事(续)〉，收入氏著《风雨十八年》下集，页109。

<sup>78</sup> 林连玉：〈调查庭记事(续)〉，收入氏著《风雨十八年》下集，页109、114。

<sup>79</sup> 林连玉：〈回忆录被禁止〉，收入氏著《风雨十八年》下集，页94。

<sup>80</sup> 何国忠：〈林连玉——为族群招魂〉，收入何国忠主编《承袭与抉择：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与人物文化篇》，页72。

<sup>81</sup> 林连玉于1963年5月26日的家书。见林多才：〈为华文教育，托妻寄子，留丹心——林连玉部分家书整理〉，《九五年华教节特辑——林连玉先生逝世十周年》，页46。

人争取平等的权利，为XX的执政者剥夺公民权，若被驱逐出境不是耻辱，而是光荣。谁知他们竟没有驱逐我！但留我下来，可以卫护我的历史及主张。虽然我已非公民，对当前的事情无权开口，但若歪曲我的历史及主张，我就显示依然敢斗的颜色给他们看。……我有著作留给后代，我的历史及主张必然重光是无可置疑的，所以我必须留下来。”<sup>82</sup>

1985年12月18日，林连玉在贫病之中，划下人生的句点。为纪念林连玉对华文教育的贡献，教总、董总、堂联等15个华团共同设立了“林连玉基金会”，配合各界追悼林连玉的活动，筹得马币一百万元的基金，用以修建林连玉墓园、出版林连玉遗著、主办教育讲座、赞助华教刊物的出版与华教史研究，并于1987年10月17日通过将林连玉的忌辰定为“华教节”，每年举行公祭仪式，颁发林连玉精神奖，以表彰“体现林连玉精神的华教工作者”，培养后继者。<sup>83</sup>

## （二）沈慕羽(1913-2009)

沈慕羽，1913年出生于马六甲这个古城，13岁时进入父亲沈鸿柏创办的培风中学初中部就读，受教于多位来自原乡中国的老师，尤以王宓文、顾叔廉、赵颂周这几位老师奠定了他对国学基础，而赵颂周更直接影响了沈慕羽对于书法的热情，<sup>84</sup>当时沈慕羽还到海边画沙习字，<sup>85</sup>造就了今日为人称颂的“沈体”。<sup>86</sup>1931年时，年已19岁的沈慕羽陪同被委任为侨务委员的父亲沈鸿柏前往中国参加中国国民党四中全会，这是他第一次踏上原乡的土地，原本想要留下

<sup>82</sup> 这是1974年3月18日的家书。〈林连玉家书一束〉，《九五年华教节特辑——林连玉先生逝世十周年》，页83。

<sup>83</sup> 〈林连玉基金十年活动回顾〉，《九五年华教节特辑——林连玉先生逝世十周年》，页97-109。

<sup>84</sup> 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页17-19。

<sup>85</sup> 《中国报》，2009年2月8日。

<sup>86</sup> 中国国门书画院执行院长封俊虎称赞沈慕羽的书体“颇得颜真卿之精髓，而又有自家风范”，能“纳古法于新意中，生新法于古意之外，参机变化，隐括众长，自成一家”。见封俊虎：〈通会之际人书俱老〉，收入陆庭谕主编《沈慕羽资料汇编》编辑委员会：《沈慕羽翰墨集三》，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2006年，页17-18。

来，在中央大学就读，却因父亲患病而于1933年返回马来亚。<sup>87</sup>

沈慕羽返抵马来亚后，开始积极投入海外华族民族主义活动与教育的工作，他一方面在培风中学任教，另一方面在五哥沈慕周创办的晨钟夜学教课。由于受到五四运动领袖何葆仁的影响，沈慕羽加入晨钟励志社。1934年时，被选为青年部总务，倡导“新生活运动”，激励海外青年的爱国精神。<sup>88</sup>1937年时，为响应抗日救国运动，他不但组织青年歌咏队及戏剧团参加抗日宣传工作，还成立“校联部”，负责策划及指挥马六甲各华校师生从事救亡运动。<sup>89</sup>1941年，他担任马六甲华侨青年战时服务团团团长，积极投身抗敌工作，因此当日军占领马来亚后，他一度被逮捕入狱，出狱后则四处逃亡，后来躲到霹雳州太平后廊的渔网厂，一边工作，一边教工友们读书，唱抗战爱国歌曲。<sup>90</sup>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满怀着“欣喜若狂，病痛若失”的高昂情绪，沈慕羽返回马六甲，受聘为华侨公立第一小学校长，并复办晨钟励志社与夜学，<sup>91</sup>同时也积极地投入华人社群的政治活动。战后初期，中国国民党挟着带领中国抗日胜利使国家跃升为“世界五强”的威望，在海外华人社群的影响力甚大，每逢黄花冈纪念、双十国庆、国父诞辰、七七抗战纪念等祖国节日时，各地党部皆与华团联合举办盛大的庆祝活动。沈慕羽受到父亲的影响，认同中华民国是祖国，积极参与中国国民党海外党部的活动。1946年时，他担任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马六甲支团的干训班教育长，<sup>92</sup>每周集训工作完成后，率领队伍游行街道。<sup>93</sup>1947年，沈慕羽更被推选为中国国民党马六甲直属支部的第五届执行委员及1949年的第六届执行委员。<sup>94</sup>

<sup>87</sup> 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页23。

<sup>88</sup> 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页26。

<sup>89</sup> 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页28。

<sup>90</sup> 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页30-35。

<sup>91</sup> 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页35-37。

<sup>92</sup> 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页38。

<sup>93</sup> 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页43。

<sup>94</sup> 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编：《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记录汇编》，台北：中央委员会秘书处，1954年，页417、646、806。



虽然具有中国国民党党员的身份，但沈慕羽却也积极投身马来亚当地的政治活动。战后马来亚华人的处境因马共的武装暴动而受到排挤，<sup>95</sup>英殖民地政府甚至意图驱离华人，<sup>96</sup>为了保障华族的利益，团结华人力量，沈慕羽以马六甲教师公会主席及晨钟励志社青年部部长的身分加入陈祯禄创组的“马华公会”，成为马华的创党元老，也是最早加入马华的华教人士。<sup>97</sup>因自父亲那一辈开始，沈家就与陈祯禄建立情谊，沈慕羽与陈祯禄虽然没有共通的语言，交谈时需要别人翻译，但沈慕羽在马华公会里颇受陈祯禄的赏识，只要陈祯禄有演讲，沈慕羽也会被邀同台演讲，<sup>98</sup>在陈祯禄的支持下，沈慕羽得以在马华成立青年团。1955年6月，沈慕羽被参政司韩麦委任为华人参事局议员，<sup>99</sup>直接参与了殖民地政府的政治活动。在参事局议员任内，沈慕羽倡议在新村筹设图书馆，由于他的积极推动，马六甲州先后成立民众图书馆13所，及巫文图书馆一所。<sup>100</sup>

1950年代可以说是沈慕羽的政治生涯中最为灿烂的时刻。1956年6月时，他被英国女王封赐为太平局绅，由于太平局绅的职权相当于二等推事，可以签证文件及保护公众安全，是一项极高的荣誉，马六甲华校教师公会特别致赠“侨教之光”的匾额为他祝贺。<sup>101</sup>1959年时，更因对马来亚独立运动及宣传公民权运动有功，受首任最高元首颁赠第三级卓越护国勋章（JMN）。<sup>102</sup>然而随着陈祯禄与林苍佑等维护华文教育的马华公会领袖逐渐淡出，继任的马

<sup>95</sup> 英殖民地政府与巫统的马来领袖一直认为华人企图将马来亚变为中国的一个省。《Proceedings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Singapore, 1930)》, p. B26; C. O. 273/569, Confidential Despatch from the Governor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to the Colonial Office, dated October 16, 1931.

<sup>96</sup> 后来英殖民地政府放弃驱逐政策，改采切断马共与乡村耕垦者的联系，以阻断马共的经济援助的策略，将乡村的居民迁至新村集中管理，此即“毕里格斯计划”（Briggs Plan）。

<sup>97</sup> 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页42-43。

<sup>98</sup> 《星洲日报》2006年12月13日；《中国报》，2006年12月15日。

<sup>99</sup> 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页67。

<sup>100</sup> 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页69-71。

<sup>101</sup> 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页71、74。

<sup>102</sup> 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页85。

华新领导层认为将华语列为官方语文的主张将会造成极大的危险，于是倾向配合联合邦政府的国语政策，确立了不支持华语为官方语文，仅保证华语的教导、学习与使用不受到禁止或阻扰的方针，<sup>103</sup>沈慕羽因其教总主席的身份，且坚持华语文为官方语文的立场，被马华视为违反党的政策而于1966年10月时，被马华公会开除党籍。

虽然不再是马华公会的成员，但沈慕羽对于华社的影响力，使得声势不断下滑的马华公会始终无法与他完整地切割，有关他重返马华公会的谣言甚嚣尘上，《星洲日报》曾于1971年2月初发文披露李孝友与沈慕羽数度密谈，邀他重返马华的消息。<sup>104</sup>但1971年2月中旬，沈慕羽接受当年主导将他逐出马华公会的陈修信之邀请，参加马华主办的全国华人团结大会，并在2月18日在怡保举行的全霹雳州团结大会上发表演说，呼吁华族“永远团结，做个堂堂的大马华人”的言论，<sup>105</sup>却导致他于同年4月时，被指控在怡保的华人聚会上发动煽动性演说，而遭到扣押，成为他为着实现民族与语文平等地位的政治目标而第一次被捕入狱的理由。法院几经审理后，在1972年10月，以罪证不足撤销对他的控诉。<sup>106</sup>1994年，马青团第卅一届常年代表大会建议马华总会长林良实恢复沈慕羽党籍。<sup>107</sup>1999年，沈慕羽在林良实的推荐以及当时内政部副部长黄家定的协助下，以其对国家教育有卓越贡献为由，获得马六甲州长赐封为“拿督”，<sup>108</sup>林良实甚至表示曾经考虑邀请沈慕羽重返马华。<sup>109</sup>2005年5月，沈慕羽以催生马华青年团创办者的名义，受邀参加马青50周年的纪念活动，当时马青总团长廖中莱再度发出恢复沈慕羽党籍的呼声。但沈慕羽以“心碎了”，没有获得平反，何来复籍为由，拒绝

<sup>103</sup> 张晓威：《“马来西亚华人公会”与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之研究》，页156-162。

<sup>104</sup> 相关报导收录于《沈慕羽资料汇编》编辑委员会：《石在火不灭》，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1996年，页175。

<sup>105</sup> 沈慕羽的演讲词全文收录于《沈慕羽资料汇编》编辑委员会：《石在火不灭》，页215-220。

<sup>106</sup> 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页119-124。

<sup>107</sup> 《星洲日报》，1994年6月18日。

<sup>108</sup> 《星洲日报》，2009年2月8日。

<sup>109</sup> 《光明日报》，2005年5月28日。

回复党籍，<sup>110</sup>因为“我是争取华文地位，不是出卖华文，却被开除党籍，这令我很伤心！”<sup>111</sup>

沈慕羽一方面活跃于华人的政党组织，也参与英殖民地政府的政治事务，同时还投入捍卫华教的运动。自1933年在培风中学及晨钟夜学教课起，沈慕羽展开了其在教育界漫长的服务生涯，<sup>112</sup>即便他于1973年依据联合邦的教育条例自任教长达27年的平民小学退休，他也不曾真正地离开教育岗位，反而在退休更积极从事社会教育，推广书法与儒家思想，他对于教育事业的这份执着，源自于实现学生时代所立下的“良师兴国”的志愿。<sup>113</sup>当战后华文教育在马来亚地区日渐受到英殖民地政府的打压，在林连玉的领头下，沈慕羽也以马六甲华校教师公会主席的身份，为捍卫华文教育的平等权力而努力。

自战后以来已历时超过半个世纪的大马华教奋斗史上，沈慕羽几乎“无役不与”，诸如林连玉时代的1952年改编教科书会议、1953年至1959年间“三大机构”的活动、反对《1954年教育白皮书》的实施、1955年马六甲会谈、反对拉萨教育报告书及火炬运动、申请公民权运动等等事件，他都曾扮演重要角色。<sup>114</sup>当1961年林连玉因公民权及教师证被取消而淡出捍卫华教的行列后，沈慕羽就肩负起林连玉未竟的志业，继续推动将华文增列为官方语言的运

<sup>110</sup> 《星洲日报》，2000年5月22日。2010年1月，马华公会总会长翁诗杰表示马华内部已达成共识，要为沈慕羽被开除党籍一案平反。见《南洋商报》，2010年1月13日。

<sup>111</sup> 《中国报》，2005年5月16日。沈慕羽曾经表示：“我对华文问题时常本着一片忠诚发言，因为马华再三对外宣布，马华与华文教育共存亡，因此我的谈话也是在维护及支持马华，一心争取华文的地位，根本与马华宗旨没有违背”。见钟天祥：《李春三·华教·马华》，吉隆坡：人间出版社，1984年，页69；转引自何启良：〈大马华人历史上的沈慕羽——《沈慕羽事迹系年》序〉，收入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页33。

<sup>112</sup> 沈慕羽因在教育界服务长达70年，且担任校长一职57年，创下任职校长最久纪录，而于2003年被列入《大马记录大全》(The Malaysia Book of Records)。见《中国报》，2003年10月30日。

<sup>113</sup> 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页24。

<sup>114</sup> 例如林连玉曾提及自己和沈慕羽参与改编华校教科书的中央委员会和咨询委员会，“每个月都要花四五天出席会议，实在够累了。”见林连玉：〈改编华校教科书〉，收入氏著《风雨十八年》上集，页35。

动。1965年12月，沈慕羽获选为教总主席，开始其对华教运动长达28年的领导，引领华社走过发动全国注册团体签名盖章大会、争取创办独立大学运动、1970年代的3M计划、1985年董教总与泛马回教党的历史性对话，以及1987年抗议华校高职等等历史事件，并为了拓展独立中学学生的升学之路，不但数度与中华民国教育部官员会谈，还分别于1966年8月、1981年11月、1990年2月、1990年4月、1992年3月时，亲自来台湾考察，与中华民国教育部、侨委会协商“侨生”升学办法，并于1990年7月时，吁请侨务委员长确保中华民国的侨生政策不受外界影响。<sup>115</sup>

沈慕羽更为了维护华文教育的存续而努力，在1987年时，以75岁高龄再度被捕入狱。为抗议政府派遣不按华语的教师到华小任职，意图将华文教育连根拔起，沈慕羽与董总主席林晃昇于1987年6月邀集全马十五华团组织行动委员会在10月召开参加人数多达4千人的全国华团政党抗议大会，企图以罢课方式迫使教育当局解决相关问题。虽然罢课活动最后取消了，但沈慕羽与林晃昇却于10月28日凌晨遭到警方以触犯《内安法令》为由逮捕。内政部以沈慕羽在1977年至1987年期间，分别在吉隆坡、芙蓉及峇株峇辖等地，以华教、华小变质、新经济政策、大学固打制及华小高职等议题挑动种族情绪为由，将沈慕羽扣押长达七个月。<sup>116</sup>由于年事已高，沈慕羽在扣押期间一度因心脏不适而就医，<sup>117</sup>他被冠上“煽动华人反对政府”的罪名，每天接受一至两次不等的密室审讯，<sup>118</sup>为了发泄满腔愤慨，他在牢中高唱“满江红”、“正气歌”等华语歌曲。<sup>119</sup>1988年6月3日，沈慕羽才在不准担任社团职位、不可公开演说以及限制居地等六项限制条件下，获得释放。<sup>120</sup>

1989年6月，首相兼内政部长马哈迪撤销对沈慕羽的六项限制

<sup>115</sup> 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页147-149、188-189、192、196、205-206；《联合报》，1966年8月6日。

<sup>116</sup> 《南洋商报》，1987年12月30日；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页178。

<sup>117</sup> 《南洋商报》，1987年12月19日。

<sup>118</sup> 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页176。

<sup>119</sup> 《中国报》，2007年10月29日。

<sup>120</sup> 《通报》，1988年6月6日。

条件后，<sup>121</sup>沈慕羽再度扛起教总主席的职务，直到1994年才正式卸下捍卫华教的重责大任，但他仍以教总与董总永久会务顾问的身份，持续关怀及协调华教之发展，推动学习书法、说华语、尊崇孔子与儒学的运动，在华社里发挥其影响力。2007年8月9日积极寻求复出政坛的安华特别拜会沈慕羽，在公正党宣传主任蔡添强的传译下进行交谈。沈慕羽向安华建议华、巫、印三语应列为必修课，因为“国语是大马国语，是国民必修课，英语因是国际语言，也必需列为必修科，而华语是我国第二大民族的语文，再加上中国崛起为经济强国，如果华语也能在我国每一间学校列为必修，将是最好。”<sup>122</sup>他认为“如果马来学生有机会修读华文，学习中华文化并养成自强不息、勤劳刻苦的性格，就不会有种族之间的猜疑问题，也不需要再靠拐杖。”<sup>123</sup>

或许正是他对华文教育发展这份难以割舍的责任与关怀，因此，虽然他不是一个言行激烈的人，<sup>124</sup>但却和林连玉一样，被马来执政当局贴上极端份子的标签。2002年8月11日，马哈迪与霹雳州国阵领袖共进午餐时，抨击沈慕羽是只顾及华族的顽固“极端份子”，以创办学校为手段，意图将马来西亚“中国化”，不但反对以英文教数理科，也反对宏愿学校计划，阻止马来族及华族儿童互相来往。马哈迪更声称：“极端份子利用媒体触发华人社会反对数理科英文文化的混乱局势，令政府担心，如果极端份子煽动种族情绪，甚至引发动乱，政府会采取行动。”<sup>125</sup>

2009年2月5日，沈慕羽于马六甲家中与世长辞，<sup>126</sup>华社各界对于沈慕羽的追思与悼念活动不断，在马华公会的马六甲州议员的提议下，马六甲州议会于3月中旬通过将培风中学校门前的甘榜恩拔

<sup>121</sup> 《南洋商报》，1989年6月23日。

<sup>122</sup> 《南洋商报》，2007年8月10日。

<sup>123</sup> 《光明日报》，2007年8月10日。

<sup>124</sup> 何启良著：〈大马华人历史上的沈慕羽——《沈慕羽事迹系年》序〉，收入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页26。

<sup>125</sup> 《联合报》，2002年8月12日；《博讯》，2002年8月12日，转引自李亚邀编著：《晚节飘香续编》，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2006年，页97-98。

<sup>126</sup> 《南洋商报》，2009年2月6日。

路易名为“拿督沈慕羽路”（Jalan Datuk Sim Mow Yu），<sup>127</sup>并于4月1日晚间，正式换上新路牌，<sup>128</sup>以“表扬沈慕羽对教育领域所做出的贡献。”<sup>129</sup>这是马来西亚第一条以华教斗士命名的路。教总也配合尊师重道运动，设立“教总沈慕羽教师奖”，以鼓励和发觉默默付出的优秀老师。<sup>130</sup>沈慕羽的家人则将治丧期间所获得的奠仪26万1,575元马币，移交“沈慕羽书法文物馆”工委，完成沈慕羽生前成立文物馆的遗愿。<sup>131</sup>而马华总会长翁诗杰甚至片面向媒体宣称，为了鼓励更多学生就读中文系，将为拉曼大学募款设立一个以沈慕羽为名的一百万令吉贷学金，协助有志者进入中文系就读。<sup>132</sup>原乡的中华民国政府与中国泉州市政府也分别唁电悼念沈慕羽。<sup>133</sup>中国国民党党主席吴伯雄更为缅怀这位德高望重的海外党员，不但以快递送来写着“遗风宛在”挽联，更于2月28日亲至马六甲吊唁沈慕羽，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也特于4月16日颁发“褒扬令”赞扬他的贡献。<sup>134</sup>

#### 四、一些观察与分析

马来西亚学者廖文辉曾对新马两地的华教人士做了三种分类：第一类型的华教人士可以称为“嘉庚型”人物，他们主要是商人，处处出钱出力兴学办教，但不曾与执政当局的教育政策冲突，是华教的开基者，以陈嘉庚为典范，其他代表人物如李光前、陈金声、李成枫等人；第二类型的华教人士可称为“六使型”人物，他们不但是商贾，也是华校的创办者、校董或领导人，因为他们对于华教的维护，使他们往往在事业上遭遇到执政当局的刁难或对付，甚至

<sup>127</sup> 《光明日报》，2009年3月20日。

<sup>128</sup> 《星洲日报》，2009年4月4日。

<sup>129</sup> 《光明日报》，2009年3月20日。

<sup>130</sup> 《星洲日报》，2009年6月3日。

<sup>131</sup> 《中国报》，2009年3月14日。

<sup>132</sup> 《星洲日报》，2009年3月12日。2010年1月12日，马华公会正式将这笔马币100万元的款项交予拉曼大学，见《南洋商报》，2010年1月13日。

<sup>133</sup> 《星洲日报》，2009年2月11日。

<sup>134</sup> 《总统府公报》第6860号（2009年4月29日），页20-21。

因而被捕入狱、驱逐出境或被褫夺公民权。这类型人物的典范是陈六使，其他代表尚有钟乐臣、庄希泉、林晃昇、郭全强等人；第三类型的华教人士则是“连玉型”人物，他们主要是教师、校长和华教工作者，为着维护民族语文与华文教育的受教权益，与执政当局进行长期的抗争，林连玉是当中的典范人物，其他代表尚有沈慕羽、陆庭谕、严元章、黄润岳、莫泰熙等人。<sup>135</sup>

廖文辉的分类勾勒出今日我们所认识的这些马来西亚华教斗士们的基本轮廓。虽然林连玉与沈慕羽同被归属为所谓的“连玉型”的华教斗士，他们在追求华文教育地位的立场上，一脉相承，但进一步观察，仍可发现两人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历史面貌。过去在探讨海外华人的政治认同时，以王赓武为首的学者，基本上以为19世纪末期至二战以前南来的“新客”，因为受到较多的压迫，在政治认同上，总是以原乡中国为依归，而“土生”的政治认同，在独立前大多倾向英殖民地当局，独立后大多倾向马来亚。<sup>136</sup>但这样的既定认知，似乎并不符合今日吾人对林连玉及沈慕羽的瞭解，在新客的林连玉与土生的沈慕羽两人身上，似乎呈现相反的现象。

林连玉自1927年南来马、印两地谋生后，直至1985年病逝吉隆坡之前，仅返回原乡中国三次：一次是在1929年，因“思家念切”而回国省亲；一次是在1934年，返国奔母丧，在永春太平国小及厦门大同国小任教一年多的时间；最后一次是在1946年，返国奔父丧，至此，他不曾再返回原乡。作为一个新客，在殖民地政府与以商人为主的华校董事会的双重压迫下，辛苦维持着受人“贱视”的教书工作，大多数的新客理所当然地认同祖国，企盼祖国富强，但林连玉却不是这样。可能是因为当年中国国民党的支持者摧毁了他在原乡引以为傲的工作，战后原乡国民政府官员自恃的嘴脸与贪污的行径，从未实现对海外华教的资助，<sup>137</sup>似乎促使林连玉对于原乡

<sup>135</sup> 廖文辉著：〈以陈嘉庚、陈六使与林连玉为代表谈华教人物的类型〉，收入林忠强、陈庆地、庄国土、聂德宁主编《东南亚的福建人》，页108-127。

<sup>136</sup> Wang Gungwu, “Chinese Politics in Malaya,” *The China Quarterly*, No. 43 (September, 1970), pp. 1-30; 王赓武，《中国与海外华人》，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年，页154-172。

<sup>137</sup> 见林连玉：〈冒牌的视学大员〉与〈华侨复校辅导委员会〉两文，收入氏著《风雨十八年》上集，页14-22。

的政治活动保持着一种疏离感。反而对于战后马来亚的政治脉动相当敏锐。

林连玉自诩是马来亚华人社会的“先觉”，早在战后马来亚步向独立建国之前，已先于1951年时取得马来亚的公民权，<sup>138</sup>并极力呼吁马来亚的华人“必须忘记祖国，以马来亚为效忠的对象，与他族争取平等生存的权力。”<sup>139</sup>他在1956年时，带头展开争取公民权运动，起草〈全马华人注册社团大表大会争取公民权宣言〉，要求在马来亚出生的人成为当然公民，在马来亚连续居住五年者有权申请为公民，所有公民之权利与义务平等，并且列华、巫、印文为官方语言。<sup>140</sup>林连玉并以教总主席的身份，通函给全马二十九个分会，发动华校校长与教师，协助学生家长填写申请公民的表格，<sup>141</sup>因为他已认清“人类是以求生存为目的的，……我们对于马来亚食此毛践此土，我们的子子孙孙，必须定居于此，已经成为不可逃避的事实，我们怎能不以马来亚为第一的家乡呢！因此，我们必须使小孩子认识马来亚是他们唯一的祖国，除了马来亚以外，其余都是友邦。”<sup>142</sup>

受迫于现实环境的变化，异地成为“家乡”，祖国转眼成了“友邦”，林连玉甚至曾强硬地主张：“凡是不肯共存共荣的人是马来亚的罪人；凡是做了马来亚的公民，而不以马来亚为祖国的人，也是马来亚的罪人。”<sup>143</sup>即使到最后他的公民权被剥夺了，他还是公开宣告：“我是深爱马来亚的，愿意终老于斯！”<sup>144</sup>他因而

<sup>138</sup> 〈林连玉年表〉，《九五年华教节特辑——林连玉先生逝世十周年》，页88。

<sup>139</sup> 〈林连玉家书一束〉，《九五年华教节特辑——林连玉先生逝世十周年》，页84。

<sup>140</sup> 〈全马华人注册社团大表大会争取公民权宣言〉之全文，收录于《教总33年》编辑室编《教总33年》，页373-374。

<sup>141</sup> 林连玉：〈有关申请公民权的史实〉，收入氏著《风雨十八年》下集，页157-168。

<sup>142</sup> 《教总33年》编辑室编《教总33年》，页64。

<sup>143</sup> 林连玉：〈代序——心理的建设〉，收入氏著《华文教育呼吁录》，无页码。

<sup>144</sup> 1965年4月15日，林连玉在教总暨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合办的饯别会上之演讲。见《教总33年》编辑室编《教总33年》，页481。



被华教支持者诠释为一个马来(西)亚的“爱国者”。<sup>145</sup>但在其写给妹妹的信中,“光荣返乡”一语透露出想望却不可及的原乡还是存在于他的内心深处,延续传承自父祖而来的中华文化对他来说是重要的、迫切的,因此他以一种“烈士”的心态,<sup>146</sup>义无反顾地投身捍卫华文教育的行动,也从而被追求单一国族认同的马来领袖视为极端主义者,诬指他将《达立报告书》“曲解”成是要消灭华校的政策,并以富有煽动力的讲词鼓吹设置独立中学为由,怀疑他对马来亚联合邦的忠诚,<sup>147</sup>责难他是“非马来亚的,所以他不拥有他所得到的公民权。”

不同于林连玉对政治的疏离,沈慕羽这一生捍卫华教的志业始终与政治活动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源自于他独特的家庭背景,为他日后出入政治场域,提供了社会资本;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教育成为民族国家形塑国家认同的手段后,学校教育就被收纳在国家机器中,不再只是单纯华族的权益了。因此,华族对教育权的抗争不再被视为一个单纯的文化课题,而是对国家制度的挑战,是一个政治议题,无法跻身决策层是难以发挥直接的作用。除此之外,作为一个海外华族移殖社会里的“士”,特别是揭起捍卫民族文化立场的知识分子的角色,也为其提供了参与政治或社会活动的重要头衔。

沈慕羽从不讳言他的父亲沈鸿柏对他这一生带来绝大的影

<sup>145</sup> 例如:郭全强:《一位真正的爱国者》,《九五年华教节特辑——林连玉先生逝世十周年》,页5;陈凯希:《林连玉——一面鲜明的民族教育旗帜》,《九五年华教节特辑——林连玉先生逝世十周年》,页29;郑良树:《林连玉评传》,雪兰莪加影:林连玉基金会,2005年,页286;廖文辉,《华校教总及其人物》,雪兰莪加影: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2006年,页187。

<sup>146</sup> 何国忠:《林连玉——为族群招魂》,收入何国忠主编《承袭与抉择: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与人物文化篇》,页64。林连玉的讲词中,总是一再强调为能实现奋斗目标,须付出重大代价的信念,为着民族大义,他已将个人利益与生死置于度外了。见林连玉:《华文教育呼吁录》,页95、111。林连玉在1960年10月21日,写给次子林多才的家书上说:“我知道我是等于原子弹,我本身会遭到被毁灭的代价。我知道我已六十岁了,今后余年无几,以此余年献给民族文化的救亡运动正是光荣的归宿。”林多才:《为华文教育,托妻寄子,留丹心——林连玉部分家书整理》,《九五年华教节特辑——林连玉先生逝世十周年》,页44。

<sup>147</sup> 林连玉:《调查庭记事实》,收入氏著《风雨十八年》下集,页101。

响。<sup>148</sup>沈鸿柏于19世纪末时，由福建晋江南来马来亚，协助哥哥沈鸿恩经营薯山和工厂。<sup>149</sup>由于事业经营有成，为人又急公好义，沈鸿柏在马六甲华社里，很快地崭露头角，建立声望，曾先后创办培风学校、培德女校、平民学校等学校及中华总商会、晋江会馆等团体。身为一名“新客”，沈鸿柏对于原乡中国也抱持着相当深的情感，“愤恨中国受到列强的侵略，华人到处受凌辱”，<sup>150</sup>使得他投身海外的革命活动，加入1908年成立的同盟会马六甲支部，<sup>151</sup>因而与中华民国的党国元老们有相当密切的联系，<sup>152</sup>在中华民国成立后，曾被委任为福建省政府顾问及几个委员会的委员或顾问，简任中央侨务委员。<sup>153</sup>沈鸿柏除投身海外华族民族主义的活动，也积极参与侨居地的社会建设。身为马六甲华社的领袖之一，沈鸿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受英海峡殖民地政府的请托，协助维持社会秩序，其为组织马六甲的商界人士而号召创设的马六甲中华总商会，也受到英海峡殖民地政府的重视，特准选派一位代表担任殖民地立法议院的议员，当时任教于马六甲高等英校教师的陈祯禄，因精通英文而被选为中华总商会代表，只要立法议会有新法案，陈祯禄就会征询沈鸿柏的意见，可见两人的交情不浅。<sup>154</sup>

沈鸿柏一生的信念与作为，对其子女产生很大的影响，<sup>155</sup>尤其四子慕卿、五子慕周与六子慕羽，都跟随他的脚步，对原乡政治与华侨教育充满热情且奉献心力，<sup>156</sup>其中沈慕羽更是成就最为辉煌的，他不但始终保持中国国民党党员身份，而且加入马华公会为马

<sup>148</sup> 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页24、43。

<sup>149</sup> 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页4。

<sup>150</sup> 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页24。

<sup>151</sup> Yen Ching-hwang, *The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51.转引自何启良：〈大马华人历史上的沈慕羽——《沈慕羽事迹系年》序〉，收入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页23。

<sup>152</sup> 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页10。

<sup>153</sup> 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页5。

<sup>154</sup> 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页12。

<sup>155</sup> 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页24。

<sup>156</sup> 沈鸿柏父子这种热爱原乡的情操，也感染了第三代的子孙们。沈鸿柏四子沈慕卿的儿子沈墨孔说：“我们这群小孩会随着歌唱，当时叔叔们都是在唱些抗战歌曲，我们也深受影响”。见《中国报》，2009年2月8日。

来亚的独立建国齐心协力，也积极投入社会服务，受到统治者的肯定，荣获勋衔。华教人士对于沈慕羽获得勋衔的事迹，总是赋予这是执政当局对于沈慕羽在推动华文教育的贡献上的肯定。

1950年代，许多马来亚地区的中国国民党党员纷纷加入马华公会的政治活动，学者何启良认为：“马华公会的出现，已显示出大马华人国家认同已开始转向，政治意识的‘马来亚中心化’基本上已出现了分水岭。”<sup>157</sup>但沈慕羽无疑是这个观点的例外。虽然沈慕羽投入马来亚的政治活动，但他作为一位对中华民国建立有功的华侨之后代，始终维持着对中华民国的情感，在他经历战时的逃亡或战后的牢狱之灾，传唱爱国歌曲给予他坚持信念的力量，<sup>158</sup>他一生访问中华民国台湾多达8次，超过返回原乡中国，并且被中华民国视为“华侨”。1973年9月29日，他来台参加第九届世界华商贸易大会，更以归国侨胞身份出席双十国庆庆典。<sup>159</sup>2006年，他受邀参加“和平之旅——世界二战历史资料全国巡回展”时，发现展览上没有陈列蒋介石领导的中央军照片时，向主办单位表示：“你们要知道，是蒋介石领导中央军正面跟日本军对抗，不是共产党军人啊！可是，我看了整个会场的图片展，却找不到一张中央军的照片。你们应该通知一下，纠正过来。”他始终认为蒋介石对中华民族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sup>160</sup>

沈慕羽虽然加入马华公会，却始终保有中国国民党党员的身份，他与中国国民党的党国大老们维持密切联系，不但被总统蒋经国提名为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sup>161</sup>1982年，沈慕羽70大寿时，蒋经国特以墨宝越洋祝贺，立法院长倪文亚、侨务委员长毛松年、

<sup>157</sup> 何启良：〈大马华人历史上的沈慕羽——《沈慕羽事迹系年》序〉，收入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页29。

<sup>158</sup> 影响所及，沈慕卿之子沈墨孔就曾表示：“我们这群小孩会随着歌唱，当时叔叔们都是在唱些抗战歌曲，我们也深受影响”。见《中国报》，2009年2月8日。沈慕羽的次子沈墨义对于“吴伯雄能亲自到坟前祭拜父亲，是让人感动的，也非常光荣。”因此，他代表家属赠送新出版的画册、书籍给予中华民国台湾总统马英九，并由请吴伯雄代转。《南洋商报》，2009年3月1日。

<sup>159</sup> 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页131、133。

<sup>160</sup> 《南洋商报》，2006年10月26日。

<sup>161</sup> 《联合报》，1988年7月10日；《南洋商报》，2009年2月28日。

资政郑彦棻也都有贺词。<sup>162</sup>1984年，他的母亲李良女士百岁大寿，台北经济文化中心孔令晟夫妇、赵兴中代表出席祝贺。<sup>163</sup>1990年2月9日至21日，他受中华民国政府的慰劳，不但游历台湾全岛，还前往当时尚未全面开放的金门观光。<sup>164</sup>1991年12月他获颁中华民国侨务委员会专业奖章——“一等华光奖章”及美金2千元贺仪。<sup>165</sup>1997年1月，更获得中华民国“八十五年行政院文化奖”，<sup>166</sup>并蒙总统李登辉的接见。<sup>167</sup>2009年2月辞世后，中国国民党党主席吴伯雄更亲至马六甲吊唁沈慕羽，总统马英九在4月颁发下的“褒扬令”中，赞颂其“长年旅居海外，眷怀祖国故土，溯源探本，精诚弥坚”的“絜行义贞”。<sup>168</sup>

虽然林连玉与沈慕羽都为着共同的目标齐心协力，也都被马来领导人士指责为冥顽不灵的极端主义者，但他们的出生却决定了他们在马来亚的命运。作为新客的林连玉，即便早在1951年就归化为联合邦公民，且一再强调自己对马来亚的效忠，但他的呼唤始终没有得到马来主政者的认同，他被视为一个永远的“他者”，是“非马来亚的”，所以当他被认为“在行为上或言论上不效忠或不满联合邦”时，<sup>169</sup>当年通过申请归化所得来的公民权立即政府以命令褫夺。相对的，出生于马六甲的沈慕羽，在英殖民统治时期是英国的保护民，在1948年2月马来亚联合邦成立后，自动成为联合邦的公民，他的公民身份不是按着联合邦宪法第十六条或第十七条之规定采取登记或通过归化方式取得的。因此，除非叛国或具有双重国籍身份，或政府批准其自动放弃公民权，他的公民身份是不能被

<sup>162</sup> 转引自何启良：〈大马华人历史上的沈慕羽——《沈慕羽事迹系年》序〉，收入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页26。

<sup>163</sup> 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页158。

<sup>164</sup> 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页188。

<sup>165</sup> 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页203。

<sup>166</sup> 《联合报》，1997年1月4日。

<sup>167</sup> 《联合报》，1997年1月7日。

<sup>168</sup> 《总统府公报》，第6860号（2009年4月29日），页20-21。

<sup>169</sup> 黄士春译：《马来西亚联合邦宪法》，霹雳怡保：信雅达法律翻译出版社，1998年，页17。

剥夺的。<sup>170</sup>故而，沈慕羽虽然和林连玉一样，毕生致力于华语文平等地位的争取，却不像林连玉一样失去公民权，仅是被执政当局以《煽动法令》及《内安法令》逮捕入狱。这样不同的结果，令他不禁庆幸：“我是地道公民，政府无权褫夺我的公民权。”<sup>171</sup>但也不禁感叹：“我是于1913年在马六甲出生的，所以我应该是100%在大马土生土长的土著，但我却没有特权，这实在是太冤枉了。”<sup>172</sup>

## 五、结语

华族在马来亚落地生根已不知多少个世纪了。当年他们为着追求美好的生活来到马来亚这块异土，生根茁壮，枝繁叶茂，转眼“他乡”已成“家乡”。但在这块孕育他们的土地上，他们却始终无法完整地实现他们做为马来亚公民的自我价值，或许就是这种失落，使得华族社会不得不以抗争的方式，期盼唤起主政者的认同。林连玉与沈慕羽在这段抗争的历史上，虽然都向着实现民族平等的共同目标奋战，却因为他们不同的身份，而呈现两种截然不同的面貌。林连玉选择与原乡切割，在政治认同上选择马来亚，却因为出生异地，他一生的挣扎与奋斗，只为他换来被剥夺公民权的残酷命运。土生的沈慕羽则选择回应原乡的呼唤，他不但清楚地区分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差异，<sup>173</sup>而且优游于原乡中华民国与家乡马来亚的政治之间，展现多层次的政治认同与效忠，他善用这种天生的优势，既维持海外华人的形貌，却仍保有“华侨”的特质，不但在马来亚家乡受到肯定，也备受中国原乡的推崇，从而也促进原乡及家乡两地的发展，在他的努力下，无数的马来西亚华裔公民的后代，

<sup>170</sup> 有关褫夺公民权之规定列于马来西亚联合邦宪法第23至28条，见黄士春译，《马来西亚联合邦宪法》，页15-22。相关探讨参见《侨情导报》，第139期（1971年11月），页47-49。

<sup>171</sup> 沈慕羽，〈教总的创组与奋斗〉，收入《教总33年》编辑室编《教总33年》，页2。

<sup>172</sup> 《光明日报》，2007年7月31日。

<sup>173</sup> 《中国报》记者曾询问沈慕羽“来世当不当中国人？”沈慕羽回答：“我永远做华人，世世代代做华人，不会因为做华人苦，而做别种人，让人家瞧不起，而且也失去了骨气。”见《中国报》，1991年7月14日。

以“侨生”的身份，“返回”中华民国台湾接受高等教育，然后再将他们的“台湾经验”回馈他们真正的家乡——马来西亚。

学者郑良树在其〈从华教史，论大马中华文化的起承转合〉一文中，对马来西亚中华文化的发展做了这样的结论：“我们没有摩西，没有人会带领我们出海；我们也没有诺亚方舟，没有客观环境做为我们的避难所；我们有的是前辈们留下来的精神遗产和人格感召，我们就凭着他们的精神和人格，要在这块土地上使中华文化成长，为着整个马来西亚文化。”<sup>174</sup>或许也能作为今日我们评判林连玉与沈慕羽两人的历史定位时，另一段美好的注解。但不管林连玉或沈慕羽的作为是不是受迫于时代，为着“牛油与面包”，逼使他们必须担负捍卫华文教育这个重责大任；不管林连玉或沈慕羽以什么样的面貌去实践他们的信念，至少他们创造了一个华文教育得以勉强为系的时代，让后代的子孙可以选择他们要或不要继续传承这个文化。终究，有选择的人生才是幸福的！

本文的完成，感谢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何启良教授、马来西亚拉曼大学张晓威博士与黄文斌博士、马来西亚林连玉基金会李亚邀先生、淡江大学黄建淳及其他与会学者的宝贵建议，对厦门大学庄国土教授、马来西亚高等教育部副部长何国忠博士的鼓励与东海大学古鸿廷教授指正，特此致谢。

---

<sup>174</sup> 郑良树：〈从华教史，论大马中华文化的起承转合〉，收入何国忠编《百年回眸：马华文化与教育》，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05年，页372。

---

# 沈慕羽的领导风格及 对华教运动的影响

---

■ 张荣强

---

我（沈慕羽）眼看着教总从诞生到成立。三十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关注它，我把它当作是生命。无论是对外的折冲，或内部的要务，我几乎无役不与。

（廖文辉，1998b:67）

## 一、引言

沈慕羽参与马来（西）亚华教运动超过半个世纪，并领导教总28年。因此，以他的思想理念、个人修养和斗争立场所形成的领导风格对华教运动及教总的各个发展期都起了显著的影响，例如在教总“开创期”（1950-1953）时，沈慕羽已积极参与和领导教总，这可由他在1950年12月来隆会见林连玉时倡议组织教总开始，然后以一宵的时间拟好教总章程。成立后，他担任过多份要职，直到1965年开始担任主席。这期间及之后“风雨期”（1954-1969）里，沈慕羽和教总主席林连玉一起面对国家教育体系和政策拟定的挑战及华文中学的改制。1960年代，沈慕羽又主导了争取华文成为其中一种官方语文的斗争。进入1970年代，沈慕羽领导教总进入“成长期”（1970-1987），他主导着抗衡政府不利华小条例的实行及参与通过法律申辩独立大学运动和独立中学复兴运动等。当茅草行动扣留被释放后，沈慕羽依旧领导教总跨入成熟期（1988至今），里头包括领导教总秘书处继续加强宣教和收集及研究华小资料等工作。无可否认，沈慕羽曾参与教总发展的每个阶段，但本文注重于

讨论他当教总主席后，领导教总及华教运动时的风格和影响。

在探讨沈慕羽的领导风格，作者认为沈慕羽在对内（组织上）和对外（政治）方面展现出不同的风格。在教总或华教运动内部组织里，他强调民主，并以中庸、厚道、包容和“广纳百川”的胸襟去容纳各方人才为华教运动服务；另一方面，沈慕羽常以大局（斗争目标）为重，给予董总领导层全面的合作，展现出合作型的领导风格。反之，对外处理华教课题时，他展现出敢于怒吼、据理力争、有着不畏强权的个人高度“魅力”形象和风格，而在策略上，他却常展示出灵活变通的手法应对。这种对内和对外展现出不同的风格是否有它强处或及矛盾之处，而又是什么因素造成他有着这样的领导风格呢？

何启良（1997:19-55）曾说：沈慕羽是本邦华文教育的直接领导者，他对大马华文教育所起的实际作用和影响，除了林连玉以外，实非一般华文教育运动的领袖人物所能及的。在他担任教总主席的28年里，华文教育运动里经历了许多大事情，例如力争华文为官方语文，争取创办独立大学，独中复兴运动，数次捍卫华小不变质运动及成立董教总教育研究中心等，而他每次都站在第一线领导着董教总。<sup>1</sup>因此，探讨沈慕羽的领导风格对整个华教运动的影响也是本文着重的一部分。在这里，作者想探讨他在组织内和向外政治概念上应用不同的手法所带给教总及华教运动的影响。例如，在组织上，他那倾向民主型，强调合作的领导风格是否能给华教运动带来帮助？而向外，他那据理力争及以灵活变通的抗衡手法是否也带来显著的功效？此外，沈慕羽这类式的领导风格是否有被后继者仿效呢？

---

<sup>1</sup> 笔者在“谷歌”的网络搜查里发现有24700个查询有关沈慕羽的文章或资料网页。相比之下，查询同个时期董总主席林晃昇的文章或资料网页有6010个（查询于2009年9月15日），这意味着谈论沈慕羽的网页数量比林晃昇多了4倍，由此我们可了解到沈慕羽对60年代至90年代初的华教运动影响实非一般华教领导人所能相比的。



## 二、沈慕羽以民主和包容的风格领导教总

在华教运动内部组织里，沈慕羽以民主和包容的风格领导和管理教总，他以宽厚及胸襟如大海，容纳百川的气度来包容组织内的每一份子。这种领导风格使教总能容纳各方人才，即使彼此之间有着不同的个性和斗争方式。在沈慕羽领导教总时，庄迪君加入教总，<sup>2</sup>使教总的行政组织得以进行了专业化的改革和开始推动提升华文教育素质的工作，例如在庄迪君建议下成立了“教育研究中心”，里头包括了收集、归类及系统性分析资料的资料室，及负责执行和协调教总会务、研究教育问题、教育发展和趋势的秘书处。今天，这资料中心已经成为国内外各机构或个人研究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借重的地方，这秘书处也陆续出版了许多高质量，有关华文教育的资料汇编和学术著作（廖文辉，2006：224-225）。对华教运动领导者来说，最重要的是此中心所收集及整理出来的资料能给予他们提供了最新及完整的数据和资料，协助他们在争取华校权益时，提供最有力的凭据。

另一方面，因容纳陆庭谕，使教总领导不减当年50、60年代林连玉、沈慕羽等主导华教运动时那种敢怒敢吼，不平则鸣的形象，例如陆庭谕被公认为华教运动里发文告和与他人笔战论争最频密的领导者，他曾因抗议联邦直辖区教育局实行每周集会上使用国语而在教育局前面静坐抗议，也曾因政府征用三宝山而绝食，并为了抗议政府派不谙华文老师至华小担任高职而当众落发。其实在沈慕羽内心深处，他对陆庭谕强硬和喜欢突出个人形象的做法，是不以为然的，但他依然以民主和包容的心态接受陆庭谕的做法。这可从他的日记里常透露了这个看法，他在1987年10月16日（星期五）的日记里写到：

陆庭谕亦爱华教，谁也不否认。可是他喜欢造出个人突出形象，也是众所知的。如去年在教育部静坐抗议週会用国

<sup>2</sup> 1983年，尊孔董事长林晃昇以高薪聘请了当时在农业大学当讲师的庄迪君前来尊孔掌校。庄迪君在出任尊孔校长不久后，即被推举为吉隆坡教师会主席，也成为教总的领导主干。而他也即提出了成立“教育研究中心”的计划（廖文辉，2006：222-224）。

语，在宝山亭静坐单抗议三宝山不被铲平；这次教师升调事，他又落发抗议，他三次的行动都获得万众赞扬。今天不知如何心血来潮，又妙想天开在十九日到甲，廿日到槟负荆向两地华团请罪，信及新闻稿都写好备送。我也接到教总来电通知，交待赖日龙通知各有关学校届时到培中迎接。据知两小时后教总来电说，经过众人向陆庭谕劝说后，此事已作罢。<sup>3</sup>

此外，陆庭谕也经常和群众大集会上痛批政治人物出卖华教。这种敢怒敢吼，不平则鸣的形象的确在华教运动向政府争取权益时，容易引起华社的共鸣及获得群众的响应和支持。我们可从廖文辉的描述里了解到它实际的情况，他这样写到：

陆庭谕硬朗的作风，虽然触痛许多政党要人，却获得广大群众的拥护与爱戴，深深激动他们内心的共鸣，尤其是他慷慨激昂的演讲，不知鼓动多少华社中下阶层的热情，尤其是独大运动时期。陆庭谕所到之处，其支持者皆蜂拥而至，争听演说。有些地方，在移交募款时，还特别指定陆庭谕领取。陆庭谕的群众魅力实不亚于1950年代的林连玉先生。

（廖文辉，2006：216）

当年的教总给人充满活力和生气的感觉，部分原因不外出自沈慕羽那强调民主、包容和接受多元意见的领导作风，这也是促成各路英雄都能发挥己长的主因。我们可从教总执行秘书长姚丽芳（2006）的言谈中领悟出，她说：“教总当时确有好几个极具个性与充满人格魅力的领导，沈老、陆庭谕、庄迪君都是其中人物。虽然思想作风各异，‘和而不同’，在沈慕羽宽容、亲和、中庸、爱惜、赏识和信任人才的经营下，组织内的矛盾自然能化戾气为祥和，而每个人都能发挥所长，形成一个坚强的教总团队。”在教总任职多年的陈亚才（1998：XVIII）也说：“沈先生是非常厚道的人，对于教总同仁，基本上是称赞鼓励多过批评苛责……与其人相处，可以轻易感受到他那‘士不可不宏毅，任重而道远’的使命感，体现‘宰

<sup>3</sup> 这段日记及沈慕羽的观点是由何启良提供的。笔者非常感激何博士能在百忙中指导笔者，并提供了不少意见给笔者，更令笔者感动的是何博士不厌其烦地为笔者修订论述和赘句，此谢。

相肚里可撑船’的胸襟。”这正符合了何启良所陈述的一般：

在70年代和80年代的教总（甚至说整个华教运动）能够凝聚了各方面的派系和人马，沈慕羽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当时教总内外的确有着不乏激进份子及主张与当局妥协的人士，若华教运动被激进路线人士控制，很可能把整个华教运动推向沙文主义的边缘，但若华教运动让妥协份子盘踞，则会使华族权益更进一步的磨削，沈慕羽在这两个极端里则扮演着一个较持平的形象，他中庸不极端，却坚持立场。而沈慕羽长年在教总的领导，亦消泯或延缓了在教总内较强硬和偏激意识，此实有功于整体华社。

（何启良，1997: 41-42）

沈慕羽这样的领导风格的形成，主要是与他的个性、家庭和教育背景有关。与他共事十余年的姚丽芳（2006: 8-10）曾这样的形容沈慕羽的个性及为人，她说：“他（沈慕羽）坐言起行，表里如一，在他的生活点滴中，一贯的厚道、谦和、廉洁、简朴、中庸、和蔼、持平、包容、认真、诚意等，这可非一时的，而是数十年如一日，已内化了，装也装不来。”除了深受那忧国忧民的父亲影响，他那深厚扎实的儒家造诣和中华文化素养也使到他领导教总及华教运动时，对内处处以和为贵，强调安内攘外，团结内部齐心向外。这种“安内攘外”领导风格，可从沈慕羽的办学和护教谈话里领悟到，沈先生说：“办学的事是‘安内’，护教之事是‘攘外’。两者休戚相关，没‘安内’怎有能力‘攘外’？”（廖文辉，1998b:77）。显然，沈慕羽也把这“安内攘外”作风用在华教运动里，他始终认为华教运动必须内部团结，方能有能力向外争取。而这种领导风格非常有利他组织群众和发动舆论。然而，这种风格有否被后续者秉持呢？

在沈慕羽领导教总及华教运动的28年里，我们未曾听闻过有任何的内部权力角斗的恶性竞争或激化起华教组织内部矛盾。然而，在他退休后的今天，华教运动却屡传出兄弟阋墙事件，而双方都举出许多有利己方的理由，并认为对方才是造成华教运动分裂的根源。我们感叹的是当年沈慕羽费尽心思树立起的华教运动良好内

部文化是否也会随此分裂事件付诸东流了？沈慕羽在84岁大寿欢庆会时，还恳切地呼吁同道说：“我华人要为办华教而团结，勿为华教而分裂；大家存异求同，万变不离其宗，这是最重要的原则。”

（魏维贤，1998：XV）新纪元学院风波时，沈慕羽也多次呼吁大家维持现状，以确保新纪元学院的稳定及化解华教闹分裂，例如在他2008年11月2日写给董总13州代表的信里这样提到：

董教总作为华教堡垒，必须永远团结巩固，不容破坏，必须以和为贵，以宏观透明中庸忍让谦虚融洽品格互相尊重，不宜刚愎自用，独断独行，违背此原则导致分裂，则民主教育无望矣！我的建议“维持现状”“寻求共识”乃欲消除歧见，以达致双赢，我毕生奉献华教，以华教为生命，今日目睹危机，震撼不已，愿大家以大局为重，冷静亲切，化解症结，坦诚合作，无任企盼之至。<sup>4</sup>

由此，我们发现沈慕羽除了强调民主和包容的重要性，更希望能有个“稳定”的董教总。然而，他这种强调民主、包容和稳定型的领导风格并不被重视，因为华教分裂运动并没因他的调解和呼吁而停止下来。由此，我们更了解到沈慕羽当年那处处以和为贵，互相尊重的领导风格的可贵。此外，沈慕羽也从未企图通过当年他在政党的身份在教总里发挥党性功能，为个人议程串通政商，使华教运动成帮成派，造成分裂。<sup>5</sup>

因为沈慕羽拥有那容纳各方人才的胸襟，这减少了华教组织内部的摩擦，并使华教组织内部工作专业化，提升了它的功效，进而使华教运动日渐壮大，成功地随时代变迁而转型，而教总也把它

<sup>4</sup> 董总于2008年11月2日召开会员大会，沈慕羽特写了一封信给13州的每一位代表，表达他对华教运动内部团结的重要。

<sup>5</sup> 其实，沈先生更令人敬佩的是他那身体力行，即以身教言教的方式领导华教；他那“华文教育的苦行僧”及“华教是我的生命”人生哲学怎能不令同道或华社支持和认同他的斗争方式！也令处心积虑的对手汗颜。数十年来，晨钟夜学战后复办，即由沈慕羽主持校政，一直到2004年的92高龄才卸下担子。晨钟夜学持有教无类的办学精神，学生不分年龄、不分种族、不分职业，前来受教者多如恒河沙数，更是促成了马六甲华语流行满天下的特色（廖文辉，1998b：67及76）。

主要功能由“救亡和抗衡”转变或提升为“抗衡和启蒙”。<sup>6</sup>这里所谓的“启蒙”工作，除了推动提升华文教育素质，如出版“教育天地”月刊、办教师培训营、华文研习营、幼教启蒙教育等工作；还包括了用来加强“抗衡”部分的幕后实际工作，如设立由专业人士领导的秘书处和它以下的单位进行研究及调查华小及华教所面对的问题。它的功效可由他们交出了不少“让数据说话”的调查报告书里了解到。例如，当发生吉华（K）校教师曾文珩因踩到白蚁蛀蚀的地板而摔死的不幸事件时，教总调查研究与资讯组就拟了《华小校舍问题与维修概况调查报告》，明确列出来自7州的232所华小急需马币5000万元的维修费向政府申辩。因此，默默地进行这方面的工作的确重要，有了数据、论据兼备的调查报告，不但能具体地反映华小的困境，亦能回应官方单方面的说辞，成为争取时的本钱和加强了成功的机会。

显然，教总能专业化及成功改型，沈慕羽那强调民主、包容和稳定的领导风格居功不少。他那中庸及肯接受他人建议的做法，成功地提升教总的功能和华文教育的素质，也奠定了教总将来应走的路线。姚丽芳称赞说：“沈慕羽奠定了教总专业化的行政系统与较巩固的财务。”（姚丽芳，2006：8-10）。潘永强也说：“社运如果无法提升专业，很难以掌握丰沛行政资源的国家机关抗衡，散兵余勇式的抗争，甚至不易吸引国家官僚的尊重。”（《东方日报》，4.9.2009）可想而知，如果没有沈慕羽和他的班子（尤其是庄迪君）成功地把教总成功改型和专业化，今天的教总就无法迅速地提呈数据确凿的调查报告向政府申辩，也无法出版刊物和主办培训营提升华文教育的水平。

---

<sup>6</sup> 关于教总的主要功能，廖文辉（2006）在《华校教总及其人物》第29页里有详细的分析。

### 三、以“合作型”风格领导，给予董总全面配合

在50、60年代，教总主导了华教运动，由林连玉领导的教总领导层成为代表华社参与马六甲会谈，拉萨教育报告书、拉曼达立教育报告书等拟定过程的主导者。当沈慕羽在1965年接过教总主席后，发起争取华文为其中一项官方语文及随后爆发的争取申办独大运动，教总的领导人沈慕羽依然主导着有关运动。然而，自1973年5月，林晃昇出任董总主席，董总似乎开始主导华教运动了，当面对政府不公政策的抗争与争取，往往都给人“董总在领导”的印象，教总是否在很多方面被董总比下去了？还是开始了董总与教总一起分享领导舞台的新纪元？

潘永强形容林晃昇是“社会运动企业家”，并说当年由林晃昇领导的董总团队是“华社观念发动机”，其贡献恐怕连已故教总主席沈慕羽也望尘莫及，林晃昇时期的董总曾不断提出新构思、新策略，包括团结在朝、在野及民间力量的“三结合”概念、朝野势均力敌、互相制衡的“两线制”、发动民权运动及由数位董总人才加入在野党、壮大在野党等（“独立新闻在线”6.3.2009）。我们不否认很多时候沈慕羽的确少了潘永强形容中董总主席林晃昇那种“社会运动企业家”般的才华。<sup>7</sup>然而，我们也不能够抹杀沈慕羽在这方面的贡献，因为很多时候，他对林晃昇所提出的观念虽不甚认同，但在以大局为重下，给予这些新构思、新策略全面的支持和配合。假如当年沈慕羽不认同和支持林晃昇的建议，我们相信这些计划或构思不可能进行的。同样的，董总与教总之间也无法维持那长久紧密合作和稳定的关系。

这种由董总主导情况的发生是因为大部分华小教师在1972年接受“阿兹薪金制”而成为政府雇员后，教师们因身份的改变而变得更谨慎发言，对原有的斗争方式作出适当的调整。此外，社会的

<sup>7</sup> 潘永强在〈社运企业家林晃昇〉这篇文章里，提到林晃昇是一位带领华教运动走向高峰的“社会运动企业家”。林先生拥有企业家精神及运用在商业领域上磨练得来的组织才华与经营能力，在1970-1990年代推进了一波又一波的社运动员，成为一名创业型的社会运动家。林先生对华教运动的主要贡献有三项：运动制度化、团队经营力、理念的建构与传播，至今无人能及。见《东方日报》，2009年9月4日。

变迁、教育的普遍化、重商轻儒的思维，造成教师的地位不再像当年般受社会器重。相比之下，由中上阶级组成的董总领导层在领导华教运动时，就显得更有气派。这在华教运动领导方面起了微妙的转变，促成华教运动上的一个转折点。其实，这不意味沈慕羽领导的教总不能扮演好他的角色，在捍卫母语教育的路途上，沈慕羽领导的教总始终与董总并肩作战，并没有因为自己常常需接受董总领导人的建议或被比下去了而耿耿于怀，也没在意“主次”之分。反而，我们所看到的是1970年代以后，教总和董总的关系益形密切，两大机构并肩作战，董总关心推动的事务，教总必然参与与支持（廖文辉，2006：26-27）。这紧密的配合，显示了沈慕羽的过人之处，与董总合力筑成了一座捍卫及发展华教的堡垒。

很多时候，教总和董总都共同主导和推动华教运动。例如在独大运动开始阶段里，从概念的提出、策划到推动，并成为一项具备华裔群众基础的运动，教总与董总均扮演了主导的角色。1968年成立的筹委会，以董总主席叶鸿恩为主席，教总领导层沈慕羽、黄伟强、陆庭谕等人亦是其中主要负责人；1974年成立独大有限公司时，沈慕羽为副主席，陆庭谕为副秘书长，黄伟强为理事，独大有限公司从理事会的成员结构来看，可说教总和董总的一个结合体（廖文辉，2006：116）。在推动独中发展运动时亦如此，沈慕羽领导的教总都给予董总和各校董事部全面的支持。此外，1973年成立的董教总发展独中工委会也吸纳了教总的一些工作内容（陈亚才，1998：XIX）。

在捍卫华小不变质运动，如反对3M计划、综合学校计划、联邦直辖区教育局限制所有的学校必须以国语进行周会以及其它种种不合理的措施，沈慕羽领导的教总主导着这些抗衡运动。在1987年反对政府调派不谙华文教师运动时，沈慕羽虽已75岁高龄，还身先士卒，与董总领导人并肩领导华社反对政府调派不谙华文教师到华小担任高职。当年，因政府不愿纠正有关不合理的委任，由董教总、各华团及华籍朝野政党领导人组成的全国华团政党联合行动委员会会议决罢课，后来因内阁成立5人小组，答应年底之前解决问题，联合行动委员会领导人就决定暂缓罢课。沈慕羽当时就认为此举不当，“感觉上是被对方‘偷吃一步’，上了当”，因这将让当

局有机会拖延（廖文辉，1996：272）。但为了顾大局，为了捍卫与维护华小，沈慕羽只好异中求同，做出让步接受，大家的议决。<sup>8</sup>其实很多时候，沈慕羽在当时华教领导层面对不同意见时，亦能扮演着长者或智者的角色，说服大家接受以大局为重的意见。令人遗憾的是这长者的劝告及智者的要求（华教同道应以大局为重，别再内斗）在他退休的20余年后的今天却无法产生作用，这是否意味着沈慕羽多年来强调大家应以大局为重、寻求共识、求同存异、强调紧密合作和稳定的领导风格似乎没有给后续者带来太大的影响和启示。

诚然，沈慕羽面对有不同观点时，能自我调整立场。当年提出三结合，两线制时，虽不甚认同，但却给予董总全面配合，正如张雅山（1998年）所说：“在1982年全国大选，华教人士入党参选，董教总也被牵涉作为号召投票的宣传，当时的我和沈局绅对此不表赞同……涉及政党显然与一向坚持原则立场不同。虽然不同意直接参政，但形势所逼，不能不表态，如果他不出来支持华教人士，万一竞选失败，恐怕会招致别人责怪他不支持华教权益的斗争，深明大义的沈先生于是及时发表支持华教人士竞选，并到甲洞亲自助阵。”沈慕羽本身也曾说过，当时他不赞成“打进国阵，纠正国阵”的策略，但是他们（林晃昇和新加入董总的知识份子）已有所行动，为了表示董教总一致，所以他也不反对（《星洲日报》，21.8.1990）。同样的发生在“两线制”时，他也是不认同董教总领导人参与政党政治，因为当年参政的经验告诉了他政党政治不可靠，这也是为什么他没一起加入行动党。沈慕羽说他不认同他们的做法，而他也认为他们太低估巫统的能力了（访问沈慕羽，12.11.2003）。然而，在团队的精神号召下，他还是支持有关选择。这两项运动能成功地发起，显然与沈慕羽那愿意自我调整立场，追求稳定的作风有着一定关系，这成功地维护着董总和教总长久紧密合作的纪元。

在大是大非的华教问题上，华教运动领导者能向外展示他们

<sup>8</sup> 根据当年有参与的华教人士的透露，当时代表教总的领导层坚持罢课，而董总主席林晃昇等却主张暂缓罢课，大家坚持不下，一直到沈慕羽愿意以大局为重接受暂缓罢课的看法后，教总的领导层才不坚持了。



一致的立场。求大同，存小异，使到当年的华教运动声势响当当，令敌人不敢轻视它的影响力，而当年董教总在动员上都能够“一呼百应”，创下了空前宏观的华教抗衡运动。此外，从那时起，董总和教总开始分工作重点，例如董总负责独中，教总负责华小。这种专业化的分类负责，使华教运动不但更专业化、更有效力及持久，也减少浪费那已鄙薄不足的资源去进行重叠的工作。或许我们可以从沈慕羽曾经形容董教总为“一个（董总）是华教司令部，一个（教总）是华教的保姆”（廖文辉，1998b：70）的谈话里认知到董总和教总其实各扮演各自的角色，各尽其责及并没所谓主次之分，使到外界（尤其是非华人社会）也分不清它们其实是由两个机构组成的，而董教总也似乎代替了“华教运动”这名词。<sup>9</sup>

#### 四、向外处理华教课题时展现出“灵活变通”的应对风格<sup>10</sup>

沈慕羽在向外处理华教课题时，常展现出“灵活变通”的应对风格。在坚持原则下，他懂得应势而调整应对策略，这可由他在1987年《教总33年》“代发刊词”里了解到，他说：“在争取华教的过程中，我始终认为本标可以兼治。”<sup>11</sup>因此，在近半世纪参与的华教运动里，他不局限于某种斗争形式，常应时局改变而调整斗争策略或手段，但目标始终如一，即争取华文教育有平等的地位。普遍上，我们可发现他曾采用或支持四大类型的方式和策略：

- （一）参与执政党，以期通过内部争取华教权益；
- （二）支持华教人士参与反对党，以期改变我国政治局面来达到华教有平等地位；
- （三）联合朝野各政党和社团的力量向政府据理力争华教权益；
- （四）领导董教总抗衡政府不合理的教育政策的施行。

沈慕羽曾积极地参与政党政治，他曾是马青创办人。在1965年

<sup>9</sup> 数年前，在笔者撰写博士论文时，曾走访了多位非华裔的政团领袖和学者，他们对华教运动这名词似乎不熟悉，反而很熟悉董教总这机构，这告诉了我们董教总已垄断了华教运动这社会运动。

<sup>10</sup> “灵活”在辞典里注释为善于随机应变、不拘泥；而“变通”在辞典里注释为依据不同情况，作非原则性的变动（世界书局编委会，1989：67）。

<sup>11</sup> 当然，沈慕羽接下去还说到：“但治标不如治本，惟有治本，一切问题才能迎刃而解。”（廖文辉，1998b：67）。

7月，他以马华公会领导人的身份发动马华支持华教组织，争取华语为官方语文运动。他的建议虽得到马华公会基层的拥护和支持，却受到领导层的反对，而把他开除了党籍。<sup>12</sup>当通过执政党作内部争取“华语为官方语文”的努力遇到障碍时，沈慕羽展示了变通的作风，他即在斗争策略或手段上作出改变，他要发起召集全国华人注册团体代表大会进行全国注册社团的签名盖章，展示华社强烈的意愿。然而，在召开全国注册社团大会不被政府答应时，他又变通，准备只是以情愿方式草拟争取华文地位备忘录，然后连同全国注册社团的签名盖章，向政府请求列华文为官方语文。但这项运动也受到政府的干涉，警告社团不得违背条例，涉嫌政治活动。在无法得到执政党的认同和协助下，他再次变通应对策略，邀国会反对党领袖西尼华沙甘律师商讨有关社团盖章问题是否有触犯法律。最终，大家成功地完成了2千社团盖章任务（廖文辉，1997：106-108）。

另一方面，当争取“华语为官方语文”的目标遇到障碍时，沈慕羽也退而求次，修改原定的“目标”，改称争取华文为“辅助官方语言”，例如1965年8月5日，在与内政部长依斯迈步对话时，被告诫不应争取华语为官方语言时，他反驳说他们不过进一步要求议会增加华语，使不很熟国语的议员们，可以表达民意，这不过是要将华文列为“辅助官方语言”而已（廖文辉，1996：43）。随后与马华总会长陈修信等讨论时，亦表明说（若能）争取华文为第二语文，不然成为官方辅助语文亦可。而陈修信也说，像新加坡所采取的方式可以考虑（廖文辉，1997：99）。其实，在他担任马青教育主任草拟“争取华文地位建议书”时，也曾定下3个变通的目标：他把争取华文为官方语文之一为第一目标，亦是最高原则；倘第一目标未能达到，即争取在宪法上列华文为辅助官方语文或第二语文的地位；如果依然不成功，则在万不得已之下争取华文列为官方应用文为第三目标（廖文辉，1996：15）。他懂得应时局而调整争

---

<sup>12</sup> 后来，有建议说恢复沈慕羽的党籍，沈回应说他的条件是除非华文广泛应用实现，马华宣布支持独大，否则决不回马华（廖文辉，1996：174）。90年代，林良实当马华总会长时，曾要求他回归马华怀抱，也被他拒绝。他的同道有这样的感言，他们认为他最了不起的是头脑经常很“清醒”，能是非分明，知道什么时候应扮演怎样的角色，没有人可以误导他。

取华语地位的目标不外是在评估局势后，认为这比较可能争取到成果，这充分地展现他那高明的政治协商技巧。<sup>13</sup>

这争取权益手段的变通，显示他懂得应局势而调整应对策略。为了目标和理念，他不局限于使用某种斗争方式，从通过政党政治的途径转换为发起群众的非政府组织式的施压行动。虽然这项运动不能取得突破，然而他那种以华教为目的，政治为手段的做法，至今仍是空前的，而这种为了华教不惜牺牲了政治上的荣华富贵的立场，依然还未有超越他的后继者，例如当年他不接受马青总团长之提名，目的就在给他运用在野之力量与在朝的力量互相配合，以达到他争取华语为官方语文目标（廖文辉，1997：100）。曾当董总主席的胡万铎在“华教内讧自毁长城”文章里称赞道：“我们当然肯定很多具有政党背景的华教人士为华教出钱出力，我们对他们在维护和发展华教的道路上所付出的牺牲和作出贡献表示崇高敬意，当面临抉择时他们大都是非分明，华教为先党性为后，沈慕羽先生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东方日报》，9.8.2009）。

这项以失败告终的运动，虽然清清楚楚地告诉华教斗士通过参与政党来争取华教权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沈慕羽通过执政党作诉求，非不能成功，还成为牺牲者了。然而，华教人士似乎并没有从中吸取历史的教训。在1982年，华教运动领导者提出三结合运动，当时他不很认同，但却还要支持有关运动。这似乎与何启良（1997：27）所说的：“54岁以前的沈慕羽把政治和教育二合为一；54岁以后的沈慕羽，则把政党政治和文化教育一分为二。”似乎不尽然符合。

1982年时，华教斗士不惜一试参与政党政治的大选，采取有关策略，主要原因是出自当时的环境使到他们必须作这般尝试。例如当年在争取3M制运动里，董教总成功地与华裔朝野三大政党发表联合声明，也促使董教总领导人有了“三结合”的概念；高等法庭在1981年11月7日判决政府在拒绝独立大学设立里并没违宪，

<sup>13</sup> 1976年10月8日，沈慕羽在东甲的集会里曾谈到：“那时巫统的极端派，势力不大，如果我们坚强，不难达致，可惜当时的马华向政府屈服以致功败垂成。”（廖文辉，1998b：253）。

这使到华教运动领导者了解到他们向来认为联邦宪法第152条文是争取华文教育的根据是不受保障的，必须另寻出路（《星洲日报》，2.2.1990）；此外，华裔政党向来无法有效地传达华社意愿也是酿成他们想派代表打入国阵的念头。这种种的因素和局势的发展，促使了本来不认同此建议的沈慕羽，在考虑各实际情况及尊重民主规则下，即加入大家的阵容，一起领导有关运动，期望多年来仍旧无法得到政府认同的母语教育斗争能有所突破，解决华教困境及团结四分五裂的华社。

另一方面，1990年，当华教领袖提议华教人士以个别身份参与反对党，促成两线制，沈慕羽也不认同，但因为当时的局势非常有利有关促成两线制的条件，例如茅草行动逮捕了许多华社领袖，使到华社一般上非常不满执政党；巫统的分裂造成46精神党联合各反对党给国阵强力的挑战等，都可能改变马来西亚的政治格局，给华教带来希望。这些因素都促成务实的沈慕羽不得不重新考虑他那华教运动应超越政党的原则，而选择与被逼上梁山的华教斗士共进退（雪兰莪中华大会堂，1990：288）。

虽然1982年及1990年的华教人士是以个别的身份参加大选，但还是难以划清华教人士介入政党政治的说法。沈慕羽从不赞成到认同和支持有关行动，主要出自他认同当时的局势的确有利。然而，我们也不可忽视这与他那常强调求同存异有关。这样的性格和立场，使到他在其他同道都赞同后，即使持不同的看法，也往往会支持有关行动。其实，沈慕羽在华教课题上还是秉持华教运动虽应超越政党，却不超越政治的原则，例如当年行动党来隆设分部，要住租教总大厦，教总领导层给予拒绝（廖文辉，1996：43）。

另一方面，沈慕羽从不拒绝联合其他社团和政党一起参与争取华教权益，并向来主张内部争取，外头使压的方式，例如1982年3M课题，他与在朝的马华公会、民政党及在野的行动党的领袖举行会谈及发表联合声明，一起要求政府重视华社的要求；1987年，华小高职事件更彰显了他这种领导的风格，他们成功地在天后宫召开了联合华裔朝野各政党和华团的抗议大会，并促使政府收回有关通令。这种超越政党，不超越政治也成为后来领导者拥护的模式，例如现任董总主席叶新田亦指出华教工作虽包括各不同党派背景的人

士，但大家不能将他们党派的政治议程带进华教组织内。<sup>14</sup>

在无法获得（执）政党的支持时，沈慕羽会改变应对策略，他会加强在外施压的方法。例如60年代，领导独大运动时，沈慕羽与马华的领导人陈修信持有对立的立场，便领导董教总与政府周旋；70年代，当政府修改教育法令时，沈慕羽领导的华教运动也与李三春领导的马华对此法令的要求有着明显的差异，而引起冲突。沈慕羽在与马华领导层不同理念和立场下，便发动群众运动（华人社团）向政府施压。这种遇到挫折时，懂得很快地调整并重新出发的做法，虽然不易带来显著的成效，但却能令政府不敢进一步采取侵蚀华教的行动，毕竟董教总在外头的抗议是获得全体华人社会的支持。

总的来说，沈慕羽领导华教运动时，对外采取灵活变通的应对风格，但必须认同的是他始终坚持维护母语教育的立场和目标。这种风格使到那个时期的华教运动采用了多种方式或手段去应对，从60年代通过参与政党政治达到华教目标及80年代派华教人士参与朝野政党的努力；60年代后期，独大运动时联合华团与各在野政党向政府施压争取创立独大及随后又通过司法去申辩，及80年代抗衡政府不合理的教育政策等例子都展示出他那因客观环境变迁而作出不同的应对方法。然而，这种形式的领导风格是否带给华教运动很大的影响呢？

这种应势而调整应对策略的领导风格，使到当时的华教运动蓬勃发展。很多时候，董教总采取了主动的方式去争取华教的权益，例如争取华文为官方语文运动、争取申办独大事件、参与政党政治的三结合和两线制等，就显示沈慕羽领导之下的华教运动充满了活力、积极和主动地向政府争取华教应有的权益。此外，在应对不合理政策时，如3M和华小高职事件时，沈慕羽等华教运动领导人却能成功地团结华人朝野政党和华团的力量，发起声势浩大的社会

<sup>14</sup> 叶新田说：“华教运动是一个群众工作，董总的群众包括来自不同党派背景的人士，也包括不属于任何党派的人士。这个客观现实不是问题。关键是，任何参与华教工作的人士绝对不能将他们党派的政治议程带进华教组织内。换句话说，他们必须是以华教工作者的身份，而不是以任何党派成员的身份来参与华教工作。唯有这样，才能保持和巩固华教队伍的团结和力量。”见《今日大马》，2009年6月7日。

运动，使到政府肯首作出修订有关政策。这不但展现了华人对华校和华文教育的坚持，也巩固及提高了董教总在华教运动里的领导地位，不管是政府或朝野政党都得认同董教总这非政府机构在维护华文教育里所扮演的角色份量。

沈慕羽这种灵活变通的领导风格是否被沿用下去？及它对之后华教运动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听到一些学者批评说，教总当下最严重的问题是迷失了方向；除了回应突发事件，教总似乎已很久没有提出总体方向？而教总经常向政府提出要求合理的教育政策、师资培训、学生培训等，也只因它华教运动组织而必须这样做，是不是太例常了呢？陈亚才说今天教总好像无法具体告诉我们其“核心功能”在哪里？（“独立新闻在线”，12.10.2006）。这比起沈慕羽当年争取华语为官方语文运动时那透彻华教困境，有远见、大目标、大方向及解决华教的治本之道的做法格外显得现今领导层已经采用不同的风格来领导华教运动。<sup>15</sup>

何启良（1997：42）说华教运动在90年代初之所以开始分化、停滞，与沈慕羽退出华教运动的领导中心似乎不无关系。的确，沈慕羽退休后的华教运动给人少了些活力和激情，然而我们也需了解这与客观环境，即国家教育政策的施行有着密切的关系。半个世纪来，政府不断地推行各种设施来达致这单元主义的教育目标是促成华教运动能持续及蓬勃发展的原因。这社会运动由50年代的萌芽期进入60年代茁壮期，然后慢慢发展成70、80年代的蓬勃期，这起因于这时期新经济政策的实行，使到马来民族主义者更迫切地要加速推动和实现单一民族的国家议程，这无形中帮助董教总凝结华社的力量去抗衡有关不利华文教育发展的政策。然而，自1990年代开始世界大环境改变，因应全球化的降临，使到政府进行选择性的“小开放”，这使到之前冲锋的“马来民族主义”分子转型隐身，不再摆阵架，亮明抢和呐喊不断，而政府也调整了某些教育政策及在实行教育政策（如宏愿学校，以英语教数理政策等）时，对华校采取

<sup>15</sup> 1976年10月8日，沈慕羽在东甲的集会里谈到：“我为什么要争取华文为官方语文呢？因为语文地位如果能够争到，则华人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而获得平等地位。”（廖文辉，1998b：253）他也曾说：“根本解决华教危机之方，唯有争取华文为官方语文之一途（廖文辉，1997：97）。”

软着陆的方式。这造成华教运动者也只能见招拆招，零星地应对，华文教育似乎稍有喘息空间，但因外在压力得到缓解，也造成无法掀起像沈慕羽年代般，那轰轰烈烈的华教抗衡运动以及能与政府之间产生“有攻有守”，甚至是“以攻为守”的互动关系。

此外，我们也发现近年来的华教运动似乎也比较不能得到群众的热烈响应，这可能是因为现今的华教运动需面对更多元化的支持者及为更多类型的群众服务，而“中国崛起”、“中文价值提升”，虽解除了中文在马来西亚被全面消灭的危险，但也降低了华社对华文教育的危机感。另一方面，全球化使英文更受落，这也使到华教运动不局限于传统的国语单元教育的挑战了，再加上社会功利主义盛行，使到理想主义被淡化了，以往年代那种华教激情也逐渐地消退。这种种无法避免的客观因素，促使了现今华教运动领导层不得不考虑调整传统式的向外“抗衡”手段，并拟出较有效的应对方式，而教总也比较注重于“启蒙”的工作。然而，这样的做法似乎也是延续沈慕羽那“灵活变通”应对的领导路线。

当年，沈慕羽与他的班子发现教总的斗争或抗衡方面无法取突破或陷入瓶颈时刻，便建议努力提升自己，应在具备了足够条件，配上时机有利我方时，才有机会马到成功。因此，教总自上世纪80、90年代起，就开始着手提升自我条件，实行专业化收集教育数据和提升华校的教育素质为其大方向。这正如姚丽芳所言：“现今教总活动比较集中于亲子教育、师资培训等。反之，在对外向政府争取的活动反而少了。然而，华社应客观评估这个局面，因为当教育素质不断滑落之际，除了‘对外的抗争’，教育的实质问题，包括教师的素质、家长对教育的认知等问题，绝不容轻视与忽略。”（“独立新闻在线”，14.8.2006）。这种自我提升的努力确实是由当年沈慕羽和他的班子带头策划而打下的基础。当然，当董教总本身组织越来越庞大时，它难免会因组织的臃肿和制度的僵化，让华教运动变得不能像沈慕羽时代般的灵活和有动力了。<sup>16</sup>这也是为什

<sup>16</sup> 傅向红说华教内部最大的问题是组织僵化和去政治化，华教诞生在整个华社政治动员和政治反叛的年代，在马哈迪打压的1980年代是华教最活跃的时候，但它走到今天却彻底地去政治化。详见蔡宜伦：〈华教运动无力回应新政治格局，评论人冀董总主动改革出大〉，载“独立新闻在线”网站，2008年8月20日，<http://www.merdeka.com/pnews/7471.html>。

么有些评论者会感叹说华教运动有日渐乏力的现象，缺乏带动性、激励性和筹划华教前景的想象力。<sup>17</sup>

其实，自沈慕羽时代以来，教总及董总的核心力量是仍以“维护华小，发展独中，争取高等教育”为最高目标，对于政府政策的不公平进行反抗，并自力更生，提升自己，追求更扩的发展空间，而这目标从未改变过，只是因不同的领导人有着不同的领导路线和风格，并因实际环境的改变而在策略上作出变动。至于这样的变动是否会给予华教运动的发展带来利或弊，还有待历史去定论。

## 五、充分展现“魅力型”和“据理力争”的领导风格

沈慕羽被公认为一位“魅力型”的社会领袖，例如在独大运动里，沈慕羽和陆庭谕充分地发挥了领袖的魅力，他们到处演讲募捐，获得群众们大力支持。当沈慕羽到东甲募捐时，数英里外已经160辆电单车、200人铜乐队、旗队及各社团队伍欢迎，市民夹道欢呼，有如欢迎国家领袖（廖文辉，1997：114-115）。1973年，沈慕羽受邀在怡保为全霹雳华团代表大会致词，在会上他一番精辟的言论，打动了大家的心，即打响了独中复兴运动的第一炮，各方纷纷响应，独中就这样起死回生，渐入佳境。<sup>18</sup>即使是退休后，他在重要集会上，总会发表一段慷慨激昂的精神训话，鼓舞华社士气，为全场压轴所在，博得如雷掌声及喝彩（廖文辉，2006：198）。

其实，沈慕羽这领袖的魅力出自于他领导华教运动时，敢于怒吼、据理力争、坚持气节、择善固执、立场坚定等的作风，例如当年沈慕羽领导华社争取华语为其中一种官方语言时，副首相拉萨曾

<sup>17</sup> 黄进发感叹在全球化的时代，新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下，华教的核心价值和核心能力到底应是什么？他还补充说：“今年3月8日后族群不平等逐步消减，巫统倒台有期，一方面让华教更难找到‘马来民族主义’这个传统敌人，一方面（国内）回教化与全球化的双重冲击则可能加强国人接受偏重英文的教育系统趋同，直接威胁了华教运动作为华裔民族主义工具的价值。”（黄进发，2008年12月16日及2008年12月19日）。

<sup>18</sup> 受英文教育的骆宝胜律师即席宣布他将与此相关位专业人士发起为独中义行筹款10万元，并要把子女送入华校，胡万铎不让贤，也宣布捐助5万元，陈孟利则捐献2万元（廖文辉，1997：130-131）。



召见他，当时的他充分地展示那据理力争的作风。当副首相警告他说政府已给华人公民权，华人领袖也答应马来文为国语，所以沈慕羽不应出尔反尔；他也警告沈不应召开全马社团争取华文大会以妨发生变乱。沈慕羽立即要求副首相拿出当初华人领袖以公民权换取接受马来语为唯一官方语言的协议，并辩驳说华人领袖也没有以这件事征求他们（华社）的意见，所以华社不会承认它，他也认为没有这回事。沈慕羽的勇气和据理力争的作风可从负责翻译的马华领袖曾永森的一席话里印证，曾永森谓：“沈先生敢言而且中肯，昨日一些华人领袖被召见时，唯唯诺诺，默不作声。”之后，联邦警察总部政治主任阿都拉曼也因此事盘问沈慕羽，并说他怀疑沈被共产党利用了，沈慕羽反驳说：“那么政府就接纳华人要求为官方语文，共党就无借口而煽动情绪了。”（廖文辉，1997：98-99）。

1972年12月16日，沈慕羽与副首相依希迈对话讨论华人招牌华巫文字事时，他以华语回答，建议政府应先起领导作用，用两种文字书写，所有政府机关的名称、表格、地名、通告等，应附加华文来反驳依希迈建议华人招牌必须华巫文。80年代3M计划，企图使华小变质，他在与教育部长阿都拉对话时，也始终以华语发言，以示民族尊严（廖文辉1997：40-41）。此外，在茅草行动时被扑后，沈慕羽在60天日夜拷问，有如刑事犯，他义不帝泰、不投降、不屈服，理直气壮的辩护词，聆审官也为之心折（廖文辉，1997：79）。

沈慕羽常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何启良，1997：43）来作为争取的凭据，并力求中庸。<sup>19</sup>他很多时候对政府充满着期望，只有在向政府内部据理力争遇到强大的阻力时，才选择从外施压，即从群众寻找力量。然而，因为他那魅力型的形象和敢于据理力争领导风格，使到华社对他领导充满信心，给予热烈的响应，这无形中帮助了沈慕羽组织群众和发动舆论，并成功地形成一波接一波的抗争运动。

<sup>19</sup> 这种中庸的作风可由他的言论甚少被反对党人物利用或认同里了解到。而在1970年被政府控告他触犯了煽动法令，当年审案的阿兹斯法官聆听了沈慕羽的陈词后曾说：“沈先生的见解相当开朗，并不极端。”1987年4月1日，沈先生在扣留营受讯，他引经据典，条剖缕析事件来龙去脉，历3句钟，法官边听边记录，没有驳斥（廖文辉，1998b：XIV）。

1988年，沈慕羽辞教总主席时，建议提陆庭谕出任主席。在他的辞教总主席函里提到陆庭谕爱护华教之意志，坚贞不拔，敢怒敢言，今后由其领导教总，定不负众望也（廖文辉，1996：284）。明显的，沈慕羽是希望他的继承人能有着坚贞不拔、敢怒敢言、据理力争的形象和领导风格。然而，这种领导风格似乎不被后来者延续或带给同僚太大的影响，这可从教总的领导人在沈慕羽退休时，选择了领导形象比较不特出和少人认识的王超群为教总主席时认知到。当有学者批评说王超群领导的教总，在华教课题的立场、争取华教权益的运动中似乎“有欠力度”，若与林连玉、沈慕羽等前任主席对比，更不在话下。教总主席王超群被问到时，亦承认这一点，并强调他的领导方式是不喜欢突出个人作风；姚丽芳则以“集体领导来把任务完成”为现今教总的领导模式来回应此问题（“独立新闻在线”，14.8.2006）。

诚然，历史的变迁、社会环境的转移，国阵政府采取较开放的政策后，导致90年代至今日的华教运动斗争似乎有衰退的现象。如果以组织、斗争格局和领导人魄力作比较，似乎无法媲美当年的董教总，例如当年董教总虽作为文教组织，对政治却抱持明确态度，参与“三结合”和“两线制”的主张里看出来，他们领导华教人士直接参与全国大选，企图以政治途径改变华教运动的命运。而现今，当马来语言份子提出英语教数理大游行时，董教总的领导人却裹足不前，虽然董教总领导人提出了许多不参与的理<sup>20</sup>，但无可否认的是这样的选择难免会给华社认为他们缺乏了当年沈慕羽和林晃昇等果敢做法。

---

<sup>20</sup> 董总在“为什么我们不参与3月7日的大集会”特刊里，谈到他们不参与有关大集会主要原因是因为“废除英语教数理联盟”呈交备忘录给最高元首时，没有提出各源流学校以母语教授数理的要求，并以英语教数理违反《联邦宪法》第152（1）及（6）条，关于马来语为国语以及官方活动必须以国语进行的规定，另一提出的原因是英语教数理违反《1996年教育法令》第17（1）条，关于国语必须成为所有教育机构的主要教学媒介的规定。换言之，该备忘录没有明确地对各源流学校和母语教育的地位和贡献作出肯定（董总，2009）。

## 六、沈慕羽领导风格的局限

沈慕羽的领导风格有它的局限和不足之处。其中最显著的局限是在他领导之下，教总似乎未能有效地提升或扩大它的基层组织。虽然这与华小教师纳入公务员制及客观环境不利于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关系，但沈慕羽也不曾在这方面有过比较全面的计划去推扩或提升它地方上的组织，即使他非常了解年轻教师加入教总的重要性，他曾告诉过笔者说他最难过的是现今年轻的华校教师越来越缺乏民族意识，教总不易获得年轻教师的参与（访问沈慕羽，12.11.2003）。

在沈慕羽领导教总那28年里，教总属会，即各地区的华校教师公会的数量没有显著的增加，只是由原本的30个增加了4个分会（1968年成立的吉兰丹华校教师公会；1974年成立的文冬华校教师公会；1980年成立的金马仑华校教师公会及1984年成立的而连突华校教师公会）；而州华校教师会联合会则增加了2个，即1969年成立的柔佛州华校教师公会联合会和1979年成立的彭亨州华校教师公会联合会，沈慕羽也未把教总的属会扩展到东马。<sup>21</sup>当属会组织上并没有积极的扩充，难免会影响招纳新会员的功效。我们可从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在1984年时撰写的一段文章里了解到它们在招收新会员时的困境：

一九六一年教育法令实施之后，华文教育厄运开始，华校学生减少，教师被裁。于是本会会员减退，二十年来，会员仅维持八百人左右。但近年来，华校学生饱满，吉隆坡华校中小学教师人数已超过一千五百人，雪州则有两千多人，可见本会会员人数未符理想，有待努力，重振会风。

（陆庭谕，2002：viii）

<sup>21</sup> 在沈慕羽退休后，东马开始成立华校教师公会，即1997年成立晋汉省华小教师会；1999年斯里阿曼暨木中省华校；2001年砂拉越美里华校教师公会；2005年沙巴华校教师总会；2002年成立砂拉越州华小教师会联合会。请参阅：教总教育咨询网[http://web.jiaozong.org.my/index2.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303&pop=1&page=0&Itemid=1](http://web.jiaozong.org.my/index2.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303&pop=1&page=0&Itemid=1)。

相比之下，现今华小及国中华裔教师几乎全都加入能为他们向政府争取更好福利的全国教师专业职工会，华小校长又活跃于华小校长理事会，而改制国中（前华文中学）校长则加入国民型华文中学校长理事会。在更多选择之下，沈慕羽领导的教总还是不曾调整过策略，以更有效的方法去吸引年轻教师的加入。更令我们吃惊的是在近半世纪的岁月里，教总只是换了两位领导人，即沈慕羽，由1966年至1994年5月（共28年）和王超群，由1994年至今2009年（15年）领导着教总，<sup>22</sup>这般长期在位是否会造成他们趋向“保守”作风，不易有创新的点子，造成组织缺乏活力？这种现象的发生是否意味着教总在结构或组织上有它不足之处，因为沈慕羽曾多次呈辞，但还是应局势需要被同僚们挽留下来。

诚然，这也与沈慕羽个人领袖魅力有着密切关系，这正如廖文辉所形容的一般，廖文辉（2006：268）说：“早期的教总可说是由几个领导人物来顶半边天，他们以个人领袖魅力，透过组织的名义来抻合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他们的光芒甚至有时掩盖了组织，知有其人，而不知有组织的存在。”这种魅力型的领导风格在很多时候会造成有关组织不易找到接班人来代替有关领袖。教总就面对这问题，沈慕羽的领袖魅力及长期在华教运动里所散发的光芒掩盖了他身旁的其他领袖所扮演的角色，当然陆庭谕是例外。然而，因在位太久而趋向保守的沈慕羽看来并不察觉他的魅力和光芒在退位后会使得教总不易找到接班人，所以在位时，他没有主动和积极地栽培接班人，即使是当年的庄迪君也是林晃昇发掘的。其实，从70年代开始，沈慕羽在教总的领导风格有趋向保守的现象，他没有像林晃昇般广招专才加入董总，也没有像林晃昇般不断有创新的点子。如果不是庄迪君的加入，我们无法想象渐呈暮气的教总会原地踏步多久。

或者我们应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沈慕羽或许老早已认定陆庭谕为他的接班人。然而，无奈陆庭谕本身个性上的特点及处理问题时过于刚烈，再加上90年代起，华教运动面对较松绑的施政，使到当

<sup>22</sup> 相比之下，董总主席已换了7位主席，即杜志昌、叶鸿恩、杨诚财、林晃昇、胡万铎、郭全强及叶新田。

时的教总同僚们了解到陆庭谕还是比较适合继续扮演原有华教急先锋的角色。当然，我们也得了解像教总这般不受政府欢迎的非政府组织，通常不会有很多人对其最高领导位子有浓厚的兴趣，而它的成员又只限于教师。

沈慕羽那民主、合作和灵活变通型的领导风格也有它的弱点，因为太“兼顾”和配合同僚及董总领导人的观点，使到沈慕羽本身原有的立场变得不够明确或被牺牲了。在商讨决定时，他经常以多数者的意见为依归，当双方僵持不下时，他则会以长者的身份为大家打圆场，例如1982年和1990年，华教人士参与全国大选的建议明显地与他经常强调董教总应“超越政党政治”的立场有矛盾之处，而当时他也对林晃昇所提出的观念不甚认同，可是却没坚决去否定它，反而给予支持，结果使到董教总失去了原有超然的地位，得罪了草野政党。事实上，沈慕羽应以他当年参与政党政治“失败”的经验来告诫林晃昇，这暴露了他缺乏一位领袖所应持有的立场和坚持。

此外，沈慕羽这种过于“兼顾”和配合的领导风格似乎也造成教总在华教运动里的地位变得附属性了。<sup>23</sup>在由董总和教总共组的委员会时，我们会发现该委员会的主席会通常由董总主席担任，教总主席则担任署理或副主席而已。同样的，教总其他代表也经常担任副秘书长、副主任等，例如在独大理事会、董教总全国发展华文独中工委、董教总教育中心，教总主席都坐第二把交椅。这样的配合看来已成为一种不成条文的惯例，造成现今教总领导在许多课题上的言论也变得附属性了。

沈慕羽向外争取权益时，通常显得很强悍，实际上如果与发动群众运动做比较，他还是比较认同与政府协商及作内部争取的管道。这可由他早年参政，响应陈修信的华人团结运动，支持华教人

<sup>23</sup> 另一方面，沈慕羽一生中曾“兼顾”多个领域的服务和奋斗，这包括了在政治上当过马青副团长；文化上从事过报业、设立图书馆、改革华语、重组孔教会等；社会事业上如加入晨钟励志社、成立马六甲华校教师职工会，以及作育英才和捍卫华教的教育领域。这般“兼顾”多个领域，并没有给他带来冲突或混淆，反而更显示他贯彻了“人生应以服务为目的”的大志。

士打入国阵作内部争取及经常选择与政府对话来寻求解决华教课题的行动里认识到。沈慕羽很多时候对政府领导人还是充满着期望，并希望通过内部争取能获得政府的认同。我们可从他以下的演讲词里了解到，他在纳吉初任教育部长时说：

纳吉当年任巫青团长时的偏激言论，至今我心仍有余悸。不过士别三日，刮目相看，他悟既往的错误，改弦易辙，认清当前的局势，不止一次地对记者表露以开明的态度解决华校的困境。我不禁举双手表示欢迎，但愿他实践诺言，是华校从他的手中化祛困厄，“接纳吉庆”。

（廖文辉，1998b：78）

前首相阿都拉刚上任首相时，沈慕羽也曾在笔者面前称赞阿都拉中庸和开明，他对阿都拉的政府充满信心，相信华教前景会更乐观（访问沈慕羽，12.11.2003）。由此，我们似乎难以捉摸沈慕羽的思维和立场，一方面他大力抨击政府对华教的打压，另一方面他又说对新首相，新教育部长充满信心，期望新的国家领导人会给以华教更大的空间，这也许就是沈慕羽值得我们再做深入探讨之处。

## 七、结语

虽然我们不能否定沈慕羽的领导风格有它的局限和不足。然而，沈慕羽作为华教运动的典范，以他的思想理念、个人修养和斗争立场形成的领导风格对华教运动起了显著的影响。这领导风格除了深受他那忧国忧民的父亲影响，更受那传统的儒家教育的熏陶，即以争取平等的民族教育文化为己任和终身目标。首先，沈慕羽领导教总或华教运动内部时，强调民主和求同存异，并以中庸、厚道、包容的作风去容纳各方豪杰加入华教运动大家庭。这促成当时有了足够的人力资源去壮大华教运动，从而把教总的功能调整、提升及扩大它扮演的角色。由早期只强调“抗衡”的功能提升到进行促使“抗衡”功能更有效的幕后工作和开始注重提升华文教育素质的“启蒙”工作。诚然，当现今的董教总也陷入“瓶颈”状况时，就应更努力地召唤新血参与，使华教运动队伍年轻化，以应对当下

环境的改变，并应以民主和包容的风格去容纳各方人才、推动华教组织。

沈慕羽常以大局（斗争目标）为重，给予董总全面的配合，这开始了董教总常以一体向外宣传的紧密合作年代。因良好的分配和策划，如董总注重独中教育和教总注重华小部分，使到他们所扮演的角色更专业化了。此外，在董总主席林晃昇和教总主席沈慕羽的领导和配合下，华教运动在那个年代充满了活力和生气，创下我国空前蓬勃的社会（华教）运动历史。这种现象在沈慕羽和林晃昇引退后，即有萎缩现象，这固然与大环境的改变和政府施政因素有着一定的关系和影响，但与沈和林的领导风格与退位亦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沈慕羽在对外处理华教课题时，常展示出灵活变通及懂得应势而调整策略的应对风格，但维护华教的原则却坚守着。他由初期的通过参加政党政治争取华教权益到坚持董教总应超越政党，不超越政治的做法，但却应局势的需要而支持华教精英参与执政党政治作内部争取及反对党以求改变政治格局的尝试。他也尝试过联合朝野政党和华团领袖向政府申辩确保华小不变质的行动，及单独领导董教总与政府周旋。这使到华教运动的手段更多元化，经常采起积极和主动的策略去争取有利华教发展的平台。此外，沈慕羽等坚持以“对事不对人”的方式与政党伙伴和社团合作，造成当时的政党无法收编或影响董教总领导人的立场。反之，沈慕羽等华教领导人的立场对当年大选时华人选票的倾向有着很大的影响。

沈慕羽在争取华文教育的平等地位和争取政府政党的认同的大前提下，还是给教总树立了一个较持平的形象，他追求与当局谈判，但从不作违心的妥协；他慷慨激昂，但并不极端；他要求对话，但立场坚定（何启良，1997：41-42）。这敢于据理力争和“魅力型”的领导风格，使到当年的华教运动正气盎然，容易号召群众及获得华社的信任和支持，并令对手不得不佩服他的论述和坚持。他退休后，华教运动似乎也少了这种典范，不禁地使我们怀念起沈慕羽那个年代的华教运动。

诚然，沈慕羽这种对内和对外展现出不同的风格其实并没有它

矛盾之处。他多元化了华教运动的斗争范围，他不只是局限于争取华校或华教权益。反之，包括了争取华人的基本权益。<sup>24</sup>例如他参与了由马华总会长陈修信鼓吹的华人大团结运动，1983年3月27日促成了全国华团文化大会的举行，并通过了反映全国华裔同胞心声的国家文化备忘录，争取马华文化在国家文化范畴中的合理地位。随后他参与由教总、董总和雪华堂主导的15华团主催了华人文化节，设立华社资料研究中心，《全国华团联合宣言》和民权委员会等。这象征着沈慕羽领导的教总斗争范围已涵盖了争取华族在各方面的权益。当时的教总还参与保三保山运动，推动改革华语，简化汉字的工作等宣扬中华文化和华文教育改革的工作。这等等对华文教育、华族文化及国家政治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最后，“华教尚未平等，同道乃须努力”，这是沈慕羽留下来的名言，也是他对华教领导者及工作者的期许。而他这句话及领导风格在今天正面临转型的华教运动显得更有意义。虽然局势和环境已不同了，但我们始终认为沈慕羽领导了28年的华教运动，在许多方面是值得我们模仿和借镜的。

## 参考资料

### 书籍、文献

陈亚才：〈路遥知马力——《沈慕羽言论集》序〉，载《沈慕羽资料汇编》编辑委员会编《沈慕羽言论集》下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1998年。

何启良：〈从沈慕羽荣休谈起〉，载李亚邀编著《晚节飘香续编》，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2006年。

<sup>24</sup> 其实，沈慕羽延续了林连玉领导教总的精神，独立年代，教总的中心工作就是推动华社争取公民权及要求政府承认华文为官方语文，而沈慕羽也是其中一位华社争取公民权的主要领导人，他利用宣传车在马六甲市内巡回演讲，沿户征求，也利用太平局绅封衔，亲手签名批准不少于5千张求助于他的华人子弟公民权证书（廖文辉2006：127）。此外，沈慕羽也在1964年参与教总议决发动全国华校师生拥护东姑领导，支持政府对抗印尼侵略我国运动。



- 何启良：〈大马华人历史上的沈慕羽——《沈慕羽事迹系年》序〉，载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1997年。
- 华社资料研究中心编：《论华团人士参政》，雪兰莪：雪兰莪中华大会堂，1990年。
- 柯嘉逊著，杨培根、谢丽玲译：《新纪元学院事件：董教总的变质》，吉隆坡：东方企业有限公司，2009年。
- 李亚遨编著：《晚节飘香续编》，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2006年。
- 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1997年。
- 廖文辉：《华校教总及其人物（1951-2005）》，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2006年。
- 林水椽：〈《沈慕羽事迹系年》序〉，载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1997年。
- 陆庭谕编著：《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庆祝成立50周年纪念特刊》，吉隆坡：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2002年。
- 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出版组编：《董总卅年》，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1987年。
- 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出版组编：《为什么我们不参与3月7日的大集会》，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2009年。
- 《沈慕羽资料汇编》编辑委员会：《沈慕羽言论集》上、下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1998年。
- 《沈慕羽资料汇编》编辑委员会：《石在火不灭》，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1996年。
- 世界书局编委会：《最新汉语大词典》，吉隆坡：世界书局（马）有限公司，1989年。
- 魏维贤：〈尊敬的沈慕羽先生——《沈慕羽言论集》序〉，载《沈慕羽资料汇编》编辑委员会编《沈慕羽言论集》下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1998年。

姚丽芳：〈路遥看沈老〉，载李亚遨编著《晚节飘香续编》，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2006年。

张雅山：〈沈慕羽感人事迹〉，载李亚遨编著《晚节飘香续编》，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2006年。

郑东阳：〈华文教育的“苦行僧”沈慕羽〉，载《凤凰周刊》2009年第7期。

郑良树：〈沈慕羽与华文官化运动〉，载李亚遨编著《晚节飘香续编》，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2006年。

庄华兴：〈马来西亚华人的内族群关系：一个殖民主义——现代性视角〉，载郑文泉、傅向红合编《粘合与张力：当代马来西亚华人族群内关系》，加影：新纪元学院马来西亚族群研究中心，2009年。

## 网络媒体、报章

《东方日报》，2009年9月4日。

《东方日报》，2009年8月9日。

黄进发：〈华教运动的阶级与世代分裂——林连玉忌辰省思华教运动（一）〉，载“独立新闻在线”网站，2008年12月16日，<http://www.merdeka.com/news.php?n=8363>。

黄进发：〈巫统霸权造就华教金字招牌——林连玉忌辰省思华教运动（二）〉，载“独立新闻在线”网站，2008年12月17日，<http://www.merdeka.com/news.php?n=8371>。

黄进发：〈传统敌人消失，华教茫然内斗——林连玉忌辰省思华教运动（三）〉，载“独立新闻在线”网站，2008年12月18日，<http://www.merdeka.com/news/n/8381.html>。

黄进发：〈非民主化华教无以转型中兴——林连玉忌辰省思华教运动（四）〉，载“独立新闻在线”网站，2008年12月19日，<http://www.merdeka.com/news/n/8388.html>。

黄义杰：〈林晃升不让他们渡黄河！潘永强说董总如今娘娘腔〉，载“独立新闻在线”网站，2009年3月6日，<http://www.merdeka.com/news/n/9002.html>。

林宏祥：〈不留姚丽芳讲不出所以然王超群领导教总何去何从？〉，载“独立新闻在线”网站，2006年10月12日，<http://www.merdeka.com/news/n/2737.html>。

林宏祥：〈陆庭谕引退缺形象鲜明领导人王超群：我的领导非突出个人〉，载“独立新闻在线”网站，2006年8月14日，<http://www.merdeka.com/news/n/2325.html>。

《星洲日报》，1990年2月2日。

〈叶新田四点声明反驳柯嘉逊展示潘永忠掌新院“成绩单”〉，载“当今大马”网站，2009年6月27日，<http://www.malaysiakini.com/news/107377>。

〈叶新田：造谣董总被收编一小撮人患“政治幼稚病”〉，载“当今大马”网站，2009年6月7日，<http://www.malaysiakini.com/news/106003>。

曾薛霏：〈董总常委与行政部伙伴相待邝其芳：常委有最终决策权〉，载“独立新闻在线”网站，2007年11月5日，<http://www.merdeka.com/news/n/5276.html>。



---

# 独立建国后的华教问题及其本质

沈慕羽与语文运动案例

■ 庄华兴

---

在马来亚华人语境中，媒介语即讯息。如果没有这种独特的媒介语，这个社群的生存能力将受到严重的打击。

——辛西娅H.恩露

## 一、前言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并非本邦社会环境中自然演化的产物，它更多是社会与政治变迁的结果。它因着特殊的历史条件而诞生，在不同历史时期又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而调整自我存在的方式。从侨教到华教，虽见证了身份属性的蜕变，但它始终被排除在国家教育主流之外，甚至被视为这个新兴国家建设之逆流，欲除之而后快。为了生存，华教不得不奋起抗争。这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不仅凝聚了华社的物质资源，更重要的是累计并创造了华社的思想与精神资源。“对付破坏，最好的答复就是建设”（林连玉语）和“战斗一世，服务一生”（沈慕羽语）几乎已成为大马华社的图腾。

可以这么说，华教领导者的理念与因应时局的策略是维护华教完整性的关键。回首过去，1950年至1964年，基本上是林连玉统领华教的时期，在此国家初兴时期，华教运动面对殖民者的族群分化

和怀柔政策<sup>1</sup>，林连玉不得不采取中间偏左的路线，在殖民者和马来统治精英之间斡旋。1964年以后，沈慕羽看似继承林连玉的领导方针，但因客观环境和历史条件的改变，他后来面对的是一个迥然不同的民族国家建设问题。在此阶段，以巫统为主的马来统治阶层继承了前殖民宗主之意识形态与统治手腕，以建立马来民族国家为目标，积极落实教育与语文统一霸业，1961年教育法令和1967年国语法令，即为此时期之产物。1969年以后，因种族冲突和巫统内部权争，导致国内政治板块的位移，华教面对另一番更严峻的挑战，即马来民族国家的变调，也导致华教运动的政治性格更形彰显。

本文仅仅探讨60年代沈慕羽领导语文运动时期，同时尝试关照沈慕羽对问题本质的掌握及其因应策略。本文以60年代的语文运动为中心，原因有二：其一是因为这事件是沈慕羽全身投入领导华教运动的起点，也最能彰显沈氏对语文抗争本质的认识水平；其二，语文运动是本邦华社在宪法范畴内进行的合法抗争（相对于1948年以后马共在宪制范畴外的华基区装斗争）的最重大事件，也是社会动员最庞大的抗争。

## 二、华—马民族主义的演变与颀颀

兴办华文教育原本有它非常单纯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满足族群内部需要而提出的母语教育诉求，是基本人权诉求之一。在开始阶段，它基本上是内延性的，出发点仅仅为保存族群语言，而语言被视为重要的文化符码，并成为族群身份的象征。内延性在外力的挤压下，便轻易地形成忧患与危机意识，对外往往表露为某种意义的保守性，甚至唯我优越的性格，也因此使它备尝苦楚与颠蹶。

以上描述或多或少出现在林连玉与沈慕羽领导教总的时代。但值得注意的是，华教运动的本质主义类型基本上是被赋予的

<sup>1</sup> 1951年，配合马来亚联合邦宪制的实施，英殖民政府推出巴恩氏巫文教育报告书，建议以“国民学校”取代“方言学校”，即以英、巫文教育消灭华、印文教育。这种以巫制华，以建国为由的堂皇大叙事消灭/边缘化其他民族教育的政策与手段比直接的行政律令更委婉有效，因它一方面获得马来民族主义者的支持，也赢得部分非马来人的认可，尤其是英文教育出身者。

(rendered essentialism)。易言之，它是特定的社会历史与政治条件制约下的建构，最终被视为华人意识形态的原生地。在林连玉领导华教运动的时代，主导性马来政治力量（以执政党巫统为主）的马来小知识分子（以教员、文员和记者编辑为主）<sup>2</sup>，极力推崇以马来文化建设为主轴的民族主义精神。1954年，第二届马来语文大会（Persidangan Persuratan Melayu Sa-Malaya Kali Kedua）通过议案，以罗马字母取代爪夷文拼写马来文，以促进马来民族的现代化（Normala Mohamad Yusof, 2009），随之而来就是马来文教育的建设。1956年，第三届马来语文大会（Kongres Bahasa dan Persuratan Melayu ke-3）在新山召开，议决成立国家语文馆（Dewan Bahasa dan Pustaka），目的是为了促进马来语文的发展、马来教科书的出版以及提升马来文学的学习；1958年，成立第一所马来中学——峇株峇辖国民学校（Sekolah Menengah Kebangsaan Batu Pahat）<sup>3</sup>；1967年，国语法案在国会通过，马来语作为国语的地位得以正式落实；1970年，以马来语为媒介语的国民大学（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创立，标示完整马来文教育体系终于建成。从这一系列动作中，得以窥探马来人尝试通过政治优势落实文化建设的努力，而“语文是民族的灵魂”（Bahasa Jiwa Bangsa）这一口号早已在战后初期，由马来民族主义者扎峇（Za'ba）首先提出。

在这情况下，林连玉和沈慕羽争取华语为官方语文往往被指为不顾全大局。因此，语文运动被马来民族主义者视为本质主义运动并不奇怪。

实际的情况是华文作为官方语文问题，是殖民主义者与马来贵族统治阶层和右翼分子进行利益勾结而起的。易言之，教总和华人

<sup>2</sup> 此处所谓马来小知识分子，不仅喻指在官方行政体系中的职位和社会地位的高低，而是以他们在西方资本主义结构中所占有的经济与权力资源而定的。简言之，他们或许具备崇高的名望/民望，但未必掌握实权。反观放洋留学的马来政治精英则没有面对这方面的问题，他们在各方面皆占尽优势。

<sup>3</sup> 这和1826年创立于英殖民时代第一所马来学校——槟城牛汝莪马来学校（Sekolah Kebangsaan Sungai Gelugor Pulau Pinang）竟相隔132年。1964年，前者改名为拿督孟达拉鲁瓦尔学校（Sekolah Dato' Bentara Luar），以纪念峇株峇辖开埠人拿督穆罕默德萨烈敏柏浪（Dato' Md. Salleh Bin Perang——拿督孟达拉鲁瓦尔为柔佛朝廷封赐之官衔）。

社团争取华文的官方地位是受制于客观因素，而不得不采取的反制行动。1965年，马来西亚华人注册社团代表大会筹备工作委员会为争取华文地位向首相提呈的备忘录即明确阐明其动机：

吾人争取华文为官方语文之一，早在殖民地时代即告开始。1952年教育法令，企图消灭华文地位，华人即奋起力争，予以维护；1952年副钦差大臣麦芝里莱爵士，召见华校教总代表于其官邸，明言因华文非官方语文，是以在本邦教育体制，不能有平等地位。于是华人对争取民族文化的运动，便从此展开而更趋积极了。（《沈慕羽资料汇编》编辑委员会编辑，1996：9）

然而，它最终成功凝聚族群力量，召唤民族意志，持续向一个目标奋进，逐步形成华人文化民族主义精神。在往后一段很长的时间内，引领大马华人前进，一直到近几年，在资本主义全球化大潮冲击下，这种凝聚力才出现松散的现象，但这并不表示华人民族主义就此消散，它在当下的具体情况仍有待进一步研究。<sup>4</sup>

马来人的文化民族主义运动在主导政治力量的推动下，极具扩张与征服力，因而给华教运动带来巨大的冲击，华文教育终于从无意识、自流的状况中惊醒，进而汇聚社会能量形成一支波澜壮阔的运动，它这才从被赋予的本质主义类型转向有意识的本质主义认同，其边界随之益形彰显。林连玉时代的华教运动可以说开创了华人文化民族主义思潮的本质主义抗争，与当时左派人士（包括紧急法令实施以前的左翼的国家主义阶级斗争）有实质上的差异。<sup>5</sup>但无可否认，林连玉在抗争策略上不失激越、基进作风，可以说林连玉先生的中间偏左的抗争路线不无受当时左翼斗争的影响。而沈慕羽继承了林连玉先生的抗争路线，然而，在这个时刻，马来人已从文

<sup>4</sup> 这种现象在60后（60年代及以后出生者）群体中已略显端倪。他们在国民教育体系下成长，倾向于认同一个平等的民族国家，一切不平等都是因上层建筑倾斜与腐败所致。因此，他们的政治性格比他们的前辈更为突显，行动能力更强。

<sup>5</sup> 两者最显著的差异在于林连玉的华教运动是以教育、文化平等为诉求，他追求在平等的公民权利与义务的框架下落实他的诉求，彰显的是一种公民意识；反之，左翼人士的国家主义宪制斗争一开始便是以政治权力为目标，群众斗争意识更为显著。



化民族主义转向政治的民族主义抗争，也就是更具体的民族国家建构。于是，沈慕羽在抗争策略上受到更大的制肘，因而更形被动。这个背景对掌握下文脉络有一定的帮助。

### 三、政治现实下的官方语文抗争策略

独立后，华教运动的挑战首先来自1961年教育法令。这项主张“一种媒介，一个源流”的法令掀开了华校改制风潮的序幕，最终导致60、70年代华文教育陷入空前的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60年代中期以后，掀起一系列的教育、文化自救运动，惟基本上都是呼应华文中学改制的救亡行动。首先便是争取华文为官方语文运动。郑良树把它称为“华人文化复兴运动之一”。沈慕羽在这个时候提出华文为官方语文的抗争，华校改制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然而就沈慕羽个人角度言，政治现实的考量也是不可忽视的促发性近因。下文尝试针对两个因素进行讨论。

#### 1. 借助马来西亚因素，宣示爱国精神

60年代中晚期，马来西亚联邦除了面对内部“新加坡问题”，在外则面对印尼和菲律宾对成立马来西亚联邦的阻力乃至对抗，以及左翼思潮因受中国文化大革命影响而复苏的问题。在各种内外因素的考验下，马来亚迎来了独立后第二次（也是马来西亚联邦成立后第一次）全国普选（1964年），联盟在本届大选提出的“马来西亚”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对沈慕羽的语文抗争产生一定的影响。联盟政府在马印对抗事件中似乎找到了出口，以纾解来自各族群的语文与教育问题的压力，同时尝试转移为全民公投，借以化解来自反对阵线的反马来西亚攻势。因而全力炒作爱国牌，联盟这一着果然凑效，马华公会在大选中取得33席的27席，论者认为马华这次取得大胜，“因为这表示了多数华人选民支持马来西亚，不是反对马来西亚。同时也反映出社阵与当时的印尼同样的反对马来西亚，并未取得华人的广泛支持。由此也证明一点：马来西亚的华人需要的是一个安定的环境与和平的国家，不想把命运寄托在被认为与印尼的左派有联系者手里。”（谢诗坚，1984：110）反之，左倾社阵在

这次选举中面对重大挫败，3个成员党（劳工党、人民党和国民议会党）分崩离析，1966年中，劳工党内的激进派（主要为受华文教育者）控制领导权，之前受英文教育的温和派被边缘化。约言之，无论左右阵营，华文教育者都可能对语文运动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这趋势下，沈慕羽于1964年从林连玉手中接过教总的领导棒子，首先于1964年11月19日，以马青副团长身份草拟，由马六甲华人注册社团大会通过之“为请求重订合理与平等之教育政策尊重华人语文地位备忘录”，提呈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暨全体内阁部长。有关华人语文地位，备忘录提出“要维护华族文化成为本邦文化之一环，及解决语文种种难题。治本的办法唯有请求政府列华语华文为官方语文之一。”（《沈慕羽资料汇编》编辑委员会，1996：6），并说明具体之理由与办法：据署理教育部长佐哈励说中学以上之教学媒介乃根据官方语文制定，职是之故，如要学校教授华文，舍在官方有地位，无他良策（同前）。后来因他被开除马华党籍，此备忘录终无法上呈东姑阿都拉曼。翌年11月4日，他以马来西亚华人注册社团代表大会筹备工作委员会主席身份向首相东姑再度提呈争取华文地位备忘录。显然，沈慕羽逮住了这个时机，向马华领导层及巫统提出语文诉求，同时也借以向巫统表明，争取语文地位绝对不是不爱国的表现，反之“可以辅助国语在发扬国策，及传达政纲应用上之不足，而使华人深刻了解政府之意旨，而达到政通人和，效忠本邦之目的。”（同前：10）

## 2. 与左翼力量划清界限，宣示爱党爱政府

众所周知，沈慕羽是公开的国民党党员。1931年，曾随父沈鸿柏归国出席国民党在南京举行的四中全会。抗日时期，他以中华民国国民党马六甲直属支部常务委员及宣传主任的身份参与抗日赈灾。后来马华公会成立，他率先加入成为党员，亦因其国民党身份所致，因早期马华公会要员不是土生华人，就是国民党背景人士。鉴于此，沈慕羽爱党爱政府的倾向是不难理解的，连带的也让他的反左反共立场更形鲜明。这可从他有限的相关言论中窥得一斑。1963年11月，沈慕羽蝉联甲州马青分团团团长，事后他在会上吁

请马青团员，准备随时随地为国家尊严及人类权益与敌人斗争到底，而当时他所谓的敌人，除了外侮印尼，另外一股势力就是马共。他在会上的讲话虽党性色彩浓厚，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共产党的批判与官方口径比较，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共产党的颠覆活动，就如细菌般无孔不入，一个健全而不露面的核心组织，训练了特务分子，渗透政党、社团、职工会、学校及乡村人民组织，用了美丽的借口，狡猾的手段，操纵着上述组织，等待时机一到，即露出他们的原形。共党专向落后的国家下手，尤以东南亚更甚，如印尼、印度、安南等国家。“人民要翻身”是他们的口号，不知羡慕了多少不满现实的人们，但是共产党统治的国家，人民有翻身吗？共产党已在我们的国家进行渗透、颠覆了，兄弟们！大家都是民主自由的斗士，就站稳你们的立场，坚定你们的意志，为共同的信仰而与魔鬼似的共产党周旋到底吧！（《沈慕羽资料汇编》编辑委员会，1998：308-309）

由此可见，沈慕羽的反左反共立场是非常鲜明的，从他往后的处事中也大体揭示他坚定的立场。对他来说，也许这样的立场可以免除官方对他的语文斗争的猜疑，然他不晓得，他所争取的官方语文运动所蒙上的华人民族主义色彩，恰好碰上其时最高涨的马来文化民族主义思潮。因此，他忠于党国的情怀自然不受重视（或被掩盖），甚至限制了他的斗争的彻底性。我认为，沈慕羽和林连玉不同之处是，后者从未参与政党政治，但为华教利益，不排除与政党合作。他后期的斗争路线也倾向中间偏左，甚至曾有一段时期，他与劳工党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刊登在《教师杂志》的《回忆片片录》甚至成了当时左派的教材。（何启良，2006：172，注释27）。

在冷战年代，沈慕羽对左右的取舍抱有高度的自觉性。然而，他却忽略了一点，争取马来语文地位的马来文化民族主义者其实都是左派人士，从报人——作家克里斯马斯（Keris Mas）、乌斯曼阿旺（Usman Awang），到语文学家阿斯拉夫（Asraf）等，或多或少都带有左翼色彩。沈慕羽虽然有“追随在朝情结”，然而，当他发现华教抗争愈来愈艰难，而不得不投入政治洪流时，他的心情

毋宁是沉重的。1990年，以林晃昇、柯嘉逊、李万千为首的27名华教人士参与反对党，期以促成两线制时，沈慕羽以“走上梁山”形容之，无可奈何之情尽显。当记者问及他本身的立场时，他表示“本身将继续以超然中立的立场，观察局面的演变，并加以评论是非。”显然，沈慕羽对通过政治管道进行华教抗争的做法有所保留，更何况通过反对政治。这一点大略可以体现他保守的一面，而这和他尊崇的儒家思想是否有关系，值得有心人进一步探讨。

#### 四、因何挫败？

沈慕羽的官方语文抗争发生于马来亚独立建国不久，并非偶然。在英殖民政府长久的分群统治和战后1948年推行亲巫政策后，留下很多未及妥善处理的族群问题，语文问题是为最尖锐的一环。独立后，随着内部族群政治权力资源的争夺和新马两地留下的历史因素，语文问题不得不被卷入政治竞争的激流之中。但同时也突出了一些人物在这场竞争中的强大个人意志，以及他对官方语文抗争造成的打击。后文尝试从这个角度分析沈慕羽官方语文抗争运动失败的原因。

##### 1. 李光耀因素

1965年，李光耀提出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Malaysian Malaysia）的理念，引发巫统因华裔人口比例占优势而可能导致巫统失去政权的戒心。从族群政治的零和游戏规则来看，突出种族比率其实是沈慕羽争取华文列为官方语文最大的障碍，对当政者而言，这无疑是一种挑衅。沈慕羽援引林连玉时代以新马两地华族总人口论华语作为争取官方语文地位的必要性，显然他的挫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重蹈林连玉的覆辙。<sup>6</sup>1965年8月6日，《星洲日报》有一则马华联络总长曾崇文的告华族同胞书，从不同立场点出了沈氏

<sup>6</sup> 1965年7月初，沈慕羽在致给全马华人注册社团联合召开代表大会的函件中提到：目前马来西亚已经成立，华人为本邦人口最多之民族，而华文则为各大城市应用最广之文字，吾人要求政府列为官方语文之一，视为环境需要，顺理成章之争（沈慕羽，1996：26）。

的问题：

现在是在李光耀所领导的所谓“团总”在幕后导演之下，提出要以非巫族的六十一巴仙的人民，向三十九巴仙的巫族人民进行“血的斗争”……但结果，制造成种族间更大的分裂与猜怨。如果华巫之间一开始就讲巴仙率，我们相信巫族人士绝对不会同意在华人公民权方面让步，让我们在投票数上，与他们竞争。（见《沈慕羽资料汇编》编辑委员会，1996：40）

换句话说，沈慕羽领导的语文运动在李光耀的政治博弈中成为马来民族主义者极度抗拒的议题，因而导致马来人更大的猜疑。<sup>7</sup>“他们觉得李光耀向他们提出斗争威胁以来，现在华人紧接着要争取语文官方地位，似有放弃诺言，撕毁宪法的趋向。”（同前）可以这么说，语文运动是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或更正确说是李光耀）的建国纲领（Malaysian Malaysia）与巫统建国纲领（Malay Malaysia 或 Tanah Melayu）的竞争下成为牺牲品。从此以后，巫统开始从政治上着手，积极推行系列政治方案，初步确立了政治的马来民族主义的斗争路线。首先是把新加坡逐出马来亚联邦（1965年），继之1969年五一三事件爆发，巫统内部鹰派势力成功趁势夺权，翌年推行新经济政策，华人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层面开始被边缘化。而这段时间，正是沈慕羽领导下的华教运动与抗争时期。

## 2. 陈修信因素

此外，沈慕羽在这个时刻提出华文官方地位问题而面对挫折，与马华公会领导层对华社形势的错误估计有关。马华公会在陈修信的领导下，始终不相信华人社会对教育问题的重视，也不以为董教

<sup>7</sup> 以赛纳雪（Syed Nasir bin Ismail）为首的国语行动阵线委员会（National Language Action Front Committees）于1964年7月成立，政府也在各州成立国语月委员会（National Language Month Committees），以策划与推广活动。赛纳雪和塞嘉化阿尔巴（Syed Jabar Albar）、拉曼敏达立（Rahman bin Talib）是当时巫统中的极右派领袖，沈慕羽在这个时刻要求列华语为官方语文，最大的阻力来自这些右派马来组织和人士。

总足以形成一股力量挑战他的权威。<sup>8</sup>他不能容忍来自以沈慕羽为首的马青有关华文地位要求的压力，更令陈修信难堪的是，他呼吁母体（指马华公会——笔者按）一定要在1967年，马来文成为唯一国语之前达到此目的，否则就太迟了。（引自郑良树，2003：127）此言一出，显然是考验陈修信的诚信，也是对陈修信施加最大的压力。<sup>9</sup>1965年10月12日，沈慕羽在华团大会筹备工委紧急会议上，正式抨击马华领导层欠缺诚意：

这次马华马青的呼吁，也就是支持陈会长和东姑总理从前所发出的诺言，不过是在催促他们从速实现罢了，名正言顺，正气磅礴，依情依理并没过份，并非叫嚣……我们可以暂时接受停止叫喊，但是我们恳切要求领袖拿出事实给我们满意，否则我们还是会同机叫嚣的，即使我不叫，全马华人也会叫起来，马华马青同志也会叫起来的。（1996：71-72）

经此事件，陈修信的颜面再也挂不住。因此，决定开除沈氏党籍，给出的理由却是“沈慕羽公开违反党纪，蔑视中央领导，公开反抗党的决策，使党难堪，甚至受到讥嘲和蔑视”。

这事件终于导致马华公会与华教领袖公开决裂，更给马华带来巨大的打击。为表达对领导层的不满，各地马青团召开紧急会议，许多基层党员更脱党求去，部分马青组织则终止活动，马华公会此

<sup>8</sup> 沈氏于1966年10月18日被开除党籍后，仍然以教总主席身份，连同董总主席杜志昌致函马华总会长陈修信，要求恢复马华、董总与教总三大机构共组“华教工作委员会”，以互通声气，维护华教。惟陈修信对董教总的态度依然非常傲慢。他在1966年12月7日的复函中，明显地揭示了这一点：……维护马来西亚全体华裔社会之利益，素为本党一贯主张，而诸君所代表之机构，不过全体华裔中之小部分而已。本党既不可以小失大，参与其中，亦未能对服务全体华裔之宗旨有所补益也（引自谢诗坚，1984：133）。又说：贵来函内，对本党维护全体华裔社会利益之宗旨，力加赞许，故本党实难知为诸君所代表之一小部分而以偏失全也。倘若马华自身为贯彻其宗旨与目标，不能为力，则有诸君所代表之少数团体参加，对本党之影响与力量，不特无增，实则有减（1984：134）。

<sup>9</sup> 1965年8月15日，陈修信出席吉隆坡增江第五届马华政治训练班，他在开幕礼上说，如果政府在施政时有损及华人长远的利益的话，他会辞去内阁的职务。22日，陈修信进一步宣布马华公会将为华文争取为官方应用文（Official working language）而斗争，并且透露联盟政府有意成立联合委员会，处理语文课题。陈修信若有压力，完全是自找的。

刻几近瘫痪，为期两年。开除党籍事件突显了董教总（尤其是教总）在华社中日益崛起的领导地位，在这关键上，沈慕羽是重要的推手。

1969年第三届大选马华公会惨败，陈修信不得不认真评估华教势力，因而力邀沈慕羽出席1971年2月7日假吉隆坡联邦酒店召开的全马华人领袖座谈会，以讨论华人团结问题。陈氏甚至于1972年派人劝说，要委沈慕羽为上议员，但为沈慕羽所谢绝。经历了开除党籍事件，以及后来参与吉隆坡和怡保两地的华人团结大会之后，沈慕羽的领袖魅力与社会形象进一步获得巩固，这为他往后参与争取创办独大（60年代末）、领导反对综合学校计划（1985年）和华小高职（1987年）等系列事件提供有用的实战经验。

### 3. 基进马来种族主义者强力施压

独立建国时期，宪法第152条列明马来文为国语，但同时允许英文为官方通用语（Official language），至1967年为止。在这10年过渡期当中，部分马来政治人物，在赛纳雪的领导下，成立了国语行动阵线（Barisan Bertindak Bahasa Kebangsaan），以监督和施压等多重管道，俾使马来语转变为唯一的国语能早日合法化，以防中途生变。赛氏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就马来社群的教育选择意愿来看，从1957年至1967年，由英文向马来文媒介过渡的10年之中，他发现大部分马来家长仍然以英文源流小学为优先选择。人民党也发表类似看法，该党发现独立7年以后，马来学校并没获得多大的改善，反之英文源流教育比之前发展得更蓬勃，终导致人们对马来语文丧失信心。（Ibrahim Saad, 1977: 77）

大约在沈慕羽遭马华公会开除党籍两个星期后，赛纳雪秘密提呈一份13页的备忘录给当时的副首相，副本给全体内阁部长、各州首长以及巫统中委。赛氏在备忘录中强调“马来语文必须成为唯一的国语”，同时指出这是中央领袖不可推卸的责任。此外，他们必须对国家教育政策达致具体的共识。他进一步指出英文必须被马来文取代，以促成单一国语成为事实。他也认同还有很多与教育相关的疑问、难题和议题是暂时无法解决的（引自K. Ramanathan, 1985: 105）。赛氏的行动除了获得巫青团成员的大力支持外，亦获得多位极右派马

来领袖的支持，包括马哈迪医生（Tun. Mahathir bin Mohamad）、雪州大臣拿督哈伦（Datuk Harun bin Haji Idris）、土地与矿藏部长拉曼耶谷（Datuk Abdul Rahman bin Yaakob）。<sup>10</sup>

表面上看来，赛纳雪和他的阵营所争取的无非是马来语文的领导权。然而，若深入审视，赛氏要求的其实是语文专断权。在他看来，官方语文即等于国语，而国语只容许一个，这显然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语文”（Satu Negara, Satu Bangsa, Satu Bahasa）的建国蓝图之所由。当中马来人心灵的转折，是从文化民族主义向政治民族主义过渡，这项转折在60年代末完成，并于70年代初正式启动马来政治霸权的机制。赛纳雪——这位DKA（Darah Keturunan Arab——阿拉伯血统的马来人）——深谙其中利害与得失，他以公务员身份（时任语文馆首任总监）号召马来人捍卫国语，他敢于打前锋，并且奋力和时间赛跑，显示他并非盲动之辈。他看到沈慕羽领导下的官方华文“诉求”，英文在官方领域仍占绝对优势，而且普遍被接受，更让他无法释怀的是，东姑在此课题上的优柔寡断。

相较之下，从1965年正式领导语文运动，到1967年国语法案通过为止，沈慕羽仅有短促的3年，事实上沈氏也和时间赛跑，如果把赛纳雪的10年比作马拉松赛，沈慕羽的3年大概是一百米短程竞赛了。由此，不难理解何以他选择最具震撼力的全国华人注册社团代表大会为抗争手段，而且屡试不爽，即便冲撞马华总会长也在所不惜。<sup>11</sup>

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基进的马来种族主义者抱着一个鲜为人知的更宏大的经济民族主义议程。澳大利亚政治学者Gordon P. Means在Malaysian Politics（马来西亚政治）一书中不无中肯地指出：

<sup>10</sup> 拉曼耶谷于五一三种族冲突事件后，受委为教育部长，英校被改成马来学校就是在他任内完成的任务。

<sup>11</sup> 沈慕羽在这时期已真正进入独当一面领导华教斗争的阶段。这时候，他倚赖的不仅仅是过人的胆色，更是他对语文斗争在认识上达到某种高度的体现。这些从他和马华公会联络总长曾崇文、总会长政治秘书吕鸿元之间的论辩文章可以窥得一斑。



较基进的马来种族主义者希望马来语向单一国语地位的转换，无论在公共或私人领域将为马来人创造经济机会，由此政府就能以国语法定地位为手段，以击破非马来人在各经济领域的垄断地位。他们认为对使用其它语文的通融将使非马来人继续保有他们在国内的经济与专业生活中保有宰制性地位。虽然马来人在马来特权下接受辅助，以获得政府机关的聘任以及保障得以进入国立高等院校，马来特权对重新分配族群经济角色，以及重组国民收入的真正影响让那些期望马来人在官方和经济领域保有宰制地位的人大为吃惊。于是，巫统中基进部分的极端马来人对东姑和联盟高层领袖向非马来人作出太多让步，以及落实把马来人置于国内经济与文化生活中的二等地位的政策表示愤慨（1976：392。笔者译自英文原著）。

面对巫统内部这个议程，沈慕羽（以及其他战友）是否知晓？在那段期间，他们又做了什么？史学家谢文庆（Cheah Boon Kheng）指出，在寻求1967年国语法令通过前，马来民族主义运动有充分理由要求政府让马来亚以“马来国家”（Malay country）的形象出现（2002：50）。这是马来民族主义运动的宏图与愿景——建立马来民族国家，偏偏沈慕羽领导的族群语文运动与它碰在一起，当族群想象与国家想象碰在一起，自然要引起猜疑与剧烈的冲撞。<sup>12</sup>

## 五、结语

马来西亚在建国过程中的问题，实际上与少数精英的寡头统治有很大的关系。譬如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这回事，是马华公会与巫统领袖之间暗地里达成的协议，具体的协商过程至今未有

<sup>12</sup> 同样的冲突也出现在左翼阵营，譬如劳工党于1961年针对拉曼教育报告书提出反馈（即反对接受政府津贴的学校必须改用马来文为教学媒介），进而提出“我们的教育政纲”（Our Educational Policy），以马来人为主的左翼政党——人民党即对劳工党的教育政纲表示反对。来自人民党的社阵主席阿末布斯达曼（Ahmad Boestamam）表示一旦马来文于1967年成为国语之后，英文、华文和泰米尔文教育必须废除，他最后因这项分歧而请辞社阵主席。由此可见，马来左翼政治的国家想象与联盟内部的马来种族主义者的国家想象在语言教育层面仍然存有极高的同质性。

公开。这项协议在争取华文为官方语文议题上，无意间由时任内政部长的拿督伊斯迈透露。少数精英决定多数人的命运是一般第三世界国家奉行的统治模式，这些居少数的民族主义精英往往在利益当前互相勾结，一旦资源分配无法满足需求，这些统治精英往往回到族群内部寻求支援，以累计谈判资源。另一方面，无论是林连玉或沈慕羽时期的语文运动，亦必须依赖群众力量以达致目的。惟与前者不同的是，后者不分阶级（贫富、贵贱）、性别、籍贯、宗教信仰，乃至不分政治意识形态。这样的群众结构最后必然对少数精英集团构成压力，乃至威胁，因此它被否定，被打压、摧毁是可以预料的。

况且，在冷战年代，语文运动很容易被扭曲/诬陷为阶级抗争，这对领导者是非常不利的。这也是沈慕羽意识到的，因而他难免会极力和左派（尤指马共）势力划清界限。上文所举沈慕羽对马共的批评，部分原因也是出于这样的考量。

语文运动已经成为历史名词，它的成败，非沈慕羽一个人可以担当，冷战格局、政坛博弈、后殖民时代的民族国家问题等，都深深牵制着运动的进程与成效。沈慕羽完成了时代赋予的任务，而他自己也从运动中完成了个人的道德与人格实践，这就是他留给后人最丰富的遗产。

## 参考文献

- 《教总33年》编辑室：《教总33年》，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1987年。
- 教总秘书处编：《晚节飘香：沈慕羽先生七十荣寿贺文集》，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1991年。
- 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1923-1965）》，台北：世界书局，1998年。
- 李亚邀编：《晚节飘香续编》，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2006年。

- 《沈慕羽资料汇编》编辑委员会：《石在火不灭：沈慕羽资料汇编（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1996年。
- 《沈慕羽资料汇编》编辑委员会：《沈慕羽言论集》上、下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1998年。
- 谢诗坚：《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吉隆坡：友达企业公司，1984年。
- 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全四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2003年。
- Cheah Boon Kheng.2002.Malaysia: The Making of A Nation. Singapore: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Cheah Boon Kheng(ed.).2007.New Perspectives and Research on Malaysian History.Kuala Lumpur: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 Enloe, Cynthia H.1970.Multi-Ethnic Politics: The Case of Malaysia. Berkeley:Center for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Ibrahim Saad.1977.Pendidikan dan Politik Di Malaysia.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 Means,Gordan P.1976.Malaysian Politics.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 Mohamed Noordin Sopiee.1976.From Malayan Union to Singapore Separation: Political Unification in the Malaysia Region 1945-1965. Kuala Lumpur: Penerbit Universiti Malaya.
- Normala Mohamad Yusof(Penyusun).2009.“Sejarah Perkembangan Bahasa Melayu: Daripada PBMPM Hingga Penubuhan DBP.”<<http://www.dbp.gov.my/klikdbp/klikdbp89jun6.pdf>>(accessed:December 2,2009).
- Ramanathan K.1985.Politik dalam Pendidikan Bahasa,1930-1971. Petaling Jaya: Penerbit Fajar Bakti.



---

# 孤忠与反叛

## 政党政治中的沈慕羽

■ 黄进发

---

### 一、前言

沈慕羽作为华教运动中继林连玉之后的第二号人物<sup>1</sup>，对其的评论也多半突出其贡献、信念与人格，而很少为他的斗争提供比较完整的历史脉络。举例说，他在1966年10月被马华开除出党，这事发生在新加坡被开除出联邦的不过10个月后，而其被开除的谣言最迟在1965年7月、新加坡被逐出联邦前一月便已出现。要理解语文平等运动，便不能不放在当时的政党政治脉络解读，然而几乎没有人整理董教总与人民行动党与其他在野党在语言课题上的竞合关系。另一个值得思考的命题是沈慕羽出身国民党世家，到故世时仍然与国民党渊源匪浅，却能跨越左右意识形态，为大部分左翼人士所接受。这固然与沈慕羽在语文问题上立场坚决、生活朴实的个人特质有关，但也与大环境脱不了关系。1971年，沈慕羽与前社阵健将顾兴光，同赴华人团结大会，结果一左一右，却双双因激昂言词在《煽动法令》下被控；正说明了，在族群紧张激化时，左右意识形态之差便成了“族群”的“人民内部矛盾”，甚至暂时消失，悄悄让位给族群/民族意识。

---

<sup>1</sup> 沈氏是任期最长的教总主席，达28年之久（1966年-1994年），在林连玉1961年被褫夺公民权之后是华教运动的公共面孔与灵魂人物。在1969年后，风雨如晦的族群紧张中，董总的角色逐渐盖过教总，董总主席林晃昇在70、80年代领导华教运动政治突围的贡献也应该比沈氏更大。谁是华教运动第二号人物，因此或可争议。然而，从华社、华教运动对林晃昇、沈慕羽两人的纪念、建档工作来看，在华教运动的“孔庙”里，“亚圣”的地位应该是奉献时间更久、早期贡献更大的沈氏。

然而，高涨的民族意识并未能推进华文教育的命运。沈慕羽自己的分析是：“马华公会当局一再坚持表示，争取华文为官方应用文，并声明与华文共存亡。马青团亦通过争取华文在本邦之适当及合理地位；东姑首相亦予保证，只要非巫人支持马来文给国语，绝在语文方面让步，使华文在本邦有适当安排，又申斥巫统中极端分子之沙文思想，而破坏种族间之和谐，邻邦新加坡又宣布华文为官方语文；诸如此类，佳讯频传，显示情势并非不可为，而系积极与消极，勇敢与懦弱之分水岭。”（《石在火不灭》，页183）这导致“很多人都曾发出类似的感慨，似乎华教运动、甚至是马华公会，都是由于偶然原因而失败，倘若政党再强硬些，胜利就属于华人了。”（何启良，1997）

作为政党与公民社会两栖的华社领袖，沈慕羽不畏牢狱、不求富贵、不高估入朝为官的影响，因而能坚持原则，坦然推却陈修信委为上议员的献议，无疑为华社树立了人格典范。<sup>2</sup>然而，如果华裔从政者多几个沈慕羽，是不是就能为华文教育扭转乾坤？这是社会科学里“结构”（structure）与“能动性”（agency）何者为重的命题。本文尝试为《石在火不灭》一书里，沈慕羽人生的三动：语文运动、团结运动和茅草行动，特别是前者，提供政党政治的脉络。本文论证：沈慕羽一片赤诚，欲作政府诤友；但是，在扭曲的政党体系中，他“天真”的孤忠却吊诡地成了当权者眼中的反叛，被开除出党之后终身在野。我们在推崇沈慕羽的政治人格典范之时，也应该理解“结构”如何制约其“能动性”，真正理解他的悲剧。

<sup>2</sup> 沈慕羽触犯煽动法令案，让巫统、马华骑虎难下，既怕华族反感，又怕巫统鹰派抗议，因而提出委任沈慕羽为上议员，然后撤销控状之议。沈慕羽回绝了陈修信来使，说：“撤销与否由当局决定，我不能出满民族利益，我不能让人拉着鼻子走。”最终，当局还是无条件撤销了案件。（《沈慕羽事迹系年》，1972年条）

## 二、从政本怀

沈慕羽的本国政党生涯<sup>3</sup>，始于1949年，以马六甲华校教师公会主席与晨钟青年部部长身份参加马华公会，而终于1966年10月18日被马华公会开除为止，最后党职是全国马青团副团长。从国民党第二代到马华公会创党党员，改变的是沈慕羽的国家认同<sup>4</sup>，不变的是作为执政党支持者的角色。沈慕羽自谓：“那时的华人是侨民，祖国是中华民国，参加执政的国民党，犹如现在的华人参加执政的马华公会，是顺理成章，天经地义的……”（《沈慕羽事迹系年》，页43）

严格而言，到1955年赢得自治大选为止，马华公会作为联盟的一员并不是执政党。然而，它无疑是受到英政府首肯的政党，其成立更是为了与马共竞逐华裔百姓的支持。出身国民党世家的沈慕羽，一方面要帮助夹在共产党人与英政府之间、“走投无路”的华人，一方面认同马华创会总会长陈祯禄爵士“华人要争取独立必须有一股政治力量”，积极投入政治动员工作中，“主办各种文化政治意识训练班，每个月有精神晚会、游艺会，还亲自到乡区设立支会、支团，在他手下成立的便多达十多个。”（同上）在他17年的马华岁月中，他参与了1955年、1959年与1964年三届大选的辅选活动，每次都要“瘦几磅”。当时联盟的对手有强大的左派势力社阵，以及由马华分裂出来，昙花一现的地方性政党马来亚党。1971年与他一起在《煽动法令》下被控的顾兴光，说起来还是他的政敌。

沈慕羽从政的目的不在求官，而旨在单纯地根据本身服务国家、社群。同样的目的让他投入华教运动中，以公民社会为另一轨道。他是倡议成立各地华校教师会组成教总的第一人，并连夜完成教总章程的草案。（《沈慕羽事迹系年》，页46-47）

<sup>3</sup> 沈慕羽令尊沈鸿柏为中国国民党海外元老。沈慕羽在1934年开始担任国民党马六甲支部常务委员与宣传主任，最后的两个党职是三民主义青年团干事（1945年）与党团干部训练班教育长（1946年）。见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1997年，页232。

<sup>4</sup> 从沈慕羽保留与中华民国、国民党的联系来看，精神上他应该是双重国籍者。

由于不求官，后来的开除党籍并不能让他屈服。参政对他而言不过是发声的管道，自然没有以不发声来保留管道的道理。在被开除前6天，他以全国华人注册社团大会筹委会主席的身份恳求马华以筹委会所呈备忘录作为与国家领袖谈商的依据，“因为这是全体华人的共同愿望，也是最低的要求。我们可以暂时接受停止叫喊，但是，我们恳切要求领袖拿出事实让我们满意，否则我们还是会同机叫嚣的。即使我不叫，全马华人也会叫起来，马华马青同志也会叫起来的。”（《石在火不灭》，页72）这样的声明，结果却让马华总会长陈修信恼羞成怒，通过中委会以“违反党纪、蔑视中央领导、公开反对党的决策，使党难堪，使党受到讥嘲和蔑视”的罪名开除沈慕羽。

何启良（1997）称许沈慕羽“主流”、“中庸”，认为他pro-establishment（支持建制）和维护status quo（现状），并引政府最终撤销其煽动罪名为证（页26），并称“若华教运动被走激进路线人士控制，很可能把整个华教运动推向沙文主义的边缘”（页41）。窃以为，就手法而言，他或许比一些同侪“中庸”；就目标而言，他绝对不会比他人保守。相对而言，从马来政治主流的角度去看，沈慕羽追求多种官方语文的主张，既不主流、也不中庸，更是反status quo。

沈慕羽予人的“主流”与“中庸”印象，或许出于其心态：从国民党时代开始，他就以政府支持者、诤友自居。因此，对政府提出要求时，理直气壮，不亢不卑。他帮助联盟建立基层组织、赢取选票，目的就在于落实他的政治理想。他既不谋推翻当道，也不求升官进爵。1966年马青选举，沈慕羽“不接受总团长之提名，还竭力支持李三春及李孝友为总团长及义务秘书，目的就在给我运用在野之力量与在朝之力量互相配合已达到我人争取语文的目标”（〈我的表白（三）〉，收入《石在火不灭》，页157），正是这种心态的反映。郑良树（1997年）称沈家父子为“世臣”，正点出了沈慕羽以政府诤友，甚至近乎国家忠臣自许，因此不畏大小官员的心态。



### 三、政党形势

那么，为什么“这个‘主流’，在思想意识上却做了一生的政治反对派”，成为“大马华人政治里一个极大的吊诡”（何启良，1997：27）？

答案可能在马来西亚的族群政党体系中。法国政治学者 Duverger (1964: xxiv-xxxvii) 把议会政党按照其缘起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由议员先组成派系，再建立本身的选举机器，这是所谓“内造政党”；第二类则是先出现工会、学会、教会、农会等利益团体，再由这些团体组织选举机器竞逐选票，这是所谓“外造政党” (externally created parties)。简单地说，内造政党要把精英的政治取向转换成选票，以维持精英的权力，党组织只是选举机器；外造政党则要把选票转换成精英的政治取向，以贯彻其所代表社会力量的意志，党组织因此是决策机关。巫统和马华都是为了因应时势而生之后才参与选举的政治组织，因此都属于外造政党。前者是数十个马来团体合并而成，而后者则以福利团体的姿态诞生，都是以服务本身社群为目标。沈慕羽以一州华校教师公会主席、国民党干部身份参加马华，希望以选票换取政策，是对外造政党的合理期待。

问题在于，一山不能藏二虎，联盟既由3个族群政党组成，如果3个政党都继续保持外造政党本质，服膺于各自社群，则3党之间极可能冲突不断，以至最后瓦解。解决方案就是只有巫统可以保有外造政党的本质，即党员与党组织可以把政治意志加诸政府，而其它两党都必须悄悄转型成内造政党，倒过来党员与党组织必须服从政府领袖。简单地说，巫统可以指挥联盟政府，联盟政府则通过内阁部长的任命与选区分配控制马华、国大党的领导层，而他们的党组织则变成选举机器，以协助党与盟党领袖胜选为目的，以此换取巫统在政策上与资源上的照顾与妥协。

用陈修信政治秘书吕鸿元在沈慕羽被开除党籍后的说法，联盟的运作模式是“形态上多元化、政纲单元化”。他强调“马华政治力量的来源大小，和全国华人给予它的支持成正比”，又强调“你支持它也罢，不支持它也罢，它会影响你和你子孙的未来命运”。

（《石在火不灭》，页106）换句话说，华人必须通过马华参加政府、接受联盟的基本政策是一个假定事实（given），华人若不支持马华，则情况只能恶化。在这个脉络下，党的纪律就变得更加重要。吕鸿元强调，“纪律不严明，组织不坚强，就会直接影响到政策的推行和理想的视线，世代子孙也会受到影响。”（同上）在这个逻辑下，华人既不能挑战巫统的底线，最好的策略便是成为有效的内造政党，通过集中选票来取悦巫统和保持谈判筹码，避免形势恶化。

这种只守不攻的心态，当然不可能为连续三届大选努力辅选联盟的沈慕羽所接受。他坚持“马华组织的目的，除协同建国之外，其主要目标，乃在维护华人原有之权益和保障华人之语文教育。”

（何启良，1997：33）<sup>5</sup>沈慕羽清楚知道在马来西亚成立后，华人比例增至四成强的事实，在争取语文平等地位时，多次强调华文为“本邦最多民族的语文”或类似说法。（《石在火不灭》，页22、24、59与62）在他的认识中，马华始终是“外造政党”（虽然未曾用此名词），应该负责的对象是它所宣称代表的华社，而不是选择它华社的巫统。马华因此必须把民意转达给政府，而非协助政府把不受欢迎的政策推销给公众。

马华在什么时候“内造化”，变质成部长与议员的选举机器呢？

这要回溯到1959年。那一年，马华总会长林苍佑要求巫统分派三分之一以上议席让马华竞选，以便华人可以有否决宪法修订案的权力作为保障。结果，因为给东姑的密函被公开，被激怒的东姑拒绝了104席中马华出战35席的要求，反建议林苍佑派系的马华离开联盟。马华没有条件独自作战，最后只好接受32席的安排，而且失去挑选候选人的权力。（Means, 1976: 212-215）未几，失势的林苍佑黯然辞职，不久即由东姑所喜的陈修信接位。

而为什么马华没有条件独立于巫统生存呢？其中一个原因是公民权的授予和选区划分，而这一如语文地位问题，这正是所谓独立

<sup>5</sup> 原引自钟天祥：《李三春·华教·马华》，雪兰莪八打灵：人间出版社，1984年，页69。

各族妥协配套的一部分。马华联络总长曾崇文在沈慕羽被开除后，解释为什么多种官方语文的诉求不可能成功时，说明为什么马华没有王牌：当时“我国华人有三百八十多万人，拥有公民权的华人只有一百八十万人（包括小孩在内）……在西马的一百零四个选区内，华人的选区不超过三十七个。”（《石在火不灭》，页123）

#### 四、语文问题

既然没有修宪成功的条件，为什么中庸的沈慕羽提出定中文为官方语文的诉求？沈慕羽其实并不认定巫统议员必然不赞同。与其说是对现实的误判，毋宁说是沈慕羽对原则的坚持，认为联盟既为一体，一向支持巫统的马华自可要求巫统投桃报李。

沈慕羽在马青内部提出的建议书列出3个目标：第一目标是作为官方语文，不可得则求其次；第二目标是组为辅助官方语文或第二语文，不可得则再求其次；第三目标为官方应用文。（《石在火不灭》，页14-19）

Horowitz（2000：第三、四章）指出，族群冲突有两个主要的源头：一为群体之间的比较（group comparison）；二为群体的权利认定（group entitlement）。语文地位的问题，正是涉及不同族群之间的权利认定与排位顺序。语文一方面是一种象征，另一方面也影响就业与教育中的优势与劣势。

马来民族认定本身为马来亚主人，自然希望国家有强烈的马来人色彩，包括制定马来语为国语以及唯一的官方语言。就这一点而言，马来右派和马来左派其实观点并无大差异。后来社会主义阵线的分裂，部分原因就在于语文课题上。

1955年大选前夕，东姑以缓兵之计说服董教总不提出华文列官方语文的要求，以避免联盟为拿督翁<sup>6</sup>所攻击；反之，只要“联盟胜利执政后，什么都可以商量”。当沈慕羽在1965年再度推动语文运

<sup>6</sup> 拿督翁原为巫统创党主席，在无法说服党员开放门户给非马来人之后，组织了走多元族群路线的独立党。未几，因为独立党在吉隆坡市议会选举败给联盟时，愤怒的拿督翁再组新党国家党，在族群问题上比巫统更右。

动时，副首相拉萨却表示：放弃争取华文列为官方语文，是超过一百万华人取得公民权的交换条件。这是当初马来人和华人领袖达成的协议，如果推翻，“可能引起严重后果”。对此，沈慕羽表示华社对这“秘密协议”并不知情，质问为何马华没有告知，并要求当局“公布内容，以释群疑”。（《石在火不灭》，页37、42-45、94）

然而，沈慕羽争取华文为辅助官方语文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进一步要求议会增加华语，使不很熟悉国语的议员们，可以表达民意”吗？（《石在火不灭》，页43）沈慕羽不论在国内国外都坚持用中文演讲，再由他人翻译。如果整场社会运动只是为了争取这种象征性的权利，从今日看来，其意义未免有些浅显。

沈慕羽的真正动机，应该是围魏救赵，以攻为守。他呈给马青的〈争取华文地位及华教地位建议书〉或许才反映其真正思路：

“我国宪章对于华文之地位与华文教育皆未有明文之合理规定。因此，华文在十多年来，备受奚落与威胁，而有消灭之虞。华人皆愤愤不平而纷纷请求规定华文为官方语文之一，唯有如此，始能彻底解决此问题。”尤其让他担忧的是：“这期间我们只听到每天广播电台以及政府机关常常宣称：从明年起，巫文将成为唯一官方语文。对于华文作适当的安排，不但没有实际行动，而一句一字也不提。我们深恐在1967年巫文成为唯一官方语文之后，米已成饭，物已定型，则神力也难改造。现在华文已经接近死亡的边缘，我们一息尚存，安得不叫。”（《石在火不灭》，页14、71）

这场运动可说是基于对联盟政府—相对于殖民地政府—的不信任。沈慕羽指出“……战前殖民地的政府时代，开会时可用华语发言，政府有翻译，（例如战前参事局会议），此外各种文告都有华文……我们只要华文在官方是有地位的，不论将华文列为第二或第三，甚至第四种语文都不成问题。”（《石在火不灭》，页25）

为什么这种务实的谈判态度，竟不能争取到巫统领袖的谅解呢？

一方面，语文争议的核心是族群权利认定。马来民族主义者的独立憧憬本来就是本身语言、文化地位的提升，有其独占性。因此，对其他社群的类似要求难以采取同情的态度。

另一方面，语言的官方地位可以协助改善族群的竞争地位与表现。（Horowitz, 2000: 220）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马来文的独尊地位显然比多语共存的环境更有助于马来人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易言之，马来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若有所提升，或者能够掌握外语，则他们才比较可能对有关外语采取友善态度。

必须指出，沈慕羽对马来语其实颇有轻视之意，而缺乏同情：“今之国语尚在襁褓时期、呀呀学语、今竟有大学与学院国语化之建议，诚不自量，倘获实行，其危害行政效率及影响学术水准必大，当局应三思之。”（《石在火不灭》，页18）他虽然保证马来同胞不会因为华文变成官方语文就必须“学习很难理解的深奥的华文”（《石在火不灭》，页25），但是他的运动也没有提出论述来回应马来同胞在马来文一旦失去独尊地位后，经济损失的忧虑。

这固然不能强求于作为教育运动家的他，但是作为政党领袖的他和马华公会在处理语言课题时，也没有考虑经济和阶级问题，对马来人的反对做出“釜底抽薪”的因应，而留给巫统去处理“马来沙文主义者”。相较之下，林连玉在十年之前以教总主席身份发表“开斋节献辞”时，就强调华社应该在经济上扶助马来社群，格局显然比沈慕羽为高。

沈慕羽推崇“前政敌”李光耀在新加坡规定4种官方语文。饱受巫统攻击为极端分子的李氏，就非常清楚语文问题不能够单独处理。1965年5月，在马华将开除沈慕羽党籍谣言初次出现前两个月，李光耀在联邦国会以马来语发言，直接戳破巫统的族群论述：“特权和马来语成为国语解决不了经济问题……你让甘榜里的人们相信，因为我们不会说马来语，政府文件不用马来文，他们才会穷，他们就会期待1967年（马来语成为国语和唯一官方语言的一年）出现奇迹：一旦我们大家都开始说马来语，他们的生活就会提高，但是，如果这种情形没出现，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作为马来西亚公民，马来人有权提升自己的培训和教育水平，同竞争力比较强的社会、非马来人的社会达到的水平一样，该做的就是这样的事，难道不是吗？而不是向他们灌输这种隐晦的理论：只要上少数特殊的马来人获得马来人的权利，他们的问题就解决了……”（李光耀，1998: 670）

从巫统的角度去看，李光耀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论述直接挑战巫统政权，比沈慕羽只要求列华文为官方语文甚至官方应用文的诉求，不知危险多少倍。然而，这番针对“马来国会议员（其中许多代表乡村地区）和更多旁听席上的马来人”的发言，却让整500人的议院鸦雀无声。当李光耀指出“除非在农业和教育领域里推行对马来人实际可行的计划，否则即使马来语成为国语，人人都说马来语，马来人的经济命运仍然改善不了时，戴‘哈芝’帽……的国会议员当中好些人点头同意”。（同上，671）<sup>7</sup>

李光耀名则4种官语，实则独尊英文的做法，当然不能和沈慕羽对华文的热爱相比；然而，沈慕羽的语文运动并未能提出可说服马来同胞的论述，也是事实。华教运动在肯定沈慕羽的人格典范之余，也应该正视并力求超越他未能把非华人视为华文教育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的局限。

## 五、党国逻辑

历史问题如果能够问“如果不是这样”（what if），是不是如果沈慕羽能够有跨族群的视野与论述，华文教育就会有不同的结局？答案恐怕不然。

李光耀越能理解和维护马来人的利益，巫统就更加忌惮他，更加欲除之而后快。李光耀语惊四座的国会马来文演讲之后不到3个月，新加坡就被逐出马来西亚。李光耀的律政部长巴克猜测：“就是在那个时刻，东姑和他的同僚觉得最好还是把新加坡和李先生踢出去。”17年后，东姑告诉一个作者：“他（李光耀）马来语说得比我好，便以为名正言顺跟我一样，有资格成为马来亚的领袖”。（李光耀，1998：671-672）

如果沈慕羽能够如李光耀一样雄辩，能够让马来人看到宽待华文教育的好处，他是不是就能更好地扮演政府诤友的角色，为华文

<sup>7</sup> 较早之前，当李光耀强调特权只能帮助一小批的资产阶级，真正迫切需要的事是提高乡区广大马来贫民的赚钱能力；他的话竟然得到玻璃市州务大臣的认同。（李光耀，1998：667）

教育争到更旷阔的天地？答案恐怕恰好相反，因为马来人如果不视华文教育为威胁，巫统就要寻找新的论述去说服马来人为什么他们一定要支持巫统。这里的关键是国家利益不等同于政府利益，而爱国很多时候就会为政府所忌。这种不为当权者所容的孤忠，历史上的最好例子是岳飞。从宋朝的国家利益来看，直捣黄龙、迎回徽钦二帝、一雪靖康国耻，当然是最好的事。可是，岳飞真要成功了，宋高宗还能做什么皇帝呢？所以，岳飞如何能不死？

回到何启良的慨叹，为什么“这个‘主流’，在思想意识上却做了一生的政治反对派”？答案可能非常反直觉（counter-intuitive）：因为沈慕羽只想做根据本身认知去爱国、去追求国家利益，却没有考虑到当政者统治的维系问题；偏偏这种以“政府诤友”姿态出现的“天真、纯情爱国者”行为并不为政治体制所容。简单地说，不求富贵的沈慕羽只求报国，不从利害关系思考政治人物的得失，因此无法有效制约当政者。

而为什么巫统、联盟政府不能够如沈慕羽所期望的，让华人用其对联盟的支持，换取政府的公平待遇？

答案不能不回到政党竞争。自1955年，联盟三党（实际上是巫统一党主导）便取得国家的统治权，以各族分享权力的姿态共治。荷兰政治学家Lijphart（1977年）把1969年之前的马来（西）亚视为“协和民主”（consociational democracy）的典范。

从表面上去看，类似联盟的大联合政府（grand coalition）推翻了美国政治学家William Riker（1962年）的“最低可获胜联盟”（minimal winning coalition）理论。Riker的理论假定，政治本质上必然是零和游戏，没有输家就没有赢家。要取得最大的胜利果实，胜利者便应该尽量排除其他人，绝对不会拉拢一个不必要的盟友来分薄战利品。大联合政府的存在，因而意味着精英并不是只会追求本身最大利益的自私分子，而愿意分享政权。巫统政权的正当性，一部分就建立在这种“慷慨大方、大局为重”的形象上。

然而，如果“最低可获胜联盟”理论并没有错或者没有完全错，那么，大联合政府就必须不时排除一些人的利益，以增加其他人的利益。而谁会是被排除者呢？第一人选自然不可能是掌握国家

大权的巫统。换句话说，当所有族群都支持政府，使到政府过分强大时，非马来人的一些利益就必须被排除，以便让巫统政治人物能够向其选民邀功。反之，如果政权有动摇的危险，政府就必须向抗议者倾斜，争取他们回归。如果马来人与非马来人都有离心趋向，那么越离心者就必须越被争取。以2008年大选为例，虽然马来人与非马来人都有很多选票倒向在野党，因为非马来人的反风比较强，纳吉政府的政策就只好向非马来人倾斜，推出“一个马来西亚”。这和1990年非马来人选票倒向在野党导致国阵几乎倒台，国阵反而在选后3个月立即推出“2020宏愿”来挽回他们民心的做法一样。反观1999年与2004年，非马来人给与国阵可观甚至关键的支持，却在选后面对巫统极右派政客的攻击，因为巫统急于激化族群矛盾来挽回流失的马来人支持（1999年），或者相信本身可以追求更高的马来人支持，一举消灭新兴威胁公正党（2004年）。1969年后的政治变迁也可以用同样理由解释：半岛的非马来人在野党虽然在议席上大有斩获，其总得票率其实几乎与1964年一样；反之，回教党在半岛的得票却激增了9个百分点，严重威胁到巫统作为马来人代表的正当性。

简单地说，在这种荒谬的族群政治逻辑下，支持政府者必然被牺牲，反而是反对政府者可以得到政府的青睐。从这个角度去看，沈慕羽的语文运动成功与否，其实取决于联盟的马来人支持。如果马来人大力支持联盟，巫统就有条件可以做出让步。正因为巫统在1965年-1966年间无法稳住乡区马来人的支持，他就必须突出其族群英雄的形象，而华文教育便只好成为祭品。如果沈慕羽当时不领导华社抗争，巫统便可能更加步步进逼。然而，只要马来人不减低对华文教育的敌意，或者选票大力回归巫统减低其不安全感，沈慕羽领导的抗争再激烈，也不可能成功。

为什么会有亏待支持者、善待反对者这样荒谬的逻辑？因为联盟/国阵长期执政，使之自大，不见棺材不流泪。如果政权可能会随时更替，执政者就必须不可能视任何方面的支持为理所当然，可以任意把玩。沈慕羽这样的政府诤友兼支持者，就比较有可能得到当政者的重视。而为什么联盟、国阵之所以能够长期执政，正是因为原来的大联合政府已经通过操纵选举、以党挟国，把原来的民主体制



逐步改装成“选举型一党制国家”（electoral one-party state）（黄进发，2007年），从结构上把政党轮替的风险减至近乎零。

从这个角度去看，1971年沈慕羽答应马华的邀请，出席“华人团结大会”，提出民族平等、多语主义、尊重人民受教育权、教育机会均等、填平贫富鸿沟、施政公平而非钳制言路、尊重国会等7项反建议，正说明沈慕羽一片报国赤诚，却未能看透政治体制的荒谬。“今天我以无党无派的身份参加大会，乃为我国家前途及民族利益，没有其他目的。（掌声）今天大会的热烈情况，乃象征华人的初步团结，只有团结华人才有得救。（掌声）……”（《石在火不灭》，页193-194）。

诚然，沈慕羽心里只有国家前途及民族利益，当道者却未必如此，而沈慕羽也未能见及此。马华能够通过鼓吹华人大团结，增加联盟的支持力量，是符合巫统的利益。然而，华人大团结若是使马华变成有效的外造政党，忠实地执行华人选民的意志，巫统便不能推行亲马来人的政策，以从回教党身边抢回选票了。沈慕羽之后在怡保的演讲，鼓起华人的民族自尊心，因而受到当局以《煽动法令》对付之，因此并不出奇。

当1987年的巫统党争导致族群关系出现紧张时，沈慕羽再一次成为“选举型一党制国家”挽救政权的祭品。当他的牢友林晃昇、柯嘉逊等在获释后投入在野党阵营时，他喻之为“民权的起义、民主的革命”，称“华团人士加入反对党是被逼到无路可走，只好走上梁山，因为几十年的奋斗，都不能接纳我们的建议”（何启良，1997：38）这句话可圈可点，说明在他心中，能够不做在野党，就不做在野党。他对国阵政府失望，但这种失望恐怕不是基于类似潘恩（Thomas Paine）对政府作为“必然之恶”本质的体认，或者对政党政治荒谬逻辑的参悟，而更多是因为他还怀有传统儒家对好政府的期待。

## 六、结语

不求富贵，不畏牢狱，沈慕羽无疑是华社政治人格的典范。何启良对“主流”的他，“在思想意识上却做了一生的政治反对派”慨叹不已。他的“主流”并不在于其主张，而在于其心态。从国民党到马华公会，他参加的都是执政党。因为不求官位，却努力辅选，以公民社会领袖身份投入政党政治的他，视自己为政府的支持者和诤友，希望自己的政治理想能够落实。沈慕羽担心1967年马来文成为唯一官方语文后，华文前途堪虞，因此以围魏救赵之姿推动华文列为官方语文运动。然而，由于巫统不允许马华继续成为外造政党，服膺于党员的意志，坚持原则的沈慕羽最终被已经变质成仅仅竞选机器而已的马华开除。

沈慕羽固然未能超越族群视角，争取马来同胞认同。然而，这不是沈慕羽必须被开除的原因。真正原因是，联盟的一党独大形成了畸形的生存规则：必须不时排除支持者，而越天真地支持政府、不懂得操纵当政者利害去诱迫当政者，就越可能是牺牲的对象。而沈慕羽只想做根据本身认知维护国家利益的“单纯、天真爱国者”，因为自己支持政府就理所当然地期待政府回报，偏偏如此有期待、无谋略地去爱政府，最不能为政治体制所容。

从这个角度去看，除非能够打破这个体制，除非这个国家民主化、正常化，沈慕羽作为少数族群领袖，对国家、政府的孤忠被冷待的悲剧，其实无可避免。我们在崇仰沈慕羽“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儒家人格典范之余，也必须看到他思想上的局限。他看不透政府的自利本质，看不清国家与政府利益的差异，始终怀抱着对好政府的憧憬，希望自己的爱国赤忱、对政府的拥戴，能够换来政府的肯定和政策上的改变，而不问如何以利害使政府就范。简单地说，他尽管参与民主政治，却缺乏深层的民主意识。这一点，以一介书生之态辅政报国的他，识见远不如曾经试图直接engage（连接？）马来社会的林连玉，或者在“打入国阵、纠正国阵”失败后就戮力鼓吹两线制的林晃昇。

这种政治上的天真（innocence），正是沈慕羽的“能动性”为何无所逃于“结构”的悲剧之核心。新教神学家Reinhold Niebuhr

说：“人性之趋恶使民主变得必要，人性之趋善使民主变得可能”

(*Man's capacity for evil makes democracy necessary and man's capacity for good makes democracy possible*) 马来西亚华社的集体政治悲剧（至少在308之前），或许正是不能正视人性之趋恶与民主的必要性却企盼好政府的出现——沈慕羽孤忠而不遇的悲剧，因而不断以另一种形式在一代又一代悲号“我爱国家、国家为何不爱我”后流放或隔离的华裔马来西亚人重复，也继续在那些缺乏沈慕羽道德高度却对政府存有幻想的华教领袖身上变调上演。

## 参考书目

何启良：〈大马华人史上的沈慕羽〉，载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1997年。

黄进发：〈马来西亚50年——选举型一党制国家的打造？〉，载孙和声、唐南发编《风云五十年》，吉隆坡：燧人氏，2007年。

《沈慕羽资料汇编》编辑委员会：《石在火不灭》，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1996年。

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1997年。

郑良树：〈总序——儒家文化的实践者〉，载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1997年。

Duverger, Maurice. 1959. *Political Parties: Their Organis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 (B. North and R. North, Translation). London: Methuen.

Horowitz, Donald. 2000. *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 2nd Edition.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ijphart, Arend. 1977. *Democracy in Plural Societies: A Comparative Exploration*.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Means, Gordon P. 1976. *Malaysian Politics*. 2nd Edition.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Riker, William H. 1962.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Coalition*.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第三部分

# 立大本、知化育：

## 沈慕羽与文化



# 立天下之大本 知天地之化育

中华文化<sup>1</sup>视野中的沈慕羽<sup>2</sup>

■ 吴前进

## 一、引言

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承与传播，历来是华人知识精英的使命与承担。马来西亚华人文化有今天的成就，凝聚着一代华人“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的赤忱。本文以华教斗士沈慕羽先生的坐言起行为视点，探讨华人精英如何在马来西亚建国历程中，把中华性融入到本土化与全球化交织的实践中，从而为移民（文化）与民族国家的相互关系找寻安身立命、共同繁荣的根基所在。本文从中国/中华文化的视角探讨沈慕羽先生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史上的贡献与局限，并尝试从以下层面切入和回答一些疑问：一、中华性在域外的适应性，包括它在居住国的延续和发展，是否有助于华人族群民族记忆和文化更新的维持或强化？沈慕羽先生和其他马来西亚同代著名华教领袖一样，为马来西亚华人族群指出了怎样的方向？；二、这种中华性在域外的发展方向，是否能够抵消居住国政府愈益迫切的本土化要求和世界范围内普遍的西化趋势？马来西亚年轻一代华人如何评价华教领袖的历史遗

<sup>1</sup> 本文的“中华文化”，指的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多元文化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融合、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具有稳定形态的中国传统文化，它包括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生活方式、礼仪制度、风俗习惯等多层面内容。

<sup>2</sup> 沈慕羽（1913年-2009年），是出生于马六甲的华人，孙中山先生的信徒。早年受父亲政治思想的引导和影响，目睹“中国受到列强的侵略，华人到处受凌辱”的困境，奠定和培育了他关心人群、社会与国家的责任与情怀。同时，中国南来的国学名家和才学出众、家学渊源的诸位师长又训练、传授了他中华文化的扎实功底和儒家思想的丰厚学养，奠定和培育了他“良师兴国”的理念和气宇不凡的浩然正气。1933年，年轻的沈慕羽开始了他人生理想和职业生涯的毕生实践——一辈子从事挚爱的华文教育工作，成为当代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上为人敬仰的华教先驱。

产和现实价值？；三、中国经济发展与综合国力的提升，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的广泛推导，如何与当今海外华人的既有文化互为关联？中国官方、媒体和学者，特别是文化教育人士又如何从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发展的历程中感受到震撼与启示？所有这些话题，都是我们今天透过沈慕羽先生观照中华文化价值的意义所在，他逼迫政府和人民共同去思考如何在全球化的时代中自处，以及如何在自我和他者的关系中，找寻历史和现实互为协调的方向。

## 二、本立道生：沈慕羽心目中的国家文化

在当代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上，如何看沈慕羽以及同时代的华人精英所代表的中华文化？并不是三言两语能够描述清楚的。这是一段马来西亚华人文化薪火相传的历史，这是一个交织着过分族群意识对立的年代。在这段历史和这个时代里，华人所承载的中华性不断遭遇本土性的压迫和西方化的挤压而不时地寻求与之互为适应和协调的方向。沈慕羽是这段历史和这个时代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他为华人族群民族记忆的维持与文化更新的未来，耗尽了心血，付出了牺牲。他在这段历史和这个时代所体验到的全部忧喜与悲乐，正是马来西亚华人族群所经历的忧喜与悲乐，这份忧喜与悲乐都与一件事有关。这件事非关个人，而是整个华裔族群千秋万代精神价值的传承。这种传承，恰是过去年代以来，马来西亚国家领导人所力求避免的，这种传承又恰恰是马来西亚华人迄今为止的文化悲情所在。马来西亚华人知道，在从殖民主义时代到民族国家建设的道路上，沈慕羽和其他的华教领袖，对于多民族国家文化建设的期许和贡献，恰是透过对多元文化理想的秉持来推展他们心目中的华语华文教育<sup>3</sup>的。然而，这种理想的追求和执着，让沈慕羽的人生充满

<sup>3</sup> 华人族群的母语文化教育，又称华文教育，主要是针对华裔子弟所实施的汉语与中华文化的教育。华文教育源于早年的华侨教育。随着世界英语经济价值的增长，加上二战后以东南亚诸国为代表的许多原殖民地国家的纷纷独立，当地政府对华侨教育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限制甚至取缔，华侨教育逐步转变为华文教育。见薛纪达：〈中华文化与华文教育的未来〉，《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5年第21期，页49。目前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指的是由华文学校提供的以华文华语为主要教学媒介用语的学校教育。在华文学校，华文为第一语文，国文（马来文）和英文为第二语文。对马来西亚的华裔子弟而言，华文教育就是他们的母语教育。马来西亚97%的华人家长会把孩子送到华文学校就读。



艰辛和曲折，他不但和政府倡导的主流文化形成对冲，而且也和族群内部不同意见领袖构成冲撞，由此倍受打压。当人们回过头来审视沈慕羽和马来西亚当代史的关系，当可感悟到这种冲突背后的政治考量远大于文化意蕴。沈慕羽的独特之处在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为了文化，他投身政治，淡定从容；为了文化，他舍弃政治，淡泊明志。<sup>4</sup>在他眼里，政治是服务于文化的手段，而不是相反。为此，他用毕生精力去推展和实践他心目中的社会理想与文化价值。

## 1. 中华性实践的根本：华人族群民族记忆的维持

“语文乃民族的灵魂”，中华文化与华人族群的关联透过华文华语得以体现。作为一个出身于“革命家庭”且受过中华文化严格训练和教导的年轻才俊，沈慕羽一生致力于中华性的实践，并把它综合在三种身份中：华教工作者、政党成员和社团领袖。

作为华教工作者，沈慕羽奉行的是“吾道一以贯之”的精神。这个“道”就是华文教育之道，它是华文教育的思想、实践和方法的总体现。早在1933年，马来亚尚处于英国殖民统治时期，沈慕羽有感于当时华人社会流行福建话，听不懂华语（普通话）的尴尬，<sup>5</sup>遂根据中国国内的注音符号拼音，<sup>6</sup>规定交流或教学所发语音，须学

<sup>4</sup> 沈慕羽1949年加入马华公会，1966年被开除。政治生涯总共17年。何启良：〈马华历史上的沈慕羽——《沈慕羽事迹系年》序〉，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沈慕羽资料汇编三），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1997年4月版，页33。

<sup>5</sup> 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页25。

<sup>6</sup>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政府继续推行国语。在推行国语的热潮中，国语标准音经过“京（音）国（音）问题”大辩论，由“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修正为纯以京音为准的新国音，其后注音字母更名为注音符号，成为推行国语的利器，使国语进入师范及小学语文教学中，在电台广播、电影、话剧等领域中建立了牢固阵地。民国时期，从官话到国语，从老国音到新国音，国语运动最重要的一条历史经验就是使自然形成的没有明确标准的初级形式的民族共同语（官话）成为有明确规范的高级形式的民族共同语（国语和普通话）。国语运动明确宣布以北京（系）作为统一全国语言的标准音，这是最大的历史功绩。它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所开展的汉语规范化运动、推广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奠定了基础。〈汉语拼音方案与注音符号、国罗、北拉的历史渊源关系〉，载“中国国学网”网站，2008年5月5日，<http://www.confucianism.com.cn/html/hanyu/5186822.html>。

标准语，率先在母校培风学校发起语言革命。稍后，又在马六甲晨钟夜校讲授华语，意图透过传授华文和华语，播下第一批说华语的种子，<sup>7</sup>以有益于华人社会内部的沟通和交流。1956年9月22日，为推广华语的使用，沈慕羽在马华公会青年组首届全马代表大会各组报告工作时用华语发言，他说：“为了民族自尊，我人应以讲本身语言为荣。”会众初大为震惊，后掌声雷动。此举打破了马华历来议事以英语为媒介语的惯例，为马华奠定了华语作为华人机关会议语言的基础。<sup>8</sup>以后，在多种国际场合，沈慕羽都强调华语是联合国五种官方语文之一，使用华语发言，感觉无限光荣。<sup>9</sup>1973年，沈慕羽担任汉字简化委员会副主席，负责推行汉字简化事宜。为此，他提出五点客观公允的简化原则，归结起来是：简体或繁体，由人民选择，不宜强迫，只要简得合理，无损中华文化尊严就可采用。此外，简繁体须要学习和对照，以利整理国故，传承文化。<sup>10</sup>70年代，沈慕羽在马六甲设立中文图书馆，用以启发民智，宣扬学术，跟随时代进步。<sup>11</sup>这样，从统一华语发音到奠定将华语作为华人政党工作语言应用的基础，再到汉字简化原则的提倡，以及中文图书馆的设立，这一切的身体力行，都在敦促马来西亚华人保持和保存民族文化的记忆和血脉，以光大传承中华文化。

作为政党成员和社团发起的倡议人，沈慕羽保持民族文化记忆之道在于两个面向的努力：一是在体制内透过政党政治方式争取华文教育的平等地位；二是在体制外透过民间社团方式寻求华文教育的自救之道。二战结束后，冷战的国际背景，以及东南亚各民族国家建设的迫切要求，导致华人面临强制同化、华文教育受到排斥和限制的艰难处境。但与其它一些东南亚国家不同的是，马来亚的华人没有因此消沉。相反，为了保存和延续族群文化的香火，他们以合作的态度、合法的步骤、合理的论说，向具有一定民主精神的马来执政当局表达作为公民、政党和社团的各种建设性主张。尽

<sup>7</sup> 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页25。

<sup>8</sup> 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页72。

<sup>9</sup> 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页116。

<sup>10</sup> 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页128。

<sup>11</sup> 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页142。

管在这个过程中，对于如何维护华文教育权益在方法手段和目标达成上，华教人士、马华公会<sup>12</sup>各有观点和侧重，但作为华人族群的一分子，任何人都无法否认有必要保持民族文化的根本！沈慕羽正是在这种有限的民主环境中，以一位本土公民和政党成员的身份去合法合理地寻求华文教育的可能空间。1951年，马来亚联合邦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在林连玉和沈慕羽的共同倡议下成立，宗旨是：“谋求华教同仁之福利，发扬中华文化，争取华文教育在本邦的平等地位”。<sup>13</sup>1954年，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成立，与“教总”一起捍卫华文教育。两大机构并称为“董教总”，加上“马华公会华文教育中央委员会”，通称“三大机构”，代表华人社会共同向政府争取华文教育公平合理的权益与地位。<sup>14</sup>然而，马来西亚政府当局在文化教育政策上，一直坚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种语文”的一元文化政策，令华文教育被排斥在国家教育体制之外，华人文化权益受到极大剥夺和损害。1965年，沈慕羽要求政府将华文列为官方语文，<sup>15</sup>此举未获成

<sup>12</sup> 1949年，马华公会起初为一个福利机构，目的帮助在紧急状态下亟需协助的近50万华人在新村建立家园。首任会长陈祯禄。1951年，马华公会转型为政党，与巫统及国大党组成联盟，代表三大民族争取独立。60年来，马华公会被国内马来族群的代表政党（巫统）视为忠实可信的伙伴，参与制订政府决策，有一定发言权。今天，华人能在宪法保障下享有宗教信仰自由、母语教育选择自由、合法经商以及弥足珍贵的公民权利等，马华公会扮演了一定角色，贡献无法抹煞。见〈马华公会60年〉，《南洋商报》，2009年7月3日。然在对待华文教育态度上，马华公会领导层的自卑与缺乏信心，为华教人士不满。沈慕羽和其他华教人士在争取教育平等地位的过程中，面对两股阻力：第一层是马华公会领导层；第二层才是巫统。参见何启良：〈大马华人历史上的沈慕羽——《沈慕羽事迹系年》序〉，载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页121。

<sup>13</sup> 〈教总简介〉，载“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网站，2008年7月5日，[http://web.jiaozong.org.my/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43&Itemid=35](http://web.jiaozong.org.my/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43&Itemid=35)。

<sup>14</sup> 陆建胜：《从“分进合击”到“联合出击”——马来西亚华文董教总的早期发展》，台湾：台湾暨南国际大学历史学系博士论文，2008年。

<sup>15</sup> 1965年8月7日，“马来西亚华人注册社团代表大会”召开，全国40余个社团一致议决成立“马来西亚华人注册社团代表大会筹备工作委员会”，沈慕羽出任主席。11月4日，“马来西亚华人注册社团代表大会筹备工作委员会”提呈《为争取华文地位向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呈送备忘录》。见〈华教大事记要1954-2004〉，载“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网站，2009年7月28日，[http://www.djz.edu.my/resource/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787&Itemid=75](http://www.djz.edu.my/resource/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787&Itemid=75)，2010年9月27日。

功，<sup>16</sup>华人社会的内部分裂却由此宣告明朗：一派以马华公会的陈修信为代表，一派以“教总”的林连玉和沈慕羽为代表，双方在华文教育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和立场，造成华人社会的分裂。同年，53岁的沈慕羽被推选为马来西亚华校教师总会主席。<sup>17</sup>此后，他领导的“教总”为华文教育历经无数挫折、困顿，从不言悔。所谓“服务一生，战斗一世”的格言，正应验了沈慕羽一生一世保持中华文化、推展华文教育的努力和不屈。

## 2. 中华性实践的路径：多元民族文化和合的必然

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代表和主流思潮。它对于中国历史文化发展，乃至中国人的人格形成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种思潮同样延续和扩展到华人社会中。在马来西亚华人印象里，沈慕羽不仅是一位昂然挺立、不屈不挠的华教斗士，更是一位倾心呵护、致力传授中华文化的儒雅之士，他一生所体现出来的政治品格和文化人格，既有对马来西亚国家的政治忠诚和肝胆相照，也有对华人社会的文化挚诚和登高一呼。即便面对艰难时局，他仍然秉持“深入而不极端，忧时而不孤愤”<sup>18</sup>的中庸精神，遵奉和实践他心目中的儒家学说，且以此为处世立命之本。

沈慕羽一生和华文教育以及华校教师会总会的发展紧密相连。从1951年《巴恩报告书》<sup>19</sup>始，到1952年教育法令、1954年教育白

<sup>16</sup> 1966年10月18日，马华中央委员会通过两条议案：（一）不能支持华文为官方语文，因为此举有违宪法第152条，马来文为国语及唯一官方语文；（二）开除沈慕羽党籍，因其违反党纪，使党受到讥嘲与蔑视。谢诗坚：《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飞扬网络，[http://seekiancheah.blogspot.com/2004\\_05\\_01\\_archive.html](http://seekiancheah.blogspot.com/2004_05_01_archive.html)，2009年4月12日。

<sup>17</sup> 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页99。

<sup>18</sup> 何启良：〈大马华人历史上的沈慕羽——《沈慕羽事迹系年》序〉，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页25。

<sup>19</sup> 消灭华文教育计划始于1951年6月10日正式公布的《巴恩报告书》。该报告书提出：为了促进共同国家意识，使学生把马来亚视为永久故乡和效忠对象，小学应建立一种新的“国民学校”，以英文及巫文（马来语文）作为教学媒介语文，而以其它语文为教学媒介的学校将被逐步取消，其最终目的是消灭所有华文学校和泰米尔文学校，实现“教育马来亚化”。1952年，马来亚的教育法令又包含了《巴恩报告书》的主要内容，消灭华文教育的计划以法令形式被合法化了。

皮书、1956年《拉萨教育报告书》<sup>20</sup>以至1960年《达立教育报告书》<sup>21</sup>和《1961年教育法令》<sup>22</sup>，沈慕羽都和当时的华教领袖（林连玉、陆庭谕等）一起，以个人的奉献精神 and 族群的奋斗力量抵制政府当局对于华文教育的各种打压举措，以此表明华人族群文化选择的方向和马来亚/马来西亚民族国家建设期待的目标理应互为相容，而非彼此排斥。他说：“我是一个忠诚、爱国的马来西亚人。”<sup>23</sup>“我们身为公民有责任维护政府，纠正政府的错误，……我们这班人，纯良而诚实，我们从事社会工作，以服务为目的，

<sup>20</sup> 1955年8月马来亚联合邦大选，华、巫、印联盟获胜，掌握政权。联盟政府为实践竞选诺言，成立一个15人教育政策委员会，负责检讨《1952年教育法令》及《1954年教育白皮书》，同时负责建议新教育政策。该委员会草就《1956年教育委员会报告书》，后来称为《1956年拉萨报告书》。据该《报告书》中第12段条文称：“我们进一步相信，本邦教育政策之最终目标，必须将各族学童集中在一个以国语作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国家教育体系，虽然我们认识到达成这目标的过程不能操之过急，而且必须逐步推行。”当这份《报告书》公布后，华社坚决反对这个条款。当时的教育部长拉萨向教总代表保证，不将“最终目标”列入新法令中。虽然在马来亚独立初期的《1957年教育法令》中没有“最终目标”的条文，但“最终目标”一直以来都是马来西亚的教育政策、法令与措施的主导思想，也是数十年来教育问题产生争议、纷争，甚至对峙局面的根本原因。〈《拉萨报告书》与“最终目标”〉，载“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网站，2005年8月26日，<http://www.djz.edu.my/hjdaobao/hj.php?id=58&period=56>。

<sup>21</sup> 1960年8月，政府发布《1960年达立报告书》，在“创造国家意识”前提下，提出以两种官方语文（巫、英文）为各源流学校主要教学媒介。《达立报告书》实质是1951年《巴恩报告书》的翻版。〈《达立报告书》与《1961年教育法令》〉，载“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网站，2005年8月26日，<http://www.djz.edu.my/hjdaobao/hj.php?id=41&period=57>，2009年11月23日。

<sup>22</sup> 《1961年教育法令》重申马来语为国语，接受全额津贴的以马来文为教学媒介语的小学为“国民学校”，其它源流小学则被称为“国民型学校”；政府不承认华文中学的地位。从1962年1月始，只有已改为“国民型学校”（用马来语或英语授课）的中学，才可获得全面资助，拒绝改制的学校被排除在政府教育体制以外，不予补贴；不改制的中学成为“独立中学”（简称“独中”），政府允许独中继续存在，但须受教育法令约束。所有中学会考只以官方语文（即英文和马来文）出题。《1961年教育法令》提出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国家团结……让接受国家资助的学校取代各语文中学，以确保各族学生都进入国民与国民型中学”。〈《达立报告书》与《1961年教育法令》〉，载“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网站，2005年8月26日，<http://www.djz.edu.my/hjdaobao/hj.php?id=41&period=57>，2010年9月27日。

<sup>23</sup> 沈慕羽〈九十五大寿讲词—2007年7月30日〉。〈永远的沈慕羽·沈慕羽语录〉，载“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网站，2009年2月23日，[http://smy.jiaozong.org.my/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8&Itemid=6](http://smy.jiaozong.org.my/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8&Itemid=6)。

不以夺取为目的。”<sup>24</sup>他以“诚”意来对待国家、社会和人群，表达“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关怀和道义责任。所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凭借的恰是“至诚”的精神，去努力引导华人族群参天化育，去共同建构他心目中理想的马来西亚社会。

沈慕羽理想的马来西亚社会，当属天下大同的社会。1951年4月4日，沈慕羽在《中兴日报》上强调：“在教育立场上，各民族应有发展其固有文化之自由，大家互相尊重，各不相悖，世界可以大同。”又说：“马来亚新的教育政策，应放弃过去偏窄优越的错误观念，执政者要有远大眼光，尊重各主要民族合理的愿望，以平等合作来求教育的统一。须知消灭华人文化，不特华人之损失，抑马来亚之重大损失，马来亚需要华人，便得尊重华人文化。”<sup>25</sup>教育的目的在于训练世界公民，爱民族爱国家之外，爱世界与爱人类，世界和平有保障，天下可以为公。<sup>26</sup>沈慕羽的文化方向在于马来西亚民族国家建设所应选择的目标——种族平等，共建大马。他希望马来人能够了解，并且承认华人文化作为这个国家组成部分的独特价值。为此，他和马来西亚各个阶层展开多层次合作，以表达他对马来西亚民族国家建设的期许，一个充满大同理想的和谐社会。

沈慕羽理想的马来西亚社会，当属和合包容的社会。20世纪90年代后，海峡两岸的稳定局势以及中国和东南亚邻国之间商贸机会的不断扩大，令华文教育孕育出更多生机。对此，沈慕羽慎重提醒，在多元种族国度里，各民族团结与包容是主要的立国基石，华裔力求母语/文化发展的同时，须融入当地社会生活，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与履行公民义务，这是造福华文教育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sup>27</sup>他以言行表明自己是一个彻底的爱国的马来西亚华人。2005年，在孔子诞辰2556周年之际，时任马六甲孔教会会长的沈慕羽先生已94岁高龄，因了他的推动和促成，孔子大厦终于在马六甲落

<sup>24</sup> 〈辩白书/我的感想和意见/我的表白〉（1988年），载《沈慕羽资料汇编》编辑委员会编《石在火不灭——语文运动、团结运动、茅草行动》（沈慕羽资料汇编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出版，1996年6月版，页326。

<sup>25</sup> 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页50。

<sup>26</sup> 同上。

<sup>27</sup> 〈沈慕羽谈大马华文教育〉，台湾《侨讯》，2003年2月16日。

成，面对巍峨堂皇的孔子大厦和雄伟的孔子巨像，沈慕羽以“我敬孔子，我爱孔子，我永远敬爱孔子！”的肺腑之言表达对至圣先师的敬仰之情。<sup>28</sup>他希望当今马来西亚华人文化能够和中华传统文化根源紧密结合起来，在马来西亚国土上重新绽放出光彩。

许多研究者注意到，沈慕羽一生是忠诚于马来西亚的爱国者的一生，是奉献给华文教育事业的一生，是信奉儒家哲学的一生，是虽经万难而从不言悔的一生，他真正达到了“心底无私天地宽”的境界。综合他的人生格局，可以看到一位彻底归化的马来西亚华人如何在生养他的土地上为国家文化建设、为族群文化延续，矢志不渝，奋斗终身的历程。他首先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马来西亚人，尔后才是具有中华民族文化情结的海外子孙。由这样的人生格局出发，他对于国家文化建设的憧憬，对于中华民族特征的维护，便显得从容、淡定、自豪，他是有资格、有权利为马来西亚国家建设指出方向的。他期望华人族群能够在异域土壤上秉持中华性的理念，从而形成富有特色的华人族群文化。他期望华族子弟能够在国家建设中追寻母国文化的根源，从而形成独特的人格和自尊的精神。当然，这种简单朴素的愿景，并非由个人和族群的良好愿望即可达成。马来民族，特别是二战结束后致力于民族国家建设的马来西亚政府人士，对于当地华人以及华文教育的态度和政策，迄今并不乐观。正因此，当历史进入21世纪，人们一方面目睹了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体系发展的相对完备，另一方面也预见到华文教育所遭遇的种种困境。好在马来西亚华人，正是在林连玉、沈慕羽等华教事业先行者的足迹上，不断前行。

### 三、化育英才：沈慕羽的历史贡献和时代局限

马哈蒂尔称，世界上除了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之外，马来西亚保存了最为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他认为这是政府政策的效果，但这种效果又何尝不是马来西亚华教领袖的牺牲所换来的？沈慕羽以及林连玉等其他华教领袖乃今日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成就的最大贡

<sup>28</sup> 《沿着孔子学说的长河》，《走向世界》，2006年，页66。

献者。他们为马来西亚华族能够拥有完整的民族母语教育(华文教育)体系付出了毕生艰辛，留下了丰富遗产。从这份历史遗产中，人们多少能够感受到中华性在域外的适应性、兼容性，以及马来西亚华人在面临本土化要求和西化大趋势同时所做出的积极回应，那便是有利于国家建设和文化发展的选择——“有容乃大、无欲则刚”的精神气度。

华文教育在马来西亚已有190余年历史。<sup>29</sup>在沈慕羽担任“教总”主席的28年间，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诸多大事都有他的奋起与参与，如争取华文为官方语文之一，发起创办独立大学，推动独中发展运动，捍卫华小永不变质及成立教育研究中心等。<sup>30</sup>目前，马来西亚已拥有1291间华文小学（约63万学生）、<sup>31</sup>60间华文独立中学（学生人数已由1973年的2万多人发展到近6万人）、<sup>32</sup>78间改制的国民型中学和3间朝着中文大学发展的华文学院（南马的“南方学院”、中马的“新纪元学院”和北马槟城的“韩江国际学院”，设有中文系，约4千学生）。2001年政府批准承认华人筹资建立拉曼大学。至此，马来西亚成为两岸三地以外华文教育体系最为完善的国家。马来西亚华人的汉语水平，也属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之外，最为优异的。建国以来，马来西亚的华文学校在提升国民素质，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华文独中培育了近10万名具有3种语文基础的高中毕业生，其中半数先后在国内外继续接受大专教育。这批接受华文教育的建国人才，不论在政治、经济

<sup>29</sup> 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若从1819年在槟城建立的第一间私塾五福书院算起，已有190余年历史。

<sup>30</sup> 郑良树：〈总序——儒家文化的实践者〉，收入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页5。

<sup>31</sup> 华文小学虽已纳入国家教育体系，但政府拨款不足，仍须靠华社筹款建设。

<sup>32</sup> 至于60所华文独立中学及3所学院（南方学院、新纪元学院及韩江学院），属完全由华人社会出资创办、维持和发展的非营利教育机构。目前，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每年至少要捐2亿马币，方可维持所有华文学校（小学、中学及学院）的办学经费。莫泰熙：〈英文教育回流对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挑战〉，载“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网站，2005年8月26日，<http://www.djz.edu.my/hjdaobao/hj.php?id=79&period=54>。



或文化领域都做出了重要贡献。<sup>33</sup>而华文教育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则是直接催生了马来西亚华文作家队伍的形成与华文报业<sup>34</sup>的繁荣，此乃马来西亚华人，较之世界其它各地华人所独有的文化优势。无可否认，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过程中，政府人士基于民主政治的雅量，在一定程度上为华文教育的维持留下了适当的空间。它也因此提示给人们一个无可避免的话题，马来西亚政府主导的国家文化整合政策和华教斗士追求的华文教育平等权，是否经过磨合达到了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华人文化教育权利的维护，是影响到马来西亚民族国家建设目标的达成，还是有助于共同目标的形成？马来西亚建国历史显示，中华性和本土性透过文化教育政策的不断争执，至今未有平息，但这种文化争执的背后，归根结底仍在于族群政治的纠结，它绵延缠绕，延续着马来西亚社会多元文化的曲折发展。

毋庸讳言，建国以来，马来西亚华人中的一部分人，一直被政府人士视作极端分子，民族文化沙文主义者，他们所代表的中华文化由此也被视作为僵硬而封闭的排他性文化，有违和有损其本身的文化精神和实质，特别当华教领袖提倡华文教育时，这种所谓的“文化悖论”时有浮现。对此，年轻的华裔学生给予了很好的答复：“建国以来，马华社会的最大心声之一是争取族群的教育机会，摆脱贫困的命运。进一步来说，华社努力争取的是政府能够平等对待华文教育，不要把除了马来文以外，其他民族的教育视为‘阻碍国民团结’的绊脚石，这是极为偏差与不符合事实的理由。世界不断进步，马来西亚政府应该意识到华人对于华文教育权利平等诉求的合理性，它符合联合国倡导的‘接受民族教育是基本人权’的主张。”<sup>35</sup>年轻的华裔学生也认为，马国作为多元种族组成

<sup>33</sup> 〈办好华校协助实现我国2020宏愿：有关当前我国华教的迫切问题和我们的要求与建议——董教总呈给政府的教育备忘录〉，载“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网站，1995年7月21日，[http://web.jiaozong.org.my/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112&Itemid=3](http://web.jiaozong.org.my/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112&Itemid=3)。

<sup>34</sup> 本地华文报纸主要有星洲日报、南洋日报、光华日报、新明日报、东方日报、中国报、亚洲时报等，发行量均在10万—50万份之间。黄育顺：〈从抗震救灾看到中华民族——兼谈法国华人社团〉，《联合早报》，2008年7月1日。

<sup>35</sup> 周凯琴：《沟通与对话的桥梁——论马华文学的马来翻译作用》，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硕士论文，2008年。

的国家，政府应该以开明的态度，容许各民族自由选择是否接受母语教育的机会。马国华人强调学习母语，并不是沙文主义的表现。实际上，华人在维护自己母语时，并不看轻其它语言。在华校，学生也学习马来语和英语，并尊敬他族的文化与宗教信仰。因此，提倡母语与华教本身并不能称为沙文主义，也绝不是挑起种族情绪及破坏国民团结的元素。<sup>36</sup>这番恳切的论述，不仅完整地表达了年轻华裔学生对维护民族文化教育权利的坚定和向往，更反映了华教先贤多年的文化主张和奋斗实践，终于经由现实的触动而体现为华裔青年的自觉、追求和坚持。华教先贤历史遗产和精神价值的延续，脉络可见。

马来亚/马来西亚建国以来的事实表明，中华性在域外的发展，不但没有抵消居住国政府的本土化要求，反而有助于把中华性融入到本土化的实践中，从而为马来西亚民族国家的建设提供具有更宽广视野的人才。但遗憾的是，接受华文教育的年轻一代华裔由于在本土长期得不到充分发展而不得不远赴海外。台湾学者朱宏源教授对于马来西亚华裔青年的痛楚十分理解。他说：“马来西亚华人仍在漂泊当中，他们虽然法律上定居于马来半岛与婆罗洲北部，但并未被赋予民族平等之应有权益。虽然下决心锲而不舍地争取，也有若干成果，但1963年建国后整个华族被压抑，他们的子女，由于在联邦之内既要融合，又不可能完成的双重压力下，显得特别有患难之感。”<sup>37</sup>这些接受华文教育的马来西亚年轻华裔子弟不得不去新加坡、中国台湾、香港和大陆求学与就业，他们自嘲、无奈和失落。这种在本土无所伸展的悲哀，不只是马来西亚华人青年的悲哀，更是马来西亚国家建设所应该反思的地方。

有研究者指出：“从种族政治来看，母语教育是最具分裂性的议题。对马来民族主义信徒来说，唯有以国语教学媒介的单语政策，才能促成全民团结，他族人士无法说服他们放弃或修改这个基本信念。因为马来民族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建设一个马来民族邦国，是‘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个领土’的特色，故此，单语教

<sup>36</sup> 同上。

<sup>37</sup> 朱宏源：〈大马留台学生认同心态的转变：1952-2005——《大马青年》内容分析〉，所载刊物不详。

育成为马来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内容。华社自独立迄今，深感民族文化将被消灭，集中族群政治与经济资源以捍卫华教，一路走来，皆以少数民族母语教育的基本人权，做据理力争。但这个坚定立场，与国家教育政策的政治议程，毫无融汇整合而化解的余地吗？”<sup>38</sup>历史发展到今天，应该可以找到答案，即语言源流与种族团结可以合二为一。如今大多数马来西亚华人会讲多种语言，马来语、英语和华语，在全球化时代，根据语言及教育渊源不同而分裂成不同的认同观与价值观的那种非此即彼的对立，在越来越强调相互依存和相互包容的世界里，当放下彼此心结，去化解和整合不同源流的族群社会。换言之，马来西亚华人，无论高度本土化，还是低度本土化，抑或处于二者之间的大多数类型，他们都善于在族群与社会之间寻找互为协调、彼此融会的中庸之道。正因此，马来西亚华人，是华人也是马来西亚人，又是不受地域束缚的跨国华人，他们之于中华文化和本土文化的认同，反映了华人地方化经历的变迁，<sup>39</sup>以及中华文化在海外土壤中实现嫁接与变异的历程。马来西亚华人有别于其它国家的华人，在于他们是一群有着鲜明族群身份和文化认同的华人，他们既担负着历史的传承性，又经历着本土的变异性，以至于其中华性特征包含着融入本土之后的地域性和时代性——身为马来西亚华人的香港中文大学陈志明教授对于“本土化”的解释是，地方化过程，一种包含对地方地理社会环境的文化适应及地域认同。这种文化适应不仅仅包含受地方势力影响的消极过程，同时也是一种积极参与及创新的过程。<sup>40</sup>马来西亚华人类群的中华性正是在地方化的实践过程中，彰显其文化的持久生命力。

今天的马来西亚华人青年如何在历经本土化的实践之后，重新评价沈慕羽及其华教先辈的历史贡献？他们是否还需要沈慕羽这样的华教斗士继续为年轻一代去赢得华文教育的权利？答案多种多样，但一个共同点在于，沈慕羽先生虽然故去，但他树立的华教精神不倒。

<sup>38</sup> 沈观仲：〈种族政治矛盾外化——对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审思〉，《南洋报》，2001年3月31日。

<sup>39</sup> 陈志明：〈马来西亚华人的认同〉，《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0卷，第4期（1998年10月），页13。

<sup>40</sup> 同上。

1. 沈先生一生致力于推动华文教育，你以及同时代的年轻华裔子弟如何评价他？——答：“沈先生受到全体华裔子弟的尊重，他的贡献和地位不容质疑”。“见仁见智。有些年轻华裔子弟已不是很记得先贤的努力，只是享用着他们努力的成果。也还有些记得他们的付出，但与生活没什么直接的关联了。”——评价：肯定、无奈与失落的交错，显示本土化压力下的华文教育现状多少有些落寞之象。

2. 你认为，沈先生对于华文教育的孜孜以求，对于今天的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是否还合适？需要做哪些改变和折衷吗？——答：“对华教的努力还需努力。今天的华教地位在马来西亚还是岌岌可危的，稍不注意就会被消灭了。马来西亚是除了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之外，华文教育办得最成功的国家，需要继续努力才能维持今日的局面”。“华人社会一直都需要像沈先生这样的人，今日社会还是需要。他对华教的理想一直没有改变，结合他对华教的知识和对政府政策的了解，随机应变。”——评价：肯定与维护的信心和决心，显示本土化压力下的华文教育未来面临危机和转机。

3. 在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如沈先生这样的华教斗士，是太多还是太少？他们的影响会持续下去吗？——答：“华教斗士不会少，但像沈先生那样不求私利，一心为华教，又有学问的还是太少了。他们的影响会继续下去的”。“太少。老一辈已凋零，少一辈已经没那个意识了，所以要维护海外华文教育尚需更多人的加入与努力”。“我个人相信现在还有一群为华教默默付出努力的工作者，但可否称之为华教斗士（毕竟这称号还是有一定分量和沉重成分在里头，总是跟事件、贡献、牺牲有关）尚待考量。对于现在为华教斗争者，我们并不完全了解，也就没法做更具体的评论。”——评价：坚信、期待与疑虑的并存，显示本土化压力下的华文教育界本身在分化和转化。

以上仅就沈慕羽在华裔青年心目中的影响和贡献所做的随机问答，不肯定能够涵盖多少华裔青年的心声，但这些评价至少显示沈慕羽留给后人的历史遗产和精神价值，影响在当下，留存在人心，且喜且忧。喜的是，华文教育在马来西亚的地位，毕竟属于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之外最为完备的地方。2007年，在马来西

亚《2006-2010年教育发展大蓝图》中，教育部已经着手在2010年把华文纳入正课，开始在全国150所国小开设华文班，并计划每年在100所国小开办华文班，以强化国小的目标。此举显示华文价值获得政府首肯，以及马来西亚政府致力于多民族融合的愿望；忧的是，华文教育在受到明显“提升”同时，又有被实际削弱的迹象。2007年，“教总”发表了《微型华小调查报告》，指出全国共有106所华小的学生人数在30人或以下的，占全国华小总数的8%，其中，学生人数少过10人的华小有22所。这类微型华小，由于学生来源持续减少而面临着随时关闭的危机。根据《微型华小调查报告》，自1981年至2007年，因生源减少而关闭的华小已超过16所，它们分布于东、西马各州。据调查，超过90%的华裔生，在华小毕业后进入国中，特别是改制国民型华文中学就读。这些学生由于付不起高昂学费而选择进入免收学费的国中或国民型华文中学（这些学校在国家12年义务教育制度下，一切开销由政府负责支付）就读，他们主要来自中下层收入家庭，<sup>41</sup>学生来源的日渐稀少，势必导致华文学校的式微。它似乎也预示着沈慕羽和华教先贤们为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开创的局面正面临凋敝的命运？对此，何国忠教授曾言辞剀切地指出，“马哈迪了解华人对族群前途凌乱不堪的心态，知道除了‘董教总’不断强调华文教育者任重道远之外，华社的整体文化危机感已经降化，维护‘华人’文化不容易成为一个强有力口号，要借危机来‘团结’华人，更不容易找到市场。多年经济高速增长以及新一代教育政策的洗礼，全球化的冲击，令马来西亚华人更容易治理了。”<sup>42</sup>他也指出，大马华人不存在国家认同的困扰，在多元文化的国家中，华人如何对自身的主体文化做调整才是政府与华人社会，以及华人社会内部的主要症结。<sup>43</sup>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使命是否应该转型，即与政府当局、马来人的马来西亚，或马/华/印的马来西亚保持一致，才是华教领袖不得不思考和面对的课题。

<sup>41</sup> 〈传承微型华小的精神薪火〉，《南洋商报》，2007年10月22日。

<sup>42</sup> 何国忠：〈马哈迪的族群政策与华人社会〉，所载刊物不详。

<sup>43</sup> 〈如苍松屹立——大马华教先驱沈慕羽〉，载“台湾光华杂志”网站，2005年6月，[http://www.taiwan-panorama.com/show\\_issue.php?id=200569406030c.txt&table=0&h1=%B5%D8%A4H%A5%40%AC%C9&h2=%AE%FC%A5~%B5%D8%A4H](http://www.taiwan-panorama.com/show_issue.php?id=200569406030c.txt&table=0&h1=%B5%D8%A4H%A5%40%AC%C9&h2=%AE%FC%A5~%B5%D8%A4H)。

为此，有学者敏锐地批评到：“马来西亚各民族之间大致上存在着‘和而不同’与‘融而不合’的现象。以华人和马来人交往来说，学习马来话和马来文是为了求学、工作、经商及从政等的方便，对马来人的文化和回教文明几乎没有人去认真研究，严格来说，华人对马来人及他们的文化并没有真正了解。华社其实应该重视这个课题。另一方面，马来人作为主体民族，不免具有优越感，因而很少人主动学习华文华语和华人方言，遑论研究中华文化及其各种哲学思想。总体而言，马来人对华人的了解，比华人对马来人的了解更少。”<sup>44</sup>南方学院祝家华院长认为，当今华文独中师资素质的培训是一个问题，而华校董教领导层青黄不接，华教“领导缺席”更是一大问题。华教领导层的认知、知识、视野、胸襟，较之于以往的陈嘉庚、林连玉、沈慕羽、林晃昇，是进步了，更为积极了，还是萎缩、被动了？今天的华教领导是否提出了更为明确的华教大方向，抑或是疲于应对国家机关主事者的讨价还价？要追问的是，当今华教的阵容是愈来愈壮大了，还是愈来愈难吸引年轻人的热诚参与？还有学者指出：现在大马华裔青年的身份认同是多元的，他们不一定只是“华人”的身份认同。像“华文教育是我们的母亲”这样的论述，对一些以英语或马来语为“母语”的华人家庭成员而言，听起来是很疏离陌生的偏激口号。华教究竟要培养出什么样的学生？这是大马华社要去思考的一个方向。大马华教的论述，还能引起新生代的共鸣吗？华教论述若再不改变，另寻新路，支持华教的力量和基盘是否将会愈来愈萎缩，陷入固步自封的境地。<sup>45</sup>所有这些问题的提出，反映出华教在地方化压力下和全球化逼迫下面临的困境。也就是说，华教人士必须在地方化和全球化的趋势中，去调整华教的方向，适合时代的走向。

这方面，越来越多的华裔人士已经认识到，华人族群有必要在国家教育政策下，学好国语（马来文），多了解和关注马来人社会现状。同时，人们也需要有更多的华人学者和中生代华人作家，用马来文写作，把马来文作品译成华文，或把华文文学作品及哲学

<sup>44</sup> 林金树：〈马来西亚华人的多元文化经验〉，《南大资讯》第17期（2006年12月）。

<sup>45</sup> 安焕然：〈大马华教精神的承传与寻路〉，《星洲日报》，2010年6月5日。

书籍译成马来文，这种双向的沟通和交流，对促进华、巫文学与学术交流会有贡献，对种族关系的和解与团结也有实际的帮助。<sup>46</sup>因为它更切合马来西亚作为儒家、兴都教、回教及西方基督教四大文明交汇的独特之处。人们相信，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作为全球华人社会中一个非常独特的群体，其所选择的道路，代表着中华文化和当地文化结合的努力，代表着华人群体在不断的跨文化交流中所体现的多元和谐的方向——它是华教先贤未竟的事业，需要后人去承继、努力和开拓。

综观沈慕羽的一生，他的贡献和局限已成为马来西亚社会历史和现实的一部分。在人生如戏的舞台上，他出演的是一部华文教育的正剧。也就是说，对于华教，他有明确的自觉意识。这种自觉意识表现在他为实现目的而付出的行动，表现在他对自身的审视和反思，即通过自己的行动，使这种要求有实现的可能性。正因为如此，沈慕羽的命运和结局有其完满性。他可以现实地实现着自己的意志，自由地创造着生活。在这个过程中，他既具有悲剧人物那种严肃的旨意、真诚的信念、深刻的思想，以及为所追求的目的而献身的精神，同时他又具有喜剧人物那种自信自足的情绪和性格。当然，正剧人物亦有局限性，但他不像喜剧人物那样对自己毫无所知。相反，他把自己置于自觉意识的对立面加以审视，从而在不断地肯定与否定中继续前进。这种身份意识恰如何启良所言：“马来西亚华人世代自强不息，虽然生活在边缘，然而爱土地，勇于拼搏，奋发图强，不落人后。他们热血之中所蕴含的，就是沈慕羽永远不屈服于万难的民族精神。”<sup>47</sup>

<sup>46</sup> 林金树：〈马来西亚华人的多元文化经验〉。载“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网站，2007年4月21日，<http://www.nandazhan.com/jijinhui/nf17p033.htm>。

<sup>47</sup> 何启良：〈永远的沈慕羽〉，《南洋商报》，2007年8月16日。

#### 四、跨国想象：沈慕羽之于中国文化的意义

沈慕羽是出生在马六甲的华人，但他的中国想象从来没有停止过。中国，对他来说，不止是一个地理概念和文化象征，更是一个孕育伟大文明的故土之国。沈慕羽一生中，到过中国大陆3次，<sup>48</sup>到过中国台湾6次。<sup>49</sup>这是一位和国民党有着特殊渊源的人，“他非常注意中国大陆的发展，他看到中国的强大对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和文化发展的正面冲击。”<sup>50</sup>他预见到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未来，除了内部的坚持之外，更需外部的助推。历史证明，华文教育与中国发展和国际时势，相互关联，顺之者昌。同时，历史也显示，海外华人文化的传承和传播，反过来推动和深化了中国文化/中华文化的内在动力和生命源泉。

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与综合国力的提升，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中华传统文化价值的广泛推导，让人有一种亲近的陌生感，因为这种根源性的文化价值，距离现今许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社会伦理已成为一种太过美好的忆念和理想了。中央之国的龙的传人，在文化传承和传播方面，不得不比照身处异域却时时以中华文化为己任的华人精英，并由此生发感慨，中华文化与当今的华人文化有着怎样的互为关联？中国官方、媒体和学者，特别是文化教育人士

<sup>48</sup> 第一次的中国大陆之行是1931年9月19日，当时沈慕羽19岁，父亲被中国国民政府委任为侨务委员，他担任父亲私人秘书，一起赴南京就任，并出席中国国民党“四全”大会。当年及次年，他还随父亲到了上海、厦门、泉州（晋江）故里，目睹壮丽河山，秀美风光，悠久文物，益增爱国心志；第二次是1991年4月4日，沈慕羽79岁，到中国游览并探亲，这是60年后再次踏上中国国土；第三次是1993年5月8日-21日，沈慕羽81岁，随“董教总”教育考察团到北京进行为期12天的访问，目的是探寻独中毕业生赴华深造的管道，顺道游长城。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页22-23、195-196、212-213。

<sup>49</sup> 1966年8月1日，沈慕羽54岁，随“教总”教育考察团赴台湾考察，受到热烈欢迎；1973年，61岁，随华商贸易大会代表团参加台湾“双十节”庆祝活动；1981年11月23日，69岁，随“董教总”同仁赴台湾考察教育，访问侨生，对台湾教育的先进，印象深刻；1990年2月9日-21日，78岁，台湾当局为慰劳沈慕羽为华教所作的辛劳，邀请他访问台湾及游览名胜；同年4月21日-30日，再赴台湾，参加侨务委员会主办的会议；1993年7月12日，81岁，沈慕羽在台北与留台同学进行座谈，鼓励他们为华教做贡献。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页105、133、149-150、188-189、213。

<sup>50</sup> 何启良回复笔者的电子邮件（2009年4月23日）。



如何从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发展的历程中感受到震撼与启示？

中国教育家舒乙对马来西亚华教人士的执着精神曾表示了由衷的敬重和感叹：“不到马来西亚，尤其是不到沙捞越，<sup>51</sup>不接触那里的华人，绝对不会知道语言的特殊重要性。对他们来说，除了水、空气、阳光之外，还有一样必不可少的生存条件，就是母语。母语，一种语言，如此重要，听起来，真是令人震惊。整整一个地区的华人，延续一百多年，在异国他乡，在非汉语作主要流通语或官方语的语境中，顽强地坚持说母语，这是非常罕见的文化现象。不但说汉语，而且为了延续不断，还教汉语，自办中文学校，由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普及率达95%，这太不简单了，变成了一桩大事，头等的大事。”<sup>52</sup>马来西亚的华教精英，一辈子所从事的正是这种罕见的坚持与努力，他们把华文教育的使命和承担视作整个人生的全部价值和生命意义。这种坚持与努力在马来西亚之外并不多见，这种坚持与努力对于华文华语的祖籍国——中国的文化精英而言，其内心的震撼与启示，自不待言。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20年来，海外一些政府人士、媒体和学者对于华人和中国的政治联系不再过于敏感和担心，对于彼此之间的经济联系也因为有助于地区经济的整体发展而乐观其成。相对来说，华人与中国的文化联系，反而被视作一种有碍于居住国民族国家认同的标志。这种担心所导致的疑虑是，中国的和平发展，是否意味着华人都要进入以汉民族文化语言为母语的华文教育体系，从而确立海外中华文化的主体价值？<sup>53</sup>换言之，华人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仍然构成居住国政府人士关心的主题，尤其对华人占人口1/4的马来西亚而言，这种困惑与担忧始终挥之不去，因为它涉及到马来西亚本土文化的塑造，关系到马来西亚国家建设所应选择的发展方向问题。

返顾中华文化与华人文化的关联，可分为两个大的脉络：第一

<sup>51</sup> 在沈慕羽居住的马六甲，从南到北，从乡下到城市，华语普及的程度，也曾令久居马来西亚之外的华人同胞惊奇不已。

<sup>52</sup> 舒乙：〈马来西亚华人对华语的坚持〉，载“百度知道”网站，2006年10月4日，<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3416179.html>，2009年3月9日。

<sup>53</sup> 张桃：〈汉语走向世界的时代〉，《光明日报》，2006年6月23日。

个脉络是近代以来到二战结束后，海外华人社会传承的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这种关联主要在于历史的延续性，而不在于当代的贯通性，它呈现为移居海外多代的华人社会文化型态，属于老侨的社会，其主要表现特征为，重人伦、讲信义、敬天法祖；第二个脉络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至今的新移民社会，其主要表现特征为，重法治、讲政治<sup>54</sup>、多元认同，它属于新侨的社会。当前的海外华人社会交织着上述两种文化类型，并在历史和现实两个面向上与中国文化互为交集，且由此在不同地区和国家显现各自的文化侧重。就马来西亚华人文化与中华文化关联来看，近代和当代的两种华人社会文化类型在马来西亚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虽然在华人人口来源上，本地的华人社会并不呈现为新侨的社会特征。今天的马来西亚，华人约600万，占全国人口的25%，为国内第二大民族，内中仅有3%华人不是本土出生。<sup>55</sup>也因此，20世纪50年代后，马来西亚的华人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分支，更多地揉合了居住国的本土文化和中国的传统文化，衍生出一种适合于当地生存的华人文化和华人特性。这种华人特性经由祖籍的认同、亲属认同、方言认同等发展演变而为华语的语言认同，突出地表达了作为文化族群的华人对自己精神家园的最终守护。进而言之，马来西亚华人经过国家认同的转变，形成了以文化认同为主要族群凝聚力的社会整合机制并逐渐建构了独特的马华文化。<sup>56</sup>此后，华人与中国的文化认同，经过岁月的洗练而逐渐演化，或强或弱，借由时间地点的不同而分离出不同的场景。但不管怎样，他们的“华人性”（Chineseness）经久不变，不管他/她是否懂中文，是否有中文姓名，他们都或多或少地保留着某种中华文化的因子，而难以从根本上抹去。

<sup>54</sup> 此处的“讲政治”，有两个含义：一指海外华人日益意识到参与居住国政治活动的重要性，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同所居住的国家，并积极投身于当地的社会实践；二指海外华人更加意识到祖籍国发展和强大的重要性，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同祖籍国的政治和文化。

<sup>55</sup> 陈玉珍：〈华人在砂拉越的人文面貌：文化、历史、经济、信仰、文学〉，《诗华日报》，2009年4月22日。

<sup>56</sup> 杨宜音：〈文化认同的独立性和动力性：以马来西亚华人文化认同的演进与创新为例〉，载张存武、汤熙勇合编《海外华族研究论集》卷三，《文化教育与认同》，台北：华侨协会总会，2002年，页407-420。

20世纪90年代后，国家之间意识形态对立的逐渐消弭，亚太地区经济的蓬勃发展，东南亚各国对于当地华人政策的渐趋宽松，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和加强了华人与中国的关系联系。而透过华人纽带搭乘中国经济快车也成为一些东南亚国家政府领导人的政策目标之一，他们希望华人能够在中国和居住国之间发挥经贸桥梁作用，从而有助于本土经济的成长和繁荣。这样，伴随经济联系而来的是文化影响，华文教育在中国因素促动下，在当地华教人士推动下，焕发了新的生命力。一些接受华文教育的年轻人，在和中国做生意时，拥有了更多的文化背景和智能技巧；另一些华裔子弟则到中国求学深造，继续研习祖籍国的语言和文化，以增进对于中国的了解。无疑，今日华裔子弟所能拥有的生活和事业选择，他们和中国的经济联系与文化互动，正是过去40多年来马来西亚华教人士精心维护华文教育，向政府当局拼力争取的结果。这些华教人士没有更多地去思考冷战的国际背景如何限制了华文教育的存续，而是从炎黄子孙的角度出发，自觉有义务有责任去担当传承和传播中华文化的任务。在这种境况下，马来西亚政府推行的文化自我中心主义与马来西亚华人推崇的文化多元主义，在马来西亚族群政治和文化政策中不断冲撞，延续至今。

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直接结果是文化自信力和文化影响力的提升。面对日益多样化的世界，中国政府领导人不讳言，中华文化，特别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在当今世界的价值，以及它对于世界文明的可能贡献。2005年4月，在雅加达召开的亚非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首次提出“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的主张。当年9月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庆典上，“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新理念得到了系统阐述。它显示冷战结束后，继新安全观、新文明观、新发展观及“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外交政策之后，中国更明确了其在全球化世界中的国际责任，“把自身发展与人类共同进步联系在一起，既充分利用世界和平发展带来的机遇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同时以更开放包容的心胸消弭所谓“中国威胁论”，把中国的发展融入变革的世界中，表达中国政府和人民致力于世界和平发展道路的目标

所在——建立一个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人类与自然之间和睦相处的理想的现实主义新世界。<sup>57</sup>在这个现实主义新世界构建中，对于中华文化和世界文明有着高度认同和尊重欣赏的华侨华人就成为和谐理念的重要传播者和实践者。他们是沟通居住国和祖籍国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是彼此间的友谊大使、亲善使者。2006年，胡锦涛在耶鲁大学发表演讲提到：“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始终没有中断，连续5千多年发展至今的文明”。中华文明拥有举世无双的生命力、连续性和稳定性。他把中国文化概括为4个方面：“以民为本，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自强不息，革故鼎新”；“社会和谐，团结互助”；“亲仁善邻，和睦相处”。<sup>58</sup>这样，通过重新认识儒家文化及其在当今世界中的作用，成为新时期中国政府全球治理的目标之一，也成为中国政府之于华侨华人与居住国关系的一个长远的政策目标。虽然这个政策目标并不是新的，因为周恩来主政时期就一直鼓励和提倡华侨华人要与所居住的国家政府与人民搞好关系，但这个政策在全球化时代更明确了，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对儒家文化精神的倡导，鼓励海外侨社的和谐构建，配合“和谐世界”的价值理念。从这个意义上说，海外“和谐侨社”，指的不仅是居住国社会内不同派别华人社团间的团结与合作，而且指不同派别的华人社团与居住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这种寻求团结、互为协作、彼此包容的精神，恰是中华传统儒家文化“和合”的精髓所在。它成为当今中国政府与华人社会在共同文化认同基础上（以儒家文化为主）的最佳契合，也是走过冷战风雨之后，中国和周边各民族国家寻求安定祥和、求同存异的外交政策选择。

可以说，对于传统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认知和肯定，并试图把它应用于内外政策的实践中加以推广，是自“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以来，中国官方首次对于儒家文化的正面、高

<sup>57</sup> 庞中英：〈“和谐世界”是在世界变化新现实和新趋势下的中国世界观〉，载“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网站，2005年12月29日，<http://houston.china-consulate.org/chn/xwgd/t228679.htm>，2008年9月16日。

<sup>58</sup> 〈胡锦涛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载“新华网”网站，2006年4月22日，[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6-04/22/content\\_4460879.htm](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6-04/22/content_4460879.htm)。

调表态。这种以传统文化资源的返本开新来消弭国际关系中政治意识对立冲突的内外政策，被视为一种更有益于形成中国文化凝聚力，更有利于加强海外华人之于当代中国向心力的文化策略。毋庸讳言，许多久违的、失传的中华传统文化仪式，可以在海外的华社中觅得踪影芬芳；那些具有儒者风范的饱学之士，散布在坚持中华文化理念的海外华人学者和知识精英群体中，他们垂范、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华裔子弟，从而为海外中华文化延续香火，点燃心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人们一方面在大声疾呼向西方学习，学习他们的科学精神、管理经验和创新能力；但另一方面也在悄无声息地向自己的海外同胞学习，学习他们沉潜的人文情怀、高度的中西会通能力以及坚韧与变革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21世纪的中国文化/中华文化将再次和海外华人文化贯通融会，只是这一次的贯通融会将不再有中心和边缘之分，而是呈现为两个互为独立，彼此观照，却又相互型塑的文化主体。它们共同在全球化的主流中延续和发展各具特色的中国文化/中华文化和华人文化。

早在1995年9月，马哈迪在英国和马来西亚学生常务理事会对话时提及，除了日本和韩国特殊案例外，未来世界将不会出现只有单一族群公民的国家。他说：“过去，我们尝试塑造单一实体，然而人民之间的紧张情绪和猜疑之心因此而起……他们担心必须放弃自己的文化、价值体系和宗教信仰。这是不可行的，而我们相信马来西亚民族是解决问题之道。”<sup>59</sup>2000年，马来西亚政府终于肯定了沈慕羽对于国家建设的整体贡献。在马哈迪首相提议下，马六甲州元首授予沈慕羽“拿督”荣衔。<sup>60</sup>此举不能不让人喟叹马来西亚政府族群文化政策的高明。难怪杜维明教授曾言：“据我了解，马来西亚选择的是通过文明对话的方式，建立一个虽然是以回教文明为中心，但也能够和世界上的其它文明，如佛教、基督教、印度教、儒家传统、道教传统和平共存、互相激荡、互相提携的多元文化社会。这是一个突出文明对话，而不是强调文明冲突的新的回教

<sup>59</sup> The Star, 11 September 1995. 见何国忠：〈马哈迪的族群政策与华人社会〉，发布刊物不详。

<sup>60</sup> 〈如苍松屹立——大马华教先驱沈慕羽〉。

文明体系。”<sup>61</sup>在这个人类文明体系中，一方面华人透过本土化实现国家认同和区域认同，成为马来西亚公民和东南亚人；另一方面透过全球化的跨国和跨地区流动，华人的多元认同和多重身份愈益鲜明。华文教育之于中华性的保留、本土性的嫁接和全球化的跟进方面，日益显示出与时俱进的时代意义：“将所有封闭的空间都打开”——全球化的根本特征在于：“‘把他人内在化，把自我对象化’，成为全球化时代文化政治需要的一种智慧。”<sup>62</sup>这种智慧需要把儒教文明、伊斯兰文明以及世界其它文明连接起来，互为协调，和而不同。

沈慕羽和马来西亚华教人士一辈子所追求的国家文化建设目标，正是“和而不同”的理想境界。其至诚之道和中庸精神可归结为：“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的苦心孤诣，这是一位华人知识分子之于马来西亚政府领导人、华人社会领导人的期待，也是其毕生孜孜以求的理想实践。事实上，中华文化发展到今天，仍然面临着“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的重任，仍然需要在东西方之间会通融合，仍然需要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平衡取舍。沈慕羽和华教人士在逆境中，为华人文化的保留和延续所开辟的空间，为的正是民族文化的根永续。今天，在中国大陆，华人文化的根源地，文化的传承和传播，虽然不曾遇到马来西亚华人的困境，但也有它自身难以遮蔽的困窘。这种困窘，有传统文化自身腐朽性的障碍，有“十年文革”期间人为破坏的残余，也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文精神价值失落的怅然。正因此，中国大陆一些文化、教育人士力图恢复国学，推崇儒家文化，接续文化血脉；而中国政府也终于在时代的各种因素交织下，以文化资源取代政治意识，逐步提升国家软实力。中华文化的局部复兴和汉语教学（孔子学院）的走向世界，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之后的文化自信，但这种文化自信，需要基于对普世文明的价值尊重，需要对基于自身文化的优劣扬弃。今天的中国，不再是封闭的“中国的中国”，而是区域范围内“亚洲的中

<sup>61</sup> 〈新加坡应全面深入累积社会资本——访杜维明教授〉，《联合早报》，1997年12月6日。

<sup>62</sup> 张旭东：〈远离集体焦虑的策略：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载“爱思想”网站，2007年6月6日，<http://www.aisixiang.com/data/detail.php?id=14694>，2009年3月22日。

国”，全球视野中“世界的中国”，中华民族与亚洲各个民族和西方各个民族的相互交流，平等发展，实乃文化的使命，时代的趋向。

沈慕羽之于中国文化的意义，在于他提出了一个华人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根源问题。一方面，海外华人社会的发展，日益揉合了本土性的要求和西化的趋势，成为一种在地化的华人文化，并由此衍生和形成不同区域板块内各个国家独特的华人文化，它是千差万别而不离其宗的；另一方面，海外的华人文化，在经历了西化和本土化的洗礼之后，再次和中国文化相遭遇、相关联，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地位与华人文化在居住国的地位，都有赖于其自强不息的精神，它们彼此辉映，相辅相成。沈慕羽最为自豪的是：“我感觉这生最光荣是生为华人。这龙的传人，带来了五千年的文化、源远流长，优秀博大，为人类造福。它的方块字是天地的讯号，为人类带来了智慧和灵感，享用无限。”<sup>63</sup>这一番发自肺腑的表白，怎能不让所有炎黄子孙者动容，并以此自省、自尊和自励？

## 五、结语

2009年2月5日，沈慕羽先生辞世，“他一生的经历和遭遇，是80年来华人社会在马来亚承受种种变迁的一个缩影”。<sup>64</sup>他之于马来西亚国家建设和文化发展的意义，之于中国/中华文化与马来西亚华人文化的意义，之于世界多元文化的意义是多面而丰富的，他的英名是马来西亚华人政治、历史和文化成就的。作为华族公民，沈慕羽和其他的马来西亚华人一样，认同马来西亚，并以其政治适应和文化融入的不断实践，体现马来西亚华人之于国家发展的精义——融入主流，为自己心目中理想的马来西亚国家而奋斗。在此过程中，政府之于国家文化政策的导向，以及华人移民之于国家文化认同的选择，正在变得更为宽容和逐渐多元。正因此，我们借“中华文化世界论坛”感谢和纪念这位为了历史选择的公正性而奋力前行的儒者和斗士，以表达内心的尊崇之意！

<sup>63</sup> 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页224。

<sup>64</sup> 何启良：〈大马华人历史上的沈慕羽——《沈慕羽事迹系年》序〉，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页21。





# 寻找文化通人

## 沈慕羽与马华文化发展

■ 叶汉伦

### 一、前言

沈慕羽（1913年-2009年）一生领导华教、引领政情、诲人不倦<sup>1</sup>，对文化传承，对教学育人的知难而进和一以贯之，足以垂为人师楷模。他在报界、书法界、华社民间服务中都享有盛誉，所涉及领域之广泛、影响力之持久，百年马华中恐无人能出其右。

在中华文化的人文传统中，这是一种名道救世的情怀，是传统儒学中一名“学者”的既定蕴义和使命。无论是余英时所称“知识人”或杜维明所谓“文化人”，所指涉的都是传统“学者”或“士”的现代观念。士志于道，道在今天就等于一套价值系统，必须通过社会实践才得以实现。沈慕羽作为现代马华的文化人，在时代洪流中积极投入政治报效家国，终其一生投身教育弘扬学术，希望以学术教育振兴民族，出入政教领域，献身社会服务，他所关注的其实是大马华人的生存问题与价值意义。沈慕羽以自身实践与教育播扬，推己及人进行华人文化传统和价值系统的阐明、提炼和实践，毕生从事文化和思想的传承与创新工作，尝试扮演沟通国家管理者和人民的桥梁角色，对马华文化性格和尊严的形成与维护，对百年马华文化的积淀与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

沈慕羽对文化理想和道德价值的持守，在其近百岁的生命中体

<sup>1</sup> 郑良树：〈儒家文化的实践者〉，收入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总序），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1997年，页4-11。

现为一种深刻的人文关怀，值得吾人更深一层的研究。郑良树在沈慕羽逝世后撰文道：

林连玉先生逝世的时候，我曾经为文追悼；当时我说，来如果我写大马华人史的话，我一定将林先生由列传提升入世家，而且列为华族第一世家。今天，以沈局绅在道德上的建设及成就，他应该列入世家，位排第二，与林先生 肩。<sup>2</sup>

郑文还提到：“‘太上立德’，沈局绅已为大马立下道德的典范！人就应该是这样地活下去！沈局绅的传记应该从这个点切入！”<sup>3</sup>此处显然要指出沈慕羽的人格典范当为大马人在道德上的楷模，身为（大马）人就应该这样的活着，只有像沈慕羽这样的活着，才能活得有意义、有价值，才算是一个合格的大马（华）人。

本文尝试以儒学传统中的人文观念，考察沈慕羽在百年马华社会中的文化意义。

## 二、全方位的华人：沈慕羽的一生事迹

沈慕羽于1913年7月20日，出生在马来（西）亚马六甲，祖籍泉州。沈家在古城马六甲可说是第一大家族，在文化意义上，更被誉为“古城第一世家”。<sup>4</sup>父亲沈鸿柏一生的理想抱负，主要寄托在政治上的革新，落籍在马六甲则对文化与教育事业充满热忱且建树良多。沈慕羽曾以政治参与为报国方式，很大程度上受到父亲革命思想的影响；对于良师兴国的信念，则是自小就立定了志向。<sup>5</sup>时代的巨变，让沈慕羽有机会尝试不同的社会角色和人生况味，同时在起伏变迁中，成就了生命的坚持和信守。

沈慕羽得享高寿，自称马六甲土著，生逢大批华裔南来落地

<sup>2</sup> 郑良树：〈敬悼沈慕羽局绅〉，《星洲日报》“言路”版，2009年2月8日。

<sup>3</sup> 同上。

<sup>4</sup> 此据郑良树教授的评语，见郑良树：〈马六甲第一世家〉，《晚节飘香——沈慕羽先生七十荣寿贺文集》，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1991年，页53。

<sup>5</sup> 载沈慕羽在大马华人文化协会表扬会上的讲话。见〈华文教育的苦行僧〉，收入陆庭谕主编《沈慕羽言论集》下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1998年，页76。

生根、参与建国发展的时代，横越20世纪的风起云涌，跨入了21世纪。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史上，论影响力，他是继林连玉之后的第二号人物；论持久性，则无人能出其右。他是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的提倡人之一，曾任教总主席达28年。

在政治上，他经历了殖民时期、日治时期、独立运动、联盟组阁，直到国阵时期。他曾参与抗日，组织歌咏队、戏剧团，到处宣传。马华公会草创，他即加入并历任要职。因组织马华青年团，被称为“马青之父”，担任马青全国副总团长，同时亦为教总主席，堪称空前，至今未有第二人。公共服务上，他曾出任马六甲华人参事局议员，既获英女皇封赐为太平局绅，也曾因宣传公民权运动有功，受首任最高元首封赐第三级卓越护国勋章J. M. N.；曾参与甚至领导的华社重大事件有教总成立、语文官化运动、华人大团结运动、茅草行动、三结合等等。从以上涉及华文教育的重要事迹来看，沈慕羽是曾经“直接涉及于为华校或华文教育的生存制定策略安排的人士”<sup>6</sup>，见证并直接参与了马来西亚历史上、尤其华教史上的许多枢纽事件。他是杏坛的常青树，从20岁（1933年）开始历任培风、晨钟夜学教师、复办培德、接任平民学校校长，一生都为教育服务。

沈慕羽的志趣、能力和关怀无疑是全方位的，他出入政坛、坚守教学岗位和领导华教运动、投身华团工作、既是报人又是书法家，他的一生事迹反映了本土华人坚守自身语文、教育、文化、政治权益的坎坷和磨难。在他身上，既体现了华人在海外保存族群特色的典范，也看到华人因地制宜的创新转化。廖文辉曾撰文探讨沈慕羽的四大事业——政治、教育、文化、社会服务<sup>7</sup>，并列举沈慕羽的六个第一<sup>8</sup>，清楚说明沈慕羽一生事业涵盖之广，以及开风气之先。沈慕羽不仅是开风气的先行者，更是诲人不倦的师者，一生大

<sup>6</sup> 陈绿漪著，李亚邀译：〈从历史观点看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与华教人士〉，吉隆坡：“教育·启蒙·创新”——“华教50100”林连玉百岁冥诞学术研讨会论文，2001年9月16日。

<sup>7</sup> 廖文辉：〈沈慕羽的四大事业〉，载李亚邀编《晚节飘香续编》，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2006年，页65-68。

<sup>8</sup> 廖文辉：〈沈慕羽二三事〉，《华教历史与人物论集》，八打灵：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07年，页208-209。

节凛然，在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和地位。何启良甚至叹谓：“如果不是因为时代形势和视野的限制，沈慕羽很可能是一位马华文化史上自成一家的大师，像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张元济、或蔡元培，甚至胡适之。”<sup>9</sup>

沈慕羽毕竟不是张元济、蔡元培，更非胡适之，他没有学说著述以成一家之言，用他本身的话说——他是以“服务一生，战斗一世”来实现个人的生命情调和人生理想，在最大的生活范围内谋求大马华人的理想人生所需的平等权益和生存条件。何启良早已点出，时代的形势与马华社会的特殊性导致文化大师的难产，沈慕羽在时空局限中显然未能幸免。然而，他在族群生存与发展的全面困境里，以多面绵长的文化观照闪烁其中，已属难能，并以毕生的实践焕发出道德的光辉，在马来西亚文化史上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不容低估。

然则，当代马华社会，应该具备怎样的文化理想和精神面貌？在广义的文化意涵中，怎样才算是一个“合格的华人”？本文认为，沈慕羽的毕生实践提供了很好的说明，或可成为极佳的参照，以下即分几个重要面向作进一步观察。

### 三、不渝之志：诲人不倦的教学实践

教育是沈慕羽终身不渝之志，他在教育领域的工作，可以分成任教办学和华教运动两个方面。沈慕羽在任教办学方面的工作显然是更为根本的。他自20岁开始执教，直到2002年近90岁仍然主持晨钟夜学，堪称杏坛异数，其可贵在于贯彻始终。

沈慕羽从事教学工作从不言悔，数十年如一日：

兄弟从弱冠开始，便献身教育，一直到现在，退而不休。教育是没有“钱途”的行业，要有钱途，就不从事教育，可是我认为民族前途比“钱”途更重要。它可以有教无类，因才施

<sup>9</sup> 何启良：〈大马华人历史上的沈慕羽〉，收入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页55。

教，集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它为国家制造未来的领袖；它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觉得这一行业对人类的贡献最大，可以说没有教育就没有人才，没有教育就没有人力，所以说教育是最神圣，最有意义的行业。身为教师的应该把它当作职业，也应把它作为终身事业。我这六十年来从事教育，从不言悔。而且感到满意。<sup>10</sup>

安贫乐道，“有教无类，因材施教，集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这句话沈慕羽不仅终身奉行，而且乐此不疲。敬业乐业，不是每个人都能有这样的乐趣，更不是每个人都能坚持到底。他坚信唯有良师的教化可以振兴民族的未来，谈到自己的理想，沈慕羽的追忆仍然不负初心：

明知教师的生活是清苦的，为何要选择当教师呢？我以为他虽然吃的是草，却能挤出奶来，养活天下的人，教育天下的人有智慧，何等伟大啊！<sup>11</sup>

这一位穿着朴素的中山装，弹着风琴教学生唱歌的年轻教员，一开始就已经是出色的教育工作者。沈慕羽的经历和业绩告诉我们，他不仅是一位勇于革新的教师，也是一位精明实干的校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沈慕羽负起重建平民学校的重任，学生人数在10年间由最初2百余人增至千余人，成为马六甲最多学生及最具规模的唯一一所特大型华文小学。1957年至1960年连续4届政府升学会考，全获100%及格。沈慕羽谓平民小学是名副其实的“平民”学府，平小的学生家长泰半是渔夫、小贩与劳工，家境穷困，“他们为生活奔波忙碌，无暇兼顾子女教育”，这些子弟也就不易管教，但沈氏认为“在这种环境中教育才显得更有意义”。<sup>12</sup>沈慕羽对教学的重视与治校之能干可见一斑。

沈慕羽真的把平民学校视为大家庭，在他的讲话中不断强调教师职工是他的兄弟姐妹、学生是他的子女。他是真正敬业乐业的教

<sup>10</sup> 沈慕羽在教总庆祝成立40周年及庆贺他80荣寿双庆典中的自述。见沈慕羽：《确保民族的根》，载《沈慕羽言论集》上册，页119。

<sup>11</sup> 同上。

<sup>12</sup> 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页39。

师、校长，真正地享受作育英才的快慰。他坚信教师的责任重大，确认“国家的强弱与民族的前程，全看教育的成果”。<sup>13</sup>所以他把掌管平民学校28年的任务当作自己的终身事业，把全副精神和心血都贡献予学校。沈慕羽对他的终身事业的坚定执着，值得我们借镜：

我们在职一天必须尽职一天，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这一方面兄弟深感自慰，因为兄弟从事教育四十年，除了生病，离州和出国外，从来没有请假，虽然是假期或星期日，我都照常办公。在我的生活中，我只有工作，而没有假期，假期对我不感兴趣，我觉得华教的工作第一，个人的事业第二。我从不在职怨职也不见异思迁，只要学校能办得好，我个人的牺牲是不计的。教育是我的职业，我靠它吃饭，但我却把它当作我的终身事业。我把学校当做是我的家，把教师当着是兄弟姐妹，我把同学当着是子女，即使是顽皮的学生，家长放过他，我也不放过他，我总要想办法挽救他，因为他是民族的子女，能救一个，就救一个，这一点很得到家长的信心。<sup>14</sup>

这段话确实很值得认真对待，细加思索，铭记在心。沈慕羽在职尽职、不在职怨职的工作态度，毋宁是现代人的典范，他更将工作事业视为一种人生的承诺。在沈慕羽的观念中，教育事业是生命价值的载体和酵素，只有这样，生命的意义才能焕发光彩。在沈慕羽的身上，充分体现出“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精神和价值，足为师者楷模。<sup>15</sup>

除了正规学校，沈慕羽还主持晨钟夜学的校政。晨钟夜学的成立也同时树立了良好社会风气，弥补了当时马六甲明显缺乏有益身心的夜间活动场所的不足，使年轻人有机会利用晚间的空闲时间求取学问，充实自己，避免在不法的风月场所留连。<sup>16</sup>沈慕羽出掌晨

<sup>13</sup> 沈慕羽：〈我的终身事业〉，《沈慕羽言论集》上册，页186。

<sup>14</sup> 沈慕羽：〈华文将有大放光明的一天〉，《沈慕羽言论集》上册，页188。

<sup>15</sup> 陈丽娟：《沈慕羽——华教运动中的导师》，加影：马来西亚新纪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学位论文，2002年，页33。

<sup>16</sup> 邱崇远：〈浅谈晨钟夜学的发展〉，收入晨钟夜学编辑委员会《晨钟夜学六二回顾特辑》，罗印务有限公司，1995年，页13。

钟夜学数十年，慕名而来的学子历久不衰。<sup>17</sup>

沈慕羽办学有方，他所办的“平民小学是全甲之冠，他所办的晨钟夜学，应该是全马之冠”<sup>18</sup>。晨钟夜学的另一项贡献是对华文华语的推广。马六甲的冯镇安在人力资源部长任内为《晨钟夜学六二回顾特辑》所写的序中就说：

华语的声音响澈古城每个角落，六十年前的通行福建话，渐渐地由华语所替代，许多外国旅客莅临马六甲时，对本地华语之通行，惊异不已，晨钟夜学在这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sup>19</sup>

郑良树对华语在马六甲盛行的观察也许能够提供更为有力的说明：

华语果然是马六甲华人社会的共同语言。年轻小伙子、满脸白胡子的老年人，都会讲华语，旅馆的服务小姐，海边食摊的小贩，都可以用华语交谈，对我们而言，这真是一个意外。在吉隆坡问过几位朋友，没人知道个中原因；直到有一天在马六甲结识了一、二位朋友，向他们打听询问，才知道这都是沈先生坐镇马六甲所发挥出来的功劳。<sup>20</sup>

马六甲被誉为公认的全马华语最流行的地区，<sup>21</sup>沈慕羽自己欢欣地自谓：“这种伟大的成就是当年做梦也没想到的。”<sup>22</sup>晨钟复办以后，打破种族、语言和文化背景的藩篱，许多非华人仰慕中华文化到晨钟学习华文华语，校友包括英、巫、印族。<sup>23</sup>这不仅符合马来

<sup>17</sup> 邱崇远：〈浅谈晨钟夜学的发展〉，收入晨钟夜学编辑委员会《晨钟夜学六二回顾特辑》，页14。方清泉在〈歌颂晨钟夜学〉一文中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见《晨钟夜学六二回顾特辑》，页146-147。

<sup>18</sup> 熊远宾：〈晨钟夜学与沈校长〉，收入晨钟夜学编辑委员会《晨钟夜学六二回顾特辑》，页125。

<sup>19</sup> 冯镇安：〈愿晨钟夜学茁壮光明〉，收入晨钟夜学编辑委员会《晨钟夜学六二回顾特辑》序文，页1。

<sup>20</sup> 郑良树：〈马六甲第一世家——寿沈慕羽先生七秩荣庆〉，《晚节飘香：沈慕羽先生七十荣寿贺文集》，页53-54。

<sup>21</sup> 《南洋商报》，1993年9月24日，转引自收入晨钟夜学编辑委员会《晨钟夜学六二回顾特辑》，页121。

<sup>22</sup> 沈慕羽：〈六二回顾，细说从头〉，收入晨钟夜学编辑委员会《晨钟夜学六二回顾特辑》，页9。

<sup>23</sup> 仁民：〈甲晨钟夜学简介〉，《南洋商报》，1983年3月5日，转引自晨钟夜学编辑委员会《晨钟夜学六二回顾特辑》，页111。

西亚的国情和建国需要，也体现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文化底蕴。晨钟夜学的发展自然也面对了很多的高低起伏，但在沈慕羽的领航之下得以长久维持下来。沈慕羽曾经这样提到：“我这一辈子与晨钟夜学，血肉相连，形影不离。晨钟夜学无异是我的生命，我的生命与晨钟夜学比重。”<sup>24</sup>在个人情感上，沈慕羽与晨钟夜学固然是难舍难离，在文化传薪的意义上，他念兹在兹的仍然是华文教育的整体发展前景。在他看来，“办好晨钟夜学，也就是对华教尽一份的力量”。<sup>25</sup>

为教育献身是沈慕羽毕生的志业，在教学办校的领地内，他出入优游，显然是其安身立命之所在。然而，对于教育事业的方向和定位，沈慕羽似乎有所抉择。他并非林文庆，不曾有过主持大学校政的念头和机遇；他亦非严元章，始终没有发展出一套自身的教育思想和理论系统。作为马来西亚华文教育运动的领袖人物，虽说无役不与，沈慕羽始终紧守华文小学的教育事务，他乐意争取基本教育的权益和机会，提升一般的教育条件和福利。他并非不关注中学华文教育的发展，但是对于独中事务，他终究着墨不多，而实际上他有条件也有义务提出更多的建言；他在壮年时期积极为独大事件奔走，晚年对新纪元学院的成立关爱有加，显然珍视大专中文教育对族群前途的重要，对于大学的教育功能和学术研究也有清晰明澄的看法，却未见更详尽深入的理念阐述。沈慕羽的演说感人，对于华文教育的困境与发展有其当局者的独到见解，有关教师职志的言论俯拾即得，传统文史常识和儒家仁义观念的娴熟在他的演讲访谈中更是屡见不鲜，对应时局往往有推陈出新之感。但是，这些长期的经验累积和知识升华，尽管经过数10年的亲身验证，终究没能提炼出一如严元章“柔道教育”相类似的思想体系。从表面的事实来看，学历的局限似乎对沈慕羽施展更开阔的教育抱负和领导使命形成阻碍。

沈慕羽出身马六甲世家，父亲兴学办校，人才荟萃良师众多，

<sup>24</sup> 沈慕羽：〈六二回顾，细说从头〉，收入晨钟夜学编辑委员会《晨钟夜学六二回顾特辑》，页12。

<sup>25</sup> 参见陈丽娟：《沈慕羽——华教运动中的导师》，附录四：〈与沈慕羽先生的访谈记录〉。



曾受教于王宓文、张礼千等学人，业师当中有前清举人，也有留比硕士。<sup>26</sup>1928年底，沈慕羽以第1名毕业于培风第2届初中，此后即献身工作，没有深造。在早期华教领袖当中，他的家世渊源可谓优越，接受过众多名师的启蒙和熏陶，学业成绩同样出众，升学条件并非不佳，在目前所能及的文献中，却未能说明沈慕羽没有负笈深造的原因。如果初中的学历确是他事业开展的绊脚石，个中缘由当大有文章。此中所涉不仅仅是沈慕羽个人晋身、视野和素养的问题，也关系到大马华文教育运动的领袖素质和理论高度，有待研究者继续发掘。

沈慕羽初中毕业后没有继续深造，在时局发展的脉动中，他选择作为一个人生存于世所必至的事业，投入救援抗日、建国公民权事业，并在华教运动的大潮中争取民族的语文和教育权益，终在华教事业上树立了伟业丰碑。如前所述，或碍于个人学历，或因时局所限，沈慕羽并未深耕中阶或高阶教育的工作。他推崇身教重于言教，以一生实践作示范，惯于奔走呼叫，习于将教育大义付诸书法以广流传，这些事迹在下文续有探讨。教总从1995年起陆续出版《沈慕羽资料汇编》，至今共8大册。晚年沈慕羽对于这些文献的出版是极为关心的，以为历史存真之一助，但对于个人的著书立说却仍旧不热衷。虽说沈慕羽身上即藏有一部大马华教史，可供后人钻研阐发，然而作为20世纪大马华教的中流砥柱，在其将近一世纪的生命中未能凝就一家之言，毕竟可惜。

#### 四、锲而不舍：交织前进的政治参与和民族事业

沈慕羽精彩的一生，在于对社会的深入参与，以及对民族建设的积极投入。1934年，22岁的沈慕羽加入晨钟励志社，担任青年部总务，倡导“新生活运动”，鼓吹不抽烟、不打牌、不懒惰、奉公守时，发扬智、德、体、群、美五育。<sup>27</sup>芦沟桥事变与太平洋战争

<sup>26</sup> 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页17-19。

<sup>27</sup> 晨钟励志社青年部每逢周末举行精神晚会，有讲演，有表演。星期日清早举行严肃的升旗礼，激发爱国情操。这里“爱国情操”的对象自然是当时饱受内忧外患的苦难中国。见沈慕羽：《沈慕羽自传》，引自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1934年条，页26。

相继爆发，沈慕羽积极投入救援抗敌。马六甲于1942年沦陷时，沈慕羽与兄长慕周被捕。结果，兄长遭刺死。面对生离死别、贫病交迫，沈慕羽历经百般折磨侥幸被释放，接着终日流离四处逃躲。<sup>28</sup>这场战乱敲碎了他宁静充实的生活，成为他生命中的第一次大考验。他虽是一介书生，但是苦难没有磨灭他的生命意志，反而磨练成一种百折不挠的生命格调。家园光复后，沈慕羽领导着晨钟励志社及青年部的复兴任务，继续推动社会工作。晨钟励志社的训练，提升了沈慕羽的领袖素质，也是他投入社会参与的起点。

### （一）公民权益与政党政治的参与

1949年是马来（西）亚华人政治史上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2月，本土最有代表性的华人现代政党——马来亚华人公会——成立了；对于沈慕羽而言，同样别具意义：这是他正式投入本土政党政治的开始。同为马六甲人的华人领袖陈祯禄创组马华公会，沈慕羽“受感召，以甲教师公会主席及晨钟青年部部长身份”加入马华，“是马六甲最早一批加入马华的华社领袖”。<sup>29</sup>他曾这样回忆道：“在整个殖民地的统治斗争中，我虽非领导人物，也曾跟随敦陈祯禄出生入死，奔走呼号的无名英雄。”<sup>30</sup>显见沈慕羽当时的那种责无旁贷而不辞劳苦的心情，是因为受了“团结华人力量”的“感召”。他担任州义务秘书多年，对推展党工作不遗余力，积极呼吁华人申请公民权。

对于政党政治，沈慕羽视之为理所当然的公民参与，于是他全情投入，也屡有建树。1954年5月7日，沈慕羽发起组织马华青年团，为全马首倡：

1955年，我有鉴于青年是政党的灵魂，有青年才有力量，于是在5月7日，假座马六甲极乐园紫燕宫成立马华青年团，这是马青的鼻祖……自此以后，全国各地的马青团像雨后春笋，

<sup>28</sup> 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页35。

<sup>29</sup> 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页42。

<sup>30</sup> 沈慕羽：〈殖民地时代已广泛使用华文〉（沈慕羽在社团大会筹委会讲词），载《沈慕羽资料汇编》编辑委员会编《石在火不灭》，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1996年，页54。

纷纷茁长出来了。<sup>31</sup>

1966年初，马青举行全国代表大会，沈慕羽拒绝接受总团长的提名。据沈氏本人的说法，目的在于朝野内外能够更好地配合华语官方地位运动的争取：

我不接受总团长之提名，还竭力支持李三春及李孝友为总团长及义务总秘书，目的就在给我运用在野之力量与在朝的力量互相配合以达到我人争取语文的目标。<sup>32</sup>

华裔朝野政治力量结合一直是沈慕羽带点一厢情愿的美丽理想。他显然获得民众与舆论的支持，唯政治对沈慕羽而言只是一种合法的策略，而不是最终的目的。尽管如此，根据历来的种种资料和议论，沈慕羽在马青创团时期的领袖地位应无可置疑。他历任马六甲马青团长、全国马青副总团长。马六甲马华公会同人曾在1966年马六甲马华公会大厦落成纪念特刊里撰文表扬沈氏推展马青团事务的功绩，认为“即使誉沈君‘马青之父’亦不为过”。<sup>33</sup>

早年的沈慕羽有着深重的政治忧患，这种政治忧患源自儒者的入世精神；而国家民族的衰微或昌盛，则是他忧患的核心。沈慕羽与中国国民党素有渊源，这是他初识政治的起点。<sup>34</sup>马华公会的建党与马来（西）亚的建国使沈慕羽得以名正言顺地更加投入在本土的政治参与。跟其他华团领袖不同，尤其和早期的董教总领导人超越政党、无党无派的态度不一样，沈慕羽不以参加政党为讳。他很

<sup>31</sup> 沈慕羽：〈沈慕羽自传〉，收入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页64。

<sup>32</sup> 沈慕羽：〈我的表白（三）〉，收入《沈慕羽资料汇编》编辑委员会编《石在火不灭》，页157。

<sup>33</sup> 可参见唐润娇：〈我国的时代闻人——沈慕羽〉，《建国日报》，1981年2月7—9日，转引自教总秘书处编：《晚节飘香：沈慕羽先生七十荣寿贺文集》，页131。另外，当沈慕羽被开除党籍，各报章报导亦列明其青年领袖的地位。可参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页106。

<sup>34</sup> 沈慕羽自谓，“我自幼即受父亲沈鸿柏革命思潮的熏陶，怀着精忠报国之志”，“信仰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沈慕羽：〈沈慕羽自传〉，收入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页43。早在1931年，当沈慕羽的父亲沈鸿柏受委为中国国民党侨务委员的时候，他就担任父亲的私人秘书，同赴南京就职，并出席国民党大会。1946年，沈慕羽正担任国民党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马六甲支团干训班教育长。这一点政治渊源与其他华教领导人很不一样。见何启良：〈大马华人历史上的沈慕羽〉，收入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页26。

早就加入政党，而且是一般人眼中的执政党——从早期的国民党，到后来的马华公会。沈慕羽的家世有两个传统——政治和教育。何启良就认为沈慕羽对于政治的态度和素质可从他家世的政治渊源找到一些端倪。<sup>35</sup>

## （二）华教运动与政治风波

政治的参与在沈慕羽来说是一种必要，而不是一种志趣。他安身立命的归属是本身的母语母文教育。教育是立国之本，在政治朝夕变幻、国家即将草创之际，教育的发展教沈慕羽不能不多费心力。

1950年12月5日，马六甲华校教师公会率先致函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由主席沈慕羽亲署——为了维护华教、解除华教困境、反对不利华教发展的法令——倡议组织全马华校教师总会。<sup>36</sup>沈慕羽甚至彻夜拟就组织章程，为华校教师会总会之最初发起人。<sup>37</sup>1965年，沈慕羽接任第15届教总主席。<sup>38</sup>郑良树认为沈慕羽的当选，为华族争取华文官化的运动增加了一匹千里马。<sup>39</sup>实际上，立国之初教育议题此起彼落，教总主席确实不易为。沈慕羽甚至说“教总主席职位犹如烫手芋，随时随地都有被烧到的可能”。<sup>40</sup>尽管随时会有被烧的可能，而沈慕羽也确实因此被烧到，不只一次，但他没

<sup>35</sup> 何启良：〈大马华人历史上的沈慕羽〉，收入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页24-25。

<sup>36</sup> 有关函件之影印副本，分见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页46及《教总33年》编辑室编：《教总33年》，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1987年，页23。

<sup>37</sup> 这是1961年12月7日教总大会当天，沈慕羽和林连玉合影之照片背面、林连玉的亲笔手谕所记。下款志明“沈慕羽先生惠存”，林氏亲署于1961年12月8日。有关手谕之影印副本，见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页47。

<sup>38</sup> 〈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历届理事名表〉，《教总33年》编辑室编：《教总33年》，页14-19。

<sup>39</sup> 诚如郑良树所言，沈氏身兼政、教二职，必定为华文官化运动带来新的生命力，凭着沈慕羽的沉毅和奔命，加上客观条件的变化，更显示他成为这场运动的核心人物地位。见郑良树：〈沈慕羽与华文官化运动〉上篇，《星洲日报》“言路”版，2002年7月17日。

<sup>40</sup> 见沈慕羽在教总第43届会员大会上的演讲稿，收入《沈慕羽资料汇编》编辑委员会编：《沈慕羽言论集》上册，页106。

有随手就把这个“烫手芋”抛给别人，反而领导着教总组织长达28年。

新国家的语文和教育政策致使沈慕羽更为投入在政治漩涡之中，他认为马来亚新的教育政策须以平等合作求统一，互相尊重各族之文化自由发展。沈慕羽早年的政治和教育事业分不开，固然是与他的家世渊源有关，也同时因为马来（西）亚华人的政治与教育的难以分割。<sup>41</sup>林连玉终身未涉足政党政治，亦无法自政治漩涡中得到幸免。董教总的教育诉求和官方语文运动命定地与国家的政治正确纠缠不清，沈慕羽身为领导人自然无法不与现实政治发生冲突。对此，他没有回避。处身政党中的沈慕羽积极发起语文运动，争取教育和语文的权益。加入马华公会17年，这一直是他的斗争主轴，也几乎就是他参政的唯一缘由。

这一波马来西亚华人教育与政治的冲突终于爆发：1966年10月18日，马华公会中央工作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通过议决案表明不能支持华文为官方语言，同时“因为沈慕羽违反党纪，蔑视中央领导，公开反抗党的决策，使党难堪，使党受到讥嘲与蔑视”，决定由1966年10月19日将沈慕羽开除党籍。<sup>42</sup>马华中委会于1966年10月31日发表公开信，并在11月1日至3日的《星洲日报》连续刊载，指沈慕羽多次违反党政策与诉诸行动损害党利益，“在几乎全体赞成之情况下”，通过开除沈慕羽的党籍。<sup>43</sup>

<sup>41</sup> 何启良已经斩钉截铁地指出：“一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史，基本上也是一部马来西亚华人政治史。历史记录了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在政治漩涡里的艰难发展。”见何启良：〈百年连玉：论马来西亚华人政治史上的林连玉〉，吉隆坡：“教育·启蒙·创新”——“华教50100”林连玉百岁冥诞学术研讨会论文，2001年9月16日（现收入《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第4期，2001年，页17-57）。陈绿漪更将其力作定名为《马来亚华文教育的政治，1945—1961》（*The Politics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Malaya, 1945-1961*），明显紧扣着华文教育与政治操作的千丝万缕作为开展论述的中心议题。相关讨论也可参阅林开忠著《建构中的“华人文化”：族群属性、国家与华教运动》第三章〈马来西亚华文教育运动：历史与议题〉，见林开忠：《建构中的“华人文化”：族群属性、国家与华教运动》，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1999年，页49-86。

<sup>42</sup> 有关陈修信之书面声明，见《星洲日报》，1966年10月19日，载《沈慕羽资料汇编》编辑委员会编《石在火不灭》，页74-75。

<sup>43</sup> 可参《沈慕羽资料汇编》编辑委员会编《石在火不灭》，页116-121。

这是马华公会创立以来第一次开除高层党员，全国为之耸动。沈慕羽在受访时说：

我始终是爱党国，我所讲的话都凭〔凭〕着良心的。我觉得这项要求不会危害国家的，我便不能缄默下来，总是要把这些话吐出来才觉得心里头快慰。……马华的宗旨，要维护华人原有的权利。还要维护华人的母语，现在我所争取的也就是配合马华的宗旨，我想不到马华以这样的手段对我，我觉得非常失望。<sup>44</sup>

沈氏当时为马青副总团长，又是教总主席，显然具有巨大的基层支持度和舆论影响力，党中央遂大动作公开说明，并纷纷向党内同志解释。沈慕羽的政党政治参与并没有留下太多美好的回忆，政治这一片疆域不是他驰骋的草原。沈慕羽“非常失望”之余，并未颓丧，过后迅速转入群众运动继续语文教育的斗争，他显然选择与当时的公意同在；在事发后不久的一次教师节演说中，他依旧慷慨陈词，尽管悲壮：

我感觉非常荣幸，今年还有教师节可以庆祝，不知道将来如何！

……今天，我们华教到了如此危急的地步了，我想我们应该为“华教而生，为华教而死。”

……在去年，我们要争取华文为官方语文，我们最高领导层邀我去谈三个钟头……白谈了三小时，一无所得。

只要事情能够成功个人怎样牺牲，成败利钝都没有关系。<sup>45</sup>

个人成败利钝都没有关系，即便牺牲又何妨？这是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可是争取语文地位的努力始终没有成功，反而付上了巨大的代价。这是沈慕羽人生中又一大挫折，也是华教悲

<sup>44</sup> 有关谈话见《星洲日报》，1966年10月19日，载《沈慕羽资料汇编》编辑委员会编《石在火不灭》，页76-77。

<sup>45</sup> 沈慕羽在1966年10月21日马六甲教师会及全国华教职总甲分会联庆教师节上发表的演说，见《沈慕羽资料汇编》编辑委员会编《石在火不灭》，页93-95。

情的另一注脚。

卷入政治漩涡，沈慕羽并没有倒下，反而愈战愈勇，继续扛起教总的领导担子。当他的政党斗争和教育诉求出现分歧对立，他即不惜与政党政治分道扬镳，面对他的两个家世传统，“教育”才是他毕生的归属，在两者之间占据了更大的比重。<sup>46</sup>尽管马华当局曾数次派要员劝说沈慕羽归队，甚至献议委任他为上议员，却为沈慕羽所谢绝。<sup>47</sup>尔后的局势发展，沈慕羽欲与政党政治划清界线，华团人士却要选择直接参政参选。1982年提出“三结合”，1990年推动“两线制”，沈慕羽始终保持中立。<sup>48</sup>

### （三）独大事件与茅草行动

面对马华公会的舆论攻势，沈慕羽再发出4篇书面澄清——〈我的表白〉之后<sup>49</sup>，投入了创设独立大学的工作，担任筹备大会副主席。1969年4月19日，沈慕羽代表大马职总出席世界教总亚洲区代表大会，以华语呼吁代表们支持申办独立大学。<sup>50</sup>

申办运动后因“五一三事件”而沉寂，独大有限公司理事会一直到1978年1月30日才正式呈请愿书予最高元首，恳求恩准创办独立大学，可是当时的教育部长慕沙宣布拒绝批准创办独大。独大有限公司唯有入禀法庭，起诉政府拒绝独大注册。对此，沈慕羽曾说：

<sup>46</sup> 陈丽娟：《沈慕羽——华教运动中的导师》，页18。

<sup>47</sup> 有关传言在1970年代曾甚嚣尘上，本地报章多次旁敲侧击，沈慕羽并未作出答复。参《沈慕羽资料汇编》编辑委员会编《石在火不灭》，页175。但过后沈氏在不同的场合均承认这些传言，在一次论文撰述的访谈中，沈氏也提到马华劝说归队的往事。见陈丽娟：《沈慕羽——华教运动中的导师》，附录四：〈与沈慕羽先生的访谈记录〉。

<sup>48</sup> 1982年华教人士倡导“三结合”，试图“打入国阵，纠正国阵”。沈慕羽追述当时他不表赞成，因为参政的时机不很成熟，但华教人士已有所行动，为了表示董教总一致，他也就不反对。1990年林晃晃、柯嘉逊、李万千等27名华团人士参政，鼓吹“两线制”，沈慕羽认为是“被逼到无路可走，只好走上梁山”，象征着一种民权起义。虽然他认为华团人士从政，献身国家民主是好事，但他本身继续保持超然中立的立场，不参与竞选活动，只会在精神上支持华团人士。见《星洲日报》，1990年8月21日，转引自华社资料研究中心编：《论华团人士参政》，吉隆坡：雪兰莪中华大会堂，1990年，页288。

<sup>49</sup> 皆收入《沈慕羽资料汇编》编辑委员会编《石在火不灭》。

<sup>50</sup> 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页115-117。

我们不会无端端地要求创办独大。为了争取做人的起码条件，为了维护人民的基本权利，我们被迫到不能喘气才出来搞的。

……五百万华人创办独大的意愿，是如钢铁一般的坚决，不到黄河，心是不死的。<sup>51</sup>

1980年，高庭宣判独大败诉。1982年7月6日，联邦法院驳回独大上诉，创办独立大学的努力也就此告一段落。<sup>52</sup>

早在申办独大运动期间，马华公会高层曾多次游说沈慕羽归队，沈氏为此提出他的条件：

- 一、华文须有官方地位；
- 二、批准创办独大；
- 三、华文教育地位平等。<sup>53</sup>

马华公会无力回应而徒劳。总会长陈修信曾对独大运动嗤之以鼻，谓“独大要在大马成立，有如期待铁树开花。”<sup>54</sup>同年5月，马华公会在全国大选中惨遭败绩。

1971年2月7日，沈慕羽接受陈修信的邀请，响应李孝式发动的华人团结运动，参加于首都联邦酒店举行的团结大会。<sup>55</sup>2月18日，在怡保华人团结大会发表演讲：〈做个堂堂正正的大马华人〉<sup>56</sup>。演讲获得听众热烈反应，甚至有人高喊沈慕羽先生万岁。<sup>57</sup>这样的演讲盛况和内容却使沈慕羽被控涉嫌触犯《煽动法令》，两度被扣留，案件拖延了两年才在1972年10月27日宣布撤消。<sup>58</sup>沈氏在案件撤销当天发表谈话：

<sup>51</sup> 沈慕羽：〈创办独大是坚决的〉（1978年1月16日），载《沈慕羽资料汇编》编辑委员会编《石在火不灭》，页85-86。

<sup>52</sup> 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页152。

<sup>53</sup> 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页115。

<sup>54</sup> 同上。

<sup>55</sup> 沈氏于会上发表演说，提出七点反建议，并被举为联络委员之一。见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页119。

<sup>56</sup> 收入《沈慕羽资料汇编》编辑委员会编《石在火不灭》，页215-220。

<sup>57</sup> 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页121。

<sup>58</sup> 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页124。



姑不论我的言论是否涉嫌煽动，但我可誓言，我的动机是纯正的，我是以一个马来西亚的公民发出一般人所要讲的话，耿耿此心，表现爱国之忠诚。<sup>59</sup>

这一位马来西亚公民的话也许无法让政府理解，一如创办独立大学的用意无法让法庭理解一般。而有关当局对国家教育的举措也似乎不容易让人理解：1980年代，教育部宣布实行3M制度在华社引起骚动，国家文化政策、三保山事件、“综合学校”计划、学生交融计划、修改《1961年教育法令》等目不暇给，华社只有疲于奔命——联署《全国华团联合宣言》、成立“全国华团民权委员会”、展开抗议行动和反建议、成立“关于教育部修改《1961年教育法令》行动委员会”、甚至推动“三结合”的概念，华教人士参政参选，试图“打入国阵、纠正国阵”。沈慕羽在“3M计划”紧急会议上表明母语教育立场：“什么都可以改变，母语教育的本质是不可以改变的。”<sup>60</sup>陆庭谕说得很真切，沈慕羽“是华教历史的见证人，也是这大时代的历史见证人。更重要的是许多史实的参与者”。<sup>61</sup>在1980年代这个华文教育风声鹤唳的大时代里，晋入古稀之年的沈慕羽不但仍然是“许多史实的参与者”，而且依旧是这些重大史实中举足轻重的人物。<sup>62</sup>

1987年，教育部委派不谙华文华语教师至华文小学任高职，华社激烈抗议。10月11日，全国华团政党抗议大会于吉隆坡天后宫举行，报导记录4000人与会。沈慕羽在会上致词：

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必须仿效整个当年抗日时安内攘外，

<sup>59</sup> 见《沈慕羽资料汇编》编辑委员会编《石在火不灭》，页250。在页251可见“编者按”录下这几句话：“此案拖延两年之久，前后过堂七八次，终于宣告撤消，但不对外公布。据说乃怕巫统提出抗议，此案处理，曾经在内阁讨论。此案如宣布沈先生有罪恐引起华族示威，对政府产生信心危机，不如委任沈先生为上议员，然后撤消罪状。关于委任沈先生为上议员之事，陈修信曾派几个要员向沈先生说项，沈先生不为利禄所动，坦白说：‘撤消与否由当局决定，我不能出卖民族利益，我不能让人拉着鼻子走’，他婉拒了。富贵不能淫这句话，沈先生可当之无愧。”有所为，有所不为：“士而怀居，不足为士矣”。大是大非之前，沈慕羽坚守民族权益的本分，保全人格节操，推翻了青云路，却留住了凌云志。

<sup>60</sup> 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页147。

<sup>61</sup> 陆庭谕：〈出版前言〉，《沈慕羽资料汇编》。

<sup>62</sup> 陈丽娟：《沈慕羽——华教运动中的导师》，页30。

尽管越战越败，也要越败越战，就会越战越勇。<sup>63</sup>

政府于是展开“茅草行动”大肆逮捕政界、文教界人士百多人，75岁的沈慕羽在10月28日凌晨在《内安法令》下遭扣留，共7个月又5天，直到1989年6月才真正恢复自由身。沈慕羽在《自传》中写到：“开始的60天监牢的生活，有如过活地狱，……屡图殉身以报华教，无奈要上吊无绳子，要自杀无刀斧。”<sup>64</sup>年迈的沈氏终究挨过。但三度入狱的沈慕羽在获释后说：“一旦禁令解除，我将尽本份为华社服务，以报答华社对我的爱戴，因为我国华裔的困境未解除。”<sup>65</sup>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是沈慕羽并未领受过华社的三顾之恩，却是在民族大义的道德责任感的驱使下鞠躬尽瘁、三系图圉。他在1989年7月杪重新为教总掌舵，显然又是对华教死而后已的另一明证。

沈慕羽终身站在华文教育的最前线，欲休不能，何启良曾一而再说明沈慕羽是我们时代的大好人<sup>66</sup>，从沈慕羽的遭遇中点出教总领导无人、华人政界不能尚贤的隐忧，而沈慕羽始终展现宽厚的人格以及一种“吾往矣”的气节。他不乏攀龙附凤的机会，自上个世纪30年代走到世纪末，沈慕羽从青春到暮年始终保持着何启良所说的向权势说真话的那种“面向权威”的独立姿态。是时代选择了他，还是他选择了自己？

## 五、文化薪火：沈体书法与孔教会

2004年2月底，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文艺活动——“岁寒三友世纪联展”。别开生面与意义非凡之处在于这项活动展出了3位90高寿的文教、艺术与佛教界前辈的书画作品：

<sup>63</sup> 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页169。

<sup>64</sup> 引自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页171。

<sup>65</sup> 《通报》，1988年10月18日，载《沈慕羽资料汇编》编辑委员会编《石在火不灭》，页297。

<sup>66</sup> 何启良：〈从沈慕羽荣休谈起〉，《面向权威》，吉隆坡：十方出版社，1995年，页95-99。

所谓“岁寒三友”指的是伯圆长老、任雨农和沈慕羽。

沈慕羽不仅是一位功绩卓著的教育家，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华教运动家，还是一位老报人<sup>67</sup>，更是一位享誉海内外的书法家。他的书法在马来西亚随处可见，尤其在马六甲，由他题书的招牌匾额遍布街头巷尾。爱好者众，也爱好者重。甚至有内行人评论说，“他在马来西亚的影响犹如中国的启功。”<sup>68</sup>虽然中国的地大物博远非马来西亚可比，然而通过这样的比附，“沈体”书法在马来西亚的影响之大声誉之隆可见一斑。他的擘窠大楷，体严法备、雄浑扎实。沈慕羽就这样提到：“我的字，以颜为骨，以赵柳为表。我不自得自诩，但喜我字端庄正直，浑厚苍劲者，大有其人。”<sup>69</sup>于是，沈慕羽也被誉为马来西亚当代书坛的鲁公。<sup>70</sup>潘正联说：“沈氏将本身所学的《颜》与《柳》两体的优点溶入《赵》体，最终自创一格而被称为《马六甲体》或《沈体》，成为一绝。”<sup>71</sup>

沈慕羽对于自己学习书法的过程有这样的自述：

我生在书香的家庭里，兄长们好读书，勤习字。他们临摹颜真卿的双鹤铭字帖。全神贯注，笔笔投入，引起我的莫大兴趣。一天，趁他们不在的时候，我也偷偷握管写个〈人〉字。左手握着笔，撇一撇，然后又把笔移到右手，捺一捺。没想到父亲在背后瞥见了，笑道：“羽儿，握笔怎可换手”。于是他教我怎样执笔，然后教我跟着他一撇一捺。我的学习书法就是

<sup>67</sup> 1953年，沈慕羽联同吴志渊、吴运科出版《古城月报》，并担任这份官民合办的地方性华文报的总编辑至1956年底停刊为止。见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页59。

<sup>68</sup> 封俊虎：〈通会之际 人书俱老〉，载陆庭谕主编：《沈慕羽翰墨集三》，加影：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2006年，页17。封俊虎为中国国门书画院执行院长；同为中国书法家的周俊杰也认为沈慕羽的书法作品一如启功的书法，同样造就了书法艺术的普及。见陆庭谕主编：《沈慕羽翰墨集三》，页25。

<sup>69</sup> 《沈慕羽资料汇编》编辑委员会编：《沈慕羽翰墨集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2002年，页18。

<sup>70</sup> 陈声桂：〈沈慕羽先生——马来西亚当代书坛的鲁公〉，收入陆庭谕主编《沈慕羽翰墨集三》，页28。

<sup>71</sup> 潘正联：〈沈体深入民间——精华结晶自成一格〉，收入沈慕羽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沈慕羽翰墨集》，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1995年，页21-22。

这样启蒙的。<sup>72</sup>

父亲的一撇一捺，启蒙了沈慕羽一手刚正不阿的书法和秉性，沈慕羽也以这样一板一眼的搦管笔法，启蒙了一代又一代人。书法艺术可以陶冶性情、磨炼意志，一笔一划，可以培养耐性，沈慕羽许为静心修身养性之道。《大学》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何况是以“道”自任之士？身修则道立，修身作为一种道德实践由孔子正式提出，孟子尤推重修身之道。然而修身并非儒家的专利，而是古代知识人的共同观念。<sup>73</sup>修身养性是“士”的重要特征，传统的“士”注重精神修养，修身不仅成为“士”的标记，也成为取“士”的标准。<sup>74</sup>沈慕羽由始至终以高标准贯彻这种精神。

沈慕羽欣赏颜真卿所说的“心正则笔正”<sup>75</sup>，反过来说，提笔书写时如能时时刻刻谨守法度，要求握笔端正，同时也要求做人端正，即是正心的良方。对沈慕羽而言，练字是正心之方，也是静心保健之策：

人练字，字也练人，人磨墨，墨亦磨人，书法是一种斯文尔雅运气的内功，也是免费的延年益寿的保健品，我们手不释笔，有恒的“练”和“磨”，旷日持久，自见效应。<sup>76</sup>

“人练字，字也练人，人磨墨，墨亦磨人”，经受磨练的不只是书法，也是人生；磨练成就的不只是好字，也是好人。姑不论练字的保健效应有多高，耐性毅力的磨练肯定日子有功，身心俱健，书格人格俱佳应该能够期待。彭松涛认为沈慕羽“书法好，书格高”，所书内容具有“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气节，词句高洁旨

<sup>72</sup> 沈慕羽：〈我如何与翰墨结缘〉，收入沈慕羽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沈慕羽翰墨集》，页28。

<sup>73</sup> 详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页123-127。

<sup>74</sup> 同上，页127。

<sup>75</sup> 沈慕羽：〈我如何与翰墨结缘〉，收入沈慕羽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沈慕羽翰墨集》，页29。

<sup>76</sup> 沈慕羽：〈书无止境——翰墨集衷心感言〉，收入陆庭谕主编《沈慕羽翰墨集三》，页31。

趣高雅。<sup>77</sup>艺术在儒家来说，需要“助人伦、成教化”。对个人，有“修身”之力，足以陶冶人心；对社会，有移风易俗、感化人心之效。

书法在沈慕羽来说不仅饱含艺术意义，还富有实用价值。既是文化传承，也是正义宣导。沈慕羽的书法作品，无论对联、校牌、招牌，都流露出“崇正尚义”的正直气质。不同团体组织的题词，沈慕羽都费煞思量：“书写时都得苦索枯肠，煞费心思。”<sup>78</sup>这显示出绝非应酬之作，而是内有深意在：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斯谓大丈夫”、“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古人惟大同谓治，君子以中庸为归”等传扬儒家经世之宏论、百折不挠之襟怀，既抒发己志，又勉励他人。不仅文以载道，书亦载道。

书法在沈慕羽手里成为实用工具，很多题词反映时局的发展，既是华教发展的历史记录，也是教总的宣教利器，时时发出警醒讯号；1987年山雨欲来，沈慕羽致予培南中学：“华小是华教的第一道防线，独中为第二道防线。如今华小屡受侵袭，唇亡齿寒，独中必须提高警惕，严阵以待。”<sup>79</sup>华教上下不分彼此，发扬华教是共同主题：“民族教育尚未踏上坦途，凡我校友，仍须提高警惕，步步为营，继续奋斗，争取最后的胜利”、“独中生要有自尊心，也要有自信心。锲而不舍，力争上游，才能为华教扬眉吐气。”华教运动的斗争和精神早已嵌入他的书法之中。沈慕羽的题字还包含了他对教育的信念和理想，比如：“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教师是民族灵魂的工程师。大家尊重教师，教师也要自重。”又或者“有教无类，促进大同”都是沈慕羽的教育宗旨。再如脍炙人口的“华教尚未平等，同道仍须努力”、“服务一生，战斗一世”，以及林连玉语录等鼓励华教士气的书法，展现的不只是四平八稳的书格，还有坚定不移的志气和人格。

<sup>77</sup> 彭松涛：〈谈“铁肩担道义”——沈老的书格〉，收入沈慕羽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沈慕羽翰墨集》，页15-16。

<sup>78</sup> 沈慕羽：〈我如何与翰墨结缘〉，收入沈慕羽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沈慕羽翰墨集》，页29。

<sup>79</sup> 沈慕羽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沈慕羽翰墨集》，页171。

沈慕羽的书法筑基颜柳，端庄而严整<sup>80</sup>，“沈体”书法负载着文化传薪的讯息。刘庆伦就说沈慕羽“藉笔情墨意传达胸中壁立千仞、疾风劲草之壮志，堪谓字如其人，人如其字；见字如若见人。”<sup>81</sup>“沈体”书法盛名远播，流传的时日也已经相当长，“其刚正不阿的气质、其为华教‘苦行’的事迹、其品格端正的形象，其表里一致的人格典范”<sup>82</sup>，也已经随着“沈体”书法的远道而深入民间。

余斯福以书法见沈慕羽的为人，“不啻平原的翻版，字类颜公或是巧合，但从他字造墙壁，落墨厚重，印证了‘字是心画’的古人领悟出的道理”，“以仰慕伟人的心态去读他的书法，自然会体会那股正气，那种慑人的刚毅”。<sup>83</sup>就儒家的修身观念来说，沈慕羽的书法弘扬了阳刚威义，深具“大丈夫”之气。<sup>84</sup>

沈慕羽的字历来得到众多的评论，从形体结构上看，“点画厚重饱满，结体宽博端正，章法疏朗茂密”，从笔法意境上说，沈慕羽90岁以后的字，“运腕执笔若有酒意，欲坠而不坠，外皮粗朴不秀，骨节则如枯藤，硬韧而有波折，似断实连，随手万变，仁心所成”，“能聚能散，能含能拓”，已臻融会贯通之化境。<sup>85</sup>

评价沈慕羽的书法是专家的事，这里只希望举其大者略述一二，试图说明沈慕羽书法的艺术价值，以及艺术之外的人格典范、文化传扬和社会教育的作用和影响。士不可以不弘毅，远道之事仍在点滴耕耘。沈慕羽对于书艺深为看重，寄盼甚殷。他对他的“沈体”有这样的说明：

我出生于革命之家，刚率正直。颜鲁公是我的师祖，关公

<sup>80</sup> 郑浩千：《漫将余力作书家》，收入陆庭谕主编《沈慕羽翰墨集三》，页19。

<sup>81</sup> 刘庆伦：《咬定青山不放松》，收入《沈慕羽资料汇编》编辑委员会编《沈慕羽翰墨集二》，页25。

<sup>82</sup> 陈丽娟：《沈慕羽——华教运动中的导师》，页43。

<sup>83</sup> 见余斯福：《书是心画》，收入《沈慕羽资料汇编》编辑委员会编《沈慕羽翰墨集二》，页22。

<sup>84</sup> 姜澄清：《中国书法思想史》，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1994年，页38。

<sup>85</sup> 见封俊虎：《通会之际 人书俱老》，载陆庭谕主编《沈慕羽翰墨集三》，页17-18。

的正气，文天祥的浩气，我都把它们融注入我的翰墨中，雄浑持重、朴实忠厚，这是我沈体忝有的风格。切盼同道在这歪风邪气乖离传统的潮流里，维护固有神圣不可亵渎的国粹。<sup>86</sup>

从1995年开始，《沈慕羽翰墨集》已先后出版了3册，沈慕羽在世时曾表示希望能够继续出版，并希望天假以年，让他能够以期颐之龄举办翰墨荣休展，他的“沈体”能够蔚成新的书法文化，赓续传世。荣休展已无法成真，书法文化的传世倒是依然可期。

沈慕羽是马六甲州设立书法班的先锋。他所领导的孔教会于1982年成立书法班，在推动书艺方面，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曾在马六甲孔教会书法班学习的人数已达数百人。除了举办书艺交流会、观摩会，还创办了拿督沈慕羽局绅挥春赛，并于2003年提升为全国书法精英赛。

孔教会原是宗教组织，自沈慕羽接掌后才蜕变为一所学术文化机构。沈慕羽从1974年起担任孔教会主席的经过又是一段当仁不让的典故。1970年代的沈慕羽因为华教事务的繁忙，本不愿接受主席的职务而再三婉拒，最后经不起孔教会几位元老多次的苦心恳求，毅然接过领导棒子。<sup>87</sup>自此，沈慕羽极力改革孔教会，希望用现代的方式发扬孔子学说，成立图书馆举办公学术活动，藉此宣扬中华文化。<sup>88</sup>他坚信“要挽救人心，重整道德，洗净头脑，孔子之道是对症的良药”。<sup>89</sup>

多年前为筹建孔子大厦卖字筹款，沈慕羽甚至还远赴台湾出席孔诞并要求当局协助。沈慕羽毅然领导孔教会，除了经不起元老们的恳求，更重要的是，他意识到自己作为教总掌舵人，对于尊孔扬孔、改革与发展孔教会是责无旁贷：“孔教与华教异途同归，应相辅而行”<sup>90</sup>。孔教与华教既然分不开，筹建孔子大厦发展孔教会的工作就与华教事业一样不能停下来。2005年，孔子大厦落成，沈慕

<sup>86</sup> 沈慕羽：〈书无止境——翰墨集衷心感言〉，陆庭谕主编《沈慕羽翰墨集三》，页32。

<sup>87</sup> 详见沈慕羽：〈我与孔教会〉，《沈慕羽言论集》上册，页275。

<sup>88</sup> 沈慕羽：〈纪念孔诞2531〉，《沈慕羽言论集》上册，页274。

<sup>89</sup> 沈慕羽：〈纪念孔诞2525〉，《沈慕羽言论集》上册，页269。

<sup>90</sup> 同上。

羽主持开幕典礼了却心愿。他希望儒家教育、学说、思想能够发扬光大，匡正人心时局，同时解救华人的生存困境。

行内人认为，马六甲是全国书法活动和书法风气最为蓬勃的一个州属，沈慕羽居功至伟。他对于马六甲书法的传播和发展所作出的最大贡献是在孔教会开办书法班，进而一改马六甲书法风气低落的现象。而沈慕羽能够带动书法风气和振兴孔教会，又跟他维护华文教育有密切的关系。<sup>91</sup>

沈慕羽对于孔子学说有正确的认识，也有改革的勇气。他呼吁众人改变信仰的方式，认为“孔子是反对迷信的，所谓敬鬼神而远之。以前的人把孔子当作神明而膜拜，求他庇佑，求他赐福，这是错误的。崇拜孔子而学习孔子的学术、人格和精神，那才是正确的。”<sup>92</sup>

对于孔教会的改革，沈慕羽持开放的态度，欢迎农工商学各界人士加入阵营，“使孔教会成为一个学术的中心，和维护中华文化的总汇”。<sup>93</sup>他既愿意保守孔教会这一传统，又不惜扬弃祭祀膜拜的惯习，加入更多的学术文化教育元素，以为今用，展现通透的理性认知，以及一种经世的胸怀。

沈慕羽做事奉循儒道，具有“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的士人气质。在沈氏一生的民族事业奋斗中，其言行与儒家思想多有契合，对孔孟的教诲也有自己的见解。他生活简朴，争取华教地位的确跟他的生命融为一体。一种“舍我其谁”而“吾往矣”的使命感和处事态度贯串他一生的言行。<sup>94</sup>当代马华文化人，从生存保民到繁衍发展，历经几许忧患，在时代的进程中保存民族的薪火，沈慕羽堪为典范。

<sup>91</sup> 陈玉佩：〈南、北马书风的差异——“南沈北孔”现象分析〉，收入郑文泉、傅向红主编《粘合与张力：当代马来西亚华人族群内关系》，加影：新纪元学院马来西亚族群研究中心，2009年，页166-167。

<sup>92</sup> 沈慕羽：〈纪念孔诞2528〉，《沈慕羽言论集》上册，页271。

<sup>93</sup> 同上。

<sup>94</sup> 陈丽娟：《沈慕羽——华教运动中的导师》。



## 六、马华文化发展：寻找文化通人？

文化俨如生命，处于不断的发展过程。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两种力量：一是维持稳定的力量，一是进行创造的力量，这两种力量经常处于抗衡与摩擦之中。<sup>95</sup>从文化的发展历程来看，这两股力量又必须交互作用，才能使得文化有平衡的发展。马华文化发展的道路崎岖，稳定与创造的力量蹒跚前行，沈慕羽的“全能”与欲罢不能，或可道出其中症结。

郑良树在将近30年前发表的〈华人文化与马来西亚华人〉中从华人南来谋求生存到发展文化的过程，推测“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文化将是自成一个体系，这个体系不是中华文化的全形复板，而是以中华文化优良的儒家传统为血肉躯骨，采撷其他马来文化、西方文化及印度文化为毛发肌肤的另一种文化。”<sup>96</sup>他清楚意识到华人文化已经在马来西亚扎下了根，也相信凭着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华人文化能够在本地发展出另一种璀璨的文化。这不仅是很多人的文化愿望，也是文化交融的理想境界。其关键在于，文中对于马来西亚华人文化的概念是清晰的，对于其发展趋向的认知也是笃定的——即糅合其它文化元素的一种华人文化。

10多年后，何启良从认同的角度，撰文分析马华文化的发展取向，说明马华文化认同的困扰和复归，指出国家文化政策和马华文化之间恒存着一个复杂的问题，即“民族融合”和“自我定位”之间的调谐与矛盾。<sup>97</sup>文章中分析马华社会对于文化认同方向的追从和适应又面临了重大转折。既没有对母体文化的有效转化，也对西方文化缺乏认识，形成对西方高层文化的“免疫”，马华文化显然没有一个自家的价值系统和整体结构。文章同样相信东、西和本土文化是现代马华文化的归趋，同时要求马华社会要有清醒的理性认知，以及细致的科学分析。他更进一步指出：社会和文化的处境已

<sup>95</sup> 许明、花建主编：《文化发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页87。

<sup>96</sup> 见郑良树：《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人文化史论丛》卷一，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学会，1982年，页1-26。

<sup>97</sup> 何启良：〈文化马华：略说马华文化认同的困扰和复归〉，《文化马华：继承与批判》，吉隆坡：十方出版社，1999年，页15-44。

改，而我们应付处境的知识未变，这就难怪我们都感觉到矛盾和停滞不前了。<sup>98</sup>

这样的矛盾与停滞在又10多年后的今天消解了吗？从融合的期许到认同的困扰，困境依旧，知识似乎并未翻新，问题仿佛更为复杂，难道说30年来我们的文化发展滞后了吗？面对这些问题，学者一般仍会同意大马华人在很多文化项目中取得长足的进步，而将症结指向马华文化的浮浅以及文化深耕的困境。上述两位作者当然关注到这个问题，骆静山、何国忠、黄锦树、曾庆豹、安焕然、黄文斌等莫不如此。<sup>99</sup>看来，思想文化的深耕与高层或精致文化人才的培养已是学界的共识。这里还要进一步提问：马华文化的发展常为外力所困扰或左右，依然挺立百年，其内在发展的动力为何？我们要有高层的文化和文化人才，目的是要充实原本苍白的文化面貌与内涵，还是要有人能够理解、解释当代马华社会的问题，进而提出改善或改良的方案？

这样的提问似乎过于功利，然而百年马华社会面对各种生存与发展的问題、认同与平等的困惑，全球化浪潮下各种价值观的交错迷惘以致空虚无根，大马华人将以怎样的文化面貌面向世界？百年马华社会，究竟是没有一个自家的价值系统和结构，还是吾人早已不自觉地加以扬弃？这一系列令人沮丧或失落的问题，在华社内部来看，其导因究竟是缺乏可延续的价值系统、还是可发展的庞大知识群体（文化人才），抑或是一位一呼百应的文化领袖？

余英时曾对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发表过这样的观察：老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大都是以平静的心情等待生命的终结，中年一代的有的彷徨苦闷，有的随世浮沉，年轻的一代则或者腐化颓废、或者愤世嫉俗、或者各谋一己的前程。<sup>100</sup>大家心中似乎都有评断。证诸当今马华，主体性的叩问与寻求暂且不提，大马华裔子弟的人生价值又要从何说起？我们每以华文教育的发展历程来窥探马华文化的发

<sup>98</sup> 同上，页33。

<sup>99</sup> 详黄文斌：〈论马华文化的承传与文化人才的培养〉，收入何国忠编《百年回眸：马华文化与教育》，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05年，页63-86。

<sup>100</sup> 余英时：〈论文化超越〉，《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台北：三民书店，1995年，页19。

展，以本土高等学府华文或人文院系的发展为文化前景的参照，可惜同时间又为华文水准的低落以及学子束书不观、辍学率高企的现象悲叹。具体而言，文化水准的停滞或低落，是文化人才的欠缺，或是读书人的独善与师道的衰退有以致之？教师变为一份职业，学者纯以专业研究人员的姿态出现，淑世用道的熏陶从何做起？文化人才的培养要从何说起，具体的实施方案如何推行？华人社会的分歧和分裂到这样的地步，文化人才的增加是否就能意味着失学失业和不法勾当所涉人数的减少？文化人才的培养不能失之笼统，当今之世，救亡之心仍不可缺。多培养几位像林连玉、沈慕羽这样的人师是否更为迫切？师道的重振是否更为关键？

如果说马华社会仍旧怀有羊群心态，希望借助文化领袖的领航走出族群退败的迷雾，文化领袖对于马华文化是否有传扬与提振的作用，进而凝聚族群意识和民族认同？何启良曾就马华知识社群的隔膜作了有趣的对比：把邱菽园换成郑良树，把林文庆换成陈志明，把宋旺相换成李锦兴，他们之间似乎有极大似曾相似的共同点——似乎没有整合。<sup>101</sup> 设若当今马华社会的文化理想追求在于文化领袖之作用，而这样的文化领袖须是对传统文化具有会通圆融的通盘掌握，复对华人文化充满信心，俾能藉此吸收转化他族之文化以为己用的文化通人，上述邱菽园、林文庆、宋旺相等3个类型，哪个的影响要大一些？

本文愿意从这个观察延伸，无论能否整合，马华知识群体类型当然远超上述，足以说明马华知识分子/学者代代都有，然而其社会和文化影响对于大马华人则不容高估。郑良树已在马华历史上列下了第一名和第二名的人物，这样的评断相信是客观的、公允的。林、沈二人毫无疑问都是现代马华文化人，却都不是政治家、思想家、专业学者或儒商。他们都是人师楷模，具有儒家人文传统的道德风范，为马华社会的教育运动家。他们切切实实地回应了时代的需要，身先士卒呼叫出人民的诉求，以不亢不卑的气度顶住了现实的压力，成就了马华社会的理性人格，终在社会舆论和历史评价中

<sup>101</sup> 何启良：〈萧萧行色：百年马华文化〉，收入何国忠编《百年回眸：马华文化与教育》，页58。

占据了应有的位置。

沈慕羽对传统文化的融汇贯通和播扬之功无需置疑，尽管他对英文、马来文的掌握能力有限，在促进文化交流方面的成就仍有明显的不足，然而在马来西亚的社会现实中，与林连玉相比较，沈作为马华文化通人无疑具备了更加优越的条件和气质。我们仍然想知道，与沈慕羽身处的年代相比，我们的教育环境是否更理想？我们的教育政策是否更开放？我们的语文条例是否更开明？我们的文化条件是否更充裕？这些都不是容易解答的问题，可是人们心中或许有数。假设现在的情况更为严峻，我们能有何对策？换成是沈慕羽，他会如何应对？

在发展失衡的马华文化当中，本文相信文化通人仍有他亘久的标志性意义。何启良深入的评析早已点明，沈慕羽文化人格的典范对于马华社会具有重大意义。沈慕羽能以其道德人格的回归来防止政治人格的失范，复以道德人格的典范来防止文化人格的失范。<sup>102</sup>“他能自拔于现实挫折之外犹不改其志，外逆境之中犹不变其高旷节操。”<sup>103</sup>更为难得的是，他能真正做到“不退缩、不投机、不气馁”，以身体力行的方式贯彻始终，面对社会的危机能够坚定承担。

传统儒家性格的文化人，具有危难中的担当精神。这种担当的决断是道德性的、价值意义的。在现实生活中，儒家思想原就是一责任伦理。儒家责任感的最重要特征，是对天地万物家国天下历史文化随时随地、此时此地都敢于勇于担当，而不转移、不逃避、不推卸责任。这是儒家一体存在的历史意识、文化意识、价值意识充沛之表现。这也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sup>104</sup>

何启良曾向沈慕羽索字，要求写陈寅恪的名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认为这两句话也能够用在沈慕羽的身上：“他独立于众多妥协之外，毅然故我，出于淤泥而不染。当华社在纷乱之

<sup>102</sup> 何启良：〈大马华人历史上的沈慕羽〉，收入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页50。

<sup>103</sup> 同上。

<sup>104</sup> 罗义俊：《生命存在与文化意识》，上海：学林出版社，2009年，页8。

中无所适从时，他还是最清醒的。他年事越高，越能够自在地游刃于出世与入世之间，身陷囹圄而华教得以捍卫，身受屈辱，屡次入狱却得思想之自由。于个人于家于国，毋宁幸哉。”<sup>105</sup>

马华社会，早有“泛政治化”或“泛政党化”的失范现象。可惜的是，很多在文化上和政治上最为活跃的人，最终都转而相信“政治力量”可以决定一切，继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政治浪潮当中。作为一位立国前后在社会与政治参与最为积极的华教人士，出于担当前仆后继，沈慕羽有至深的体会和自觉，在浪尖上起伏之后，仍能独立自守，最终坚持教育力量和文化力量才是安身立命的归宿。他的这一番体会和自觉，以及及时的抽身，在在显现个人的睿智与游刃其间的能力。沈慕羽对传统价值的信念与持守，及其文化的底蕴相信是更为关键的因素。遗憾的是，相信“政治力量”可以决定一切的人依旧大有人在，仍然前仆后继的代代都有。马华政治的这一摊浑水，埋葬了多少文化人的善与真？马华政治的无力与尴尬，又扼杀了多少马华文化创造上的可能？姑不论当今政治环境与议政条件是否更为恶劣，沈慕羽之后，能够力保文化人格于不失、力挽道德人格于不坠的又有几人？

观诸当今大马华人社会，对华人自身文化具有通盘的掌握和充分的信心，复对友族文化具有深度的了解与自发的同情，而能在文化交融的海洋中悠然自得者，是否比林、沈时代更多？本文以沈慕羽为例，试图说明其作为文化通人的条件和气质之不可多得，复以其人生成败作对比，点出华人文化发展在大马社会的具体困境。沈慕羽未能跨出种族的藩篱，成为多元文化社会中的公民典范，至少在守护民族特色播扬自身传统上保存了真实的根脉。他以自己在文化传承上的“完美精致”来掩饰整体马华文化的虚浮与低落，而马华文化群体却未能给他以更实在的支持和衬托。这一种落差不能不说是民族文化上的悲哀；沈慕羽个人的缺憾，毋宁是时代困局所限，更是马华文化人的集体缺陷。斯人已逝，大马华人文化真的要能立足本土面向世界，文化通人的追寻在可知的未来恐怕还是共同的心愿，却可望而不可及。

<sup>105</sup> 何启良：〈永远的沈慕羽〉，《南洋商报》“商余”版，2007年8月21日。

## 七、结语

文化发展需呈现鲜明的时代风格和历史特征，才能看出生命力。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问题，每一代的文化，有赖每一代人的努力更新和创造。文化的外在表象，就是人生。我们可以肯定文化的超越性以克服浅薄的功利意识和物质意识，是一切文明社会的共同要求，以追求人生的真、善、美。

钱穆晚年曾在一场演讲中说道：“今天的中国，绝不是我小孩子时候的中国了。今天的中国人，亦绝不是我小孩子时候的中国人了。已经变得很大，亦可以说变得很新了。我们还要求变求新，我们究竟要变到什么一个阶段？什么一个形态？怎么样的新？这是当前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人生问题。”<sup>106</sup>

今天的大马（华社），已经不是沈慕羽小孩子时候的大马（华社）了。今天的大马华人，亦绝不是沈慕羽小孩子时候的大马华人了。“已经变得很大，亦可以说变得很新了。我们还要求变求新，我们究竟要变到什么一个阶段？什么一个形态？怎么样的新？”这是当前我们每一个大马华人的生问题。

谁能点出这道题？何启良曾诘问“华社领导何在？”就有人对沈慕羽的荣休强调“华社不可一日无此君”直问“‘不可一日无’到何时？”并指华社期待摩西型人物出现的心态是幼稚甚至是愚昧。<sup>107</sup>可是他继而提出忧虑：华社是否能够在未来培育出几位具最起码领导素质的俊杰？他们又能否勇于尝试一些未完成的工作，成为时代的中流砥柱，把华社带到一个更理性、更崇高的层段？<sup>108</sup>

本文相信具有道德典范意义的文化通人始终对马华社会举足轻重。沈慕羽对于文化传统，有身体力行的持守，也有推己及人的传扬。换句话说，他是既能保守，又能创新，关键还在于他清楚自己营营役役所为何事。他说明教师是读书人，必须守住读书人的气节；他愿意自承身为华人最光荣，毕生最爱华教。华人文化中的成

<sup>106</sup> 钱穆：《人生十论》，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页123。

<sup>107</sup> 何启良：〈华社领导何在？〉，《面向权威》，页53-54。

<sup>108</sup> 同上，页54。

败端在人格，人格上失败了，失守了，不能称其为人。沈慕羽能够守住自己——守住自己做人的独立性，守住自身清白，守住华族文化。他能守住清白，做一个及格的人；他能守住华人文化大义，够得上一个合格的大马华人。

文化要求理性与情感的平衡，沈慕羽的文教诉求不逾理性的范畴，其呼吁充满情感的丰沛，处处显现当代马华文化人敏锐的分寸感。“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沈慕羽以其毕生的忧患挣脱了马华的政治裂缝，从而抚平了马华文化裂痕中的一道缺口。





---

# 沈慕羽的楷书形体

## 正体规范与书艺别构的兼容

■ 李乾耀

---

### 一、前言

沈慕羽很重视书法，他说：“古时读书人，不但要写好文章，同时也要写得一手好书法，才能算是个文人。”<sup>1</sup>他在〈汉字与书法〉一文又说：

一路来华人士大夫，都以琴棋书画作为高尚消遣，尤其是毛笔书法最受重视，临池成为日常功课。他们认为学问是内涵，书法是外表，内涵充实，外表端壮，才是完人。<sup>2</sup>

沈氏认为内涵充实的士大夫，必需擅长书法，才能算是“完人”。因此，士大夫在琴、棋、书、画中，最重视书法。

在众多书体中，沈慕羽选用楷书。他在〈我如何与翰墨结缘〉一文中说：

我此生嫉恶如仇，崇尚正义。我欣赏“颜真卿”所说

---

<sup>1</sup> 潘正联：〈能用筷子亦可挥毫〉，见《沈慕羽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沈慕羽翰墨集》，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总会，1997年，页45。

<sup>2</sup> 《沈慕羽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沈慕羽翰墨集》，页37。

的：“心正则笔正”<sup>3</sup>。颜真卿的字刚朴遒劲，流露出其为人之气质。我一路走来都写正楷，表现了个人性格。<sup>4</sup>

可见沈氏写正楷，与他嫉恶如仇、崇尚正义有关。这是将书艺人格化的展现<sup>5</sup>。

沈氏自述其楷书宗法颜体，参酌柳体与赵体<sup>6</sup>，并将颜真卿的人格、关公（约160-219）的正气、文天祥（1236-1283）的浩气融注于翰墨，形成雄浑持重、朴实忠厚的“沈体”<sup>7</sup>。他的楷书形体，在讲求规范中又参杂非正体字，值得加以探索。

本文的论述，涉及书法形体中同字异构的术语。此术语在文献中，有的称它为“碑别字”，有的称为“帖体”等，必须加以界说。董寿平为秦公辑《碑别字新编》写的序文说：“碑版之别构

<sup>3</sup> 按：《沈慕羽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沈慕羽翰墨集》收录〈沈慕羽局绅主讲：华文书法心得〉一文，文中沈先生慕羽说：“颜真卿是唐朝的书法家，有一天，唐穆宗问他怎样才能写好字？真卿说：‘心正则笔正’。其实，颜真卿的话是在笔谏。他借题发挥，寓意是治理国政和写字一样，要正心诚意，凝神定气，一心一意，思想纯洁，不做他念。”（《沈慕羽翰墨集》，页42）将此文与引文对照，可知沈氏在这两段文字中，提到颜真卿（709-785）说的“心正则笔正”，是指“笔谏”的典故而言。然而，“笔谏”中的书法家，实为柳公权。《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五曰：“公权字诚悬。幼嗜学，十二能为辞赋。元和初，进士擢第，释褐秘书省校书郎。李听镇夏州，辟为掌书记。穆宗即位，入奏事，帝召见，谓公权曰：‘我于佛寺见卿笔迹，思之久矣。’即日拜右拾遗，充翰林侍书学士，迁右补阙、司封员外郎。穆宗政僻，尝问公权笔何尽善，对曰：‘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上改容，知其笔谏也。”（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页4310）显然，沈慕羽将典故中的“柳公权”误为“颜真卿”。

<sup>4</sup> 《沈慕羽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沈慕羽翰墨集》，页29。

<sup>5</sup> 关于沈慕羽的书法与人格，何启良〈大马华人历史上的沈慕羽-《沈慕羽事迹系年》序〉之“文化人格的典范”一节，论述甚详，见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总会，1997年，页44-51。又见于李亚邀编：《晚节飘香续编》，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总会，2006年，页161-167。

<sup>6</sup> 爱枫笔记，沈慕羽口述〈如何学习书法〉说：“我小时写‘人’字，左手提笔一撇，右手提笔一捺，父亲指我不能写好字，于是我就发奋勤练颜体，再参酌赵体和柳体，而自成一体。”见《沈慕羽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沈慕羽翰墨集》，页34。

<sup>7</sup> 沈慕羽〈书无止境——翰墨集衷心感言〉说：“颜鲁公是我的祖师，关公的正气，文天祥的浩气，我都把它们融注入我的翰墨中，雄浑持重、朴实忠厚，这是我沈体忝有的风格。”见《沈慕羽资料汇编》编辑委员会编：《沈慕羽翰墨集三》，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总会，2006年，页32。

字，历代殊多有之，期间惟以北朝唐代为甚。”<sup>8</sup>在此，董氏所谓的“碑别字”是指碑版的别构字。叶昌炽（1847?-1917）《语石》说：

唐碑之别字，不尽同于宋，宋碑之别字，亦不尽同于辽金元。见门帖延、禧、迎、祥等字，“延”皆写作迤，“迎”皆写作迓，后观唐宋碑皆如此。乃知里巷相承之字，亦有自来，流俗所谓帖体，是矣。<sup>9</sup>

叶氏指出“碑别字”又称“帖体”。然而，无论以“碑别字”或“帖体”作为同字异形的术语，都会由于书写材料的囿限，而不容易有明确的界说；况且“碑”与“帖”的名与实，又含混不清。梁章钜（1775-1849）《退庵随笔》说：

今人临摹古人书者统曰“临帖”，不知帖之名起于晋而盛于宋。秦汉以前之钟鼎款识及石鼓等等，皆当谓之金石文字；李斯各篆刻，但当谓之磨崖；至两汉以后树石书丹者，则谓之碑碣，而不可以帖名。帖者，始于卷帛之蜀书，凡后世一缣半纸珍藏墨迹者，皆归之帖。<sup>10</sup>

梁氏虽辨析出帖、金石文字、磨崖和碑碣之间的差异。然而，“碑”与“帖”在不同的时代，名与实的关系又有所变更。王壮弘（1931-2008）《碑帖鉴别常识》说：

今日的碑字，有狭义和广义二解。从狭义来讲，它不过是一些石刻种类中的一种；从广义来讲，它是泛指各种形制的石刻文字。作为书法欣赏时，人们常常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这是碑字含义引申和扩大的结果。石刻文字统称之为碑，并非近时才开始的。清人叶昌炽在《语石》中曾说“凡刻石之文皆谓之碑，但是汉以后始。”这说明在很久以前人们就约定俗成的了。

<sup>8</sup> 秦公辑：《碑别字新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页1。

<sup>9</sup> [清]叶昌炽撰，柯昌泗评，陈公柔、张明善点校：《语石、语石异同评》，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页510。

<sup>10</sup> 梁章钜撰：《退庵随笔》，收入《清代笔记丛刊》全六册，济南：齐鲁书社，2001年，页2079（卷二十二页十一）。

故碑经过含义的引申，它可以是刻石、碑、碣、墓志、塔铭、刻经、造像、石阙、摩亚、题名、桥柱、井栏、食堂（享祠纪事）、界石、画像题字等等，一切刻有文字的石刻（除刻帖外）的总称。

“帖”，《说文解字》解释为“帛书也”。古人把书写在竹、木片上的字迹，称之为帖……自从造纸术发明后，帛与缣素、质并用于书扎。因此凡是小件篇幅的书迹，当时人们都称之为帖，这是“帖”字含义的扩展。自从后汉开始，书法艺术逐渐受到社会的重视，士大夫有收集书家手迹的习惯，把名家信札作为珍秘收藏起来欣赏研习，称之为帖。这帖字含义的再扩展。自北宋始，有汇刻历代名家书迹于木、石之上的，名之曰丛帖、汇帖或集帖。这是帖字含义的三扩展。从石刻上捶拓下来的拓本，为了便于临摹欣赏，装裱成册，或直（或推蓬装）、或横（称蝴蝶装）亦皆称之为帖，这是帖字含义的第四扩展。从帛到刻帖以至一切书写、摹刻、椎拓、影印文字，在作为研习书法应用时，装表成册的都称之为帖，这是帖字含义扩展的结果。<sup>11</sup>

王氏指出：“碑”与“帖”，会随着使用材料的发展与变更、广义和狭义的词性而有不同的意义。因此，本文论述时不使用“碑别字”与“帖体”这两个术语。由于本文从书法探讨沈慕羽的楷书形体，所以直接用“别构字”，或将“书法”、“书艺”和“别构”一词连用。

依照会议论文的格式，文字必须采用简体输入。然而，沈慕羽的楷书强调以繁体书写，其中又以非正体字别构异体；此外，文中从字样书籍引用的文字，也有繁体与俗字；若全用简体输入，解说形体时，将造成混淆。因此，只好采用权宜的方式，主要用简体输入，必要时兼用繁体或造字。

<sup>11</sup> 王壮弘：《碑帖鉴别常识》，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页1-2。

## 二、以“六书”为本的汉字形体观

沈慕羽在〈悼王宓文老师〉一文回忆说：“我一生中，受业的老师不下数十人。然而，给我印象最深，毕生难忘的，要算王宓文老师了。”<sup>12</sup>关于王宓文的学识，沈氏为《王宓文诗文集》写序时说：

王老师世代书香，家学渊源，居常孜孜，手不释卷，钻研国学，造诣精湛，经、史、子、集，无所不窥。擅篆书、工行草，笔走龙蛇，神韵超逸。尤精内典，举凡佛经偈语，绝世津梁，更多领悟，故其道德高尚……。马大教授陈铁凡、苏莹辉两君，对王老师之才学，备极敬服。林文庆博士早年翻译《离骚》为英文本，王老师曾推敲切磋，见地特多，林博士赞许有加，其英文之养深，于此可见。<sup>13</sup>

由此可知，王宓文国学造诣精湛，擅长书法，亦精通英文。王氏渊博的学识，对沈氏的书法又有怎样的启发？沈慕羽〈我如何与翰墨结缘〉说：

影响我的书法，最大的有下面几位老师和一位广府佬。童年时代，我住在古里街，隔壁有个广府老，天天在门口摆了一张桌子，替一间“宝文石印公司”写字板，有大有小，每个字都端方秀丽，笔划不苟，给我的启发很大。念初中一时，王宓文老师传授《说文解字》，使我认识了方块字的结构，从此减少错字和别字。中二时，前清赵颂周老师指导我们悬腕挥毫他的赵体是“赵孟頫”的嫡传，令人欣赏。我从旁揣摩，渐渐的也学会了赵体的几招，加上我家藏有百家字帖，我时常展读，细嚼名家的神髓，研取其特征，临摹时，每字百次，逐个比较，写不好再写，一直写到满意才歇笔，绝无姑息。这时我才进入书法的门槛。<sup>14</sup>

<sup>12</sup> 《沈慕羽资料汇编》编辑委员会：《沈慕羽言论集》下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1998年，页112。

<sup>13</sup> 《沈慕羽资料汇编》编辑委员会：《沈慕羽言论集》下册，页123。

<sup>14</sup> 《沈慕羽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沈慕羽翰墨集》，页28。

可见王宓文、赵颂周老师和广府老对沈氏的书法都有影响。赵颂周老师与广府佬给沈先生的启发，主要是书法的技法。王宓文传授《说文解字》，让沈氏认知汉字的结构，从而讲求书写的规范，则是对书法形体的影响。此影响构成沈慕羽的汉字形体观。这可从沈氏的言论窥探其大略。

沈慕羽〈汉字与书法〉说：

中华文化，不但是华人之宝，也是世界之宝，其文字在世界各种语文中，独树一帜，与拼音字迥然不同，它是由象形文字而蜕变的。从字的构造，可以意会字的读音，有边读边，无边读上下，从字的形状可以知道它的意义，如哭、笑、吠。它是由指事（如上、下）、象形（如日、月）、形声（如江、河）、会意（如武、信）、转注（同一意义而有数字，如老、考）、假借（如长、令）。<sup>15</sup>

沈氏文中所谓的“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即文字学中的“六书”，见于许慎《说文解字·序》：

《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二（按：古文上字）、一（按：古文下字）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屈，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事也。<sup>16</sup>

由此可知，沈氏所谓的“六书”出于《说文解字》，他排列“六书”的顺序亦严守许慎〈说文解字序〉。

“六书”不仅是解说汉字的学理，其中也蕴含中国文化。儒家将“六书”列为“六艺”之一。《周礼》曰：

<sup>15</sup> 《沈慕羽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沈慕羽翰墨集》，页36。

<sup>16</sup>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页754-756。

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sup>17</sup>

沈氏研习《说文解字》，体悟汉字形体中所蕴藉的文化内涵。这也反映在他的言论中。他在〈华文的创造与书艺〉曾说：

中国的方块字是世界上最独特的一种文化，中国的毛笔书法也是世界艺术的奇葩。中国的方块字是蕴吸天地的灵气而创造的，它是根据天地的形象而塑成的，可说是造物者授予的记号。它的每一个字的构造都是有原理的。从字的构造和形态，我们可以会意的读音，也可以领悟字的含义，这是拼音字所做不到的。我们的方块字一个字一个音，不像拼音字，许多字母合起来才成一个字。这是方块字独有的生命，迥异其他的语文。<sup>18</sup>

他在〈汉字与书法〉一文又说：

它是由几种形式而创造的，不是随意杜撰的。一撇、一划、一点、一钩，都具有意义，成为这些构造的道理，汉字可说是最容易学习的语文，汉字是单音语文，不像其他语文，每个字是由好几个字母拼成的，一个字几个音，是复音。我们如能用科学方法去教导华文，我相信学习华文是轻而易举的。因为我们可以从华文的表面看出字音和字义，但英文的生字就要查字典，才知道其意义。令人遗憾的，竟有一班丧心病狂的人，想要以罗马字母代替华文。真是岂有此理。<sup>19</sup>

显然，他研读《说文解字》，了解汉字结构的原理与文化内涵，深入体会汉字的特质，能清楚区分汉字与其它文字的差异。因此，他严厉抨击想以罗马字母取代汉字者。文中，会出现“丧心病狂”与“真是岂有此理”的词语，正因为他对汉字形体了解深入，明白以罗马字母取代汉字的改革方案，无疑是自毁民族文化，所以才会用如此强烈的措词。

<sup>17</sup> 阮元：《周礼注疏》，见《十三经注疏》第3册，卷十四，台北：艺文印书馆，1965年，页6。

<sup>18</sup> 《沈慕羽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沈慕羽翰墨集》，页31。

<sup>19</sup> 《沈慕羽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沈慕羽翰墨集》，页37。

沈慕羽的汉字形体观，也反映在他对简化汉字的原则。1973年1月15日，他在曾永森国会议员召集的汉字简化委员会会议，被选为副主席。<sup>20</sup>关于汉字简化的原则，沈氏〈对于汉字简化的看法〉一文说：

甄选简体字是一项最重要的工作，也应定下一个原则，究竟要简到什么程度？要以什么作为根据？我以为应以华人民间所通用的“俗字”为蓝本；必须注意简得有道理，不要太离谱，避免和六书冲突——中国文字制造的原理——象形、会意、指事、形声、专注、假借相违背；以中国大陆、台湾、新加坡简体字汇作参考，不可激进，宜温和，选其共同而最通用者先行采用，字汇应有限制，以免太滥。<sup>21</sup>

关于汉字的简化，他仍然强调不宜违背六书。他在〈对于汉字简化的看法〉中又说：

简体字适合于速写，写信作文，以求快捷。对于艺术来说，写条幅对联用简体字，就不自然了，所以提倡简体字的中共领袖毛泽东、郭沫若仍然用毛笔写完整的汉字，由此可证。<sup>22</sup>

沈氏以提倡简体字的毛泽东（1893-1976）、郭沫若（1892-1978）仍然用繁体字写书法为例，认为书法应该用繁体，这与他深谙六书不无关系。

沈慕羽曾接受《中国报》的采访，谈论正统书法的课题。据采访稿〈新潮书法虽风行，然非正统〉记载：

沈局绅认为，任何一样东西都必须要有有一个准则及技能的传授，华文书法是从六书构成的，并不是随随便便可以自己创造，每一字的组织都有其意义，如果自由发挥，而没有体统，将来可能没有书法了，而写的字也越写越怪，对正统书法是一

<sup>20</sup> 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总会，1997年，页82。

<sup>21</sup> 《沈慕羽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沈慕羽翰墨集》，页39。

<sup>22</sup> 《沈慕羽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沈慕羽翰墨集》，页39-40。



种危害，不应鼓励。<sup>23</sup>

可见沈氏强调正统的书法，认为正统的书法，须含有正统技法的传授与符合“六书”结构的形体。换言之，依从“六书”结构的形体，是正统书法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

综上所述，在王宓文的传授下，沈慕羽研习《说文解字》，认知“六书”的学理。此学理，构成沈氏的汉字形体观。沈氏从此体悟汉字所蕴蓄的文化内涵，深刻了解汉字的特质，进而能清楚辨析汉字与其它文字的差异，并意识到以罗马字母取代汉字将戕害民族文化，甚至认为即使简化汉字也不宜违背“六书”。此形体观，反映于书法创作，则强调应该采用繁体字书写，并认为讲求结构形体的规范，是正统书法的重要条件之一。统括而言，沈慕羽的汉字形体观，即以“六书”为本。

### 三、沈慕羽楷书的正体与书艺的别构字

上一节从文献论述沈慕羽的汉字形体观以“六书”为本，于书法形体则讲求规范。然而，从沈慕羽的三本翰墨集中，不难发现其楷书在同一字中使用不同形体。例如“经”字写作“經”，又写作“經”；“能”字写作“能”，又写作“能”；“宝”字写作“寶”，又写作“寶”等等。究竟他所用的同字不同形体在性质上有什么差异？

在辨析沈慕羽楷书形体的性质之前，首先需要找出判断的依据。沈氏的楷书主要学颜真卿，颜氏是唐朝人，而唐代又是楷书字样学兴盛的时代，所以可用唐代流传至今的字样书籍，如《干禄字书》、《五经文字》和《九经字样》作为判断依据。谨将沈慕羽部分同字异形的字例，列于下表：

<sup>23</sup> 《沈慕羽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沈慕羽翰墨集》，页44。

(表1)

字例	判断依据	性质
<b>經</b> (沈三·169) <sup>24</sup>	《九经字样》曰：“經作經者讹。” <sup>25</sup>	正体
<b>經</b> (沈三·133)		讹字
<b>能</b> (沈二 <sup>26</sup> ·43)	《干禄字书》曰：“能能上通，下正。” <sup>27</sup>	正体
<b>能</b> (沈三·121)		通体
<b>寶</b> (沈一 <sup>28</sup> ·134)	《干禄字书》曰：“寶寶上通，下正。” <sup>29</sup> 《五经文字》曰：“寶从缶，从尔讹。” <sup>30</sup>	正体（《干禄字书》、《五经文字》）
<b>寶</b> (沈二·71)		通体（《干禄字书》） 讹字（《五经文字》）
<b>懷</b> (沈二·46)	《干禄字书》曰：“懷懷上通，下正。” <sup>31</sup>	正体
<b>懷</b> (沈三·69)		通体

<sup>24</sup> “沈三”即《沈慕羽资料汇编》编辑委员会编《沈慕羽翰墨集三》，其中的阿拉伯数字为字例之页码，后不赘。

<sup>25</sup> 唐玄度（活动于唐代开成[836-840]前后）：《九经字样》，见景印《四库全书》第22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页9。

<sup>26</sup> “沈二”即《沈慕羽翰墨集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总会，1997年。

<sup>27</sup> 颜元孙（活动于唐高宗至唐玄宗时）撰，颜真卿书：《干禄字书》（石刻本），见中国书法编辑组编《颜真卿》第4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页111。

<sup>28</sup> “沈一”即《沈慕羽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沈慕羽翰墨集》。

<sup>29</sup> 颜元孙撰，颜真卿书：《干禄字书》，页119。

<sup>30</sup> 张参（活动于776前后）：《五经文字》，见《四库全书》第224，卷上，页12。

<sup>31</sup> 颜元孙撰，颜真卿书：《干禄字书》，页98。

<p><b>足</b> (沈二·183)</p>	<p>《干禄字书》曰：“<b>足</b>足上通，下正。”<sup>32</sup></p>	正体
<p><b>足</b> (沈二·32)</p>		通体
<p><b>節</b> (沈二·87)</p>	<p>《干禄字书》曰：“<b>節</b>節上俗，下正。”<sup>33</sup></p>	正体
<p><b>節</b> (沈二·72)</p>		俗体
<p><b>於</b> (沈三·140)</p>	<p>《干禄字书》曰：“<b>於</b>於上通，下正。”<sup>34</sup> 《九经字样》“<b>於</b>”下</p>	正体（《干禄字书》、《九经字样》）
<p><b>於</b> (沈三·148)</p>		<p>曰：“本非从<b>於</b>，作<b>於</b>者讹。”<sup>35</sup></p>

上表显示，沈慕羽楷书的“经”、“能”、“宝”、“怀”、“足”、“节”、“于”七个字，皆含有正字与非规范的形体。沈氏既然重视六书，讲究文字形体的规范，为什么还要兼用非正体字呢？关于此问题，在他的文章里没有解说。可尝试从中国历代书法理论中探寻。

何延之（唐人，生卒年不详）《兰亭记》说：

《兰亭》者，晋右将军会稽内史琅琊王羲之字逸少所书诗序也。右军蝉联美胄，萧散名贤，雅好山水，尤善草隶。以晋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三日宦游山阴，与太原孙统承公、孙绰兴公、广汉王彬之道生、陈郡谢安安石、高平郗昙重熙、太原王蕴叔仁、释支遁道林并逸少子凝、徽、操之等四十有一人，

<sup>32</sup> 颜元孙撰，颜真卿书：《干禄字书》，页135。

<sup>33</sup> 颜元孙撰，颜真卿书：《干禄字书》，页137。

<sup>34</sup> 颜元孙撰，颜真卿书：《干禄字书》，页95。

<sup>35</sup> 唐玄度：《九经字样》，页14。

修拔契之礼，挥毫制序，兴乐而书，用蚕茧纸，鼠须笔，遒媚劲健，绝代更无。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构别体。其中“之”字最多，乃有二十许个，变转悉异，遂无同者，其时乃有神助。<sup>36</sup>

何氏指出王羲之（321-379）《兰亭序》中，20多个“之”字形体，具有“变转悉异，遂无同者”的现象。蔡希综（活动于天宝十二载[753]前后）对此现象有详尽的解说，他在《法书论》中说：





















右军云：“若作点，必须悬手而为之，若作波，抑而复曳。忽一点失所，若美女之眇一目；一画失所，如壮士之折一肱。可谓难矣。”每字皆须骨气雄强，爽爽然有飞动之态。屈折之状，如钢铁为钩，牵掣之踪，若劲针直下。主客胜负皆须姑息，先作者主也，后为者客也，既构筋力，然后装束，必须举措合则，起发相承，轻浓似云雾往来，舒卷如林花间吐。每书一纸，或有重字，亦须字字意殊。故何延之云，右军书《兰亭》，每字皆构别体，盖其理也。<sup>37</sup>

蔡氏引王羲之的书论，进一步申述，认为何延所谓的“每字皆构别体”，是为了达致“字字意殊”的效果。为了了解王羲之《兰亭序》的“之”字如何通过“变转悉异”，而产生“字字意殊”的变化，谨将神龙半印本《兰亭序》的25个“之”字列于下表，进一步分析：

<sup>36</sup> 张彦远（活动于9世纪）辑：《法书要录》，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6年，页99。

<sup>37</sup>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选编校点：《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页271-2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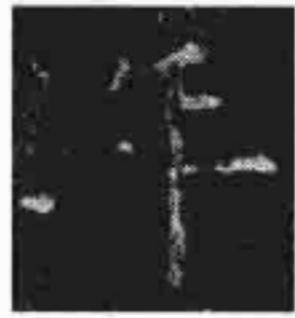







(表2)

 (兰 <sup>38</sup> ·14)	 (兰·14)	 (兰·15)	 (兰·16)	 (兰·16)
 (兰·16)	 (兰·16)	 (兰·16)	 (兰·16)	 (兰·17)
 (兰·17)	 (兰·17)	 (兰·17)	 (兰·17)	 (兰·17)
 (兰·18)	 (兰·18)	 (兰·18)	 (兰·18)	 (兰·19)

上表显示，王羲之《兰亭序》是通过点画的映带、俯仰、向背、伸缩、增损等变化，营造富有逸趣的不同形体。《兰亭序》是以行书写成，行书结体的变化空间比较大；楷书则属于端体书，结体的变化有所限制。究竟楷书是以怎样的方式表现出“字字意殊”的美感呢？王羲之是一位善于营造形体变化的书法家，可从他的楷书作品寻求解答。谨将王羲之《黄庭经》中同字异形的字例于下表：

<sup>38</sup> “兰”即王羲之：《兰亭序（五种）》，见《中国法书选》第11集，东京：二玄社，1988年。

(表3)

华	阴	年	咙	岁
 (黄 <sup>39</sup> ·28)	 (黄·29)	 (黄·29)	 (黄·29)	 (黄·28)
 (黄·29)	 (黄·29)	 (黄·31)	 (黄·30)	 (黄·30)

上表的“华”、“阴”、“年”、“咙”、“岁”，皆有两个不同的形体。显然，王羲之是采用异体字别构形体。换言之，楷书主要仰赖异体字来处理书艺的别构。

由此可知，以上所举沈慕羽楷书的“经”、“能”、“宝”、“怀”、“足”、“节”、“于”七个字，写正体，是因为沈氏的汉字形观以六书为本，所以讲求规范；写同字异构的非正体字者，则是为了追求书法形体变换的意趣而使用异体字。

#### 四、沈慕羽楷书形体溯源

蒋善国（1898-1986）《汉字形体学》说：

小篆是古文字的终点，今隶是今文字的开始，古隶是一个转折点；它结束了过去古文字的形体，开辟了汉代以后今隶和真书的形体，是古今文字的中间或过渡形式，是古今文字的分水岭。《说文序》说：“是时秦烧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戍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古文字的绝迹，便是今文字的开始，他这几句话描出了古隶对于汉字所起的作用。<sup>40</sup>




<sup>39</sup> “黄”即王羲之：《黄庭经》，见《中国法书选》第11集《魏晋唐小楷集》。

<sup>40</sup> 蒋善国：《汉字形体学》，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9年，页12。

蒋氏把汉字形体分为古文字与今文字。楷书虽然属于“今文字”，然而，楷书从篆书、隶书演变而来，其形体自然会受到古文字与隶变形体的影响。所以要探讨沈慕羽的楷书形体，可从书体演变的轨迹，追溯其本源。由于沈慕羽的汉字形体观以《说文》为宗，因此探索形体的本源时，仅上溯至小篆。以下将上述讨论的14个形体，列于下表分析：

## 1. 经

(表4)

形体	小篆	汉隶	魏晋南北朝楷书	沈慕羽楷书
字例				
	(说 <sup>41</sup> ·644上)	(尹 <sup>42</sup> ·28)	(郑 <sup>43</sup> ·64)	(沈三·169)
				
		(史 <sup>44</sup> ·13)	(瑒 <sup>45</sup> ·4)	(沈三·133)
解说	“经”字，许慎（约卒于120）《说文解字》说：“經，织也。从乡，至声。” <sup>46</sup> 汉隶中，《尹宙碑》写作  （尹·28），《史晨碑》写作  （史·13），都把“至”旁讹为“至”。沈慕羽楷书写作  （沈三·169），是依照小篆的结构隶定；写作  （沈三·133）的，那是源自《尹宙碑》与《史晨碑》一类的隶变形体。			

<sup>41</sup> “说”即《说文解字》，见[汉]许慎撰，[清]段玉裁（1735-1815）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sup>42</sup> “尹”即《尹宙碑》，见《书迹名品丛刊》第2集第9册。

<sup>43</sup> “郑”即《郑羲下碑》，见《中国法书选》第22集。

<sup>44</sup> “史”即《史晨前碑/史晨后碑》，见《中国法书选》第6集。

<sup>45</sup> “瑒”即《雍州刺史元瑒墓志》，见《北魏墓志百种》第9辑，第4片。

<sup>46</sup>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页644。

## 2. 能

(表5)

形体	小篆	汉隶	魏晋南北朝 楷书	沈慕羽楷书
字例	 (说·479下)	 (乙 <sup>47</sup> ·25)	 (崔 <sup>48</sup> ·54)	 (沈二·43)
		 (西 <sup>49</sup> ·27)	 (楨 <sup>50</sup> ·4)	 (沈三·121)
解说	<p>“能”字，《说文解字》说：“𧠆，熊属。足似鹿，从肉，𠄎声。能兽坚中，故称贤能；而强壮，称能杰也。”<sup>51</sup>《隶辨》“能”字下注解说明：“能，《说文》作𧠆，熊属，足似鹿，从肉，𠄎声；隶变如上，亦作能、𧠆。”<sup>52</sup>汉碑中，能字有写成“能”的，出现于《西狭颂》（西·27），顾藹吉《隶辨》没有收录。这个“能”字，右旁的上下部分以直线串连，是“能足”形体的讹变。沈慕羽楷书写作能（沈二·43），是按照小篆的结构隶定；写作能（沈三·121）的，那是源自《西狭颂》一类的隶变形体。</p>			

<sup>47</sup> “乙”即《乙瑛碑》，见《中国法书选》第4集。

<sup>48</sup> “崔”即《崔敬邕墓志铭》，见《中国法书选》第25集《墓志铭集》上册。

<sup>49</sup> “西”即《西狭颂》，见《中国法书选》第7集。

<sup>50</sup> “楨”即《元楨墓志铭》，见《中国法书选》第25集《墓志铭集》上册。


<sup>51</sup>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下册，页479。

<sup>52</sup> [清]顾藹吉（清朝人，生卒年不详）编撰：《隶辨》，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页229。



## 3. 宝

(表6)

形体	小篆	汉隶	魏晋南北朝 楷书	沈慕羽楷书
字 例	 (說·340上)	 (石 <sup>53</sup> ·71)	 (玄 <sup>53</sup> ·36)	 (沈一·134)
		 (禮 <sup>55</sup> ·4)	 (敬 <sup>56</sup> ·24)	 (沈二·71)
解 说	“宝”字，《说文解字》说：“寶，珍也。从宀，从王，从貝，缶声。博皓切。𠄎古文宝，省貝。” <sup>57</sup> 汉隶中，《石门颂》写作  （石·71），《礼器碑》写作  （礼·4），都将“缶”旁讹为“尔”。沈慕羽的楷书写作  （沈一·134），是依从小篆的结构隶定；写作  （沈二·71）的，那是源自《石门颂》和《礼器碑》一类的隶变形体。			

<sup>53</sup> “石”即《石门颂》，见《中国法书选》第3集。

<sup>54</sup> “玄”即《张玄墓志》，见《中国法书选》第26集《墓志铭集》下册。

<sup>55</sup> “礼”即《礼器碑》，见《中国法书选》第5集。

<sup>56</sup> “敬”即《敬史君碑》，见《书迹名品丛刊》第3集，第75册。

<sup>57</sup>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页340。

## 4. 怀

(表7)

形体	小篆	汉隶	魏晋南北朝 楷书	沈慕羽楷书
字 例				
	(说·505上)	(据 <sup>58</sup> ·8)	(宣 <sup>59</sup> ·4)	(沈二·46)
				
		(相 <sup>60</sup> ·63)	(猛 <sup>61</sup> ·18)	(沈三·69)
解 说	<p>“怀”字，《说文解字》说：“懷，念思也，从心，褻声。”<sup>62</sup>汉隶中，《孟孝琚碑》变作（琚·8）。《隶辨》于《景北海碑》“懷”字下注解说明：“变褻为褻，今俗因之。”<sup>63</sup>魏晋南北朝楷书进一步讹化，钟繇（151-230）《宣示表》写作（宣·4），北魏《张猛龙碑》写作（猛·18），右旁上部从十，中部从𠂔，下部省去衣旁上方的点。沈慕羽楷书作（沈二·46），是源自《孟孝琚碑》一类隶变形体；写作（沈三·69）的，那是源自魏晋南北朝楷书进一步讹变的形体。</p>			

<sup>58</sup> “琚”即《孟孝琚碑》，上海：艺苑真赏社（出版年缺）。

<sup>59</sup> “宣”即《宣示表》，见《中国法书选》第11集《魏晋唐小楷集》。

<sup>60</sup> “相”即《北海相景君碑》，见《书迹名品丛刊》第2集，第69册，东京：二玄社，1969年。








<sup>61</sup> “猛”即《张猛龙碑》，见《中国法书选》第23集。

<sup>62</sup>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页505。

<sup>63</sup> [清]顾藹吉编撰：《隶辨》，页27。

## 5. 足

(表8)

形体	小篆	汉隶	魏晋南北朝 楷书	沈慕羽楷书
字 例	 (说·81上)	 (鲁 <sup>64</sup> ·45)	 (韩 <sup>65</sup> ·17)	 (沈二·183)
		 (曹 <sup>66</sup> ·31)	 (顺 <sup>67</sup> ·9)	 (沈二·32)
解 说	“足”字，小篆写作“𠦪”，《说文解字》说：“从止、口”。 <sup>68</sup> 《隶辨》“足”字下注解：“足与《说文》同，从止从口，亦作𠦪，或作𠦪，变从之，亦作𠦪、足。” <sup>69</sup> 沈慕羽楷写作足（沈二·183），是依照小篆的结构隶定；写作𠦪（沈二·32）的，那是源自隶变的形体。			

<sup>64</sup> “鲁”即《汉鲁峻碑》，见《书迹名品丛刊》第172册。

<sup>65</sup> “韩”即《韩显宗墓志》，见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北魏墓志选粹》上册，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01年。

<sup>66</sup> “曹”即《曹全碑》，见《中国法书选》第8集。



<sup>67</sup> “顺”即《东安王太妃陆顺华墓志》，见《北魏墓志百种》第10辑，第9片。

<sup>68</sup>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页81。

<sup>69</sup> [清]顾藹吉编撰：《隶辨》，页202。

## 6. 节

(表9)

形体	小篆	汉隶	魏晋南北朝 楷书	沈慕羽楷书
字 例	 (说·189下)	 (迁 <sup>70</sup> ·41)	 (黄·27)	 (沈二·87)
		 (鲜 <sup>71</sup> ·9)	 (晒 <sup>72</sup> ·15)	 (沈二·72)
解 说	“节”字，《说文解字》曰：“筴，竹约也。从竹，即声。” <sup>73</sup> 汉隶中，《张迁碑》写作  （迁·41），《鲜于璜碑》写作  （鲜·9），都将“竹”部讹为“艹”部。沈慕羽楷书写作  （沈二·87），是依从小篆的结构隶定；写作  （沈二·72）的，那是源自讹“竹”为“艹”的隶变形体。			

<sup>70</sup> “迁”即《张迁碑》，见《中国法书选》第9集。

<sup>71</sup> “鲜”即《鲜于璜碑》，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1年。

<sup>72</sup> “晒”即《司马晒墓志》，见《中国法书选》第26集《墓志铭集》下册。

<sup>73</sup>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页189。

## 7. 于

(表10)

形体	小篆	汉隶	魏晋南北朝 楷书	沈慕羽楷书
字 例				
	(说·157上)	(史·64)	(猛·7)	(沈三·140)
				
		(孔 <sup>74</sup> ·18)	(牛 <sup>75</sup> ·5)	(沈三·148)
解 说	“于”字，《说文解字》“𪔁”字下说：“𪔁，古文乌，象形。𪔁象古文乌省。” <sup>76</sup> 《九经字样》“于”字下注解说明：“於本是乌鸟字，象形。古文作𪔁，篆文作𪔁，隶变作於。” <sup>77</sup> 魏晋南北朝楷书，进一步将左边的“方”旁讹为“才”，如《张猛龙碑》写作𪔁（猛·7），《牛橛造像记》写作𪔁（牛·5）。沈慕羽楷书写作於（沈三·140），是源自隶变的形体；写作𪔁（沈三·148）的，那是源自魏晋南北朝楷书讹变的形体。			

以上的14个楷书形体，或源自小篆，或源自隶变形体，或源自魏晋南北朝楷书讹变形体。将以上分析所得，列入第二节形体性质分析的图表一中，进行综合分析，可了解这14个形体的本源与所属规范性性质之关系。

<sup>74</sup> “孔”即《孔宙碑》，见《书迹名品丛刊》第1集，第11册。

<sup>75</sup> “牛”即《尉迟为牛橛造像记》，见《中国法书选》第20集《龙门二十品》上册。

<sup>76</sup>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页157。

<sup>77</sup> 唐玄度：《九经字样》，页14。

(表11)

字例	判断依据	性质	本源
<b>經</b> (沈三·169)	《九经字样》 曰：“經作經者 讹。” <sup>78</sup>	正体	小篆
<b>經</b> (沈三·133)		讹字	隶变形体
<b>能</b> (沈二·43)	《干禄字书》 曰：“能能上 通，下正。” <sup>79</sup>	正体	小篆
<b>能</b> (沈三·121)		通体	隶变形体
<b>寶</b> (沈一·134)	《干禄字书》 曰：“寶寶上 通，下正。” <sup>80</sup> 《五经文字》 曰：“寶从缶， 从尔讹。” <sup>81</sup>	正体（《干禄 字书》、《五 经文字》）	小篆
<b>寶</b> (沈二·71)		通体（《干禄 字书》） 讹字（《五经 文字》）	隶变形体

<sup>78</sup> 唐玄度：《九经字样》，页9。

<sup>79</sup> 颜元孙撰，颜真卿书：《干禄字书》，页111。

<sup>80</sup> 颜元孙撰，颜真卿书：《干禄字书》，页119。

<sup>81</sup> 《五经文字》卷上，页12。

<p>懷</p> <p>(沈二·46)</p>	<p>《干禄字书》 曰：“懷懷上 通，下正。”<sup>82</sup></p>	正体	隶变形体
<p>懷</p> <p>(沈三·69)</p>		通体	魏晋南北朝楷书讹变形体
<p>足</p> <p>(沈二·183)</p>	<p>《干禄字书》 曰：“足足上通， 下正。”<sup>83</sup></p>	正体（《干禄字书》）	小篆
<p>足</p> <p>(沈二·32)</p>		通体	隶变形体
<p>節</p> <p>(沈二·87)</p>	<p>《干禄字书》 曰：“節節上俗， 下正。”<sup>84</sup></p>	正体	小篆
<p>節</p> <p>(沈二·72)</p>		俗体	隶变形体

<sup>82</sup> 颜元孙撰，颜真卿书：《干禄字书》，页98。

<sup>83</sup> 颜元孙撰，颜真卿书：《干禄字书》，页135。

<sup>84</sup> 颜元孙撰，颜真卿书：《干禄字书》，页137。

 (沈三·140)	《干禄字书》 曰：“於於上 通，下正。” <sup>85</sup> 《九经字样》	正体（《干禄 字书》、《九 经字样》）	隶变形体
 (沈三·148)	“於”下曰： “本非从於，作 於者讹。” <sup>86</sup>	通体（《干禄 字书》） 讹字（《九经 字样》）	魏晋南北朝楷 书讹变形体

上表显示沈慕羽所用的正体字，主要源自小篆，部分源自隶变形体；所用的书法别构字，则源自隶变形体，或源自魏晋南北朝楷书讹变形体。沈氏楷书的“於”或“懷”字，虽然都源自隶变形体，然而，在《干禄字书》与《九经字样》中则属于正体字。这与颜元孙和唐玄度拟定正体字的标准有关。颜元孙《干禄字书·序》说：

字书源流，起于上古。自改篆行隶，渐失本真。若总据《说文》，便下笔多碍；当去泰去甚，使轻重合宜。<sup>87</sup>

唐玄度《九经字样·牒文》曰：

古今体异，隶变不同。如总据《说文》，即古体惊俗；若依近代文字，或传写乖讹。今与校勘官同商较是非，取其适中，纂录为《新加九经字样》壹卷。<sup>88</sup>

从以上的引文，可知颜元孙与唐玄度拟定正体字，采取折中的态度，除了依据《说文》，也部分接受隶变的形体，这就是所谓的“从俗”。换言之，沈慕羽的正体字，部分也从俗，而非完完全全依从《说文解字》。

<sup>85</sup> 颜元孙撰，颜真卿书：《干禄字书》，页95。

<sup>86</sup> 唐玄度：《九经字样》，页14。

<sup>87</sup> 颜元孙撰，颜真卿书：《干禄字书》，页83-84。

<sup>88</sup> 唐玄度：《九经字样》，页1。



## 五、结语

沈慕羽研习《说文解字》，从而构成个人的汉字形体观，无论解说汉字的特质，辨识汉字与其它文字的差异，或论述汉字的简化等等，皆以“六书”为本。此观念反映于书法，则重视形体规范。不过，他所用的正体字，有从俗的成分，而非完全依从《说文解字》。此外，他的书法别构字，不仅有源自隶变的形体，还有源自魏晋南北朝楷书讹变的形体。这说明沈氏的楷书形体，在尊崇《说文解字》的同时，也接纳随着书体演变而讹化的形体。综合言之，他的楷书形体，即讲求形体的规范，也兼容书艺的别构。

---

# 作者简介

---

**廖文辉**，祖籍福建安溪，马来西亚吉隆坡人。台湾国立大学历史系，马来亚大学中文研究所硕士，中国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历史学博士。曾先后服务于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以及母校尊孔独中，2003年开始任教于新纪元学院中文系至今。曾参与中国之《世界华侨华人百科全书》和新加坡之*Southeast Asian Personalities of Chinese Descent: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的撰写，著有《华校教总及其人物（1951-2005）》、《华教历史与人物论集》，编有《百年尊孔大事纪年稿》、《许云樵来往书信集》和《沈慕羽资料汇编》系列丛书，有约30余篇学术论文发表于国内外期刊杂志。研究兴趣是东南亚史和华侨华人，近来专注于重现南洋研究学术传统的面貌和内涵。

**黄建淳**，1956年生于台湾台北市。中国文化大学地理系理学士，民族与华侨研究所法学硕士，史学研究所文学博士。1992-1993年曾任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访问学人；1997-1998年奉行政院国科会核定“砂拉越研究计划”，旅居诗巫一年。1999年1月出版一部近64万言巨著《砂拉越华人史研究》，2001年荣获中山学术研究奖，名重士林。其它专著如《新加坡华侨会党对辛亥革命影响之研究》、《晚清新马华侨对国家认同之研究》、《中华玉器文化特展图典》等，并发表有〈维新派与革命派在新马侨社的发展（1900-1911）〉〈红山玉器图腾文化中的鸟与牛〉等30余篇学术论文。现任台湾淡江大学历史系专任教授，讲授“东南亚华人史专题研究”、“中国玉器美术史研究”等课程。

**曹淑瑶**，史学博士，台湾东海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研究领域是海外华人研究、星马华文教育。近年来之研究，集中于海外华人在多种族社会的处境下对于华文教育的受教权之争取、战后台湾的小留学生议题，以及东南亚华商经贸网络之建立发展与现况等。相关研究成果有〈近20年来台湾与越南的经贸发展〉，《新世纪的海外华人变貌》新竹：玄奘大学海外华人研究中心，2009年5月，页193-241；〈马来西亚韩江学院的创办与发展——‘华人’学院抑‘华文’学院？〉，《亚太研究论坛》第43期，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亚太区域研究专题中心，2009年3月，页206-234；（合著）“Chinese Secondary Education in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Liao Shaolian ed., *Malaysia and the Sino-Malaysian Relations in a Changing World*. Xiamen: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pp162 -186, 2008.12.;（合著），〈近代东南亚华族移民重商原因之探讨〉，《Journal of Diaspora Studies》，第2卷第1期，2008年6月，页149-168；〈背洋书包的东方孩子：战后留学美加地区的台湾小留学生〉，收录于夏诚华编《新世纪移民的变迁》，新竹：玄奘大学海外华人研究中心，2006年4月，页305-332。

**张荣强**，马来亚大学博士，现任职于加影育华中学。生于霹雳州金宝，中六毕业后，曾当独中和小学临教，后进入师训学院受训。毕业后，被派往加影育华小学执教。2008年马大中文系（华人社会研究组）博士毕业，博士论文为：《马来西亚华教运动：探讨董教总的斗争（1970-2002）》。研究兴趣范围：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曾在马来西亚社会学国际研讨会（MSC）、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PEMIKIR(巫文)学刊等发表有关马来西亚华文教育课题的论文。

**庄华兴**，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博士，现任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外文系中文学士课程讲师、大马翻译与创作协会秘书。研究方向包括马华文学主体建构、马来文学与国家话语、文学翻译与文化生产、大马华族文化思潮。以中文和马来文创作、撰写学术论文与翻译。中文著作有《端倪：大马译创会中文文集一》（主编，1998年）、

《寂寞求音：林天英诗选（1972-1998）》（编译，2000年）、《伊的故事：马来新文学研究》（2005年）、《绵延：大马译创会中文文集二》（主编，2006年）、《国家文学：宰制与回应》（编著译，2006年）及马来文著作Putik（新蕾：大马译创会马来文集）（主编，2003年）、*Cerpen Mahua dan Cerpen Melayu: Suatu Perbandingan*（马华—马来短篇小说比较研究）（2006年）、*Salam Malaysia: Antologi Terjemahan Puisi Mahua*（问候马来西亚：马华诗歌选译）（编译，2006年）及博士论文“Sastera Mahua Dalam Gejala Kritikan dan Pensejarahan: Satu Proses Penerokaan Jati Diri”（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现象：马华文学主体性探索）。

**黄进发**，英国埃塞克斯（Essex）大学比较民主化博士班研究生，专攻选举制度、族群政治与政党体系。现为莫纳斯大学双威分校新闻学讲师，工余活跃于公民社会与评论写作，专注于民主化与言论自由。他赴英深造前曾任华团大选诉求工委会执行秘书。最新学术著作有“Malaysia at 50: An Electoral One-Party State?”，收录于Abdul Razak Baginda（2009）编、Malaysia Strategic Research Centre出版的*Governing Malaysia*。其中文版〈马来西亚50年：选举型一党制国家的打造〉则收入孙和声与唐南发（2007年）编著、燧人氏出版的《风云五十年：马来西亚政党政治》一书。

**吴前进**，上海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研究员。1986年上海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毕业，获法学士学位。1993年获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学硕士学位。目前主要从事当代海外华人问题及其与国家关系的研究。著作有：《国家关系中的华侨华人和华族》、《美国华侨华人文化变迁论》。主要论文有：《当代移民的本土性与全球化——跨国主义的视角分析》、《跨国主义：全球化时代移民问题研究的新视野》、《多边关系中的华族困境及其选择》、《华人社团的跨国实践和网络功用——冷战后海外华人社团的现状与发展趋势》、《冷战后华文教育与中国——东南亚国家之关系互动》、《华侨华人问题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持久性》等。

**叶汉伦**，马来亚大学东亚研究系荣誉文学士、硕士。先后服务于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马来亚大学、新纪元学院、马来西亚高等教育部；现任新纪元学院学生事务处主任。研究兴趣包括中国近现代思想、马新华人社会及中国儒学发展史。撰有《做事·做官·做人：黄家定的政治人生》（与黄文斌合著）（2009年）、〈史德与文德：论章学诚对学者心术与文史结合的观点〉（2008年）、〈大哉孔子：论钱穆对孔子历史文化地位之评价〉（2007年）、〈新世纪的中国民族主义：政治纠葛与文化想象之间〉（2006年，马来文）等。

**李乾耀**，拉曼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博士。博士论文为《欧阳询楷书形体研究》。论文有〈《论语》与《庄子》中的孔子：“为学”与“为道”的两种思想〉，《传统中国研究集刊》（上海社会科学院）第六辑，2009年6月；〈诗文书画的融通：道源“文”体艺用〉，《第三届中国古典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新纪元学院）2009年。研究兴趣包括传统中国书法、古典文学与书道等。

---

# 主编简介

---

**何启良**，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院长、教授。教学、研究专长为政治政策研究、行政改革、新马关系、新马华人等。中文编著有《政治动员于政治参与——大马华人政治述论》（论文集）、《面向权威》（时评集）、《文化马华》（论文集）、《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共三册）（合编）（论文集）、《马来西亚华人思想与人物：匡政与流变（政治篇）》（编著）（论文集）。英文著作有：*The Politics of Policy-making in Singapore;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Global Changes and Regional Challenges, ed.* 共发表中英论文80余篇。目前从事有关马来西亚华人思想、沈慕羽日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政治治理等研究课题。

# 主编简介

- 《1952年教育法令》 100、108、160、196  
《1954年教育白皮书》 108、115、196-197  
《1957年教育法令》 108  
《1961年教育法令》 158、161、197、233  
1967年国语法令 158、169  
《1996年新教育法令》 59  
《2006-2010年教育发展大蓝图》 205  
2020宏愿 184  
3M 103、116、135、139-141、145、233
- A**  
阿都拉 60、103、145、150  
阿都拉萨 (Abdul Razak) 101  
《阿兹报告书》 77  
阿兹薪金制 134  
艾青 41  
艾森豪威尔 5  
安华 117  
安顺三民学校 9
- B**  
《巴恩报告书》 99、100、107、196  
巴基斯坦 14、23  
巴黎 21  
巴生共和学校 106
- 峇株峇辖国民学校 159  
白鸿川 24  
比利时 21、25、38、39  
槟华女中 43  
波士顿 14、30、34、51  
伯夷叔齐 80  
伯圆 74
- C**  
蔡士章 68  
蔡添强 117  
蔡希综 260  
蔡元培 220  
陈衡哲 13、30、42  
陈嘉庚 105、118、206  
陈金声 118  
陈昆楼 15  
陈立夫 71  
陈六使 119  
陈奇禄 71  
陈清水 10  
陈绍贤 107  
陈省身 33  
陈淑婷 75  
陈铁凡 253  
陈文宣 24  
陈修信 10、23、39、46、102、114、138、141、149、152、165-167、174、176-178、196、232  
陈亚才 130、135、142

- 陈寅恪 244  
 陈祯禄 6、10、109、113、122、  
 175、226  
 陈志明 203、243  
 晨钟励志社 112、225、226  
 晨钟励志社青年部 113  
 晨钟夜学 57、61、80、112、  
 115、219、220、222-224  
 《晨钟夜学六二回顾特辑》 223  
 初级教育文凭考试 101  
 《出使四国日记》 41  
 传统博物馆 83
- D
- 《达立报告书》 102、108、109、  
 121  
 大马佛教大学 72  
 大马华人 114、123、160、177、  
 205、217、220、242、243、  
 245-247  
 大马华社 53、82、157、206  
 大马华文教育运动 225  
 大战纪念堂 15  
 德国 21、38  
 德国使馆 13  
 第二次世界大战 32、67、99、  
 221  
 第一次世界大战 99、122  
 第二届马来语文大会 (Persidangan  
 Persuratan Melayu Sa-Malaya  
 Kali Kedua) 159  
 第三届马来语文大会 (Kongres  
 Bahasa dan Persuratan Melayu  
 ke-3) 159  
 地理学会 13、27  
 东姑阿都拉曼 6、109、162  
 董颢光 12  
 董教总 57-59、77、80、97、103、  
 104、116、128、132、135-137、  
 139、141-143、146、149-151、  
 167、173、179、195、205、  
 227、229  
 董教总教育研究中心 59、74、  
 128、149  
 董寿平 250  
 董总 101、111、117、128、132、  
 134-137、144、148、149、151、  
 152、195  
 董总主席 104、116、134、135、  
 139、140、149、151  
 独大 102、135、141、167、  
 186、224、231、232  
 独大理事会 149  
 独大运动 130、134、135、  
 141、144、232  
 独立中学 102、103、108、  
 116、121、127  
 独中 59、128、135、137、  
 144、200、224、237  
 独中毕业生 102  
 独中工委 135  
 独中教育 151  
 独中统考 103  
 多元文化 81、83、94、109、192、  
 201、205、213、215、245
- E
- 讹字 258、259、270、272  
 而连突华校教师公会 147
- F
- 法国 21、38、177  
 法兰克福 21、22  
 《方吴报告书》 (Fenn-Wu  
 Report) 100  
 方言教育 99  
 菲律宾 12、161  
 菲律宾华侨中学 7  
 冯镇安 223  
 福斯福大学 31



- 福特博物馆 15  
福特汽车工厂 15
- G
- 歌德故居 21  
哥伦比亚大学 13、29、30  
共产党 123、145、163、175  
公民权 6、51、102、109-111、  
115、119-121、124、125、145、  
165、178-180、225、226  
公民权运动 113、115、120、219  
顾蔼吉 264  
顾叔廉 111  
顾毓瑞 12  
顾兴光 173、175  
瓜拉比勝中学 76  
官方语文 21、39、46、55、59、  
69、102、114、127、128、134、  
138、139、145、159-162、  
164、168、170、174、176、  
179-182、186、194、195、  
200、230  
官方语文运动 138、141、142、  
161、163、186、229  
关崇焕 13  
关公 238、250  
关镜池 13  
广福宫 86  
《光华日报》 68  
国家教育政策 100、105、142、  
167、203、206  
国家认同 51、100、121、123、  
175、205、209、210、214  
国家文化 152、192、199、201、  
214  
国家文化奖 78  
国家语文馆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159  
国民党 9、24、69、71、106、  
162、173、175-177、186、208、  
228  
国民型学校 60、102  
国民型中学 60、110、200  
国语 16、27、34、35、117、  
129、135、138、143、145、  
159、162、166-169、174、  
179-182、202、206  
国语法案 159、168  
国阵 58、117、136、140、  
150、184、186、219、233  
国阵政府 57、146、185  
郭沫若 256  
郭全强 119  
敦赛阿末赛马木沙哈布丁 72  
郭嵩焘 52  
郭则钦 20
- H
- 哈佛大学 14  
海外华教 119  
海外华人 71、86、93、112、  
119、125、192、213  
海外华人社会 210、215  
海外华族民族主义 99、112、122  
好莱坞 27  
荷兰 20、38  
何葆仁 112  
何国忠 97、98、205、242  
何启良 55、61、76、80、98、  
123、128、131、139、142、  
145、151、163、174、  
176-178、183、185、186、  
207、220、228、234、241、  
243、244、246  
何延之 259、260  
宏愿学校 104、117、142  
侯士 7、20  
胡锦涛 211、212  
胡良珍 21  
胡适 13、30、42、45、220  
胡万铎 139

- 华教 7、8、57-59、61、69-74、  
 76、77、81、83、102、104、  
 108、110、115-118、121、129、  
 130、132、133、135-137、  
 139-144、146、149-152、157、  
 158、163、164、167、199、  
 202-207、209、217、222、224、  
 228、230、233、234、237-240、  
 245、246  
 华教斗士 98、118、119、139、  
 140、191、196、201、203、  
 204  
 华教节 111  
 华教人士 7、8、70、72、78、  
 97、104、113、118、119、  
 123、136、137、139-141、  
 146、149、164、195、206、  
 209、211、214、233、245  
 华教史 56、74、111、219  
 华教运动 60、77、78、116、  
 127-132、134-137、139-144、  
 146、148-152、157-161、165、  
 173-176、182、219、220、  
 225、235、237  
 华侨 15、24、33、34、56、  
 123、125、212  
 华侨公立第一小学 112  
 华人 98-100、108、110、113-116、  
 120、122、132、138、141、  
 142、145、151、152、159-162、  
 165-167、174-180、182、183、  
 185、191、192、194、198-203、  
 205-212、214、215、219、  
 220、223、226、230、232、  
 234、240、241、245、246、  
 249、254、256  
 华人参事局议员 113  
 华人大团结运动 152、219  
 华人公民权 145、165  
 华人领袖 109、145、167、180、  
 226  
 华人沙文主义 109  
 华人社会 55、57、63、66、117、  
 137、141、165、193-196、  
 204、205、207、210、212、  
 214、215、243  
 华人文化 160、161、195、198、  
 201、208-210、213-215、217、  
 241、243、245-247  
 华社资料研究中心 152  
 华盛顿 12、25-27、34  
 华盛顿市麦坚利高级中学 12、25  
 华文 21、34、39、43、46、55、  
 59-61、69、103、108、109、  
 115、117、127-129、134、  
 138、141、145、159-162、  
 164-166、168、170、174、  
 178-182、186、193-195、200、  
 205、206、209、223、228-230、  
 232、233、243、255、256  
 《华文独立中学联合建议书》  
 103  
 华文独中工委 149  
 华文教育 5-7、9、48、52、53、  
 55、57、59、71、72、75-77、  
 80、94、97-102、104、105、  
 107、108、111、113、115-117、  
 119、121、123、126、128、  
 129、133、137、140、142、  
 143、147、150-152、158、160、  
 161、174、180、182-184、  
 192-209、211、214、219、224、  
 232-234、240、242、275  
 华文教育咨询委员会 101  
 华校教师职工会 9-10、55  
 华裔马来西亚人 187  
 华语 7、97、101、104、109、  
 114、116、117、125、138、  
 139、142、144、145、152、  
 159、162、164、180、  
 192-194、203、206、209、  
 210、223、227、231、233

华族知识分子 4、47、49、50、  
53  
黄光男 85  
黄家定 79、114  
黄金炳 74  
黄锦树 242  
黄润岳 45、48-50、119  
黄伟强 135  
黄文斌 242  
黄沃泉 34  
黄兴宗 13  
黄仰英 8  
黄遵宪 85  
《回忆片片录》 163  
火炬运动 108、115

## I

Ibrahim Saad 167

## J

吉池 67  
吉兰丹华校教师公会 147  
吉兰丹晋江会馆 60  
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 107、147、  
228  
吉隆坡联邦直辖区教育局 103  
吉隆坡天后宫 70、233  
吉隆坡尊孔 74、103  
基督精神教会母会 14  
集美师中学校师范部 105、106  
甲必丹 68  
甲华人参事局议员 55  
加藤教授 14  
加影董教总教育中心 74  
加影育华学校 106  
嘉化峇峇 10  
蒋复璁 71  
蒋介石 123  
蒋善国 262  
蒋勋 44

《姜桂集》 74  
《教师杂志》 163  
《教学笔记》 73  
教育检讨委员会 101  
教育政策 104、118、137、141、  
142、162、198、205、229、  
244  
教育政策检讨委员会 102  
教总 7-9、55-58、64、69、71、  
72、74、77、100、101、108、  
111、117、118、127-137、  
140、142-144、146-152、158-  
160、162、167、175、195、  
196、200、205、219、225、  
229、231、234、237、239  
《教总33年》 137  
教总沈慕羽教师奖 118  
教总主席 55-57、71、72、74、  
77、97、102、104、108、109、  
114、116、117、120、127、  
128、134、146、149、151、  
181、219、228、230  
杰弗逊纪念馆 12、26  
晋江会馆 122  
金马仑华校教师公会 147  
《景北海碑》 266  
旧金山 34、43

K  
楷书 249、250、252、257、259、  
261-266、268、269、271-273  
抗日义士纪念碑 67  
康有为 4、40、41、45、51  
柯嘉逊 58、164、185  
孔教会 61、62、64、66、76、  
77、239、240  
孔祥金 62  
孔翔泰 64  
孔子 62、63、117、198、199、  
236、239、240

- L
- 拉曼达立教育报告书 102、134
- 拉曼大学 118、200
- 拉曼耶谷 168
- 《拉萨教育报告书》 101、115、134、197
- 赖家球 12
- 赖瑞和 41
- 赖淑娟 56
- 《兰亭序》 260、261
- 郎静山 71
- 劳工党 162、163
- 黎巴嫩 23
- 《隶辨》 264、266、267
- 李成枫 118
- 李登辉 124
- 李光前 118
- 李光耀 164、165、181、182
- 李锦兴 243
- 李良 124
- 李美舍 15
- 李妙玲 15
- 李三春 141、176、227
- 李天禄 71
- 李万千 164
- 李伟伦 75
- 李孝式 102、232
- 李孝友 114、176、227
- 李亚遨 52
- 李玉佑 20
- 李志贤 13
- 《礼器碑》 265
- 《离骚》 253
- 《礼运大同篇》 63
- 联邦直辖区教育局 103、129、135
- 联合邦教育部 7、106
- 联合邦政府 99-104、108-110、114
- 联合邦中央教育咨询委员会 100
- 联合国 13、30、43、67、194、201、211
- 联盟政府 6、161、177、180、183
- 连士升 45、48-50
- 梁锦源 15
- 梁卢泰 13
- 梁启超 40、45、51
- 梁树漠 24
- 梁宇皋 102、109
- 梁章钜 251
- 廖文辉 8、52、55、118、119、127、129-131、135-140、144-146、148、150、219
- 廖中莱 114
- 林采仁 106
- 林苍佑 113、178
- 林晃昇 104、116、119、134、136、146、148、149、151、164、185、186、206
- 林肯 37、38
- 林连玉 8、56、64、73、74、77-80、97、98、100、102、105-111、115、117、119-121、124-130、134、146、157-160、162-164、170、173、181、186、195-197、199、206、218、219、229、243、244
- 林连玉基金 74、111
- 林连玉精神奖 72、111
- 林良实 60、70、103、114
- 林文炳 24
- 林文庆 224、243、253
- 林语堂 23
- 凌崇熙 12
- 刘海粟 48
- 刘和 12
- 刘庆伦 238
- 刘志良 24
- 六书 254-257、259、262、273

- 六艺 254、255  
 柳下惠 80  
 陆庭谕 60、73、103、119、  
 129、130、135、144、  
 146-149、197、233  
 陆游 40  
 鲁迅 45  
 卢振樵 8-10、76  
 吕鸿元 177、178  
 伦敦 19、20、38  
 骆静山 242  
 骆传华 12  
 罗光 71  
 罗马 19、22  
 罗马字母 159、255、257  
 洛杉矶 27
- M
- 马共 113、158、163、170、175  
 马哈迪 116、117、168、205、  
 213  
 马华公会 6、10、46、55、70、  
 79、97、100、102、108、109、  
 113、114、117、122、123、  
 138、161、162、165-167、169、  
 174、175、181、186、195、  
 196、219、226-232  
 马华公会青年团 10、55、114、  
 219、226  
 马华公会中央工作委员会 229  
 马华总会长 70、79、114、118、  
 138、152、168、176、178  
 马来民族国家 158、169、203  
 马来民族主义 99、142、165、  
 202  
 马来人 6、99、100、159、160、  
 65、168、169、179-185、198、  
 205、206  
 马来文 100、145、159、166、  
 167、174、181、182、186、  
 201、206、207、244  
 《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大选诉求》  
 60  
 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奖 70  
 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 70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 74  
 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  
 100、195  
 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 54、  
 57、100、108、219  
 马来亚党 175  
 马来亚独立运动 113  
 马来亚共产党 6、99  
 马来语 6、100、145、159、  
 167、169、179、181、182、  
 202、203、206  
 马来政治霸权 168  
 马六甲晨钟励志社 67  
 马六甲晨钟夜校 194  
 马六甲华侨青年 112  
 马六甲华人参事局议员 10、219  
 马六甲华校教师公会 59、60、  
 67、69、113、115、175、228  
 马六甲晋江会馆 60  
 马青总团长 114、139  
 马英九 76、118、124  
 曼谷 20  
 茅草行动 46、74、76、104、  
 127、140、145、174、219、  
 234  
 毛松年 123  
 毛泽东 256  
 毛子水 71  
 梅拔群 15  
 梅光中学 24  
 梅友煦 15  
 美国 5、6、10-13、15、17、18、  
 20、25-30、32-39、42-44、48、  
 51、72  
 美国国会 13  
 美国国务院 5、8、76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 32

美国教师总会 13、27

美国新闻署 (USIA) 5

《孟孝琚碑》 266

孟子 108、236

缅甸 24、59

缪经田 13

民权委员会 152

民族意识 83、147、173、174

民族主义 56、99、112、122、  
160、161、163、168、170

莫泰熙 119

牟宗三 71

慕沙希旦 103

母语教育 6、7、55、57、61、  
97、98、102、104、109、  
110、135、140、141、158、  
200、202、203、233

## N

拿督哈伦 (Datuk Harun bin Haji  
Idris) 168

拿督沈慕羽路 (Jalan Datuk Sim  
Mow Yu) 118

纳吉 104、150、184

南方学院 200、206

南沈北孔 64

南洋大学 23、49

《南洋商报》 60、68、72、97

《内安法令》 46、74、116、  
125、234

倪文亚 123

牛津大学 99

《牛橛造像记》 269

纽约 13、14、20、25、27-30、  
34

## O

《欧非胜览》 49

欧里尔 86

欧美博物馆 94

《欧游随笔》 48

欧洲 38、39、48

《欧洲十一国游记》 40、41

## P

PAA办事处 12、13、28

潘贤模 15

潘永强 133、134

潘正联 235

培德女校 122

培风中学 70、111、112、115、  
117

培南中学 237

彭亨州华校教师公会联合会 147

彭启平 12

彭松涛 236

霹雳爱大华国民学校 106

平民小学 57、115、221、223

濮德介 23

## Q

钱穆 71、246

秦公辑 250

青云寺 86

青云亭 68、93

邱菽园 243

邱祥炽 70

全国华人团结大会 46、114

《全国华团联合宣言》 152、233

全国华团民权委员会 233

## R

人民党 162、167

人民行动党 173

任雨农 70、74、235

日内瓦 22、23

柔佛州华校教师公会联合会 147

儒家思想 46、61-63、93、115、  
164、240、244

儒家文化 46、210-212、214

儒家文化历史文物特展 93

瑞士 22、38

## S

赛那雪 10

三保井 68

三保山 67、68、93、152、233

三大机构 101、108、115、195

森美兰中华中学 9

莎士比亚 21、85

莎士比亚研究所 85

沙文主义 131、176、181、201、  
202

《煽动法令》 46、55、74、125、  
173、175、185、232

上海国立暨南大学 7

社阵 161、173、175

沈鸿柏 111、121、122、162、  
218

沈鸿恩 122

沈慕尧 61

沈慕羽 3-5、7-12、25、27、30、  
35、38-46、50-53、55、56、  
58、61、69-71、73-76、97、  
98、104、105、111-119、121-  
152、157-170、173-187、191-  
200、203-208、213-215、217-  
241、243-247、249、252-254、  
256、257、259、262-269、  
272、273

沈慕羽出版基金 74

沈慕羽大专奖励金 74

沈慕羽法律基金 74

《沈慕羽翰墨集》 74、239

《沈慕羽翰墨集二》 74

《沈慕羽翰墨集三》 74

沈慕羽纪念馆 54、56、73、81-  
83、93、94

《沈慕羽日记》 4、5、25、

39-42、44、45、50、52-54、76

沈慕羽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76

《沈慕羽言论集》 74

《沈慕羽资料汇编》 55、74、76、  
160、162、163、165、225

沈慕周 66、112

沈体 64、111、235、238、239、  
250

沈志明 64

《神墨碑林》 64

《史晨碑》 263

施家佐 24

士拉央侨民学校 106

《石门颂》 265

《石在火不灭》 74、174、176、  
178-181、185

舒乙 209

《说文》 263、264、267、272

《说文解字》 252-255、257、  
263、264、266-269、272、273

宋高宗 183

宋旺相 243

苏启慧 73

苏雪林 71

苏莹辉 253

## T

台北经济文化中心 124

台东卑南遗址博物馆 83

台静农 71

台湾 12、56、69、71、75、76、  
83、85、93、116、124、126、  
199、200、202、204、208、  
239、256

台湾行政院文化奖 71

泰国 24、59

太平洋战争 23、37、66、67、  
225

谭正文 13

堂联 111

唐玄度 272

- 童纪唐 24  
 同盟会马六甲支部 122  
 通体 258、259、270-272  
 《图说沈慕羽》 58、74-75
- W
- 《晚节飘香续集》 74  
 王超群 74、146、148  
 王大琅 24  
 王赓武 119  
 王辉 24  
 王宓文 48、111、225、253、  
 254、257  
 《王宓文诗文集》 253  
 王羲之 259-262  
 王修齐 34  
 王壮弘 251  
 汪永年 43  
 魏维贤 132  
 《微型华小调查报告》 205  
 文冬华校教师公会 147  
 文化民族主义运动 160  
 文化人 9、47、50、61、217、  
 244  
 文化认同 82、125、203、210、  
 212、215、241  
 文化政策 195、211、213、215  
 文天祥 239、250  
 文物馆 66、73、118  
 温源宁 23  
 翁诗杰 118  
 〈我如何与翰墨结缘〉 249、253  
 乌拜德拉 71  
 乌斯曼阿旺 (Usman Awang)  
 163  
 吴伯雄 118、124  
 吴德芳 71  
 吴德耀 100  
 吴京 71  
 吴经熊 71
- 吴毓腾 7  
 吴仲坦 10  
 《五经文字》 257、258、270  
 伍伦 15  
 伍锡璋 13  
 巫语 22、100、102、103、109
- X
- 西班牙 26  
 西北大学 31  
 西尼华沙甘 138  
 《西狭颂》 264  
 《西行书简》 40  
 西游记 20  
 希腊 23、38  
 厦门 105、119、126  
 厦门大同国小 119  
 《鲜于璜碑》 268  
 香港中文大学 203  
 孝恩园 67  
 萧介珊 24  
 小泉纯一郎 67  
 小篆 262-265、267-272  
 谢敦禄 102  
 谢升溥 56  
 谢诗坚 161  
 谢文庆 169  
 《新大陆游记》 40、51  
 新德里 23、24、39  
 新纪元学院 58、60、77、132、  
 200、224  
 新加坡 6、9、10、12、24、32、  
 34、48、138、161、165、173、  
 174、181、182、202、256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 165  
 新教育法令 60、102  
 新马华知识分子 49、50  
 《星洲日报》 68、74、114、  
 136、140、164、229  
 熊式一 23



徐霞客 49  
 许慎 254、263  
 许云樵 48-50  
   《宣示表》 266  
 薛福成 41  
 雪兰莪 100、106  
 雪兰莪医药补助队 106  
 雪兰莪中华大会堂 74、140

Y

雅典 23  
 亚特兰大城 19  
 颜元孙 272  
 颜真卿 235、236、249、250、  
   257  
 严元章 78、119、224  
 仰光 24  
 杨文伯 13  
 杨应俊 58  
 杨裕兰 13  
 姚丽芳 130、131、133、143、  
   146  
 姚拓 71  
 叶昌炽 251  
 叶鸿恩 135  
 叶剑英 85  
 叶新田 58、140  
 印度 23-26、32、38、39、163  
 印尼 7、161、163  
   《尹宙碑》 263  
 英国 6、19-21、38、48、85、  
   99、124、193、213  
   《英伦见闻》 45、48  
 英女皇 10、36、55、219  
 英属马来亚 97、99  
 英殖民地政府 98、99、107、  
   113、115  
 永春太平国小 119  
 郁达夫 40  
 育南学校 73

余秋雨 40  
 余养棵 20  
 余英时 71、217、242  
   《语石》 251  
 语文教育 59、178、230  
 语言 21、25、33、36、39、  
   100、107、109、113、158、  
   173、180、181、194、202、  
   203、209-211、223  
 宇野精 71  
 袁奕沛 15  
 岳飞 183

Z

曾崇文 164、179  
 曾恩波 12  
 曾庆豹 242  
 曾文珩 133  
 曾永森 145、256  
 曾宗麟 13  
 扎峇 (Za' ba) 159  
 张礼千 225  
   《张猛龙碑》 266、269  
 张木钦 78  
 张其昀 71  
   《张迁碑》 268  
 张树德 10、16、35  
 张雅山 58、136  
 张元济 220  
 赵百川 13  
 赵颂周 111、253、254  
 政党政治 136、137、139-141、  
   149、151、163、173、174、  
   185、186、194、226、229-231  
 政治认同 99、119、125  
 郑和纪念馆 66  
 郑良树 46、74、126、161、  
   166、176、218、223、228、  
   241、243  
 郑文胜 10

- 郑彦棻 124  
 郑振铎 40  
 正体 258、259、262、270-272  
 证严法师 71  
 芝加哥 15、25、30-35、37  
 芝加哥大学 15、31-33  
 知识分子 47、50、53、121、  
 159、242  
 《中国报》 68、256  
 中国城 13-15、33、34  
 中国国民党 112、113、118、  
 119、122-124、227  
 中国国民党马六甲直属支部 112  
 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马六甲  
 支团 112  
 中国文化大革命 161  
 中华民国 51、112、116、118、  
 122-125、175  
 中华民国国民党 162  
 中华总商会 122  
 中学联音乐大会 17  
 中央大学 112  
 中央公园 13、14、30  
 钟乐臣 78、119  
 钟灵中学 43、101  
 钟敏璋 6-10、97、98  
 钟叔河 47  
 钟繇 266  
 周恩来 212  
 《周礼》 254  
 周树 75  
 周星衢 32  
 周宇凡 15  
 周曾谏 32  
 周曾琰 15  
 周作人 45  
 朱抚松 12  
 朱宏源 56、202  
 朱子 19  
 朱自存 74  
 祝家华 206  
 庄迪君 104、129、130、133、  
 148  
 庄金秀 70  
 庄叔永 17  
 庄希泉 78、119  
 庄泽宣 15、32  
 子贞 110  
 《祖国记行》 48  
 族魂 78  
 族英 78  
 尊孔中学 106、110  
 佐哈励 102、109、162